

彩图第二页补充说明：

上图前排：原内蒙古军区政委刘昌（左四）；原内蒙古计委副主任乌力吉那仁（左五）；原内蒙古检察院副检察长徐子干（左三）；原内蒙古农科院副院长那苏图（左六）；原内蒙古民政厅副厅长确吉敖斯尔（左二）；内蒙古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奇天祥（左一）、郝力（左七）；著名电影艺术家恩和森：

上图后排：内蒙文联主席敖德斯尔（左七）；内蒙政府参事王越（左五）、李福祺（左六），参事室工作人员康明才（左四）；内蒙古政协文史办梁跃君（左一）；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徐世明（左八）；阿鲁科尔沁旗政协孝顺（左三）、吕斌（左九）；和子章孙女卓玛（左二）。

下图：赤峰市政协主席昭日格图（左五）；阿鲁科尔沁旗政协副主席达古拉（前排左六）、办公室主任刘科文（后排右一）；巴林左旗政协副主席许少春（前排左八）、旺钦道尔吉（前排左一）、副秘书长额尔敦昌（中排左八）、文史办王玉龙（后排左三）；巴林右旗政协副主席特·武力更（中排左九）、原副主席暴云峰（前排左三）、文史办木松（后排左五）；林西县政协副主席李贵（中排左七）、秘书长韩志禹（中排左五）、文史委副主任阎国山（后排左二）；克什克腾旗政协副主席董润生（中排左二）、白树德（前排左二）、布和（前排左七）秘书长赵学祺（中排左三）、副秘书长张贵民（后排左四）、文史委员柴树果（后排左六）、工作人员周树宇（后排左一）；内蒙古政协联络处处长王士英（前排左四）；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徐世明（中排左六），工作人员王襄平（中排左一）。

说 明

《和子章与蒙骑四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个“蒙骑四师”，是指“八·一五”光复后，在苏蒙红军支持与我党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下，产生于原昭乌达盟※的一支由爱国人士和子章任师长的蒙古族地方武装。起初，受中共东北局和西满分局支持的东蒙自治政府领导、阿思根将军指挥，称东蒙自治军骑兵第四师；1946年东西蒙统一会议之后，称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后经整顿和改造，改称冀察热辽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1948年与卓盟纵队合并后，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曾光荣地完成了做为人民解放军的各种使命。我们出版这样一本书，目的是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群众基础，并沉痛悼念为这个伟大事业献身的仁人志士！

《和子章与蒙骑四师》的形成和出版，是许多人集体劳动的成果。自1985年以来，我市政协和北五个旗县的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

※解放初的昭乌达盟包括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以及现属哲里木盟的扎鲁特旗和开鲁县。

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分工协作，征集到了百余万言的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在整理和通编过程中，又承蒙刘昌同志、徐子干同志、苏雷同志、石汝麟同志、乌力吉那仁同志、乌力更同志、贡嘎丹儒布同志、那苏图同志、义达嘎苏荣同志、确吉敖斯尔同志、戈更夫同志、敖德斯尔同志、恩和森同志、扎拉嘎夫同志、才吉尔乎同志、农乃扎布同志、阿尔斯郎同志、白英同志、阿林同志、色登扎布同志、清格勒巴图同志、鲍世民同志、贺什格图同志、贺希格同志等方方面面的历史见证人的热诚支持；承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办、扎鲁特旗政协、赤峰市档案局、赤峰市公安局公安史料征集办公室等单位的积极配合、提供方便，在此一并志以谢忱。

坦诚地说，为了出好这本书，不论我市政协、有关旗县政协，还是各有关同志和单位，确实付出了努力，包括对有些事件的核实、甄别和订正，在注脚和某些回忆文章中保持“多说并存”的做法等。但是，事件本身毕竟过去了四十多年，许多当事人已经作古，加上编者阅历所限，原始资料不足，在记述过程中难免失误，希望批评指正。

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和子章同志生平 (代序)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同志在

和子章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悼词…………… (1)

忆和子章先生……………刘 昌 (4)

和子章与蒙骑四师……………孟克 执笔 (7)

一、和子章其人…………… (8)

二、和子章与蒙骑四师…………… (18)

忆“蒙骑四师”的成长历程……………刘 昌 (53)

三十二团及其事件

记一支草原骑兵三十二团……………戈更夫 (63)

三十四团及其事件

三十四团 纪 略……………巴林右旗政协文史办 (69)

乌日他及其叛变……………宝音贺什格 整理
叶贺吉如木 翻译 (76)

韩桑杰及其叛变……………巴林右旗政协文史办 (92)

三十五团及其事件

三十五团及额勒登格叛变

.....	根据荣·扎木苏文整理 (93)
塔日巴喇嘛.....	胡国荣阿 整理 (109)
阿力本嘎的叛变.....	白寿峰 (114)
姚家段事件.....	据白寿峰、白晓山等人忆述整理 (118)
斯钦朝格图烈士与凤凰山事件	
.....	苏雅力图 孙国章整理 (121)
忆烈士宝音乌力吉.....	荣·扎木苏 (129)
我是怎样起义投诚的	
.....	散布拉扎布 口述 连柱 敖都 整理 (131)
天山保卫战.....	绝世民 (136)

三十六团及其事件

三十六团的组建及其活动情况	
.....	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40)

三十七团及其事件

三十七团及洪富升格叛变	
.....	扎鲁特旗政协文史办 (149)
忆义和他拉战斗.....	巴拉吉尼玛 (155)

蒙骑四师团以上干部简介

乌力吉那仁忆在内蒙古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自述 (157)
阿民布和	
特木热忆父亲的一生.....	(173)
许少春忆阿民布和在开鲁二高.....	(177)
乌力吉那仁忆阿民布和与蒙骑四师.....	(178)
刘 昌.....	自述 (182)

蒙和舞乐极烈士	郭振有	(182)
确吉敖斯尔	根据忆述整理	(190)
义达嘎苏荣	根据忆述整理	(193)
斯布吉德道尔吉	自述	(197)
徐子干	根据忆述整理	(198)
业喜扎拉森烈士	柴·扎木苏	(200)
道布钦巴拉珠尔烈士	嘎尔迪 希日布扎木苏口述 李树民整理	(202)
阿民赛和其烈士	都瓦萨	(206)
仁钦宁布	旺钦	(214)
金宝光	旺钦	(214)
博拉哈	戈更夫 旺钦	(215)
桑杰	旺钦	(216)
恩和图布新	旺钦	(217)
敖子洋	王玉龙	(218)
仲乃	伊丽	(219)
额尔恒巴图	特·武力更	(220)
鲍金昌	纳·宝音贺希格	(221)
张华廷		(223)
却吉宁布	旺钦	(224)
包英昌	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办	(225)
察干楚仑	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办	(225)
布仁巴雅尔		(226)
赛音巴雅尔		(227)
农乃扎布	自述	(227)
胡图仍嘎	那·色登	(231)
额勒登格		(232)

洪富升格.....	(232)
-----------	-------

几位与蒙骑四师相关的人物

萨嘎拉扎布.....	阿其吐 (233)
那苏图.....	孟克 整理 (235)
敬文泰.....	阿其吐 (237)
苏达那木道布.....	色布勒玛 (241)

附 录

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

.....	乌兰夫 (245)
东西蒙承德会议主要决议.....	乌兰夫 (262)
关于昭乌达盟行政军事及蒙汉关系诸问题的决定	
.....	乌兰夫 (264)
解放初期的林西.....	王逸伦 (265)
热北建军问题.....	会议记录 (267)

兴安总省布告第一号 (1945年8月18日) ... 陈奎提供 (273)

兴安总省训令第肆号 (1945年9月12日) ... 陈奎提供 (274)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宣言(译文)

(1946年1月19日)..... (275)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译文)

(1946年1月通过)..... (278)

林东林西摩擦期间的有关信件 (17件) (281)

五十家子事件后双方谈判 记录..... (300)

和子章同志生平（代序）

阿拉坦敖其尔

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原内蒙古政府参事室已故参事和子章同志。

和子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呼和浩特市逝世。

和子章，蒙古族，又名清卓里克图、和文、和致中，一八九八年出生于赤峰市巴林左翼旗。参加革命前曾历任巴林左翼旗公署梅林，林东公安局局长，伪满巴林左旗政府总务科长，伪蒙古军八师二十二团团团长、上校参谋，昭乌达盟自治委员会①会长，昭乌达盟警备指挥部和昭乌达盟、卓索图盟联合警备总指挥部总指挥，巴林左旗旗长等职务。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后接受我党领导，曾先后任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师长，林西军政学校校长，昭乌达盟政府行政委员，热辽军区蒙汉联军司令部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军事部部副，内蒙古军事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蒙古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在和子章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悼词。

和子章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由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布仁巴图主持，在呼和浩特大青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参加仪式的自治区党政军各界领导同志有：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力更，内蒙古军区离休老干部刘昌、巴音图、贺其格陶克陶、哈斯巴根、栋日布、乌哈嘎图、苏力木，内蒙古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仁钦，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离休老干部徐子于，内蒙古文联原主席阿·敖德斯尔、副主席俄尼斯以及原民政厅副厅长确吉敖斯尔等。

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务。

和子章同志是昭乌达盟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上层代表人物，是一位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和子章同志联络各界人士，热烈欢迎苏联红军进驻林东，并积极为苏军筹集物资、运送粮草，协助苏军维护治安。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对稳定当时热北地区的社会秩序，保障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国民党军队和土匪的蹂躏起了一定的作用。“四·三”会议后，在我热北军分区和蒙汉联军的统一指挥下，和子章同志追剿叛匪，为保卫巴林草原根据地，保卫各族人民在清除汉奸恶霸、减租减息中得到的利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解决我军政机关与牧民的困难，他捐献了三百余顷土地及大量牲畜等财产。他的举动受到了我冀热辽军区的嘉奖和当地各族人民群众的赞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反动党团登记时，和子章同志被错误拘捕审查长达七年之久。一九五七年无罪释放后，回到内蒙古政府参事室工作。一九八六年三月，自治区公安厅对和子章同志的“问题”重新做了复查，结论认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对和子章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任参事期间，积极参政议政，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十年内乱”期间，和子章同志惨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尽管如此，和子章同志对党没有失去信心，他坚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终久会有一天正确解决他的问题。

和子章同志参加革命三十多年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动地改造世界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团结；识大局，顾大体；他做过的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今天我们悼念他，就是要象他一样，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信社会主义

道路，爱憎分明，廉洁奉公；向他那样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团结为重，在党的十三大和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认真地贯彻团结、建设、改革、开放的方针，为实现区党委提出的三个近期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

和子章同志安息吧！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

编者注：①应为巴林左翼族自治委员会。

忆和子章先生

刘 昌

和子章（清卓里克图）先生与世长辞已有十年了。他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尤其是在昭乌达地区很有影响的民族人物。

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子章出面在林东组织维持会和建立了地方武装，保卫了蒙汉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后来与我党我军合作，建立了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在保卫解放区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5年冬，我们奉中共热河省委和冀察热辽军区的指示，开进了昭乌达地区，在林西成立了热北地区专署和第二十军分区。当时，日本刚投降，昭盟地区的广大蒙古族群众对我党我军缺乏正确的认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地方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形势严峻，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军进林东之前与和子章的部队发生过几次小的磨擦和冲突。“四、三”会议后，我们与和子章之间几经谈判，终于取得了成功。

1946年5月，我军进驻林东。当时，和子章是骑兵第四师师长，昭乌达盟各旗的蒙古族部队都归他管。从此，我们与和子章之间的关系开始密切了起来。例如：1946年夏季，我们发现和子章的师直属部队中以陈化远为连长的通信连成份很复杂，里面有土匪、伪满警察、地主等，他们已成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清算汉奸恶霸的障碍。于是，我们向和子章提出缴械这个连的武器。和子章与陈化远等人虽有相当浓厚的老关系，但他听从我们的要

求，亲自下手，毅然决然地缴械了这个连的武器，表现了与我党合作的诚意。后来，经过多次协商，当年九月，在林东成立了蒙汉联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喻楚杰任司令员、权星垣兼任政治委员、和子章任副司令、乌力吉那仁任副政治委员、阿民布和任参谋长、卜云龙任副参谋长、孟和乌力吉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副主任。

党为了加强对骑兵第四师的团结争取、教育和改造，决定我直接到四师开展政治工作。于是，我与和子章先生的直接接触就逐渐多了起来。当年十月，我们从各地抽调大批靠近党的蒙古族青年，举办了首次部队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主要是我们这些老同志讲课，讲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党的民族政策、部队政治工作等。但是为了团结，我们也邀请和子章讲话。我率领大批蒙古族青年到部队，建立了政治制度，开展了政治工作，发展了党员。他看到我们在部队上开展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组织纪律得到加强后，高兴地说：“还是革命好！部队的面貌变化挺快。”

和子章先生同我党合作过程中，很多事情主动和我们联系，反映情况。尤其值得称赞的是，1946年10月，国民党九十三军派特务马青山和任常德潜入林东，秘密找和子章。企图用高官厚禄拉拢他搞武装叛乱。在这严峻时刻，他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一边，立即把敌人送来的信件和两名特务交给了我们，用实际行动得到了我党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任。

1946年冬，蒙汉联军在天山（查布干庙）召开了连长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亲自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在这次会议上，和子章先生同我们合作得很好，受到李运昌将军的赞赏。

1946年冬天，在国民党大举进攻昭乌达地区的严重关头，和子章先生和我们一起，率领蒙汉联军部队去德博勒庙准备攻打开鲁时，由于阿鲁科尔沁旗的协理、大牧主额勒登格率三十五团叛变，改变了作战计划。但由和子章直接掌握的巴林左旗骑兵三十

二团却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叛变投敌等事情，一直是与国民党和叛匪作战的主力，并在保卫冀察热辽解放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2月，乌兰夫同志经林东赴乌兰浩特（王爷庙）时，他也随着去了乌兰浩特。从此他调离了昭乌达盟。当时，昭乌达地区的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误伤了不少好人，后来，和子章先生也受到株连。据说在乌兰浩特被捕入狱长达八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关押。落实政策后，仍在内蒙古参事室工作。

和子章先生是个热爱自己民族，热爱自己家乡和人民的爱国人士。他为人诚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他在晚年受了不少委屈，但一直跟党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关于这点，前年在呼和浩特举行的和子章先生骨灰安葬仪式上，自治区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同志做了全面、公正的评价。

和子章与蒙骑四师

孟克执笔

1945年8月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先后对日宣战。8月9日，苏蒙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伪满洲国防线；12日^①，先头部队攻占林西县城。自此，昭乌达地区出现长达数月之久的混乱时期：日本侵略者，跑的跑，死的死；伪政权土崩瓦解；不论是共产党八路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还没有到来。老百姓不知所措，一些人开始哄抢官厅会社物资，大批公共设施、文物古迹被毁。日伪时期的军、警、宪、特，社会渣滓，或聚而为匪，或散而为民……到处是惊恐和骚乱！一时间，维持社会秩序成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心愿。于是，在昭乌达地区，首先在巴林左翼旗林东镇，出现一个人物——和子章。是他，以地方自治和维持治安为号召，在日伪政权的废墟上，组建了临时政权和拥有三千多武装的内蒙古骑兵第四师；是他，拖着一付旧官吏的沉重包袱，凭着一种对民主革命的朦胧理解，走上了拥护东蒙自治政府，反对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他，在对自身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的同时，配合我党我军实现了对四师的改造。以他特有的角度和方式，对于巴林草原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对于具有重要意义的热北革命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做出了贡献。

^①据林西县政协提供的情况为8月12日，有的文献作8月10日。

一、和子章其人

和子章，蒙古族，名清卓里克图，1898年①11月21日生于巴林右翼旗要口吐，祖籍蒙古克烈部，所以汉姓和，汉名和子章，曾用名和文、和致中。兄弟姐妹九人，在兄弟中和子章行三。长兄阿尤尔、次兄和什格陶格陶、四弟阿民布和、五弟乌日图那苏图、六弟青巴图。姐妹二人为伊勒玛、巴达玛、敖特根②。

和氏家族并非贵族，是哈日陶亥“诺彦”的属民③。和子章的祖父叫布赫济亚。布赫济亚的父亲跟王爷狩猎射死猛虎，受赏一副白顶珠，并且荫及和子章的父亲笃固尔扎布，被破格提拔为王府的笔且其（相当于文书）。

笃固尔扎布曾就学于东土默特来的私塾先生，学得蒙文、满文，当上笔且其之后，更加勤勉，后来甚至当上了占哈拉克齐④。笃固尔扎布的腾达，并没有使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属民地位得到根本改善。和子章11岁的时亲，父亲已经官升“扎兰”⑤，兄弟数人还按惯例轮番给哈日陶亥家庭“烧火”⑥。和子章原本兄弟七人，在四弟阿民布和之上还曾有个弟弟叫恩和吉尔格勒，母亲生下恩和不久就被王府叫去给王爷的格格当奶妈，以致幼儿三岁时玩耍中失身被炭火烧死。和子章幼年时也很少有读书的机会，只在12岁时读了一年私塾，多数时光在家劳动。1913年2月被选入王府文书房当学徒读蒙文，一直到1917年2月，才有机会被送入宝日

①和子章出生年份多说不一，据恩和森说是属狗的，被定为这一年。

②又名查干博勒。

③属民蒙古语称哈里雅图。诺彦，直译为官员，此处作哈日陶亥这家贵族的尊称。

④即管旗章京，职贵为总理旗丁，参与行政。人选多选自贵族，也有从属丁拣任的。

⑤受章京和梅林指挥，管理苏木事宜的官职。

⑥即在祭火日到主人家祭火。

浩特①的一个私塾馆，跟一个姓周的先生学习汉文。1918年9月，巴林左翼旗扎萨克阿格旺业喜色丹那木扎勒旺宝（即色王）进京纠缠与巴林右翼旗的旗界官司，新任吉哈拉克齐的笃固尔扎布随行，和子章便以跟差身分被带进北京。

和子章聪颖好学，见在京的同龄人上学十分羡慕，便求父亲央及王爷开恩，在这一年的12月进入北京齐华门南小街万顺成草铺半日制学校读书。

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大变革的年代，北京学界以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为契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和子章，这个来自塞外大漠、头顶上盘着长辫子的中学生，也偷偷地剪了辫子，并且参加了同学们的示威游行和演新戏等活动。一次他为某公园的集会和演戏活动守门收票，恰好遇见色王看热闹。色王爷以为看门的不是外人，便大摇大摆往里闯，没想到这个不讲情面的小徒工还认起真来，此事引起色王大为不满。和子章受到父亲和色王爷的严厉训斥，求学梦几乎告吹。

和子章的这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几乎伴他终生。这一点与他后来的坎坷也许不无关系。比如说伪康德元年（1934年），52岁的色王选偶续弦，选中了他的妹妹巴达玛，委禽奠雁之礼在即，被他断然中止，色王因此方寸失据，为此和子章一度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这是后话。

色王毕竟是个朴厚之人，发过脾气再没深究。1919年1月，和子章又进入北京后鼓楼院的求实中学补习班，1920年2月考入求实中学第21班，1922年3月肄业，回到巴林左翼旗扎萨克衙门文书房当笔且其。

初 试 锋 芒

二十年代的巴林左翼旗，因缠讼多年②和被迫放垦已经焦头

①即乌丹。

②起初与巴林右翼旗，后来又与阿鲁科尔沁旗有边界纠纷。

烂额，深感蒙汉兼通人才的匮乏。和子章这个进过洋学堂，见过大世面的年轻人，一旦回到这里，立刻引起达官权贵的侧目。首先是西协理阿巴瑞米德那位大胡子叔叔，不顾门第差别，主动把侄女松吉玛^①嫁给他。25岁的和子章，一跃成了名门快婿，遂举家迁到敖日盖。所得嫁资，包括牛，一“苏鲁克”（约20头）；马，一“阿吉尔嘎”（一个种公马的马群）；羊，一“苏鲁克”（约200只）。色王还赐给了荒地10多顷。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一下子翻了个身。民国十二年（1923年），和子章受命当了林东垦务局交涉员，1924年升任巴林左翼旗印务扎兰^②，具备了在政治舞台一试的条件。

和子章参与垦务和升任扎兰的时候，巴林左翼旗正为垦荒问题闹得人心惶惶。早在民国七年勘定左右翼两旗旗界时，王士仁就对这里的肥美牧场打下了主意。经他鼓动，1923年热河都统王怀庆要挟色王“王荒报效八千方”，并在林西成立“林西巴林左翼旗垦务局”，总办王士仁，会办色王与和子章的父亲笃固尔扎布。和子章任翻译。由于出荒官员蒙骗蒙方贪污作弊，巴林左翼旗扎萨克衙门告到蒙藏院，经办人钟熙中被撤职，热河垦务局派王立二、甄文龄调解。1924年夏，林东脱离林西垦务局成立“热河垦务总局林东分局”^③，局址在海林贝子庙（即今林东镇）。自此有了林东这个名称，局长王立三^④。

放垦牧场，这对于从事畜牧业经济的蒙古人来说，无疑意味着生存条件的剥夺。在林东垦务分局成立前夕，色王召开了一次应付时局的会议，诸多当权人物既很懊丧又苦无良策。刚刚升任扎兰的和子章有了主意，他说，公开对抗成命吗？不行。但是垦务分

①即西协理的胞妹。

②升任扎兰的时间是根据恩和森回忆、王晴遗稿联系起来推测的。

③不久又成立设治局。

④有人认为是阔化林。

局尚未成立，我们可以抓紧把一部分地分下去，把地契的日期推前，并向他们说，大部分土地已经分给个人了。几句话，别开生面，立即受到拥护。于是，王公、贵族、官吏逐级号得土地。而和子章一来因他底子薄，二来也是出高见有功，一人得了双份，一次分得80顷好地，加上妻子的嫁资，果然暴发起来了。

1925年12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务委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领导人乐景熹，率部配合国民军攻占经棚、林西、乌丹、开鲁、洮南等地，逮捕了林西县长张奉先（字奎一）。巴林左翼旗章京色楞、阿拉坦格热勒等50多人，到林东①逮捕了王立三、华子荣、征收局长全靖权三人，送交乐景熹司令部。和子章积极参加此次行动。

1927年，巴林左翼旗垦务局长改任钟文清，和子章以衙门扎兰兼垦务监视身分参与垦务。1929年以后，巴林左翼旗放垦已近尾声，和子章便脱离垦务。由于财源兴通，这时他染上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吸食鸦片的嗜好。但是，和子章毕竟是和子章，他年少得意，为政刚毅，许多方面表现出与一些纨绔子弟的区别。

当年，查干白其地方有一座喇嘛庙。庙里的达喇嘛依势霸占了一位有夫之妇。这个妇女的丈夫四处告状无人敢管，后来告到和子章处。和子章揽讼将那个不法喇嘛拘捕，可是这个喇嘛手眼不凡，在王爷那里做了手脚，和子章反倒受审斥。和子章面对王爷，手持状纸，据理力争，终于罚了那个喇嘛若干银两，并将受害女子送还前夫。

敖日盖东南山里也有一座庙，叫陈板庙。庙上的喇嘛是个“活佛”，俗称陈板喇嘛，因为帮助过哲布尊丹巴称帝，很有权势。此人从来不守戒律，娶了老婆，并生有九个姑娘，人们戏称他欢喜佛转世。他贪财如命。扎木苏、额尔德夫兄弟曾借他钱，他用“驴打滚”暴利赶走七八十头牲畜，还买通衙门把两兄弟监禁起来。和子章从

①当时巴林左翼旗公署在敖日盖。

中调解，力排陈板喇嘛的神权威胁，强迫他归还了牲畜，并帮助扎木苏兄弟偿还了债务。扎木苏兄弟自此搬到和子章家的附近居住。

1930年1月，和子章升任印务梅林①。

这期间，由于一些偶然事件，使和子章这个一介书生在军事上也崭露头角。1931年的秋初，从开鲁方面窜来一股土匪，约四五百人。匪首布勒嘎，绰号“火龙”，扬言踏遍左右巴林。而巴林左翼旗王府仅按清制备有52名兵员，加之久废不用，谈不上有多少战斗力。和子章闻警先把王府老幼安顿到床金庙暂避，自己带上王府卫兵和30多名猎手在查干哈达一带御敌。从双方兵力面论，以一比六的比例，是很难取胜的。但和子章毕竟是读书人，他从“火龙”这个绰号联想到火攻的办法。率队从西北纵火，火乘风势直扑东南敌阵，大获全胜。在旗兵、猎手无一伤亡情况下，毙敌20多，赢得全旗上下的好评。色王高兴，晋升他为主要负责全旗武装的“左翼梅林章京”②，并按古制赏给“满其格”（一种佩戴在马首的红缨）和“好都如古”（乘马的坐鞅佩饰）。披挂整齐走在街上，观众踊跃，传为盛事。

三 起 三 落

从1922年走上仕途到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升任梅林章京是和子章最为得意的时刻。自此，他在官场三起三落。

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蒙一些民族上层和知识青年，组织自治军。1932年3月，日本人在长春拼凑了伪满洲国，把包括昭乌达盟在内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入满洲国版图，成立了“兴安”东西南北四省。但是日寇的势力1933年前并未到达昭乌达地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式各样的兵、匪，东奔西走，朝秦暮楚。所谓“火龙”之灾不过是匪中较大一股，火龙事件以后，和子章为了应付时局，把旗里的武装扩大到100多人，同时向王爷

①塔米格梅林，辅佐协理和章京处理旗务兼办文案。

②梅林章京为左右二人，在协理和管旗章京下，分掌军事和政治。

递交了训练军队和腾出王府部分房屋兴办学校的呈请。可是循规蹈矩的色王对此并不理解，不知是处于维护王权的直感，还是担心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招惹麻烦，总之，他采取一种完全反对的态度。他向年迈退休的老鸛固尔扎布写信提出警告，说这是违反祖制。老鸛固尔扎布立即把儿子叫回来，命他跪下。一顿严厉训斥之后，摘下和子章的顶戴花翎，并附上一封信送给王爷，表示请罪和对儿子的惩戒。色王虽然相当客气，但并没有退还官阶，一直到再一次想到这个年轻人，那已经是斗转星移，时局大变。这期间，和子章赋闲在家，坐了整整一年的冷板凳。时间是1932年2月到1933年2月。

1933年元旦，日寇占领山海关。热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汤玉麟部队驻扎在林西到开鲁的东北骑兵十七旅崔兴武部，虽然已经和日寇拉上关系，但仍以抗战名义扩充军队^①，征集粮草马匹。巴林左翼旗色王为了应付时局，重新起用和子章，于1933年2月给他官复原职。可是，当和子章将马匹送到林西回来时，十七旅驻林东骑兵营营长陈生，已经随林东县^②长苏泽民逃之夭夭了。

1933年2月下旬，日寇分三路攻占热河。3月2日，孙殿英、李振东部退出赤峰；3月4日，汤玉麟不战退出热河；3月5日，李守信率崔兴武的十七旅把日军请进林西县城^③。“热河抗战”告一段落。

1933年3月3日，日寇小柳津率部进入林东镇。接着，日伪设治行政人员斋藤到来。起初，斋藤的翻译朱子周与本地士绅组织“天林公安队”，数日后又解散公安队，成立“林东公安局”，和子章被士绅推为公安局临时局长。7月1日，“兴安西省设治工作

①成立所谓抗日补充团。

②1932年8月，林东设治局升格为林东县。

③根据《李守信自述》。

临时办事处”处长寿明阿，主持成立巴林左翼旗公署，撤销林东县，将公安局改为警察局，改王府衙门为旗公署，色王出任旗长，和子章为总务科长。和子章将原王府卫队中的骨干调入旗公署担任警卫。

伪大同三年（即1934年），3月1日，由日本人操纵，郑孝胥出面，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重登九五大典，巴林左翼旗的色王爷经不住一再敦请，也带了总务科长和子章、文书股长彭即吾前往。在“新京”，杏花村的土垒“天坛”、关东军为皇帝陛下特制的戎装，都使人们大开眼界。但是，色王爷的世袭罔替狮子钮银质扎萨克大印却被作为谢礼没收。尤其使和子章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人得意之余，利用“盛宴”机会，重提几年前色王和福晋谢绝日本人来访的往事羞辱色王。

原来，阿格旺业喜色丹那木扎勒旺宝的原配福晋，是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的妹妹“七格格”。当年，贡王锐意改革图强，延请国内文人和日本教师，兴办了崇正文学堂、守正武学堂和毓正女学堂。七格格是毓正女学堂的首届学员，是个精通文墨，又谙武术的贤淑女性。而色王又是安分朴厚之人。所以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尽管“七格格”终生不孕，一直到1933年病逝，色王不作侧娶之议。色王和七格格婚后某年，巴林左翼旗王府（在敖日盖）来了几个日本人，执意要见福晋，并以姑妈相称。色王的母亲，是个擅权的老太婆，坚决不让少王和福晋接见这些莫名其妙的“侄儿”。日本人在王府前的小河傍架起帐幕，以示必达目的决心。可是二十多天过去了，王府的大门还是未向他们开放，只得快快离去。

日本人在偌大的宴会上，当着满堂新贵和蒙古王公，明白无误地侮辱色王，首先激怒了和子章。他忿然而立，说，“我是色王上的随员，按着蒙古人的习惯，王爷就是我们的主宰，希望尊重这一点。至于成立满洲国，蒙古人和满洲人历来是亲戚。既然是

亲戚，就应该友好。这位人士方才说的话还是不说为好。”几句话使那个日本人大为扫兴。

从新京回来后，色王常兴亡国亡家之叹。不久前妻子病逝，打算续娶生子又被和子章抗婚。现在日本人又横行霸道，这一切，常使这个53岁的王爷泪下沾襟。他将祖先的甲冑和旗帜，从贝子庙取出来祭祀，并问左右：“何代帝王北狩，曾有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之言？……此语果有之乎？”如此郁郁终日，以酒代餐，不久病逝。

新京酒筵上的不快，和子章固然维护了色王的面子和在场蒙古人的尊严，但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言而喻的。接着又发生了一段公案。

仍是1934年，驻巴林左翼旗第一任参事官小手川胜彦，为了把旗公署从王府衙门迁出，拆毁蔚为壮观的“海林贝子庙”，把佛像抛入沙里河，在庙址新建方砖洋房四十间，并且从中贪污大宗款项。和子章以破坏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贪污上告。

和子章在总务科长任上，前后几件事，已经深深刺痛了日本人的心。遂于1935年5月，兴安西省警备军本间顾问，派出宪兵把他拘捕到林西。当时，日本人碍于巴林人不服和立足未稳，未敢采取进一步措施，全身拍照并取下手足指纹拓印，不久放回。和子章继续上告，迫使日本人把小手川拘捕押走。但和子章的官是当不成了，罪名是现成的：“反满抗日嫌疑”，“引咎辞职”。和子章受审前，曾在林东办了一所孤儿学校^①，收容蒙汉孤儿七八十，此后便由旗公署统管。“八一五”光复后，和子章组军，这批人就排上了用场。

和子章丢了官，深感处境之险，于是以去奉天戒烟为名，带上儿子恩和森，住进奉天的“天津大旅社”，冬季返回，安葬了父亲笃固尔扎布。

^①学生的食宿穿戴均由和子章自付。

1936年8月，包悦卿根据共产国际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党部关于抓军队的旨意，在哲、昭、卓地区替德穆楚克栋鲁布招兵。8月的一天，这个又高又胖、双目失明的蒙古人来到敖日盖，指名要找正在苦无出头之日的和子章。于是，和子章策马巴林各地，招得新兵500名①、军马250匹，10月，趋多伦投靠德王，被任命为第八师二十二团上校团长。师长起初是包悦卿。包悦卿调任蒙疆银行总裁后由扎青扎布续任。

在日本人来说，不论是东部的满洲国，还是西部的“军政府”，都不过是关东军一手泡制的两个玩具。当和子章利用自己的影响东奔西走招兵时，日本还是满支持的，但当他把人马带到多伦后，就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财政、人事都控制在日本人手里，而且不给部队发武器，一直到王英在日本人扶持下组成“大汉义军”攻打红格尔图，德王调兵在百灵庙增防，才临阵发枪。和子章对此感慨颇多，据说当着日本人的面发了牢骚。日本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遂于1937年4月调他到伪蒙疆军总部当上校参议。

和子章靠边站了，跟他西来的数百官兵感到大势已去，纷纷逃回家乡。和子章自党没趣，挂职告退。时间是1939年1月。

和子章组军，本来以为天赐良机，从此可以大显身手了。所以率部西进时，曾携家带眷。丢了团长，他心凉半截，遂将妻儿送回原籍。到了挂职回家，他已经对伪蒙疆政府得出明确的结论。据说他到了北京后曾说：“德王不是成事的气象。”

等 待 时 机

从1939年1月，到“八一五”日本投降，和子章一面以经营产业掩人耳目，一面坐观时局，以求政治上的东山再起。

和子章途经北京，写信托好友叶普泽②将妻子和儿子恩和森

①也有人说300名。

②蒙古名约苏图。

送到身边，并买下东四吉兆胡同西口路北22号宅院，以作暂住之计。后来认识了雍和宫的一位姓邵^①的喇嘛名医，曾设想办一家蒙医院，遂在原籍派嘎拉僧、扎木苏等到通化、沈阳变卖70多匹马以及其它牲畜，拆掉吉兆22号平房，盖起一栋三层楼房。但不知何故未果，将楼房出租，于同年底又回到原籍经营起田畜产业。回到林东后，又卖了些地产补充北京建房资金。

和子章以一个退役军官回到巴林左翼旗，但是日本人对他不放心，明明白白感受到这一点的和子章索性把家从敖日盖搬进日本人眼皮底下的林东。一天，日本参事官堀田太郎给他介绍一位名叫宫藤的“商人”，说镇上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这里宅院肃静，希望关照。当然，和子章也不会看不出眉眼高低，于是宫藤便和一个叫阿勇巴图^②的与他朝夕相处起来。而和子章居然也学起日文来，间或谈论生意经，案头摆满了日文书籍以及“七侠五义”、大小“八义”、“雍正侠剑图”、“梅花剑侠”、“十三妹”等闲书。

其实，和子章无日不在关心时局。正在这个时候，他秘密结交了东乌珠穆沁的贝子道尔吉，此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很熟悉，他们经常以买卖食盐、粮食作掩护互通信息。那个贝子还曾以到召庙^③晋香为由，前来与和子章晤面。

和子章的信息来源，还有另一个渠道，那就是他的四弟阿民布和。这个后来担任蒙汉联军参谋长和骑四师师长的年轻人，四十年代初在王爷庙(乌兰浩特)任兴安军教导团的少校团副时，被发展为苏蒙红军的情报人员。和子章不断从他那里听到苏蒙情况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况。

①俗名邵永和。

②警备军的一个团长。“八一五”前夕曾率部起义。

③林东召庙为辽代的“真寂之寺”，清时改为喇嘛庙，称“善福寺”。在内蒙古东部颇负盛名，有“查干五台”之称。

“九一八”事变以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共产国际的指使下，打入“伪满”和“伪蒙疆”内部，发展组织，占居职位，掌握武装，待机控制局势。和子章解职回家，有些内人党的成员主动和他联系。萨嘎拉扎布为他送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白云航、拉沁旺楚克等，于1945年4月在赤峰发起组织“昭卓两盟联合会”，预言“蒙古人民可能在最短期内完成自治”，和子章应邀派代表参加，并被责成成立林东自治分会^①。另据那苏图同志回忆，1945年5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东部地区的负责人哈丰阿，曾借伪兴安总省参事官身分来巴林左翼旗检查工作。在一次与那苏图的私下谈话中，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说：“日本人超不过十月必败。日本败退后，由于遗留的民族矛盾很深，如处理不好，很可能发生民族间的残杀、流血事件。所以要提高警惕，要组织武装进行自卫。你没有号召力，要争取和子章。他这个人在民族革命问题上可能有点作为，到民主革命时期很可能动摇。林东这个地区，共产党可能先到，国民党由于是机械化部队也可能先到，但不要同国民党合作，国民党靠不住。要同共产党合作。”此后，那苏图“便积极从各方面作工作引导和子章不要反对八路军”云云。

来自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本身的见识，使和子章更加注意群众的向背。1944年，巴林左翼旗一带大旱，饿殍遍野，和子章倾囊放粮^②。自家粮食放尽，又向其他富户转借续放。日本人着了慌，出动警察、宪兵昼夜监视。日本人垮台后，和子章要人有人，要马有马，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二、和子章与蒙骑四师

1945年8月苏蒙对日宣战后，于8月12日先头部队就进入林西。

^①见《巴林左旗志大事记》。

^②在救日盖。

但抵达林东的时间却迟至8月15日,原因是经过“哈林达坝”和昆都冷河的一路军,需要工程兵拓宽坝上的路面和用木材铺垫河底,坦克、汽车才能通行。

8月10日,巴林左翼旗公署焚烧文书档案。伪旗公署末任参事官崛田太郎把日伪人员转移到召庙,于12日又回到林东,在家里召开所谓备战会议,把荐任官乌梁海巴音福、巴雅尔、扎拉森、那苏图,以及赋闲在家的和子章、达理扎布、金宝光、仁钦宁布等统通叫去,面授机宜,妄想借这些人的威望,组织地方武装,为他们的逃跑抵挡一阵。会后,便与日本男子和伪职人员50多人组成的“退避行动群”,向召庙转移;日本女子数十人,乘坐胶车,在林东兴安西省史迹保存馆主事大内健率领下,向开鲁方向逃遁;驻林东警备军六团新兵大队在日籍副团长町田上尉率领下,携带輜重大车200余辆向本旗南部撤退。但是,压迫和反抗总是成正比的,人们不会因为侵略者的逃跑而放弃斗争。崛田走后,和子章立即布置迎接苏蒙军队事宜。伪军警中的抗日力量也与和子章建立联系^①,溃逃日本人被歼的消息很快传来;14日晚8时许,南撤的新兵大队在蒙古族连长丹参、排长色丹扎布带领下,于敖包毛都土茂林大院前杀死町田等人四散;逃在这一带(包括野猪沟、黄羊洼等地)的其他日本人也先后身亡。25日,从林东逃出的日本妇女,在阿鲁科尔沁旗南、奈曼旗阿斯吐庙附近,走头无路,集体自杀。据日本东京出版的专门为了寻找日本在华死难人员的《蒙古》小报记载,当时死于巴林左翼旗的人员达109名,失踪两名。

欢迎苏军的仪式是很别致的,8月14日下午2时,一辆苏军汽车向林东驰来^②,经人报告说苏军已到,和子章率领欢迎队伍,

①巴林左旗政协副主席旺钦道尔吉经访问当时为警备军送过信的牧民米希格证实,从8月10日起,哗变的警备军至少向和子章去过两封联络信。有的信经博勒哈特和子章。

②是住在林西等待汽油,准备南下赤峰的一路,并非正式路过林东的军队,

每人手持一面小白旗，列队到西门外迎候。汽车上下来一名叫伊万的军官，后面跟着十几名士兵。看来伊万很生气，众人惶惶然不知所措，有的脱帽鞠躬，有的点头哈腰，有的手摇白旗强作笑颜。苏军把他们的白旗一一夺过撕碎。一名会蒙语的翻译说：

“欢迎苏军应持红旗，持白旗意为不恭”，大家才放下心来。当伊万一行来到十字街口时，金宝光率领警察夹道欢迎，伊万从警察手中取过两支日本三八枪，轻蔑地一笑，命士兵摔毁。伊万在旗公署要汽油，和子章一面派人弄油，一面请伊万到“三庆园”饭店款待。席间，和子章和伊万互赠随身佩带的手枪。之后，伊万回林西。

巴林左翼旗人民自治委员会

从8月10日开始，伪政权瘫痪，日本人纷纷逃离，各种传闻真真假假，莫名恐惧笼罩林东城。伪官厅会社相继被抢，上千人冲进伪兴农合作社大院，砸门撬锁，各取所需；伪旗公署库存的几百块大烟砖，由伪官吏带头抢夺。更有第一水的落任者，半路拦截吃“二魔”……。鉴于此，早有成竹在胸的和子章，13日上午堀田的临别训话之后，就把林东街里的头面人物叫到家里，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首先分析了时局和研究成立一个维护社会治安和保证苏蒙军物资供应的临时组织问题。这个组织的名称定为“巴林左翼旗人民自治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会）”。将全旗划为十个村、一个街，决定村设村公所、林东街建立街公署，以村为单位组建自卫队。

参加这次会的人员有和子章、达理扎布、金宝光、那苏图、张锡爵、马贞吾、彭即吾、李规芳、陆香坡。

同日下午，会议研究具体人选，大家公推和子章为自治会会长，李规芳、达理扎布为副会长，那苏图为秘书长，金宝光为自卫队长。和子章任命李规芳为林东街长，并组织林东青年团，负责维持林东街的秩序。

同月27日，李规芳、马贞吾、刘上青在自治会会议上提出：人民自治委员会范围太大，要求从中分出一部分另组维持会，和子章不同意①。

9月3日，自治会正式成立，委员有和子章、李规芳、达理扎布、那苏图、乌梁海巴音福、彭即吾、张甲声、金宝光、李静忱②、王藩、王世恩、马贞吾、张文达、陆香坡、穆启明等。和子章、李规芳、达理扎布、那苏图等正式当选。下设自卫队、庶务、民政、公安、给养、管理各系，乌梁海巴音福为庶务系主任，彭即吾为财务系主任，金宝光为自卫队长。

自治会正式成立于9月3日，但从13日搭起架子之后即已开始工作，主要事迹大致是：

(1)自治会的架子搭起来后，林东街里日夜有人站岗巡逻。起初是金宝光组织的旧警察，接着是林东青年团，后来是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同盟。严防日伪武装人员和土匪滋扰。

(2)保证了苏蒙军队的物资供应。由于对日寇厌恶已极，巴林左翼旗人民对于苏蒙军队的欢迎是竭尽全力的。和子章带头，其他人按贫富捐赠有差，捐献菜畜达一万头(只)③。米面粮草也很充足。和子章派孟庆林、吴天元等在大军入出境沿路设站供应，一连三个昼夜不曾怠慢，苏蒙军十分满意。苏军为了支持和子章，还赠他一幅写着俄文字的红布，一位懂俄文的外蒙古军官告诉他，那是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的联系凭据，拿着它，可以在苏蒙军控制区域畅通无阻。

(3)为了稳定市场，在巴林左翼旗发行了一种在伪蒙疆纸币

①对自治会有人也称维持会。苏蒙军队所过之处也多称自治会，但和子章叫自治委员会。因当时对此产生过分歧故本文不称维持会。

②王晴遭稿作李明忱。

③据恩和森回忆。对这个数字在巴林左旗撰写旗志时，也有争论，但公认和子章捐赠数目很大。

背面印有和子章、那苏图、乌梁海巴音福、彭即吾四人^①盖章的临时代用货币，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经济生活。

(4)扩充了自卫队，集中了伪满时期遗散的武器，平抑了土匪，为蒙旗四师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自治会从8月13日筹建，中经9月3日正式成立，到11月30日解散，一共工作了89天。它的影响遍及昭乌达盟各旗，它的功绩也是有目共睹的。1945年12月1日，和子章受东蒙自治运动领导人之命，成立巴林左翼旗政府，遂于前一天宣布自治会解散。

自卫队、公安队的建立与达理扎布、李规芳的叛逃

自治会从8月13日筹建伊始，就把自卫队的组建列入日程，并委任金宝光为自卫队长。会后，和子章便到哈达英格找到老朋友希拉。此人是他任扎兰时的警卫，枪法极好。和子章命他把伪满初期共同埋藏在敖日盖伊和敖拉的枪支取出来，挑选好的运往林东。又叫希拉去查干哈达找来过去的侍从博拉哈以及宝音乌达拉嘎等人，充实自卫队作骨干。苏蒙大部队通过之后，8月30日，和子章就带上双柱、希拉二人，策马十个大村，组织各村自治分会和自卫队。

在查干哈达村，当时村长额尔敦朝格图已组织有30多人，任博拉哈为大队长，桑杰为副大队长。于是和子章等到王府村组织20多人，任阿拉坦胡雅嘎为小队长。然后，在两村留下联络人员，把队伍领到白塔子村。恩和图布新组织30多人，自己担任小队长，带队跟和子章到碧流台村。碧流台村长敖其尔，也组织有10多人，自任小队长，跟和子章去土木富洲村。土木富洲村长谷瑞廷组织30多人，也自任小队长跟随和子章。此后，陆续加入和子章队伍中的有：乌尔吉村村长崔海二亲自带领的30多人，王安池村村长梁永生带领的6个人，花加拉嘎村村长吴克正带领的10个人。衙门庙村村长王洪生带领的10个人，几天工夫，到九月初，和子

^①贺什格图回忆为三人，敖子洋以为四人，还有人说是和子章等二人。

章便带领一支约200人的军队回到林东，正式成立自卫队，并任命金宝光为总队长，博拉哈为大队长，桑杰为副大队长。装备自然谈不上，衣服是自己的，五颜六色；马是个人的或富户捐赠①的，骖驾不齐。武器：“三八式”“冲锋枪”“连珠炮”五花八门。有的还没枪没马跟着跑。每人带一个印有俄文的红布袖标。

武器来源，除缴自伪军警宪特者外，一部分是日本人逃跑时扔掉的（包括库存），一部分是伪军、警人员杀死日本人后四散时埋在地下的，还有和子章自己私藏的。

自卫队成立后，便投入剿匪斗争，在五十家子收缴了股匪张悦等百余人，在王安池收缴王二虎等六七十，并解决了熊占和、王六点等股匪，用这些土匪的武器进一步武装了自卫队，并吸收其中一部分成员加入自卫队。但这部分人进入部队以后，使部队纪律涣散，扰民害民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和子章于11月中旬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洗刷收编的土匪，成立公安队，其编成为：

1. 蒙汉联合公安大队。由海力根台、乌尔吉、土木富洲各小队组成，大队长仁钦宁布（佟荣久），副大队长谷瑞廷，100多人，50左右支枪，大部有马；

2. 林东公安大队，大队长金宝光，60——70人，全部有枪，半数有马；

3. 白塔子公安大队，大队长恩和图布新，60——70人，半数有枪，大部有马；

4. 查干哈达公安大队，大队长桑杰，60——70人，半数有枪，大部有马；

5. 王府公安中队，队长阿拉坦胡雅嘎，30——50人，10余支枪，大部有马。

和子章又派恩和图布新等人去五十家子组织了80余人的武装；乌兰套海的邢万春也带若干武装来归；大板的达木仁也带40

①有相当一部分是东西协理、东西财主捐赠的。

——50人接受和子章指挥。至此，和子章的武装，人过500，枪过300，已经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

这里应该补述一下，岫田于8月13日上午临行前召开的备战会议，实际是在他的身后安排了一种四足鼎立、互相牵制的实力格局。在这次会上他召集的人员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职人员：旗公署庶务科长那苏图、行政科长乌梁海巴音福、警务科长扎拉森、实业科长巴雅尔四人；一类是曾担任过伪军军官闲居在家的和子章、达理扎布、金宝光、仁钦宁布(佟荣久)四人。他把伪警察分给这四个军人，并且划分地盘，让他们组织保安队阻击苏蒙军。当然，这四个人并没有相信他的鬼话，但在最初的日子里，确实造成了一种互相牵制的局面。一直到和子章的自卫队壮大之后，达理扎布、李规芳等相继出走，这种局面才告结束。

达理扎布，汉名包寿轩、包福廷，原籍散汉旗。伪满时曾在乌古廷手下任兴安西省警备军驻林西骑兵三团团长，但与李守信有更深的关系。在伪军界有一定影响。诺门罕战争爆发，兴安军不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红军打仗，纷纷逃离战场。战后，日本人为了剪除后患，招抚“归还兵”。有一批溃散伪军在一个名叫小喇嘛的率领下，活动在巴林左翼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地。达理扎布按日本人的旨意，以保证这些人人身安全为条件，进行招抚并交给日本人。可是，当小喇嘛等就范后，日本人竟以徒手训练为名，把小喇嘛以外的数十人用机关枪杀死在查布干庙。小喇嘛认了日本的本间顾问为干爹，被保护下来并被派驻乌珠穆沁的特务机关。和子章、达理扎布等组成自治会后不久，苏军来到之前，小喇嘛突然带领40多名武装人员要进林东街，声言要找他们的好友达理扎布，被守护东门的岗哨拒之门外。当晚，达理扎布等私下把这批人引入家中设宴款待，又被和子章以自治会规定不准日伪武装人员进街为由，予以赶走①。达理扎布甚觉难堪。自此二人积

①小喇嘛后来投靠李守信。

怨日深。苏军大部队通过之后，自治会追查原旗政府保存于达理扎布家的43块大烟砖，达理扎布到家和解释，说已被苏军拿走，和于章不信。二人发生激烈冲突。九月下旬，和于章率自卫队将王六、石荣股匪打散，俘虏30多人，派达理扎布去王六家取枪。达理扎布未归，后来逃奔国民党^①。于是，和于章率部包围林东街，对土匪、特务王六、石荣、王子厚、黄金生、李兴泉、李仕成、袁翰章、华生嘎、白乙拉进行大搜查，搜出大小枪9支、弹药大烟若干。

自治会的另一个副会长李规芳，也在和于章正式接受东蒙古自治运动领导后出走。

李规芳伪满时在旗协和会任职。担任自治会副会长后，受和于章指派，建立了“林东青年团”，人数最多时达50多人，内分总务、宣传、警报、司法、联络等班，任务为维持林东街里秩序，每人配以木棒，臂带“青年团”三字红色臂章。后来和于章发给步枪五、六支。办了一张小报，叫《林东时报》，后以《笔阵》刊行，主编岳昆。登载的消息以“国军”接收各地的内容居多。消息来源于上青医院的刘上青。整个组织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都较浓，被称为“汉族青年团”。和于章命恩和森、扎拉嘎呼、老布僧普日米等另于1945年11月4日成立“东蒙古青年同盟巴林左翼旗本部”，开始时20多人，有那苏图、布仁白音、那孙乌尼、哈斯道尔吉（阿林）、穆林、才吉尔乎、乌恩宝音、何什格图、图门白音等。那苏图为名誉书记长，扎拉嘎呼为秘书长。11月10日^②，巴林左翼旗自治会向驻通辽苏军送菜牛，以林东青年团为主组成护路队，由李规芳和吴克正率领。李、吴等乘机贩卖大

^①巴林左旗政协文史办根据达理扎布二弟的回忆说，1946年8月达理扎布与马贞吾、李规芳、李静忱一起出走投奔开青的李守信。此据和于章等人回忆。

^②旧历。

烟，在通辽与守城部队①发生冲突，被打死2人，运回林东开追悼会。在和子章支持下，青年同盟于12月缴了他们的枪支，砸了他们的牌子，没收了他们的油印机、收音机，另办《晨报》，强制他们解散了林东青年团组织。

林东青年团解散后，李规芳等人出逃到朝阳投奔国民党。李规芳后来化名李尔航，1948年以开鲁代表名义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1949年逃到台湾。

联防组织的产生

“八一五”光复前后，由于苏蒙红军支持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内蒙古东部各蒙旗，分别建立了自治会一类的临时政权和自卫队一类的群众武装。在昭乌达盟各旗和努图克，也纷纷以巴林左翼旗为榜样，行动起来。与巴林左翼旗相邻的巴林右翼旗，首先在乌素义和、查干沐沦、巴彦汉、查干诺尔等嘎查，群众自发地组成了自卫武装，公推曾经担任过昭乌达盟长的扎噶尔亲王的女婿仲乃统一指挥；克什克腾旗，则由巴嘎亚、卓斯郎以及包英昌、文振铎（阿拉坦瓦齐尔）等进步青年倡导，组织了120多人的自卫队。此外，在阿鲁科尔沁、扎鲁特旗，则形成了由民族上层和伪军警人员自上而下组织的武装②。到1945年末，大体都具备了二三百人的规模。为了统一行动，原昭乌达盟各旗县在巴林左翼旗倡议下，于1946年1月3日，在林东召开了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扎鲁特旗、奈曼旗、翁牛特左翼旗、开鲁县以及喀喇沁中旗九个旗县③的18名代表。

①据何什克图等人谈是黄克诚部队。

②参照确吉敦斯尔的回忆。

③在后人的回忆中，有人称八部十二旗代表会，有人称昭盟联防会议。查昭乌达盟八部十三旗是民国中后期的提法，包括，翁牛特部左右二旗、敖汉部左右南三旗、奈曼部一旗、扎鲁特部左右二旗、阿鲁科尔沁部一旗、巴林部左右二旗、克什克腾部一旗、喀尔喀一旗。不包括喀喇沁。

会议由翁牛特左翼旗代表①主持，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促进案；盟政府设置案；盟内民族融和案；对共军取友好关系案；盟内各旗县驿站设置案；对锡盟贸易案；盟内各旗县共同防卫案；盟内各旗县经济提携案；盟内各旗县通信机关试办案；盟内各旗县匪患肃清案，共10项议案。其中，在第七项“各旗县共同防卫案”中写道：“理由一，旗县之防卫有限，若不联合一致共同防卫，难免被匪贼各个击破，唇亡齿寒，欲一旗县独得安宁殊为困难。为守望相助起见，经成立共同防卫关系。”关于共同防卫办法，议案写了五条：“一、旗县遇警时，须急速通知邻近旗县，至急应援，不得稍有观望；二、遇多数之攻击时，须飞檄各旗县至急应援；三、在境内要塞地方设置常川驻防军警；以资防守；四、应援部队必听从请援旗县之指挥，或协议之；五、应援部队之给养，由请援旗县负担之。”

当通过第七项议案时，克旗代表义达嘎苏荣提出，在省、盟政府未成立之前，应成立临时机关和临时首长。于是，大家公推和于章为共同联防总指挥，为了“事权合一”，在行政上并有委员长或“议长”的职权。

其“推举状”如下：

“兹经昭盟各旗县代表大会共同议决，通过选举，巴林左翼旗长清卓里克图，为昭盟共同防卫总指挥。特此共同出具推举状，俟各代表返还本旗县时，再行补具正式推举状送付前来，以昭信用。

此状

喀中旗代表 恩和格尔勒图

额日穆布仁

翁左旗代表 达临泰

①那苏图、斯布吉德道尔吉等同志认为这次会议是道布主持的，可是签到名册上没有阿鲁科尔沁旗道布旗长的名字。此据档案资料。

	宝音格什格
克 旗 代 表	义达嘎苏荣
	察干楚伦
	巴嘎雅色登
奈 曼 旗 代 表	宋宝山
开 鲁 县 代 表	张荫兹
	何瑞廷
	马汉楨
扎鲁特旗代表	王少德
阿 旗 代 表	郭云峰
巴林右翼旗代表	博音图
巴林左翼旗代表	清卓里克图①
	乌梁海巴音福
	白雅尔
	彭即吾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三日

(均为本人签名)

在讨论该项议案时，议定“根据总省所颁之建设要纲②，在军事上称作昭盟共同防卫警备队”，并根据陈庆云提交的意见书，将公安队更名为内蒙古地方人民解放军③。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的建立，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警备队的改编和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的建立

1946年1月16日至21日，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共东北局、

①此次会议期间，和子章、那苏图正在林西谈判，因而并未出席。

②即《兴安总省公署地方政治建设要纲》。“要纲”组织要点中提到建立“内蒙古人民解放会”和“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的问题。

③代表会议资料系由赤峰市公安局陈奎同志提供。

西满分局和苏蒙驻军支持下，在葛根庙召开。会上产生了东蒙人民政府，宣布包括昭乌达盟在内的五盟四旗为它的管辖范围，指出建立一支“为人民服务”的、“保障东蒙古人民自治权的军队”。不久，将王爷庙地区的警备总队扩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一师。2月15日，东蒙自治政府正式办公^①，向昭乌达盟派出以萨嘎拉扎布为首的工作团^②，工作团中除萨嘎拉扎布年令较大外，都是经过挑选的蒙古族进步青年，后来均成为昭乌达地区军政骨干。

工作团到达林东后向和子章传达了东蒙自治政府关于建立昭乌达省^③和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四师的指示以及由萨嘎拉扎布担任盟政府主席、和子章为第四师师长的任命。盟政府于3月17日宣布成立，秘书长那苏图、秘书科长贡嘎丹儒布，财政处长彭即吾、内防处长博和、阿尤尔布尼亚代替和子章出任巴林左翼旗旗长。

和子章受命之后，对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扎鲁特旗的警备队进行了统一编制。对他直接掌握的巴林左翼旗警备队的骨干进行了部分裁汰和调整，成立两个团。四师司令部于1946年4月1日正式成立，受东蒙自治政府内防部长阿恩根将军指挥。司令部设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卫生、生产六处。参谋长仁钦宁布，副参谋长业喜扎拉森，参谋处长鲍德斋，参谋阿尔斯郎，教导队长阿民布和（暂缺）。统辖六个团：

三十二团：团长恩和图布新，副团长却吉宁布、敖子洋、敖其尔，驻巴林左翼旗；

①“八一五”后，在苏蒙军支持下，曾于8月17日重新组建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后撤销。

②工作团成员名单，回忆资料分歧颇大。

③据王晴遗稿。

三十三团：团长博拉哈，副团长桑杰，驻巴林左翼旗；
三十四团：团长仲乃，副团长鲍金昌，驻巴林右翼旗；
三十五团：团长额勒登格，副团长嘎达苏，驻阿鲁科尔沁旗；
三十六团：团长宝长寿，副团长包英昌，驻克什克腾旗；
三十七团，团长洪富升格，副团长布仁巴雅尔，驻扎鲁特旗。

骑四师初建，骨干队伍成分复杂，有些人，如三十二团副团长却吉宁布、三十三团团长沙拉哈则因社会影响较大捐赠较多当上团长，他们对带兵打仗并不热心。以却吉宁布为例，本来是阿贵庙上的活佛。此庙为巴林左翼旗王爷亲自祭祀的庙宇，所以庙上的活佛名望较高；而博拉哈，则是有名的西财主，为建四师捐马30匹，表现积极，但是担任团长后从未到职。三十三团建制基本上是空架子，后来鉴于师直需要机动兵力，遂将三十三团建制取消，所属部队改编为通讯侦察连、机炮混合连、与师部原来的警卫连一起为师部直辖兵力。

关于三十三团的番号，后来还有出现。1946年秋，二十五团额勒登格叛变，将斯钦朝格图等进步青年裹挟到开鲁，任斯钦朝格图“国民党军十三团”副团长。斯钦朝格图不为所动，借机率部分进步青年返回，蒙汉联军责成他组建一个新团，仍用三十三团的番号，结果发生了“凤凰山事件”，斯钦朝格图牺牲，三十三团仍未建立起来。直到1947年对三十二团整编，取消三十二团，改为三十三团。

初建的骑四师总兵力为3,386人，有迫击炮2门、速射炮1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10挺、掷弹筒6具，各种类型的步枪1,106支、冲锋枪17支、手枪121支、马1,878匹。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支民族武装，也是在连接东北与华北、西北重要战略要地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尽管在它的草创时期，难免混进了一些反动人物，

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劳动农牧民和知识分子。即使在那些曾经混迹于伪政权的人中，由于亡国奴的遭遇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绝大多数还是富有民族正义感的，这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已经多次得到证明。尽管总地看来包括和子章在内，一度对八路军个别部队心存戒备，但是，当环境迫使他们在共产党八路军和国民党之间选择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还是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一边。

关于与热北部队的摩擦

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以及林西县等地的自治会、维持会、自卫队成立之后，1945年10月，王逸伦、张焕然在乌丹、林西一带组织军队，并派出人员接管林东和大板。和子章、敬文泰等以“管辖领域攸关”和“反对假八路军”之名，予以还击，摩擦多次，持续五个月之久。

王逸伦、张焕然等同志，初到乌丹、林西等地，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没有到来。他们一方面以“八路军地下军”的名义，从苏军手里接收部分地主武装；一方面委任并派熟人招抚股匪，于是有盛世恩、张振发、王瑞贤等人的地主武装和张振山、姚占山、石荣等股匪被编作18个支队。其实有好几个支队还无一兵一卒。10月底，师军又带隆化讨伐队（已降）110人来此。这样，总人数虽达2,143人，但根本没经整顿和改造，在领导和指挥上严重失控。至到11月初，卜云龙带教一旅一个连、周跃山带干部团121人、谢滋群带20多人到来，这支部队才充实了革命力量，遂于11月7日在林西成立五分区司政供给各部门，但是，部队的领导权仍未掌握过来。至于用这样的部队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那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和子章方面来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共产党、八路军比对国民党信任，他希望我党我军帮助他实现他所理解的“民族

自治”，相互间建立一种“最友爱的同志关系”，但不是领导关系。于是，问题发生了。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五个多月的摩擦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9月21日①有个叫陈荣久的支队长等2人，自称“奉王逸伦司令员之命”，“为中国第八路军建军”，找巴林左翼旗“责任者”。和子章、那苏图等待之以上宾之礼，宴请于三庆园。席间，问及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健康情况以及八路军中的工作情况，陈等一无所答。和子章等产生怀疑。原来，陈荣久曾是伪兴安西省的一个雇员，与那苏图为老相识，他们断定陈不是真八路。由陈荣久推及王逸伦。王逸伦曾在伪满初期林东地主马贞吾办的一个小学教书，与马贞吾家交谊不错，他怎么成了八路军的司令员呢？如此等等，使和子章等人对五分区产生了一种“假八路”的结论，不久，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使这个“假八路”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10月中旬②，林西方面又委派刚刚改编过来的张振山支队长，率部100多人去接收林东。张振山在巴林左翼旗乡下召集土匪，造成骚扰，“张本人抽大烟，又显大汉族主义，与林东汉人邢桐仁结合，在街上贴打倒和子章标语”③，因此被和部包围、缴械。经过审问，“始知与陈荣久支队长同出一辙”④。和子章怕

①参见和子章1945年12月27日给王逸伦同志信、王晴同志遗稿、那苏图同志回忆以及档案资料《热北建军问题》。

②热北档案中说“刚到林西”，查热北干部最早到林西为十月中旬。

③引自热北档案。

④引自和子章12月27日的信。关于这次事件，巴林左旗政协提供的实地调查材料认为，“张振山”自称张景太，为八路军队长。另一负责人叫王佩林，自称王逸伦的侄儿。二人又互称表兄弟。于1945年10月带20多武装到敖包毛道地主王茂林家招兵，准备接收林东。约半个月，招收200余人，到离林东20华里的道老毛道，就和部70多武装包围缴械。经谈判，张、王带队离开林东，和部归还武器。

把事态扩大，放回张振山等，随后送还武器。

这时，热北方面有人主张硬打，遂于10月底或11月初，由分区参谋长师军率十三支队①、六支队等从乌丹经大板去林东。在大板街里，部队纪律不好。巴林右翼旗旗长敬文泰，一面派人向和子章告急，一面把支队以上干部请到家里安顿。和子章闻讯，一面派代表到大板交涉，一面派自卫队第一大队32人在大板与林东之间的老道板警戒。和子章的代表要求部队缓进，师军不听。师军坐上汽车，代表告诉他前边有卡子，他也不理，一直向林东挺进。到了老道板附近果然交火。师军所带部队死亡2人，扔下汽车一部，撤回大板。在大板一带，抢劫民户达130余家，并缴了公安队（自治军）部分马匹、枪支，将牧民集资办的兴学会的马匹也当作日伪财产没收，被大板公安队包围，扣留五六十人，其余赶走。热北地委立即派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刘昌同志去大板协商善后事宜。

刘昌同志是个经过长征锻炼和中央党校学习的老同志。他以我党做民族工作的传统，向仲乃和敬文泰转达了地委负责人的致意，并献上自己仅有的两条好烟。敬文泰以蒙古人接待上宾之礼安排酒宴。刘昌同志与仲乃等，饮酒谈心，通宵达旦。他拿出在延安时中央党校发的证件给大家看，详细介绍党中央和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情况，用长征中的经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仲乃等人也各述衷肠。“闲谈”中各种问题应刃而解。群众听说真八路军来了，纷纷到窗下来偷看。因为他们听说八路军飞檐走壁，待人板好，争先恐后地一饱眼福。

次日，还由刘昌同志主持，在大板街召开了群众大会，根据协商好的内容，刘昌同志着重宣传了八路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他承认有的部队干部战士违犯群众纪律是一种错误行为，拿走的东西，有物还物，没有原物的写下欠条赔偿。

①十三支队为盛世恩部。

仲乃、敬文泰等也表示立即送还扣留的干部战士。大板会谈在非常和谐的气氛中结束。在大板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干部受到了撤职处分。

第二阶段

大板事件之后，和子章、敬文泰等以索还赔偿为由，乘势把部队推到林西城下。关于这个过程大致如下：

送走刘吕同志，和于章、敬文泰又向林西去信，要求赔偿损失。王逸伦、张盘新、卜云龙回信^①，说明我党的民族政策、态度，“承认错误”，“答应调查事实如实赔偿”，并通知和子章，于12月13日由王逸伦与克什克腾旗旗长去林东谈判，带一部汽车和一连警卫。到了12月13日这天，和子章率林东街里军政干部出西门外迎候。可是王逸伦等没有去^②，和于章更加气愤。

王逸伦等既然没来林东，和子章便派那苏图持信去林西，约定12月15日去林西面谈。可是，当那苏图走后，敬文泰来到林东，向和子章详细汇报了师军等在巴林右翼旗期间的情况^③，并力主将“假八路”赶出林西。于是和子章改变了15日谈判的计划，亲自率领四五百人于12月25日到林西县境要求谈判。

林西方面，到20日仍不见和子章到来，便由王逸伦带领克什克腾旗旗长仪礼通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张雨同志，去赤峰找郭矩和苏军负责人寻求解决办法，地委其他同志见和子章大军压境，形势不利，一面函促王逸伦速归，一面加强城防，拒绝谈判。和子章遂把部队推进林西城下，苏军留守部队把机枪、大炮架上城头，阻止进城。和部在新林镇抓走了张治中副区长和民政助理李涛。27日，和于章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昭乌达盟政治委员”的身分，给王逸伦、张盘新、卜云龙、张焕然写了一封措

①这两封信原件没找到 此据张盘新同志向省委的报告。

②苏雷同志回忆，当时王逸伦同志去了热河。

③据档案载，他的女儿被奸污。

词强硬的信①，说“诸位责任者，务于本月三十日以前，率领真正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退出林西、经棚等地，……当地编成之武装土匪应交我方处置……。”否则，“难免破开面子，致使发生重大交涉。希望以上各节作具体答复。”

此时的热北党组织陷入极端困境。东门外，和子章率部兵临城下；西边，张桐轩土匪武装（已受国民党委任——档案资料）大军压境；城里，十八个支队纪律又差……为了打破僵局，林西县县长苏雷同志，请示热北地委，于12月28日带上警卫员，坐上苏军汽车，去大板找和子章。在大板没找到，最后在林西二区找到了和子章、敬文泰。和子章指责“王逸伦是土匪，抢蒙古人的东西。”苏雷同志解释：“王逸伦不是土匪，是热河省任命的政委，有人抢了蒙古人的东西，那是我们新扩部队所为，调查清楚后，可以包赔。”和子章、敬文泰当即释放了张治中、李涛二同志。苏雷同志请二位去林西会谈，和子章派那苏图、查干楚伦随同苏雷于31日去林西。这时，王逸伦也从赤峰同苏军负责人马丁洛夫以及“内人党白②、吴二同志”，克旗旗长仪礼通阿回到林西。会谈在苏军代表马丁洛夫主持下，于1946年1月1日在林西县冬不冷村周家大院举行，热北方面参加的有张焕然、苏雷，和子章方面有和子章、敬文泰、那苏图、仪礼通阿、查干楚伦，“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吴二同志”，也出席了会议。马丁洛夫强令 and 子章率部退出林西，恢复和平局面，其它问题由东蒙和热河双方上级机关解决。

第三阶段

关于这个阶段的摩擦，热北正式文件中没有记载，但从双方会谈记录、会议记录以及来往信件中，可见大概，但与传闻相去较远。据传1946年春节，林西县五十家子地主韩寿天、陆香坡给和

①见附录。

②以下参照那苏图、苏雷同志回忆。

子章拜年，和子章遂率一团人出兵五十家子……。其实，韩、陆拜年，可能实有其事，各种人员挑拨事非的情况也一直存在，但春节前后的和子章，并没有象兵进林西时那样摆出决战架式，而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对于这一点，从正月十六日桑杰大队长给热北地委的信、正月二十日（即2月19日）和子章给热北地委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①。

自从苏军出面调停，和子章退兵之后，和部以五十家子原归巴林左翼旗管辖为由，并未从这些地方退出。为了要和子章部队从五十家子、新林镇一带退出，据王逸伦信稿透露，他于1月26日曾给和子章去过一封要求“再作一次真诚合作”，“以求得先生谅解”②的信。于是，和子章派老布僧普日来③作代表去林西，于旧历腊月28日（即46年1月30日）双方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老布僧普日来答应7日内（即1946年正月初五前）撤出。但和子章对于从这些地方撤兵并不情愿，他以这些地方应属“蒙旗”和等待赤峰谈判结果为由拖延时间。

正在这时，热河八路军主力三十旅第六十八团开进林西。2月19日，和子章听说林西骑兵200余名在小于屯一带集结，一面立即写信给热北方面和苏雷同志，呼吁“严守前约”，等候谈判解决；一面带上警卫连，去五十家子观察动静。和子章与警卫连住在五十家子村东一座庙里，派扎拉嘎呼、哈斯道尔吉等进村宣传东蒙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扎拉嘎呼等住在一户姓王的老百姓家。王家告诉他们形势紧张，请他们赶快撤到河东。2月23日，和子章等一面向白塔子方向撤离，一面派哈斯道尔吉回林东向那苏图告急。

24日黎明，六十八团和林西部队向永生号（新林镇）、五十家子发起进攻。和部死亡一二人，叛附和子章的林西县四区

①见附录。

②即要求谈判的信。

③据巴林右旗政协提供的情况，还有恩和森、乌尼宝音。

长任承藻等一二十人被俘^①。24日下午，金宝光率领一连人回来报复，打死热北方面指导员1人、战士2人。

2月25日，和子章正为五十家子冲突“犹豫”之际，巴林左翼旗出席赤峰谈判的代表归来，带回由胡锡奎政委、包玉昆共同签署的“条约”：

- (1)双方停止一切冲突；
- (2)八路军方面对热北开展工作停止，保持现实状态；
- (3)双方公务来往时互相保护；
- (4)百姓及商人自由来往不得限制；
- (5)若有大数土匪双方联络剿除。

和子章将这五条抄在信中送给热北地委，要求执行和释放被俘人员。当即，又派老布僧普日来、乌尼宝音出面交涉。27日喻楚杰、谢镗忠以未接到上级命令，“仍执行原来指示”，提出进军大板、林东。

关于东进大板、林东的背景这样的：六十八团等部队在“消灭”新林镇、五十家子等地和部武装的同时，热北地委在喻楚杰、谢滋群坚决主张的情况下，对王逸伦、张焕然等组织的武装进行了清理，将原来的“旧兵”，除留下180多人，其余全部裁汰。包括被“洗刷”的盛世恩、张振山、姚占山等不纯分子，共剔除1600多人。所以进军大板、林东的计划是中共热北地委真正控制了局面并经过认真准备的。和子章方面，在要求释放被俘人员的情况下，对这次进军表示欢迎。但是，热北方面不久就否决了这次进军计划^②，只要求和子章亲自谈判。

林东方面，3月9日东蒙工作团到达后，便侧重于组建“昭乌

^①热北会议记录：“主力军六十八团到热北，配合分区消灭了五十家子、新林镇土匪160多人，枪马齐全”，和子章在给热北地委信中说有100余人被俘。但所有当事人回忆均说没有那么严重。此据扎拉嘎呼、刘昌等人回忆。

^②见谢镗忠3月2日、3月3日给喻楚杰、谢滋群的信。

达省”和四师，把谈判事宜留给“东蒙来人”去解决。3月20日，东蒙自治政府准备参加承德会议的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哈斯巴特尔等人到达。哈丰阿等对和子章与林西方面的摩擦很着急。他们说，在林西的热北地委和军分区，确实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内蒙的自治运动要靠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现在，内蒙古的统一会议都要召开了，你们的摩擦还没解决！有误会，要谈判，要与共产党八路军实行合作，共同开展工作，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哈丰阿等要求和子章、萨嘎拉扎布亲自去林西进行商谈消除误会的办法。于是，由萨嘎拉扎布、和子章等给热北方面写了一封信，表示对过去的事通过和平谈判去解决，“实现合作，共同建设昭盟^①。”信由斯布占德道尔吉、业喜扎拉森送去。王逸伦等同志完全同意，并确定会谈地点在林西。

关于谈判代表，最初拟议有和子章、萨嘎拉扎布、敬文泰、那苏图、贡嘎丹儒布。和子章说自己身体不好，提议由金宝光代表。据说，萨嘎拉扎布临行前去找和子章说：“洗澡就得脱裤子，要解决问题还得去林西。你去不去，反正我得脱裤子。”和祝他成功。

谈判代表25日去大板。萨嘎拉扎布开会决定确吉敖斯尔代替敬文泰去林西。金宝光主张率一团人去，被否定，便借口感冒回到林东。于是萨嘎拉扎布（昭乌达省主席）、那苏图（秘书长）、确吉敖斯尔（宣传科长）、贡嘎丹儒布（秘书科长）一行四人，于3月底到林西。当时，热北方面负责人都去承德开会，这几人等到“四·三”会后，于4月8日和12日，就昭乌达地区建政问题、蒙汉关系问题与热北党政军两次会商后回到林东。而双方摩擦也便就此结束。

但是，几个月的摩擦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是我党领导的武装，另一方面是倾向我党的民族武装，大家都说目标一致，可是竟然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据现有资料看，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

^①确吉敖斯尔回忆。

人事方面的原因、部队成分、坏人挑拨以及执行政策失误等项外，还有历史的原因：(1)当时的民族矛盾十分突出，(2)党中央在当时虽然已经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但具体政策还不十分明确。(3)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隶属(区域)关系上，互相交错。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支持的东蒙自治政府，自始就把昭卓地区包括在它的管辖范围。和子章的组织自治会、自卫队，建立旗政府，将自卫队改为公安队、警备队，以后又组成自治军第四师等等，均受东蒙方面的影响、授意或任命。就连与林西的摩擦，也希望由东蒙自治政府出面来解决。而热河方面，1945年11月1日成立热河省政府时，又宣布昭乌达地区为其管辖范围，而此前摩擦已经开始。此后一直到持续到“四·三”会议，才得到解决。

“四·三”会议以后昭乌达地区的统一

在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协助下，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自治政府，于1946年三、四月之交，在承德召开了统一会议，从此，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东西蒙分裂局面宣告结束。这就是著名的“四·三”会议。“四·三”会议的成功召开，对热北与昭乌达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四·三”会后，根据“四·三”会议和林西会商精神，昭乌达地区实行蒙汉分治。按蒙汉各半的原则，建立昭乌达盟民主政府，领导阿鲁科尔沁、巴林左翼、巴林右翼、克什克腾、扎鲁特五旗和开鲁^①、林西、经棚三县以及林东行政委员会。大板、天山、鲁北设汉民自治区，由汉民科管理。一切汉人工作由八路军去做。在林东共同组成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一切。发动群众开展清算运动。汉人武装归分区整编，蒙古族武装归东蒙古自治军整编，双方不得发生任何冲突……。此后局势发展很快。

“四·三”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向蒙旗派遣干部，经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请求，乌兰夫同意，原热河省公安厅首先派

^①开鲁暂归西满分区。

出徐子干同志，与参加会议的东蒙代表团于4月11日抵达林东。

5月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在林东成立。主任委员乌力吉那仁，副主任委员那苏图，组织科长义达嘎苏荣、宣传科长确吉敏斯尔，青年科长期斯布吉德道尔吉，秘书科长徐子干，军事科长阿民布和。将昭乌达省改为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

5月19日，热北党政军机关迁到林东。

对蒙骑四师的改造和蒙汉联军的成立

热北党政军进驻林东后，他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这里的军界和政界对共产党和八路军，采取的是欢迎配合和友好态度，对国民党及其军队是坚决反对的。尤其这里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通过不同渠道，已经对民族民主革命有了不同程度的启蒙理解。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另一方面，这里毕竟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局面。反映在组织构成上是旧军人多，旧职员多，思想混乱，组织涣散。要把这样的军队和政权机构，变为我党领导下的能够担负起战争考验的军队和政权机构，还需要经过艰苦认真的改造。

热北地委迁到林东后改称昭乌达盟地委，对外叫民运部。开始时地委成员有书记王逸伦（王逸伦7月调走，由原副书记权星桓继任），副书记权星桓、李望淮，秘书长石汝麟，组织部长肖佐汉，宣传部长王纪明。李望淮调走后，新增民运部长赵承瑞、司令员喻楚杰。

对盟政府的改造。6月5日，热河省政府通知撤销第五专员公署成立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由热河省政府领导，任萨嘎拉扎布为主席，党派吴广文任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委员12人，蒙汉各半。下设处，也安排了一些党内同志。对各旗县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如经棚县长陆棣、巴林右翼旗汉民科长雷代夫、林东行政委员会主席苏雷、阿鲁科尔沁旗汉民科长惠北海、扎鲁

特旗汉民科长秦纯一等，都是老共产党员。巴林左翼旗因为有了汉民林东行政委员会，暂未设“汉民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0月，国民党军占领通辽、开鲁；10月8日我冀热辽中央分局、军分区和热河省政府机关移驻林西；10月10日，国民党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攻占赤峰。在这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热河省委、省军区、昭乌达盟委进行了对自卫军①第四师的改造。

当时，对军队的改造和许多施政安排，多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出面贯彻执行。盟里叫分会，各旗设支会。盟分会为了便于工作，吸收和子章、萨嘎拉扎布任常委。

改造的第一步是从组织自治运动联合会各级组织入手训练干部。6月5日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选拔积极参加自治运动和青年同盟的年轻人举办训练班。第一批训练班约150人。这些人经过半个月学习训练，初步掌握了党的方针政策，被派各旗支会当骨干。象克旗支会的查干楚伦、巴林右翼旗支会的额尔恒巴图、巴林左翼旗支会的扎拉嘎呼、阿鲁科尔沁旗的道布钦巴拉珠尔、扎鲁特旗的赛音巴雅尔等，都是经过训练班学习后担任旗支会主任的。林西军政干部学校成立后，也从四师选拔了90多名青年入校学习。在掌握了这第一批骨干后，盟委8月决定，用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名义向第四师派遣政工人员，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盟分会主任乌力吉那仁同志被派到四师当政委，盟分会军事科长阿民布和到四师当参谋长，各旗支会主任分别担任各团政委。当然，人员使用上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巴林左翼旗支会主任是扎拉嘎呼，并没有被派作三十二团的政委，而是派了盟分会青年科长斯布吉德道尔吉。因为扎拉嘎呼原籍不是左旗人，他在三十二团影响不大，而斯布吉德道尔吉是团长博拉哈的侄儿，与和

①“四·三”会后，自治军第四师改为自卫军第四师。

子章等上层人物均有较深的关系，他也很进步，是盟分会常委。安排他去作用更大。其他军政干校和训练班学员到各团政治处或连队担任政治工作职务。

第二步是抓军权，换团长。因为估计到国民党的进攻会出现叛乱的情况，捉了四师参谋长仁钦宁布，把扎鲁特的三十七团团长江富升格叫到了林东，另派布仁巴雅尔代替他任团长。向克旗的三十六团派包英昌当团长。

为了使几个不可靠的团职干部脱离实职岗位，在师和团之间增设了相当于旅的机构——支队。将三十五团、三十七团编为第一支队，提升原二十五团团长江勒登格兼任支队长，派义达嘎苏荣担任支队政委，业喜扎拉森为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三十四、三十六团为第二支队，提升原三十四团团团长仲乃为支队长，任确吉敖斯尔为支队政委，郎布仁钦为参谋长。三十二团仍直属师部。

第三步是建立蒙汉联军，即把自卫军第四师和分区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成立联军司政部，协调两部分部队的共同行动。联军司政部在人事安排上也是贯彻了平衡的原则，司令员喻楚杰、副司令员和子章。因为6月13日昭乌达盟军政学校成立时，和子章任校长，喻楚杰为副校长。两相照应，也算平衡。政委是盟委书记权星桓，乌力吉那仁任副政委。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军事科长阿民布和任参谋长，20军分区的卜云龙任副参谋长。蒙和舞乐极当政治部主任，刘昌同志任副主任。于是，联军司政部及蒙骑四师的干部阵容为：

蒙汉联军司政部

司令员：喻楚杰

副司令员：和子章

政治委员：权星桓

副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

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

政治部副主任：刘昌

参谋长：阿民布和

副参谋长：卜云龙

政治部组织科长：徐子干

自卫军骑四师改编为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

师长：和子章

政委：乌力吉那仁

参谋长：阿民布和

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蒙和舞乐极牺牲后，1947年
3月刘昌同志继任）

政治部下设三个处：

组织处长：蒙和舞乐极（兼）

宣传处长：宝音陶格套

保卫处长：衣乃扎布

处以下设股，组织股长：白英，干部股长：恩和森
师以下两个支队（四个团）、一个直属团、三个直属
连。

第一支队：辖三十五、三十七团

支队长：额勒登格

政委：义达嘎苏荣

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业喜扎拉森

三十五团

团长：额勒登格（兼）

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

副团长：嘎达苏

政治处主任：宝音乌力吉

三十七团

团长：布仁巴雅尔
政委：赛音巴雅尔
政治处主任：阿民赛和其
第二支队，辖三十四、三十六团
支队长：仲乃
政委：确吉敖斯尔
参谋长：郎布仁钦
副参谋长：沙尔夫

三十四团

团长：确吉敖斯尔（兼）
政委：额尔恒巴图（后来斯布吉德道尔吉）
副参谋长：莫日根夫
政治处副主任：孟和毕力格（后来白英继任）

三十六团

团长：包英昌
政委：查干楚伦
政治处主任：卓斯郎
师直属三十二团
团长：恩和图布新（后包英昌继任）
政委：斯布吉德道尔吉（后张华廷继任）
政治处主任：敖德斯尔

师直属三个连，警卫连连长阿拉坦乎雅嘎；通讯侦察连连长陈化远；机炮连连长宝音乌达拉嘎。

蒙汉联军正式成立于1946年10月28日。

我党对骑四师的争取和改造是在和子章等人的配合下完成的。

对于热北党政军迁驻林东，和子章等人自始就表示欢迎；街里的显著位置就写了标语，欢迎会场上用红被面赶制的横幅字标

庄重严肃。和子章以主人身分酬客三天。当然，在持续半年之久的矛盾冲突之后，一朝言归于好，那心情也是复杂的。所以，此时的和子章是有酒必醉，每醉就发牢骚。比如，一次酒席宴上，热北地委组织部长肖佐汉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是朋友”，他马上想起三十旅在五十家子、新林镇的事，反唇相讥：“朋友？我是土匪呀！”主人宴请三天后，热北方面回请，和子章喝得酒明显减少，但还是“每酒必醉”。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从日本主子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的李守信，从北票给他捎来一封信，赞扬他“反共”、保护地方有功，希望与他建立联系，并约定在翁牛特沙窝子给他投送武器，要他按规定时间地点布置联络信号。这封信落在权星恒同志手里。经权星恒①、肖佐汉研究后，不告诉和子章却以他的名义写了回信、明确了联络信号②。此事和子章已有耳闻，他在一次会上说，“李守信送信来叫我里应外合，我已派人去找……”，还有一次，他又趁着酒力，指着热北党政军首脑说，“革命，讲起来你们还是孩子，我民国十年③就革命了！”话虽这么说，牢骚归牢骚，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对我党的工作还是竭诚配合的。自从和子章组建起地方武装，国民党方面就不断派遣日伪时的残渣余孽，前来进行拉拢、挑拨和破坏活动。为了回击这些特务活动，早在萨嘎拉扎布等于1946年3月组建“昭乌达省”政府前后，就曾采取一些除奸反特行动④。热北地委迁到林东，特别是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后，这类特务活动更加猖狂。在这种情况下，和子章毫不动摇，他在行政委员会的会议上，曾多次报告这类情况，如从张家口来的顿巴豆尔、那顺巴雅

①这时是热北地委副书记，代替调走的李望淮。

②后来没有下文。

③指“五四”运动时期。

④参见2月27日老布僧普日来、乌尼宝音与喻楚杰、谢滋群谈判记录 and 确吉牧斯尔回忆。

尔，他把这些人交给行政委员会处置①。

对改造四师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措施，和子章也给予了真诚的合作。原四师的通讯侦察连，是师部的直属连队。连长陈化远，从自卫队时起就是和子章的得力支持者，但这个连队阶级成分很复杂，陈化远本人就是巴林左翼旗地主。1946年9、10月份减租减息开始，这个连队成了地主富农抗拒运动的靠山。盟委提出这个连影响发动群众，和子章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就把他们搞掉”，并派阿民布和前去，从陈化远开始解除了全连的武装，从此撤销通讯侦察连建制。

1946年8月，李守信攻占开鲁，张念祖派其河南大队长王新智男女二人来到林东，从事破坏活动，被和子章逮捕。王新智于1947年5月被公安部门处决②。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赤峰。逃离林东的梁永生等人巴结国民党军军长石觉策反和子章。梁永生以石军长名义和自己“难民会长”名义各写一封信，派马青山、任常德、姜贵昌三人送来。信的大意为“东安已被国军攻陷，现已进驻开鲁，不久北上。共产党大势已去，望阁下率部前来……。”和子章当即将三人逮捕，并于11月17日在喇嘛苏庙召开群众大会枪毙③。当时的《民声报》为此发了消息并原文登载和子章讲话全文。原文为：

全国蒙汉回苗夷各民族同胞们！爱国志士们！今天我以无比愤慨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罪行。蒋介石

①据热北档案记载。

②和子章曾证实此事，说“搞破坏活动，被我捕起来。”

③据徐子干、斯布吉德道尔吉同志回忆，当时枪毙的是二人。斯布吉德道尔吉说，姜贵昌当时逃跑，后来才捕回来的。而农乃扎布回忆，在公判大会上枪毙的三个人是：左旗七家子的俩兄弟任常德（23岁）、任常胜（22岁）和左旗四间房的姜贵荣（22岁）。本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1947年9月出版的《内蒙古剪影》所载。

当政以来，对我蒙古民族始终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残酷压迫。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明文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我内蒙人民迄未获得丝毫自由。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开放土地，掠我牧场，毁喇嘛庙，抢我牲畜，废旗设县，使我蒙古族毫无政治权利，失去生活保障。“九一八”事变以不抵抗主义把我昭盟人民拱手送与日寇，使我昭盟人民沦为日本法西斯之奴隶。十三年来，奄奄一息。蒋介石却逃遁到峨眉山，毫无同情之念。幸有共产党八路军八年艰苦抗战，配合伟大苏联红军、蒙古人民革命军，英勇出击，打败日本侵略者，昭盟人民乃得重见天日。在内蒙古人民领袖云泽主席领导之下，曾长期坚持民族运动的干部努力之下，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与军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政治、文化、经济逐渐提高。十三年蒋介石将至内蒙送给日寇，公开否认蒙古民族于前，1943年蒋著《中国之命运》后，又下令取消“内蒙”名称于后（1945年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今则公然在美国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下，向我国人民实行大屠杀，且已攻占我内蒙不少城镇，向我昭盟窥伺，派遣特务，组织土匪，扰乱我人民和平生活。国民党反动派近更无耻至极，派遣特务并携带诱降信前来，企图以高官厚禄，使我放下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做他傀儡。国民党反动派此等卑鄙行为，实对我蒙古民族运动一重大污辱。愤恨之余，我要警告蒋介石：你派遣的特务今天执行枪决了，你想重新恢复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毒计已不可能实现。为保卫我昭乌达盟，为我蒙古民族解放，我将率内蒙古人民自治军第四师全体指战员，对你反动派作殊死战，直至消灭你大汉族主义者为止。我相信全昭盟人民和全蒙古民族会和我站在

一起，共同奋斗。我并向全国各民族同胞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粉碎美蒋反动派对全国人民的大屠杀，直到最后胜利为止。最后我高呼：粉碎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大汉族主义政策！神圣的自卫战争胜利万岁！

在与四师的改造和整编的同时，四师所属部队中，有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勾结国民党特务，先后叛变。1946年9、10月份，被免去团长职务的扎鲁特旗三十七团团团长洪富升格、连长宝音陶克陶（二虎）等人叛变，绑架了民运部范文彩同志，杀害了团政治部主任阿民赛和其投敌；与此同时，三十四团三连连长韩桑杰、丁合尔扎布，二连连长乌日他叛变，杀害了联军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以及却吉僧格、王金宝等8人为匪；11月末12月初，三十五团团长沙勒勒登格，在其蓄谋已久的反动喇嘛哥哥塔日巴策动下，绑架了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业喜扎拉森，诱杀了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裹胁三十五团官兵，与相继叛变的公安队长孙根全投降开鲁的李守信、张念祖部。据有人估计，在这两三个月中，从四师约有千余人叛变投敌。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残酷斗争中，和子章更加坚定了跟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三十五团叛变，和子章主张剿除，他亲自出征。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四师政委乌力吉那仁、二十军分区的谢滋群。后来，政治部副主任刘昌也去了，打了一个多月。

为了提高蒙骑四师指挥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1946年6月和子章经与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李子光联系，选拔10名优秀青年知识分子进冀察热辽军区高级军事研究班深造。这些人回到四师后确实发挥了骨干作用。

在这个时期，昭乌达地区经济上也遇到了严重困难。有时候，部队不得不放战士回家吃饭。自治会和政府人员实行供给制，

但不经常发粮，很多人被迫卖衣物吃饭^①。在这种情况下，和子章用自己财产支援军队、军校、政府机关和农牧民。对此，《民声报》11月17日有如下报道：

林东讯 为援助巴林左旗贫苦蒙民及解决盟府和第四师部分物资困难，内蒙古人民自治军第四师师长清卓里克图将军，特慷慨捐出巨额土地及财产给予贫苦蒙民。共计土地二百廿余顷，房基地□□子地九十二顷，房子百余间；并给盟分会马二百五十匹，牛二百头、骆驼廿头、骡子三十一头、胶皮盐车两辆、铁轮大车两辆及衣服用具等物资为□□□。借给第四师生□□之□□约值伪币六百万两。

消息传出后，此间蒙汉各界莫不赞喻，闻省府已予嘉奖。

1947年2月，和子章随乌兰夫同志去乌兰浩特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大会。蒙汉联军向四师派出以阿民布和为团长，刘昌同志为副团长的工作团对四师洗刷和整顿。工作团的成员有博彦陶格图、胡格德力格尔、巴彦扎布、哈斯乎、阿尔斯楞等。一部分人被洗刷，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被选送到内蒙古军政大学、内蒙古自治学院、二十军分区教导大队学习。整顿工作进行了两个月。阿民布和以副师长兼参谋长代理师长职务，“五一”大会以后，正式代替和子章担任师长，任郎布仁钦为参谋长。此后，四师的领导阵容为：

师 长：阿民布和

政治委员：乌力吉那仁

司令部 参 谋 长：郎布仁钦

作战科长：阿日斯楞

侦通科长：乌力吉巴图

^①据热北档案记载。

管理科长：莫日根夫
直属警通连（由原三个连合成）
连 长：赛音巴雅尔
副 连 长：宝音乌力吉
指 导 员：占日格郎（吴金龙）
副指导员：扎拉嘎夫

政治部主任：刘昌

组织科长：徐子干
宣传科长：博彦陶格图
保卫科长：农乃扎布
敌工科长：色登尼玛
总务科长：宝音乌达拉嘎

供给部部长：图门思

副 部 长：乌梁海巴音福
粮供科长：额尔和
军械科长：色里扎布
军需加工厂长：色里扎布（兼）

到1947年9月，全师排除叛变的、牺牲的、洗刷掉的，所剩790人，遂将原来5个团中的四个团编成两个团。原三十四团与三十六团一部编为三十一团；原三十二团与三十五团余部^①编为二十三团；三十七团已划归辽西军区。到1948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7周年时，蒙骑四师中，已发展中共党员99人，团员171人，建立起师党委、团委。蒙骑四师已经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

三十一团 团长：确吉敖斯尔
政委：斯布吉德道尔吉
团副：吴振邦

^①额勒登格叛变后，三十五团剩一个连零一个排。

政治处主任：白英

后勤处主任：拉喜

三十三团 团长：包英昌

政委：张华廷

参谋长：乌兰巴尔斯

政治处主任：敖德斯尔

1948年10月23日，蒙骑四师与卓盟纵队在林东合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师长孔飞，副师长阿民布和，政委乌力吉那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昌，副师长兼参谋长慕汝瑞，副参谋长包英昌。下辖两个团、八个连。原四师三十一团与三十三团合编为三十一团，分4个连，562人，团长唐·巴图、平安，政委张华廷，副政委斯布吉德道尔吉，政治处主任白英；原卓纵一支队整编为三十三团，分4个连562人，团长陶克陶，政委席达，副团长兼参谋长赛音，政治处主任张健。还包括卓纵六支队，但军事上这个支队受冀热辽军区二十一分区指挥。

1949年5月10日，骑十师调离林东。6月1日，在突泉受命与昭盟军事部所属三十二团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三师。师长孔飞，政委刘昌，参谋长包英昌，政治部主任白云，政治部副主任高万宝扎布，供给部主任盖力宾嘎，卫生部部长包正。辖3个团：原十师三十一团改为第七团，原十师三十二团改为第八团，从昭盟军事部划入十师的三十二团仍称第三十二团。

1950年10月，内蒙古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精简缩编的指示，将骑三师精简，原三师师直机关一部和所属第八团划入呼伦贝尔盟，组建盟军分区；第三十二团划归呼纳盟公安大队，原第七团划归兴安盟军分区；从师直和各团抽一批干部组建了上述各盟旗县武装部。

调离骑四师后的和子章

乌兰浩特“五一”大会以后，和子章受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乌兰夫任命，担任自治政府军事部部副。至此，和子章结束了他与蒙骑四师的联系。同年10月，改任内蒙古军事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12月改任内蒙古自治政府参事室参事。

和子章虽然离开了蒙骑四师。但是，他已经与这个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12月，当骑四师的番号经过两次变动，并已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之后，他却被所谓的四师叛变问题拘捕审查，而且一审就是七八年！一直到1957年3月无罪释放。“文革”中，还是那个“四师问题”，身心再度遭受摧残，1979年4月21日衔冤病逝于呼和浩特。

不论是蒙骑四师的荣誉，还是和子章等一大批爱国人士的声誉，只是我党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拨乱反正之后，才得到了昭雪和公正评价。1988年5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在呼和浩特的党政军各界人士与和子章同志生前友好，在大青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和子章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对和子章同志的生平事迹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从此，因和子章冤案蒙受株连的原蒙骑四师许许多多好同志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和子章先生如果冥冥有知，亦当含笑九泉了。

忆“蒙骑四师”的成长历程

刘 昌

一、风 雪 征 程

1945年8月，由延安中央党校毕业的六百多名学员组成的赴华中干部队，在南下途中听到了日寇投降的喜讯，随之，又收到了中央的紧急指示：干部队停止南下，立即进军东北。

东北，是许多同志日夜向往的地方。1931年“9.18”事变后，山河变色，国土沦丧达十四年之久。但是，我们时刻也没有忘记东北几千万父老兄弟，没有忘记白山黑水的千里沃野，时刻牢记着抗战的最终目的是打到鸭绿江边，把日本帝国主义全部驱逐出中国领土。今天，我们直接担负了光复东北、扩大东北解放区的光荣使命，大家的兴奋心情是难以表达的。我们日夜兼程，向北疾进。10月，到达了热河省省会承德。

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韩惟同志很快给我们分派了任务。确定我和邱仁华同志率34名干部去林西，参加筹建热北军分区工作，团结当地少数民族部队，就地开展斗争。当时经费困难，我们只领到了一千五百元伪币的路费，设法弄到了一辆北去的大汽车。到了赤峰，汽油已经所剩无几。在驻赤峰的热中军分区何廷玉司令员帮助下，又买了两大桶汽油，继续北上。对付着走到乌丹（翁牛特旗所在地），汽车又坏了。

①原标题为“以党的民族政策开创前进道路”。文中个别字句有改动——编者。

翁牛特是个蒙汉杂居的牧业旗。长期以来，由于内外敌人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兵匪残害，极为贫困落后。举目望去，一片荒沙枯草，人稀路断。此时已届隆冬，大雪纷飞、朔风卷地，一派萧条景象。我们挤住在一家小客栈的土房里，等着修理汽车。房子四面透风，上炕寒气袭人。许多经过长征的同志感到，进入这个地区，又要“过草地、爬雪山”了。又听说沿途土匪出没，自己又没有武器，不禁增加了几分顾虑。

针对这种思想动态，邱仁华同志和我及时开展工作，对大家进行了教育。我们和人家一起研究了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斗争形势，分析了有利和不利条件，很快统一了认识。大家认为，这里虽是千里冰封的塞北，但比雪山草地的自然条件还是好得多。我大军长驱直入进入东北，敌我力量对比根本不同于长征时期，不象当年那样处处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有的同志还举出了当地群众一家人只一条棉被、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事例，深切感到兄弟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帮助他们翻身解放，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我们是中央党校的毕业生，要压倒一切敌人和艰难困苦，而决不能被敌人和困难所吓倒。

统一的思想产生了统一的行动。两天后，我们这支小分队斗志昂扬地出发了，迎着狂风暴雨继续向北挺进。“脚踏在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的歌声响彻荒漠草原。

二、剑拔弩张

11月上旬，我们到达了林西，同先期到达的同志共同交换了情况。形势是严峻的：这是一个新开辟的地区，热北地委、行署和分区都还在筹建中，各族群众对我们党还不十分了解，各派政治力量、各个武装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日伪的残余力量和美蒋派遣的特务、土匪的活动猖獗。在这种形势下，要站稳脚跟，开展工作，关键是正确贯彻执行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住上层，

深入基层，依靠青年，发动群众”的方针，其中特别要做好昭乌达地区的蒙古族地方武装、被“东蒙自治政府”任命为东蒙自治政府昭乌达盟自卫军第四师师长的和子章的工作①。

和子章是当地较有影响的蒙族上层人物，日伪时期曾任过巴林左旗王府“梅林”和伪蒙疆蒙古陆军蒙八师团长，均因对日伪不满和上层之间的矛盾而先后去职。苏军解放林东后，他出面担任“自治会”会长并组织了地方武装数百人，后被东蒙自治政府指派为骑兵第四师师长，陆续收纳了克什克腾（经棚）、林西、巴林右旗（大板）、巴林左旗（林东）、阿鲁科尔沁旗（天山）、扎鲁特旗（鲁北）的武装力量，辖有五个骑兵团三千多人，成为昭盟地区的一支重要政治、军事力量。他的民族意识较强，不愿意与日伪美蒋合作。政治上靠拢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因而对我党虽有怀疑，但不公开反对。这是我们争取的有利条件；但他对我党我军也是疑虑甚多，特别是数日前和我们收编的盛世恩团发生过武装冲突，至今双方仍在对峙。这更加重了他的不满和疑虑。

盛世恩团是苏军进入赤峰时被我收编的一支旧军队，部队成分非常复杂。他们虽然打着八路军的旗号，但党的工作还未建立，纪律很差。热河军区派师军同志把他们拉到热北，同时带来的还有在围场起义一个伪军连队。这样的部队，当时根本不可能理解更谈不上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们从林西东进大板时，许多举动同党的团结少数民族部队的指示相违拗，还收缴了东蒙自治政府委派的巴林右旗旗长敬文泰卫队的枪支，激化了矛盾。和子章搞了一次伏击，盛团人员有伤亡，汽车被打坏，围场起义的那个连被困在大板镇的一个土围子里，其余部队撤回林西。和部也随之向林西近逼，双方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形势是严重的。正确解决这一危机，对于在少数民族中正确树立党的形象，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从而团结各族武装力量和广

大群众坚持热北地区的斗争，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稳住上层，深入基层”这一总方针的精神，我们确定直接同和子章谈判，按照党的政策，公平合理地解决蒙汉部队的冲突。分区派我作为八路军的代表，去大板“单刀赴会”。

三、大板谈判

11月15日在林西召开了庆祝分区成立的群众大会。两天后，我即启程去大板。随我们前往的有军区派来帮助疏通关系的一个哥老会“二爷”，一个常跑蒙地做买卖的翻译郝成，还有我从延安带来的警卫员，一行共四人。

出林西东门不到三十里，就被和子章的部队的前哨骑兵拦住了去路。我策马向前告知他们：我们是八路军的干部，是延安毛主席派来的，来此专门解决蒙汉部队的纠纷，请你们向你们的上级通报。

两小时后，驻大板的团长仲乃来接我们。把我们安排到一个上层人士的家里，摆“全羊席”进行招待。饭前，我向接触到的干部战士赠送了礼品：每人一支香烟、几块水果糖和一杯白酒，并相机向他们宣传了蒙汉部队团结共同反对蒋介石大汉族主义的道理。酒席间，我一再向仲乃团长和敬文泰旗长申明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对民族部队的一贯政策。我说，我们党对一切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部队都是坚决支持并帮助其发展的。对于两支部队的纠纷，我们要本着团结的愿望，从反对共同敌人的大局出发，公平合理地加以解决。你们如同意，我们将撤出被困连队，你们需要时我们再来。仲乃和敬文泰原则上同意我的意见，但也举出了不少盛世恩团败坏我军纪律的事实。他们激愤地说：盛世恩那个团不是真正的八路军，他们败坏了你们的名誉，你们要严肃处理这个问题。我表示要做进一步调查，查清后一定按部队纪律加以处理。这顿饭从早到晚，边吃边谈，吃了七八个小时，总地来

看，气氛是融洽的。

第二天，我用整天时间接触了各方面的群众，听取了他们对这次蒙汉部队纠纷的意见，也去看望了被困的连队，了解了和部被收缴的枪马财物的下落。晚上继续会谈，并达成了四项协议：

1. 为了团结对敌，立即停止蒙汉部队的冲突；
2. 撤出进入大板的连队，返回林西，由和部保证沿途安全；双方以东不冷河为界，互不侵犯，遇有争议的问题双方发函协商；
3. 召开大板镇群众大会，公开归还被收缴的敬文泰旗长所属的枪马财物，不足部分今后查清偿还；
4. 双方共同调查盛世恩从林西到大板途中的在地方征用的粮食草料，开具证明，今后从征收公粮的数额中扣除。

按照协议规定，第三天召开了由敬文泰旗长主持的群众大会。我在大会上，两次申明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讲述了会谈经过和协议内容，介绍了我军经过万里长征成长壮大的事迹，号召蒙汉部队、蒙汉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仲乃和敬文泰也都讲了话。大会气氛极为热烈，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通过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和群众大会，和子章部队的官兵和广大群众真正看到了共产党光明磊落，说到做到，认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帮助少数民族闹翻身、求解放的，有力地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会后，我率被困连队返回林西，仲乃通知沿途保证顺利通过。至此，蒙汉纠纷圆满得到初步解决。以后，虽然还发生过一些磨擦，但都及时做了处理。这样，就为我们党进一步团结教育这支民族部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争取大大小小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和头目，是在争取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区工作的关键。在当时来说，仲乃是巴林右旗王爷扎嘎尔（当时已故）的女婿，也是

这个旗民族武装的团长。敬文泰是右旗有较大影响的政界人物，旗长。我们争取了这两个人物后，基本解决了与林西我军直接接触的右旗民族部队与地方的关系。

四、蒙 汉 联 军

1946年3月末4月初，在承德举行了有名的“四三会议”。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确定由乌兰夫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撤销“东蒙自治政府”，决定内蒙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分别归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这次会议，对整个内蒙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使和子章部朝着革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根据会议决定，和子章和东蒙政府委派的昭盟盟长萨嘎拉扎布等人，在5月中旬由林东专程来林西商讨热北地委和军分区移驻林东、成立蒙汉联军司令部及部队整训等问题。我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热北地委书记王逸伦兼政委、分区司令员俞楚杰和和子章、萨嘎拉扎布都讲了话。大家都表示坚决贯彻会议决议，加强蒙汉人民和各方面武装力量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蒋介石。会后，各方人士进行了聚餐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气氛热烈融洽。此后，热北军政机关分批移驻林东，以军分区为基础的蒙汉联军司令部、政治部正式组成。俞楚杰兼任司令员，和子章为副司令员，阿民布和为参谋长，卜云龙为副参谋长。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主任乌力吉那仁为副政委，巴林右旗进步青年蒙和舞乐极为政治部主任，我兼任副主任。原由和子章率领的“东蒙自治政府昭盟自卫军第四师”改名为“冀察热辽二十军分区蒙汉联军第四师”，置于蒙汉联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之下。从此，这支民族部队正式列入我军序列，为后来改造成为党领导的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革命武装打下了初步基础。

从对党的怀疑到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从划地分守到欢迎分区移驻林东，从双方对峙到服从统一指挥，这一切都标志着这支民族部队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这次飞跃是在全国、全区革命形势的推动下完成的，是“四三会议”的光辉成果；同时也雄辩地说明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十六字方针的完全正确，说明了我们针对和子章等上层人物采取的工作步骤和方法是适当的、正确的。和子章同志在完成这次飞跃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应该给予肯定。这一事实也说明，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许多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或领袖人物是可以争取的。一旦争取了他们，我们的民族地区工作就能顺利地进行。

五、耕 耘 播 种

在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的同时，我们在基层扎扎实实地进行了政治思想建设，用我军的建军宗旨、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思想武装这支民族部队。在开展这项工作时，蒙古族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桥梁作用和骨干作用。

把蒙古族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作为依靠力量，是我党对他们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后所采取的一项重要决策。蒙族青年具有普遍的热爱民族的感情。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的结果。所以，当时他们是一支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热切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和民族解放。这个基本方面决定了他们必然坚决反对外部的民族压迫和内部的阶级压迫，能够较快接受党的理论指导并热忱地投身于革命实践。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有着模糊的政治观念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但一旦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是很快可以转变的。当时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军解放东北和内蒙地区时，内蒙古的许多青年受了革命的影响，他们倾向莫斯科，特别是倾向乌兰巴托，这也是他们倾向我党我军的重要

因素。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党确定了大力培养、使用蒙古族青年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它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蒙汉联军成立前后，党的组织就专门研究了培养干部问题，并且规定了选拔干部三条标准。这三条是：年轻、历史上无重大问题、政治思想可靠。按照这个标准，从师直和各团、连选拔了大批有发展前途的蒙古民族青年去赤峰民族自治学院、哈尔滨东北军大、张家口蒙古族干部训练班等地方学习。蒙汉联军教导队还专门成立了用蒙汉两种语言授课的蒙族学员队。此外，我们从昭盟各旗召来大批蒙古族青年，在林东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当时的昭盟地委负责同志王逸伦、吴广义、谢滋群和我都分别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理论和党的各项政策。同时也请乌力吉那仁、萨嘎拉扎布、和子章等蒙古族干部和上层人物讲话。为了培养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联军政治部又开办了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的连队政治干部短训班。这批青年经过短期学习后，有的在地方上参加了减租减息、清算汉奸恶霸，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的工作，有的被分配到部队担任政治干部。他们都是当地人，同昭盟各旗群众及部队有着血肉联系，语言又通，生活习惯等方面同基层的广大牧民群众和干部战士很容易打成一片。他们革命热情高，能够克服困难，都以忘我的精神从事地方各项工作和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蒙和舞乐极、斯布吉德道尔吉、确吉敦斯尔、敦德斯尔、巴嘎雅色登、哈斯乌拉、白音仓等许多同志就是这批青年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是在昭盟发展的首批少数民族党员，以后，大部分在地方或军队中担任了领导职务。

在斗争实践中经过严格考察，我们秘密地、逐个地发展了蒙古族的优秀青年加入党的组织，并陆续在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小组。共产党员们在艰苦的行军、作战和训练中，起到了带头、骨干作用，在干部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其中，蒙汉联军政治

部主任蒙和舞乐极、三十五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三十七团政治处主任阿民萨和其等政工干部，在匪徒面前宁死不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三十五团三连连长斯钦朝格图在该团叛变投敌时，率领自己的连队返回革命队伍中，受到乌兰夫同志的接见和表扬，后来被额勒登格叛匪杀害。他们有的人当时刚刚成为预备党员，有的还不是预备党员。斗争实践证明，我们对蒙古族青年采取的培养、信任、依靠、重用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

六、百 炼 成 钢

在革命化征途上不断前进的蒙汉联军骑兵四师，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成为 支无坚不摧的革命武装力量。从1946年10月建立以后的两年中，部队参加了三十八次较大的战斗。1946年冬季的保卫天山战役，1947年春的消灭布利亚特仁钦道尔吉叛匪的战斗及经棚一带剿灭白金辉土匪的战斗，配合解放多伦的外围作战等都是昭盟蒙汉联军部队参加的主要战役和战斗。在护送乌兰夫同志等一百多名领导干部去王爷庙参加“五一”大会的保卫任务和在剿灭叛匪额勒登格、白金辉、韩桑杰、二虎（宝音陶格陶）的历次战斗中，广大指战员一往无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作战，都取得了显著战果。特别是1948年1月追剿韩桑杰、二虎连续作战四十五天，战士们顶风冒雪，忍饥挨饿，长途奔袭，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四师指战员的英勇战斗，直接保卫了冀察热辽军区和昭盟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了昭盟蒙汉人民翻身解放的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

1948年10月，四师与卓盟纵队合编，番号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1949年6月在突泉改编后，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三师”。每一次部队名称的改变，都标志着一个新的战斗历程的开始。这支创始时以保卫民族利益为

目标的民族部队，在党的辛勤培养下，在艰苦战斗的锻炼中，终于突破了狭隘的眼界，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大家庭中的一员，担负起解放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崇高使命。

（左树林整理）

编者注：①此时和子章为巴林左翼旗人民自治委员会主任，手下有500多人的自卫队。

记一支草原骑兵三十二团

戈更夫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43年前有一支蒙古族骑兵团，活跃在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巴林草原上。它曾引起过人们的广泛注意，同时也经历了坎坷而复杂的历程。这支部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并在短期内克服了狭隘的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和自由散漫的游牧式的组织状况，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经受了民主改革（土改）和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从一支很小的地方民族武装转变为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我作为当年三十二团的政委，今天回忆当时的情况，往事历历在目感到光荣和自豪！当然，感慨之余也有过苦闷、抱怨的情绪。这是因为在如何评说这支地方民族武装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褒贬不一，评价不公。问题的焦点在于对和子章这个人物怎么看和如何评价的问题。多年来和子章的历史问题和政治案件直接影响了三十二团的全体官兵，有不少干部战士包括我党派的政工干部都因此受到株连，遭到打击、监禁、劳改，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糊里糊涂含冤死去。幸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指导下，许多影响安定团结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冤假错案获得清理，和子章的问题也得到解决。近几年来内蒙古军区和巴林左旗党委和政府、政协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给原三十二团的许多干部战士落实政策，恢复了他们的革命军人的荣誉和待遇。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谨撰此文，追述往事，借抒情思，以志纪念。

一、三十二团的成长和整编改造过程

(一) 三十二团的组建经过

三十二团的前身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军进驻林东后，巴林左旗各区的地方实力人物，以保护各自的家园、财产和牲畜不受外来侵害所组织的自卫队（保安队），后经和子章以林东自治会会长身份，联合各地自卫队组建起来的旗保安总队（团）。这支武装当初是一个自备枪支马匹，不离乡、不脱产，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民兵式的队伍。和子章虽不是地方封建贵族，也没有日伪、国民党的背景，但他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地位当时在左旗和林东比别人优越。他还同东蒙地区蒙古族进步人士哈丰阿等人早有联系，并支持他们的内入党和民族自治运动。1945年底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和子章被任命为东蒙自治军第四师师长，当时他把左旗保安队分编为三十二团、三十三团两个团（金宝光为三十二团团团长，博拉哈为三十三团团团长），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到1946年3月，三十二、三十三两个团合编为一个团，任命恩和图布新为三十二团团团长，却吉宁布为副团长，下属四个连（一、二、三连和机炮连），仍维持一个区一个连的建制。当时三十二团的成份比较复杂（有喇嘛、伪军警和教职员等人），但其基本成员是牧民和农民，其共同的目的是保卫家乡安宁和地方民族自治。

(二) 三十二团的整编改造

1946年3月，东蒙自治政府派遣的工作团到林东后，从王爷庙（乌兰浩特）来的阿民布和、郎布仁钦、业喜扎拉森等人参加到第四师司令部工作，还有一批青年分别到团连工作。此外，在三十二团有过一些时事宣传和启蒙教育工作，如讲苏军出兵，日伪垮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以及东蒙自治政府的宗旨；依靠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争取民族自治等。1946年4月，东西蒙代表承德会议之后，昭盟情况发生了前

所未有的大变化，四师和三十二团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接受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中共热河省委的领导；热北地委进驻林东和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的成立等，使昭盟有了历史性的转折，第四师以及三十二团的性质和组织从此开始大改变。1946年10月，昭盟蒙汉联军司令部的成立和在第四师设政治部，并向团、连选派政工干部的决定，使第四师所属的地方民族武装发生空前的根本性变化。当时决定军分区司令员喻楚杰为联军司令员，和子章为副司令员，阿民布和为参谋长，刘昌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师政委由盟分会主任乌力吉那仁兼任，师政治部主任为孟和乌力吉。三十二团政委为斯布吉德，团政治处主任为敖德斯尔，另外陶格陶、那逊乌尼、乌尔吐那苏图、色登扎布、哈斯乌拉、达瓦仁钦、胡尔查比力格、孟和那逊等一批进步青年经短期政训后被派到三十二团担任连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干事。第四师及三十二团从此切实进入了革命队伍和人民军队的行列。

（三）三十二团经受的考验

自从1946年下半年起国内局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十月以后形势突变，热河省军区从赤峰撤到林西。当国民党进犯军前后占领赤峰、开鲁并向昭盟疯狂进攻的时候，昭盟第四师所属各旗地方武装开始分化，一部分团、连动摇叛变，如右旗三十四团的韩桑杰一个连叛变，并杀害了前去阻止叛变的师政治部主任孟和乌力吉；阿旗三十五团大部叛变，还杀害了副支队长业喜扎拉森和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扎旗三十七团的一部分人叛变；克旗三十六团的大部分后来也被仁钦道尔吉叛匪打散。当时只有三十二团始终没有动摇、叛变，没有一个人叛逃。在外部国民党大军压境，内部几个团发生叛乱的严重时刻，三十二团经受考验，站稳脚根，保存全团，旗帜鲜明地投入了反击国民党和叛军进攻的屡次战斗。从1946年至1948年的三年当中，三十二团积极参加了保卫天山的战斗；追剿白金辉窜匪的

战斗；剿灭仁钦道尔吉叛匪的战斗；追歼二虎一股窜匪的战斗；追剿呼图仍嘎一伙窜匪的战斗以及剿灭流窜在多伦多沙漠中几股土匪的战斗等。三十二团经受战争的考验，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保卫昭盟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三十二团的主要几次剿匪作战情况

（一）打垮三十五团叛军，击溃国民党李守信部，保卫天山和昭盟

1948年10月，阿鲁科尔沁旗三十五团在团长额勒登格及其兄反动喇嘛塔日巴的策动下，勾结开鲁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其部属拦路杀害了从王爷庙回林东的革命干部十一人（即姚家段事件）。额勒登格叛变时，杀害其副手业喜扎拉森和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投奔国民党李守信部。不久，国民党军的三十五团叛军向阿旗党政军所在地天山猖狂进攻，一时阿旗和昭盟局势紧张，情况比较严重。当时昭盟蒙汉联军调遣三十二团、天山支队和其它一些部队，在天山一带同国民党军队及叛军交战，很快把敌人击溃，有力地保卫了天山和昭盟。当时三十二团在保卫天山战斗中的作用和意义是明显的：1.可以相信三十二团是比较可靠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2.在民族地区三十二团同民族叛军作战，可以打破“汉人打蒙古人”的反动宣传和挑拨民族关系阴谋；3.在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的雪山旷原和沙漠中同骑匪周旋，本地生长的蒙古族骑兵三十二团能很好地发挥它的特长和作用；4.在本地区、本民族之间比较容易知己知彼。三十二团比起汉族步兵和外地调来部队更多了解叛军的人员装备、马匹枪支情况甚至他们的思想心理状态。这支部队在思想进步和懂军事的阿民布和与忠于革命、无私无畏的长征老干部刘昌二位师领导的带领指挥下，经受了战争烈火的严峻考验，表现出坚定勇敢团结战斗的精神，完成了各种情况下的作战任务，在这次击溃国民党和叛军、保卫天山的战

争中，三十二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起到很好的作用。

(二) 剿灭盘踞在克旗边境的仁钦道尔吉匪帮，保证了锡察昭三盟边境的安宁

1947年初从阿旗胜利回师的三十二团，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训练后，接受军区命令开往克旗。在经过林西时，我团受到热河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和副司令员陈奇涵等军区首长的接见和勉励。5月底，三十一团在经棚南部白岔沟地区阻击追剿白金辉匪二千多人，把这部分匪帮赶出昭盟境外。7月，三十二团又奉命开到克旗西北部大王庙、达里诺尔地区，接受剿灭仁钦道尔吉匪帮的任务，同林西大队、天山支队、克旗大队和三十六团的一部分人马联合，在军区统一指挥下与锡盟部队和察哈尔部分军队协同作战，共同剿灭张家口多伦方面国民党操纵指挥的以仁钦道尔吉为首的匪帮。这次作战的任务较重，规模较大，敌人比较顽强，情况比较特殊。这股匪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贝加尔湖畔叛逃到外蒙古，蒙古的人民革命胜利后又从外蒙逃到我国锡林郭勒盟借地落户。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西蒙期间，它投靠日本侵略者。日本投降后它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欺压西蒙各盟旗的老百姓，成为“独立王国”。它是一股经过几个时代的国际性反动集团，一向搞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如不彻底铲除这股匪帮，锡察昭三盟不得安宁，这一带后方也不能巩固。因此，当时组织调动昭乌达、锡林郭勒和察哈尔三盟几个方面力量，一举歼灭了这一顽固不化的反革命据点。战斗结果，持枪的反动分子溃败逃往多伦、张家口，其家属和牲畜全部被迁徙到呼伦贝尔盟。在这次战斗中，三十二团在大王庙宿营的当夜凌晨被匪袭击，在庙门被机枪封锁和部分战马被他们夺走的情况下，在敌人机枪严密扫射下，沉着应战冲出庙门，打死打伤敌人，缴获了一挺俄式“马克西姆”机关枪，赶跑偷袭者，当场受到军区骑兵旅何司令员的队前嘉奖，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三十二团的首战胜利，赢得各方面的赞扬。紧

接着三十二团一马当先穷追敌人不舍，一气跑出百余里，追到敌人老巢，彻底击溃了这股盘踞多年、作恶多端的匪部，保证了锡察昭三盟边境的长久安宁。

（三）消灭原从三十七团叛逃出去的二虎叛匪，保护了昭盟地区土改成果

1949年2月春节前后，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和锦州的解放，早在1946年冬，从扎旗三十七团叛逃的一股叛匪二虎等人，无路可走窜到西拉沐沦河流域。我三十二团和三十四团奉命前往阻击。敌人一路上打死打伤正在搞清算斗争的干部群众，抢夺老百姓分得的土改果实，一路抢老百姓的马匹、毛驴换骑逃跑。而我军严守群众纪律，把伤病员和累垮的马留在后头，继续穷追不舍。广大指战员不怕寒冷、不怕饥饿，克服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在林西县、巴林左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同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最后把敌人追到扎鲁特旗南部，终于迫使他们投降。这股叛匪先被扎旗方面缴械收容，后经我们同扎旗共同商定，将二虎等几个头头由我们带回林东处置，其余人员和枪支马匹全部留给扎旗。在这次剿匪当中人们已经看出，随着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胜利反攻，这些民族败类，反革命叛乱分子和集团，已经变成丧家之犬，无处藏身，到处乱窜。在此之后，三十二团还参加了剿灭胡图仍嘎等几股叛匪流寇的战斗，在昭盟、锡盟和察盟的多伦等广阔的草原、雪山和沙漠中多次战斗。经过三年的战斗历程和几次重要剿匪作战，三十二团屡立战功，曾荣获内蒙军区和热河省军区的表扬、嘉奖。

三十四团纪略

巴林右旗政协文史办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2日，巴林右旗、巴林左旗、林西县宣告解放，日伪势力土崩瓦解。8月13日，巴林左旗和子章(蒙古名清卓力克图)着手在旗内各努图克组建自卫队，编为两个团，分别任恩和图布新、博勒哈为团长，保卫地方，保护牧民生命财产，协助苏联红军清除日伪残余势力。

紧接着巴林右旗部分努图克、嘎查受巴林左旗和子章的影响，组建努图克、嘎查自卫队，之后由拉巴哈扎木苏、沙尔夫、德瓦、胡图仍嘎等人建议，由仲乃指挥建立旗自卫队。仲乃接受大家的意见，将各自卫队编为三个连，另由旗东部牌毛都地方的乌日他(伪人村长)组建了一个独立连，这个连自行其事，不服仲乃指挥。东蒙古哈丰阿派恩和森带着给和子章的亲笔信来到林东，命和子章组建地方自卫军，和子章邀阿鲁科尔沁旗旗长曹都那木道布，赴林东主持召开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联防会议，各旗县都派来军事要员参加，会议推荐和子章为昭卓两盟自卫军总指挥，巴林右旗自卫队编为一个团，称大板自卫团，也叫仲乃团。仲乃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他从林东赶回大板，组建骑兵团，共四个连，一连连长拉巴哈扎木苏，副连长达理扎布，二连连长乌日他，副连长双喜，三连连长韩桑杰，副连长胡图仍嘎，四连连长沙尔夫，副连长敖额勒图。

1946年2月中旬，东蒙古自治政府向林东派出一个以萨嘎拉

扎布为首的工作团。成立昭乌达省，并按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命令，将昭盟自卫军整编为以阿斯根将军为司令员的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任命和子章为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师长，和子章当即发布原昭乌达盟自卫军所属各团，由东蒙古自治军司令员统帅的命令，各团重新编号。巴林右旗自卫军大板团改编为东蒙古自治军骑四师第三十四团，团部驻大板荟福寺东原根波勒（又叫三喇嘛）的宅院，仲乃由大板自卫团团团长改任为三十四团团团长，原自卫团四连连长沙尔夫调任团参谋长。

1946年4月，在承德召开了内蒙古东西部统一会议，就是有名的“四、三”会议。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使内蒙古自治区的自治运动明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以乌兰夫（云泽）同志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子章表示拥护承德“四、三”会议，并同东蒙古自治政府委派的萨嘎拉扎布等人，于5月中旬专程赴林西，与热北地委、军分区会谈，研究热北地委和军分区迁驻林东等事宜。按照“林西协议”，自治军骑兵四师改编为以乌兰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四师，和子章继任师长，三十四团原班人马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四师三十四团，团长由仲乃继任。不久，鲍金昌带领十余人由彰武县来林东投奔和子章，和子章遂将鲍派往驻大板的三十四团，给仲乃当助手。随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对骑四师进行第一次整编，这次整编将原全师六个团缩编为五个团，其中一个团及另编的三个连由师部直属，其余四个团分属两个支队，骑四师三十四团和三十六团组建为第二支队，仲乃提任二支队队长，确吉敖斯尔任二支队政委，郎布仁钦任二支队参谋长，沙尔夫任副参谋长。从师到团都建立了政治机构，从师到连都配备了政工干部，师长仍由和子章继任，乌力吉那仁任师政委，阿民布和任师参谋长，蒙和舞乐极任师政治部主任，刘昌任师政治部副主任。

三十四团团长的二支队政委确吉敖斯尔兼任，团政委由旗支会主任额尔恒巴图兼任，鲍金昌任副团长，莫尔根乎任团参谋长，孟和毕力格任团政治处副主任，拉喜任团供给处副主任，团部仍驻在大板褔福寺东原根波勒院。团下属四个连，一连连长拉巴哈扎木苏，连指导员哈顺巴图，副连长达里扎布，副政治指导员曹都那木道尔吉，连部驻在东庙巴拉其楼特葛根仓。二连连长乌日他，政治指导员赛音乌优吐，副连长双喜、德戈、丹达尔（兼排长），连部驻牌毛都。三连连长韩桑杰，政治指导员业贺昭日勒图，副连长胡图仍嘎、丁和尔扎布（二人均兼任排长），连部无固定地点，游动于查干诺尔、巴彦汉一带。四连连长敖额勒图，政治指导员胡春达来，副连长赛彦巴音，副指导员敖尔布，连部驻胡苏台。团设有直属警卫排（连级待遇），排长道尔吉，政治指导员由团参谋道荣嘎兼任。1946年10月，三连连长韩桑杰以恢复自卫队为名，带领二十余人脱离团部指挥叛变后，任巴布道尔吉为三连连长。

1947年6月，经军分区和师部批准，调任三连副连长胡图仍嘎为三十四团副团长。4月，团政治处副主任孟和毕力格调离学习，5月初团政委额尔恒巴图离职学习，同时调团参谋长莫尔根乎去师部。同月上级委派八路军老干部吴振邦为三十四团副团长，任白英扎布为团政治处主任。

1947年8月，师部对全师进行第二次整编，三十四团整编为三十一团，确吉敖斯尔继任团长，斯布吉德道尔吉（戈更夫）为团政委，吴振邦继任副团长，白英扎布继任团政治处主任。

1948年元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四师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四师，改编后的三十四团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四师三十一团，因换防离开大板赴巴林左旗驻防。骑四师三十四团有指战员六百余人，绝大部分都是巴林右旗蒙古族青年，这支少数民族铁骑部队是巴林右旗草原上仅有的以

蒙古族为兵员的人民军队，它随着民族解放的隆隆炮声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壮大，在风云多变的政治形势下前进，在血雨腥风的战斗中成长。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46年11月到1948年10月，举钢枪，跨骏马，驰骋在广阔的巴林草原上，经受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和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为保卫胜利果实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作出了巨大贡献，功标史册。其主要功绩为：

一、保卫革命政权

建团以后，三十四团指战员按照上级的指示，胜利地完成了防务任务，没有让国民党军队进入巴林，巩固了后方，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二年多，三十四团指战员们经过大小几十次战斗，不仅在左旗境的嘎尔迪哈达（半拉山）、巴林桥、楚图郎图、拉嘎山、楼子村、黄花庙、巴尔图山、孟根西热、巴彥包特附近的乌勒吉沐沦河畔和三座山、马鬃山等地向匪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还先后配合兄弟部队在克什克腾旗南部、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和围场等地剿匪。

1947年元月，二十四团以二个连的兵力，在西拉沐沦河北岸围剿以嘎尔布喇嘛为首的翁牛特、敖汉一带的三百名匪徒，经过两昼夜激战，毙敌十五人，打伤几十人，匪首嘎尔布逃往锡林郭勒盟，余匪溃逃到翁牛特大沙窝子里。此次战斗，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三十支，军马一百五十匹，牛八十头，驼百峰，羊百余只，保卫了巴林桥，使巴林桥成为保障后方运输的“安全桥”。

1947年3月，从三十四团叛逃的被收编为国民党李守信部的乌日他、韩桑杰匪徒，翁牛特旗的秃喇嘛和阿鲁科尔沁旗部分匪徒共五百多，包围了巴林右旗政治处所在地巴彥包特，扬言要“剿除共党”。当时驻在巴彥包特的我三十四团团团长确吉敖斯尔、

政委额尔恒巴图、副团长胡图仍嘎带领两个排七十五名指战员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激战，将匪徒击毙四人，重伤多人，终于把敌人赶出巴林右旗境，保卫了巴林右旗政治处机关和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蒙汉群众的赞扬。

二、剿 清 叛 匪

三十四团指战员除了保护革命群众运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维护交通，支援前线外，还有效地完成了肃清叛匪的任务。

1946年10月，韩桑杰叛变为匪以后，三十四团就投入了歼灭韩匪的战斗。韩桑杰原是伪满兴安西省警备军的骑兵上尉连长，“八一五”光复后趁机拉起地方武装，由三十四团叛变后，经常在右旗查干诺尔和翁牛特旗一带骚扰破坏，网罗匪伙，公开与人民为敌。这股匪徒先后窜到阜新、敖汉、阿鲁科尔沁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破坏减租减息，扰乱社会秩序，先后杀害我军民和革命干部六十余人。三十四团指战员从1948年1月对叛匪韩桑杰连续进行四十五天追剿，指战员们顶风冒雪，忍饥挨饿，长途跋涉，奔袭战斗，胜利地完成了追剿任务，1949年5月，韩匪残余被彻底消灭。

跟随韩桑杰叛变的丁合尔扎布等人，在1947年2、3月间，在我三十四团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向三十四团投诚，弃暗投明。

1946年11月，在阿鲁科尔沁旗叛首额勒登格的策动和影响下，原三十四团二连连长乌日他带领全连叛变，投靠国民党李守信部，并派人侦探四师情报，骑四师首长洞察乌日他的动向和叛变行为后，为了弄清情况和劝导叛匪乌日他改邪归正，同年11月9日，师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极同志带领师政治部确占僧格等干部战士十一人，从林东出发，跋涉四百余里，11月15日到达二连驻

地牌毛都，被叛匪欺骗而遭到突然袭击被捕。11月22日，乌日他匪部在翁牛特旗的哲日根吐营子杀害了蒙和舞乐极同志，23日又在牌毛都南沙窝子杀害了原被捕的三十四团参谋乌恩奇、二连指导员赛音乌优吐以及随同蒙和舞乐极的确吉僧格、敖其尔喇嘛、昂萨格尔、斯钦格日勒六人，这些蒙古族革命青年为民族解放事业，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英勇牺牲，献出了宝贵生命。为讨还血债，歼灭叛匪，三十四团指战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乌日他匪部在三十四团的重创下溃不成军，有的毙命，有的投诚。

三、保卫云泽（乌兰夫）主席一行

1947年2月，三十四团接受冀察热辽军区的命令，为完成保卫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人民自卫军司令兼政委的乌兰夫一行途经巴林右旗去王爷府的政治任务，三十四团指战员怀着高度的警惕性和崇高的使命感，制定慎密的行动计划和作战方案，扫清西拉沐沦河两岸的土匪，经过半个月的艰苦战斗，对五股约七百余名匪徒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杀伤二十人，俘虏二十一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五支，胶轮车二辆，马三百二十匹，牛二十头，将敌人赶到西拉沐沦河以南大沙漠。在乌兰夫主席一行到来时，沿途放警戒，组织迎送队伍，保证了乌兰夫主席一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军区首长的表扬。

四、在战斗中成长

三十四团的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都是草原牧民、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学本领，长知识，在战斗中学打仗，逐步由普通牧民锻炼成长为革命战争的指挥员、战斗员。虽然当时政治风云多变，但是他们拥护党的民族政策，拥护自治运动，有的由战斗员而提为指挥员，全团载入名册的六百多名指战员中，有二十余名被调师部机关工作，有十余人调出学习。

应该指出的是巴林右旗的青年学生和蒙古族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的锻炼中成了部队的骨干力量。1948年10月，骑四师与卓盟纵队合编，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三师”，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此文在编写过程中，采访了原三十四团团长确吉敖斯尔同志、原政治处副主任孟和毕力格同志，以及道川嘎、哈顺巴图、叶贺昭日勒图等同志，确团长还撰写了回忆材料，在此一并致谢。）

乌日他及其叛变

宝音贺什格 整理

叶贺吉如木 翻译

乌日他，蒙古族，汉名叫包秀峰、包景峰、包金山，1912年阴历9月18日生于巴林右旗东南部牌毛道村的牧主包和泰（次子）家。他叔父叫包恒泰，长兄叫包振荣，弟弟叫包金生（蒙古名嘎拉桑斯愣）。祖籍辽宁省朝阳县。祖父（是个喇嘛，姓名不详）时期由辽宁省朝阳县迁来右旗，当乌日他出生时，其父包和泰已经是放牧种地均雇工，并且向外放苏鲁克的富户。

自乌日他12岁（1923年）那年起，父亲包和泰请先生在家里办私塾，叫乌同时学习蒙汉两种语文共7年，使他读完《五经》、《四书》。乌日他从十八岁开始，跟随父亲收地租和清点苏鲁克。当时，由于他的弟兄和亲属们在军政界里几乎都混上了一官半职，一时乌的势力如虎添翼。

1931年，候兴、吉木彦二人，因为散布了对乌日他横征暴敛不满言论而被抓了壮丁。后来，候兴终身未归死在兵营。1932年，包和泰去世。乌日他在叔父栽培下管家理财。

1934年，乌日他23岁被任命为伪满牌毛道村的百家长官。

在乌日他家有常年放牧的老牛倌儿，有五个儿子。可是其中的四个都是双目失明，唯独其二儿子具有劳动能力而成了全家人维持生活的命根子。但是，乌日他因为受贿，赦免了摊在富裕户子弟头上的壮丁任务，而派老牛倌儿的二儿子顶替别人去当

兵送死。老牛倌儿一家人统通饿死。

自乌日他充当百家长之后，常年在他家做零活儿的佣人就达十五名之多。并且，乌日他还规定：凡居住在他的管辖之内具有男劳动力的户，都必须为他家无偿从事修房、打草、堆积牛粪等季节性生产和放畜群、牵骆驼、饲养马匹等劳动。假如谁人胆敢违抗，乌日他就叫他不能在牌毛道居住生活下去。有个叫昭那斯图的，就是因为家里有事未能按时去参加修房劳动，而从牌毛道被赶走。

到了秋季，哪里草场的草长得茂盛，那里便成为乌日他的打草场。他还任意强占别人耕地。有个叫拉喜的农民开了几亩荒地种了庄稼，收成不错。乌看见就红了眼，到第二年他就把那块土地归为己有。

每逢过春节，牧民们都按自己的家景，尽力而为给乌日他奉送礼物。谁如果不送礼，谁肯定要遭殃。所以，人们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尽力完成奉送乌日他的春节礼物。就是连那些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穷户，也得送去一捆勒车牛粪或是柴木，甚至连那身上无衣、炕上无席、锅里没米的“穷光蛋”们也得送一背篓树疙瘩才算了事。再说，他所放的苏鲁克头（口）数，只许增多，不许减少。假如出现丢失或狼吃现象时，就必须以二岁牛赔三岁牛，以犍牛赔二岁牛。他还扬言这是他对穷人们的莫大恩赐。

1939年，乌日他28岁被任命为伪满巴林右旗乌兰套海地区区长。这时他已知道对自己的民愤。他为防备被人暗算而身边设置了两名持枪警卫，一前一后，形影不离。

随着乌日他权势的扩大，他的财产也水涨船高。他已拥有牛300多头，马200多匹，骆驼30多峰，羊500来只，连毛驴子都超过十几头，论其不动产——有完整的平房15间，蒙古包一座，耕地36顷和全套生产工具。

乌日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狠狠地抓壮丁和劳工；他重重地摊派出苛粮、出牛马羊以及搜刮各种所谓“犯私”的畜产品和农副产品，另一方面，他同邢万春、屈贵等人拉帮结伙、互相利用，以“家中断粮”为由，从乌兰套海国库粮中拿走37石5斗原粮。到第二年春耕时，他以偿还上述公粮为借口，向当地农民，以每头牛四石粮的租价租出12头耕牛。可是到秋后，乌把出租耕牛的粮食又全部装入自己粮仓，而根本没还从国库借走的公粮。

日本投降后，乌日他用欺骗、敲诈等手段先后弄到长短枪26支，组织武装。到1946年8月，乌日他搜罗了30来名人马，组建了地方武装，并将它命名为“保安队”。自己当队长，任双喜为副队长。下设两个小队：任敖占林为第一小队队长。任额勒博克仓为第二小队队长。这个“保安队”的主要成员，由乌日他、双喜、敖占林、额勒博克仓、司叶、阵思誉、白清林、小曹德宝、仁钦敖尔布、仁普乐、玛尼扎布、付顺、辛杰扎布、扎日嘎拉、居如木吐、德葛、达木仁等人组成。该“保安队”名义上是维护地方治安，而实际上是维护地主、牧主利益的。

乌日他把该队保卫范围放在东、西两个希热艾勒、高里戈勒、牌毛道、东西两个马鬃山、哈尔杰毛道和东西两个苏吉为重点，有时还偶尔去乌兰套海、白音布统一带。

当年11月间，乌日他率领手下部分人马，以警戒巡逻为名，去乌兰套海一带大肆扰害百姓。一次他在王振东的烧锅碰见阿旗地方武装的奈拉布，并从奈听说和子章准备要缴械乌日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回牌毛道同双喜商量对策，并亲赴林东，找见许文林（许是乌的亲戚，和子章手下的队长），通过许与何子章取得了联系。

于12月上旬，和子章带领他儿子恩和森，还有博勒哈、许振东，到乌日他家住两天，观察了情形。当时和对乌日他说：“你

这个地方，就是林东的南大门，你也已归我们管辖。今后，如有什么重要情报一定要立即报告，并且要进一步加强你的武装力量。对此，我也帮助你……。”这次乌日他向和子章的儿子恩和森赠送了一匹全鞍马。

1946年2月中旬，和子章通知乌日他：“哈丰阿、萨嘎拉扎布等人从乌兰浩特已到林东，要检阅我们的部队，你要立即率部前来林东参加检阅。”乌接到通知后，率领40来名人马前去林东参加检阅。检阅结束后，他还找见昭乌达省省长萨嘎拉扎布。

1946年2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成立了。和子章被任师长，下设六个团，巴林左旗部队为三十二团、三十三团，巴林右旗为三十四团，阿鲁科尔沁旗为三十五团，克什克腾旗为三十六团，扎鲁特旗为三十七团。

二十四团团长为仲奈、韩桑杰为副团长，甘珠尔扎布为副官。

当年四月份，仲奈、韩桑杰、甘珠尔扎布、乌日他等人在黄花庙聚会商讨整编部队事宜。在这次会上将乌日他的“保安队”正式编为仲奈三十四团二连。甘珠尔扎布已被任命为副官。甘珠尔扎布手下由占力格指挥的30多人马编入乌日他的二连。当时，由团部派去一部分工作人员，到哈木图巴彦家，对占力格进行了归属二连的工作。

这次整编后，乌日他把占力格手下那部分人马与自己七十多人编成四个排。乌日他为二连连长，双喜为副连长。敖占林为一排排长，额勒博克仓为二排排长，占力格为三排排长，白清林为四排排长，王占明为连部文书。阵思誉、德葛、占木彦、古希、德宝、老布桑旺楚克、曹德那木斯楞等人分别担任司务长和各班班长。乌日他将本连连部和驻军兵营安置在自己家院东侧，把警戒区重点放在西从拉新希勒庙东至牌毛道的沿西拉沐沦河岸地带。并将其四个排分别驻守几处，但无固定驻地而经常处于流动巡逻

状态。

4月中旬，团部通知乌日他去大板。乌与居如木德、白清林、斯布吉德道尔吉一同去大板。到团部后才得知，这次叫他去大板并无要事，只由巴林右旗的代表传达了在王爷庙召开的会议精神。参加王爷庙会议的右旗代表有四名。他们是：塔木、色旺拉西、阿旺东力布扎木苏和额尔根巴图。他们在东庙前大殿开会，参加这次传达会议的有：仲奈、韩桑杰、甘珠尔扎布、拉布杰、三喇嘛（葛万普乐）、包孝宗（比和那森），李如坦、宝音和希格、舍布格扎布等人。

乌日他听完传达返回途中路过哈鲁时去门其克吐活佛家住宿，并向他祈求活佛保佑。该活佛向乌日他赐给了挂在脖子上的护身佛和全身无标记的雪白马，安抚他说：“乌日他，你只要身不离这两件宝物，它就永保你刀枪不入，所向无敌。”

当年9月中旬，团部又叫乌日他去大板。他这次去时，仲奈已被提升旅长而由确吉敖斯尔当团长。乌在团部与确见了面，确对乌讲：“不久将从团部派去一个工作队，对你聚集的150多名人员进行整顿，要精简到八十名。并给二连派去一名政治指导员等。”还给了他九九式步枪六支。

乌这次从大板返回时带着他所领到的六支枪和派给其连的政治指导员赛音乌尤图一同回连队。

乌回到连后，立即向财主们征集了军马。向哈木图、德尔达格、米格苏木、门其克吐活佛等人总共征收了160匹军马。

9月下旬，确吉敖斯尔带领工作队前去乌日他连队。他首先将二连精简到82人，把其余人员全部刷掉。这样，二连的军马远远超过人数。武器方面，三分之二的人有了枪支。确按整编后的实际人数留给二连每人一匹马，并将多余部分挑选好的全部拿回团部。确决定让自己几名随从人员往回送军马，他自己已经白音布统去林东。临行前确还向乌日他嘱咐：“你要密切注意开鲁国民党

的行动，如有情况即时报告。”

当确吉敖斯尔刚刚离开乌日他之后，邢万春派来的人向乌报告，有一部分地主牧主要来乌日他处避难，今正在沙窝子里隐蔽的情况。没过几天，乌日他老家朝阳的地主李景阳、林东的商人珍咸典、地主杨正雅等一伙地主牧主的乌合之众前来乌日他家躲藏。

10月份有一天，乌日他收到阿鲁科尔沁旗旺吉乐梅林给他的信。次日，乌同白清林、司叶、德宝、居如木德5人，前往阿旗中查干淖尔的敖斯尔巴彦家，与额勒登格、塔日巴二人单独会面。从那里出来之后，乌向居如木德说：“赶快回去，如果指导员问，就告诉他，我们去查看畜群。”乌日他回来当晚，即将赛音乌尤图逮捕，并投入土崩崩里关押起来。第二天，塔日巴的联络员来说：

“你们如跟从我们，就得立即照办，否则要缴出你们的枪马。”对此，乌回答：“我若不愿跟从你们的话，怎么会把指导员逮捕呢！”联络员说：“那么，明天你必须去鄂苏巴彦家。”次日，乌日他同白清林前去鄂苏巴彦家。当他们到达时，翁牛特的拉钦旺楚克王爷同浩特劳、秃喇嘛等人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见到乌日他就说：“我们跟从了塔日巴，你怎么办？”乌回答：“我也跟从他。”几天之后，三十五团团长额勒登格、塔日巴将率领整个团的部下向国民党投降的信息派人传达给乌日他，并敦促他说：“我们鄂协理已经投诚，请你自便。”乌日他、双喜获此信息后，同敖占林、额勒博克仓、古力格、白清林、陈恩誉、德葛、吉木彦、仁钦敖尔布、六十二、王占明等人召开连排长会议。然后召开全连官兵大会。会上乌日他将三十五团情况向大家讲明之后，征求大家的意见——“我们怎么办？”众人同声回答：“连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乌日他与浩特劳、秃喇嘛等联系后组成天林支队（天山林东支队）。这是一支由阿旗和巴林左右旗的反动派所组成的武装力量。

过几天后，塔日巴派敖斯尔给乌日他送去天林支队第十五团副长的委任状，并通知他：“我天林支队是隶属热河自卫队，直接受李守信将军的指挥。”

后来将天林支队分成三个团，任额勒登格为司令。阿旗军队为十三团，任阿力本嘎为团长，桑日布为副团长。巴林右旗为十五团，任乌日他为团长，双喜为副团长。翁牛特旗为十七团，任浩特劳为团长，秃喇嘛为副团长。对此，乌日他把自己原来的排改称连，并且把四个排长都提拔成连长。名义上虽然称呼连也罢，实际上他的全团只有一百二十来名人员和八十来支长短枪。

乌日他叛变后，为侦探第四师的情报，以“汇报情况”为名，派通信员毛小儿送去假汇报。

11月9日，天林支队派去敖斯尔旺吉乐，给乌日他传达了“十五团、十七团当前坚守岗位，待命行动”的命令。乌接到命令后，一面执行命令坚守岗位，一面积极进行宣传动员活动。他在沙布嘎敖包的哈木图巴彦家召集五十名财主开会，向他们鼓吹：

“我们已决定同阿旗的额勒登格，翁旗的浩特劳联合起来投靠中央军。你们大家若有什么事，要和我们取得联系，不准同翁根努吐克接触。如果打起仗来，就把畜群赶入翁牛特境内……”。正在此刻，双喜派遣的人前来向乌请示：“林东第四师的蒙和舞乐吉等人已到，怎么办？”乌回答：“我既然叛变了，你们要视情况果断对待。”

1946年阴历11月，林东第四师领导获悉三十四团驻牌毛道二连政治上出现反常现象，并对此进行研究，决定将师政治部主任蒙和舞乐吉，助手确吉曾格，参谋乌恩其等11人（连毛小儿12人）派去牌毛道。蒙和舞乐吉从林东出发时，派通信员去大板，给三十四团团长期确吉敖斯尔送信，通知他率部火速前往牌毛道。

蒙和舞乐吉一行于11月18日到达西牌毛道之后，将师部与二连之间当联络员的毛小儿派去对乌日他进行侦察。当毛到二连时，

因乌日他不在，他就直接找见双喜，向他报告了蒙一行来到西牌毛道的情景。双喜听到蒙和舞乐吉一行人马武器装备等情况后，当即决定将他们逮捕。于是双喜一方面将毛小儿、包金祥二人派去迎接蒙一行，以欺骗他们上圈套。与此同时为了在西牌毛道至东牌毛道的途中，将蒙一行缴械起见，双喜亲自率领两个排的兵力埋伏在险路上，等待他们自投虎口。按此诡计毛小儿、包金祥二人前来向蒙等人说：“乌日他不但没有叛变，而且听到你们的到来他非常高兴，还派我们两人来迎接你们。”就这样按预谋将他们引入埋伏圈内。双喜一伙在险路上截住他们，并几次准备动手，但又唯恐做不到一网打尽而没动手。况且，当时毛小儿、包金祥二人始终走在来者的两旁，所以也未敢向他们开枪射击。这样双喜一伙只好按预定暗号，利用地形地物进行隐蔽火速返回连部。

当蒙一行到达二连时，双喜从容不迫地将他们迎接在马桩子跟前，但蒙已觉察到他们鬼鬼祟祟，警备森严的可疑动向，问到双喜时，双喜假装地回答：“在当前局势不稳，土匪横行的情况下，不加强警戒怎么行。”蒙又问到乌日他和指导员赛音乌尤图在何处时，双回答：“去打从翁旗过来的一股土匪，还没回来。”并将客人按官兵区别住进上下两个屋子。然后，按习惯请客人们先喝了茶水，紧接着上了荞面条。客人们尚未吃完第一碗面条儿的功夫——双喜突然在当院大声叫：“盛饭。”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土匪们，各各持枪向来者进住的两个屋子蜂涌冲进。向蒙和舞乐吉、确吉曾格、乌恩其住处冲进的是双喜、古力格、却斯愣、福全、白清林，冲进耳房的有额勒博克仓、仁钦敖尔布、辛杰扎布、福喜、老布桑旺吉乐等。就这么未放一枪将他们十一人全部逮捕，共缴获了手枪两支、冲锋枪一支、步枪十一支。

当乌日他还未动身离开哈木图巴彦家的时候，西热艾勒的丁合尔扎布赶来将旺吉乐梅林的一封亲笔书信交给了乌日他。乌拆封过目后嘱咐丁合尔扎布：“你告诉谢、仁钦敖尔布、却斯愣、

古力格等人——要把他们统统逮捕。”

当晚黄昏时刻，乌动身起程。这时，有个叫黄曹德宝的乘骆驼前来，在途中截住乌日他，向他报告了确吉敖斯尔一行十人来到包冷艾勒在业喜家歇脚的情报。听到这个新情况后，乌没回家直接赶到仁钦敖尔布家观察动静。当晚天黑之后，确吉敖斯尔来到旺吉乐梅林家。旺吉乐家离仁钦敖尔布家只有二华里。乌日他派人侦察后，叫黄曹德宝、仁吉乐二人换衣化装并发给每人一支二号匣子交待他们执行任务：“你们二人进屋看看。如果确吉敖斯尔独身在场，就开枪逮捕他。”该二人赶到旺吉乐梅林家门口时，被岗哨所阻，未得逞打兴而归。乌日他一计未成又想一计，他唯恐白清林的一排兵力对付不了确吉敖斯尔一行。于是就连夜通知在碑毛道的三个排，叫他们立即出发，马不停蹄，务必在黎明前赶到东希热艾勒。然而，当乌日他的援兵到来之时天已大明，确吉敖斯尔已发觉身临险境，鸣枪出逃。其随从中的八人在希热艾勒被俘，一人在益和诺尔艾勒被俘。但对确吉敖斯尔始终未追上。

乌日他向旺吉乐梅林逼问确吉敖斯尔怎么会发觉和出逃时，旺回答：“是苏格德尔那木吉勒通报了消息。”于是乌日他命令古力格枪毙苏。因当时苏没在当场，几天后，把他抓起来押到希热艾勒以东的哈尔杰三口井处，古力格枪杀了他。

第二天，乌日他、双喜将21名俘虏中的18名，用杨××的大胶车押送到翁牛特旗太本艾勒、奈林他拉艾勒、查巴干艾勒等地分别关押。在此期间，乌日他带着两匹马做礼物去双合兴找见土匪头子达利扎布。并从达处听到李守信、乌占廷都在开鲁，国民党很快就会占领天山、林东的消息。

乌日他从双合兴返回途中，在德卜勒庙见到额勒登格，向额报告抓住蒙和舞乐吉等人并请示将他们如何处理等问题。对此，额答复：“先关押在当地，至于怎么处理，以后再说。”当乌日他回到家时，蒙和舞乐吉已被杀害。这时，大板东庙的敖其尔喇嘛来探

望，乌日他正在等候他回来。敖是乌的结义弟兄。不久乌对敖其尔喇嘛产生怀疑，并将他逮捕。

1946年12月23日，在西牌毛道的铁木耳道尔吉家，乌日他同双喜、敖占林、白清林、古力格、阵思誉、司叶、王占明、德葛、额勒博克仓等人开会研究决定将确吉曾格、乌恩其、赛音乌尤图、敖其尔喇嘛、昂萨嘎尔、斯钦格日勒等6人进行枪决。双喜、古力格、敖占林3人带领却斯愣、却道尔吉、恩克阿木尔、仁钦敖尔布、宝音达来等手下匪兵，把全体俘虏押到乌日他家的西北沙窝子里，对上述六人进行枪决，将其余人释放。

1947年的大年初一，乌日他将这个传统节日在甘珠尔扎布家度过。初一清晨他听到和子章路经哈鲁向这里赶来的情报。他还获悉天山、林东的八路军经由牌毛道前往哈木图那里的消息。乌将此情况同韩桑杰进行研究，并连夜赶到沙巴嘎敖包后，得知八路军昨天住在这里，今早已奔向希热艾勒。乌听到这一连串意外情报已使他成为“惊弓之鸟”。于是他率领部下，快马加鞭，深夜渡过西拉沐沦河，跑到格日僧的一户牧民家下马歇脚。在此他听到秃喇嘛就在格日僧南沙窝子里隐蔽渡过春节的信息，便派人与他取得了联系。正月初二早晨，岗哨向乌报告，八路军正在向南进军。乌立即率部迎到西拉沐沦河南岸，隔水向八路军开枪射击。这样，双方虽然交火互相射击了大半天，但由于相距太远和风力很大的缘故，两方都无伤亡而停火撤退。此后乌日他窜入格日僧以南的沙窝子里，在那里见到浩特劳，又同翁牛特的王爷拉沁旺楚克取得联系。并商定巴林、翁牛特的土匪汇合起来投奔开鲁。乌决定去开鲁的途中，对驻守在马宗山的李春来部队进行偷袭，以报复乌叛变后李攻打过他两次之仇。为此，乌向阿旗的敖斯尔、翁牛特的浩特劳讲：“假如不打退李春来部队的话，我们三个旗的武装都难保自己的后方。”这样，乌日他、敖斯尔、浩特劳联合起来，以三个旗的二百多名土匪对马宗山“敖汉大队”（蒙

古八路)进行了第一次袭击。对此,李春来率部应战,双方相持了大半天。这时,驻守白音布统的八路军赶来欲堵截土匪的退路时,三个旗的土匪唯恐丢失自己的老窝而各回家乡。

正月初五,乌日他伙同浩特劳,起程奔开鲁。在此期间确吉敖斯尔派人找到被土匪杀害的四名烈士的尸首,并将他们装入乌日他的躺筐,送到白音布统安葬。

正月初七或是初八,乌日他他们到达开鲁后,乌日他、塔日巴、达利扎布、韩博灯、秃喇嘛、浩特劳、双喜等人一同进城晋见额勒登格司令。并在他的率领下会见李守信、乌古廷。

正月二十几口,由天林支队队长额勒登格下达了如下命令:十三团担任阻止八路军向西拉沐沦河沿岸进犯的任务,十五团担任老哈河岸的警戒任务。从此,乌日他立即离开开鲁,经由双合兴,下伙房,查下套海,路过奈曼旗的八仙筒时遇到了八路军。在此乌日他指挥自己团和浩特劳的大部土匪进行一天的战斗,将遇到的十三名八路军全部击毙,并烧毁他们的一辆汽车,乌的土匪中死亡两人。由此他们向西路过查干套海到达敖包甘时,又遇到八路军打了一天仗。这次战斗中土匪被打死一人。第二天,从敖包甘出发奔向西北,到达哈巴庙时凑巧碰见从乌日他家来的人。来人向乌告急:“马宗山的李春来,在乌日他去开鲁之时乘虚而入,将其马群统通赶走。”乌听罢气急败坏,他向浩特劳和阿鲁科尔沁的苏庆嘎求援,三人拉开土匪部队,立即起程渡过西拉沐沦河,当夜赶到乌日他家宿营。于次日(初二)乌日他第二次攻打马宗山。在战斗中李春来部下死亡一人,而且在兵力上寡不敌众,迫不得已撤离马宗山。乌日他夺得80峰骆驼,50来匹马返回牌毛道。

当乌日他在这场战斗中取胜,得意洋洋回到自己老窝时,十三团已派人送来开鲁解放的情报。他听到这一不吉祥的消息,即时渡过西拉沐沦河。乌日他匪帮驻进达尔罕庙,十三团匪帮驻

进德格吉得家，浩特劳匪帮驻进新庙以北。

在开鲁解放、额勒登格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三个旗的土匪头子们聚会研究，把阿力本嘎推举为他们的总管。

1947年2月中旬，匪首们再次聚会商定去通辽投靠李守信的参谋长刘智广。当月中旬起程，下旬到达通辽。

乌日他、浩特劳等匪首们到达通辽后很快见到刘智广参谋长和塔日巴。刘智广向这些面黄肌瘦的部下每人发一身正式军服，向各团发给了些药品，以安定军心和提高士气。并且交给他们新的任务，警戒攻打通辽的八路军。此后不久，他们在河北岸同“蒙古八路”打过一次仗。

1947年4月，通辽解放。乌日他、刘智广部同塔日巴、达利扎布会合躲到科左中旗、彰武县、阜新一带。在那里乌日他击毙一名八路军。刘智广召集一次会，下达了乘火车去赤峰攻打八路军的任务。于是，这帮一千多名土匪由阜新乘火车到达朝阳以西东大道车站下车，正准备西进叶柏寿的时候，事与愿违，八路军早已在叶柏寿以东摆开阵势，并连续追击，迫使土匪撤回北票。

5月上旬，乌日他手下的两名连长额勒博克仓、白清林率领部下70来人，会同阿旗的二百多人从北票叛返。这样，乌日他被自己大部分部下所唾弃，带着二十几人在北票渡过十几天，再次返回朝阳进驻西大营子，总共五十多人开始非团非连的生活。

阴历9月份，朝阳解放，乌日他等人在八路军前堵后追之下，逃窜到锦州北山，夜间抢劫，白天拦路，维持一段绿林生活。不久，又与浩特劳、塔日巴、达利扎布等匪会合驻进锦州街里，驻锦期间，他们先后组建了“昭盟驻锦办事处”，各旗驻锦办事处等机构。乌日他担任巴林右旗驻锦办事处主任。这时他勾结邢万春、周凌云、嘎拉僧斯楞等相依为命。

1947年9月下旬，乌日他、邢万春、周凌云、嘎拉僧斯楞、白民愿进一步勾结，伪造了选举蒋介石为国大总统的假人民选举册。

在该选举册里,为了扩大“选民”人数,他们将自己所能够编造的蒙族人名,随便拼凑了几万户。

驻锦州期间的盟长曹德那木不时召集各旗驻锦办事处主任开会,鼓吹选举蒋介石为国大总统,并向东北地区各蒙旗“驻锦办事处”分发办事经费等。

还向乌日他和奈曼旗的翰博灯二人授予国民党政府颁发的“剿匪有功”四个字的奖状。

当乌日他基本捏造完假人民选举册的时候,接到去沈阳的命令,他将办事处工作移交邢万春,带领手下土匪,于11月份开进沈阳,在铁西、铁岭、辽阳一带“保卫沈阳”。在此期间他在铁西同八路军打过一次仗。但在战斗中双方都无伤亡。

1948年4月份,乌日他、苏和巴特尔两股土匪在辽阳被合并,但乌手下的20来名土匪被编入秃喇嘛帮内。由此乌便成了“光杆司令”,军外的军人。这时秃喇嘛帮已派来一名姓许的旅长掌管军权。在苏和巴特尔的团升格为师的时候,乌才被任命为骑兵第一旅的副官。在此地乌日他领兵攻打解放军,打死三人,并洗劫仓库。就在这个月中旬,乌日他在沈阳,以一千万元伪币将自己手枪卖掉,持旅部介绍信,由沈阳乘飞机回到锦州办事处。这时,锦州的解放迫在眉睫,伪昭盟驻锦办事处和各旗办事处正拟迁北平。

6月中旬,伪昭盟驻锦办事处迁驻北平时,乌随同赴北平。进京后,昭盟办事处、奈曼旗办事处(翰博灯当主任)、扎鲁特旗办事处(辛杰旺苏木当主任)、巴林右旗办事处(乌日他当主任)等单位都挤在北平太安街12号一个院里。将巴林左旗(达利扎布当主任)、翁牛特旗(浩特劳当主任)、赤峰县(朴俊生当主任)、敖汉旗(于××当主任)、克旗(有机构无人员)等单位塞进另一个院内。

7月中旬,乌日他经张秉衡介绍(口头)加入了国民党。曹德那木从国民党国家救济总部领来一部分美国支援的物资,乌日他分得六袋面粉、两麻袋大米和两套服装。这个时期乌日他一方

面以月薪30万元伪币勉强度日，另一方面他为北平解放时逃往何处怎样活命而绞尽脑汁。

在此期间，乌日他同扎鲁特的日其克、奈曼的翰博灯、嘎萨尔、翁牛特的浩特劳等人持包贵廷的介绍信曾去乌古廷家两次，打听留在沈阳的残匪消息。

1948年11月，乌日他同嘎萨尔、翰博灯前往张北找包贵廷（包当时在傅作义手下做事，是个伪蒙疆的官吏、蒙奸），企图通过包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当时张北的解放迫在旦夕，包贵廷来不及接见他们就逃到宝昌。几天后乌日他见到从东北率骑兵一旅逃往张北的苏和巴特尔、孙明海，这时乌处在既不能迁移驻京办事处，又回不去北平的境地。可是，留在沈阳的古力格率领的20来人与孙明海土匪一同来到张北一事却符合了乌日他的心愿。

包贵廷与苏和巴特尔的土匪会合后进驻宝昌渡过十来天，改称为骑兵师。包贵廷为师长，苏和巴特尔、孙明海为付师长。下设三个团，将原天林支队编为一个团，任乌日他为团长，原苏和巴特尔部下编为一个团，察哈尔部队编为一个团。

于腊月赶往武川过春节。1949年2月中旬，在武川合并于原驻归绥的孙兰峰部队。此后乌日他率部在四子正旗一带与八路军打了一次仗，并缴械地方干部的三支枪，对其中一名女干部进行了残无人道的折磨，使她几次死去活来。

3月中旬，再次西行到达奈曼江。

6月中旬，达理扎雅从阿拉善赶来。当时，德穆楚克栋鲁布在阿拉善旗筹备成立伪蒙疆政府。巴林右旗乌日他、巴林左旗王占明、奈曼旗翰博灯、阿鲁哈巴彦、扎鲁特旗辛杰旺苏木等人以各自旗的代表身份参加了协商会。

1949年阴历7月中旬，召开“伪蒙疆政府”成立大会。各盟、旗的代表一百余人参加，其中的骨干有：德穆楚克栋鲁布、达理扎雅、李守信、乌古廷、达利扎布、塔日巴、罗巴图孟和、罗

永树、金巴图道尔吉、金巴特尔、包国民、图布新、旺钦扎布、乌尔根、包贵廷、韩世忠、吴四等人。

会议进行了八、九天，散会后，乌日他赴宁夏的陶乐找到自己的匪部。

8月中旬，宁夏、阿拉善解放已成定局。这时德王带领一部分伪政府官员窜入定远营以北的沙漠里。乌日他率领自己残兵潜逃，路经盐池、陶乐、平罗等地抵达磴口见到李守信。几天之后，随李守信逃入大漠。

9月份，乌日他在阿拉善北部的巴彦山附近见到德王。在此他与旺钦扎布合伙率手下土匪对阿拉善牧民进行一次浩劫。

1949年10月份，德王在吐库木庙，将其军队重新整编为两个师，原骑兵旅为第一师，任苏和巴特尔为师长，孙明海为付师长；察哈尔、乌珠穆沁部队为第二师，任格力金泰为师长。乌日他部在第一师。

10月中旬，德王从吐库木庙到沙拉吉庙。几天之后，迁居蒙古境内的拐子湖。蒙古方面派人来这里，将德王、李守信、包贵廷、苏和巴特尔、奴门巴特尔和白××等人用汽车接走。

1950年1月（以下均用阳历）、2月份，宁夏省主席潘自力，达理扎雅派人去向国境内的逃窜土匪通知全国已解放的消息并宣传政策劝他们立即返回。

1950年，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孙明海率领上千名土匪向定远营出发。乌日他即在其中。在沿途各站由宁夏省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粮食和驼肉。

4月上旬，他们到达定远营（今巴彦浩特镇）。在这以前办和巴特尔手下的一个团长率其部下向西分道扬镳。另外有个叫苏和巴特尔的连长率其部下向东溜走。

乌日他随一千多人缴械投降。

从此将这批投降人员，按起义投诚人员载入名册入档。同时，

向他们作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具体交待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对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回家，只要不做反人民的事，各行各业都允许——愿当民者当民，愿出家者出家，愿工作者予以安排工作，愿当兵者编入解放军继续当兵等……。并对每个人发给了新服装。

1951年6月起，乌日他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在阿拉善自治旗政务处工作。

1956年6月被调到宁夏省人事厅待分配，10月中旬被分配到磴口县，后下乡协助二区搞合作化。在县委组织部领导下，参加了组织常年互助组，常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

1958年9月，调到磴口县郊区供销社批发部工作。

1959年调到巴彦高勒市煤建公司工作。

1961年1月调到胡苏台煤矿商业局服务处工作。当年8月，由于该矿停产而又调回巴彦高勒煤建公司工作。

1962年，磴口县旧郊区供销社工作。

1966年10月，调新郊区供销社的铁路运输货物部门从事收货、卸货、运输工作。

1967年3月9日起按“历史反革命分子”，“土匪”，“地主兼牧主分子”，被批、斗，当月17日开始被入狱关押。

1969年7月31日，巴林右旗军管小组通过巴彦淖尔盟煤建公司将乌日他以“历史反革命分子”押回原籍。并将他拿到各公社游街，游斗后关进监狱。

1974年10月23日，由巴林右旗组织部将他按退休干部处理并安置到良种苗圃工作。

1977年4月18日，病故于巴林右旗大板镇。

韩桑杰及其叛变

韩桑杰，光绪二十三年(1897)生于敖汉旗昭浩特村(即今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乌兰敖都)，后迁至巴林右旗查干诺尔的巴尔图。伪满初曾任保甲长，1934年在热河省保安游击队为队员，1938年在巴林右旗当保安队员，后来当过伪国兵的排长。

1945年冬，巴林右旗成立自卫队，韩桑杰参加。自卫队整编为三十四团，韩桑杰任三连连长。1946年秋，正在拟任他为三十四团副团长时叛变，流窜于翁牛特旗、巴林右旗、敖汉旗、阿鲁科尔沁旗、阜新和锡林郭勒等地，破坏土改运动。据统计，从1946年秋到1949年10月的三年时间，与我军发生大小战斗27次，杀害我军民60余人，抢掠民财甚多。

韩桑杰杀害我军民手段极端残忍。特别是当他于1948年初听说老婆被斗死后，气焰更加嚣张。他派人到原籍打死村长朝克都仍，到处杀害土改下部。同年6月，当他经两次追捕捉获贫农会主任扎木萨后，将扎木萨从指端到手臂，一个骨节，一个骨节地卸下，看着扎木萨在痛苦中挣扎放声大笑。

韩桑杰1949年5月窜入锡林浩特一带，10月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1952年11月被引渡回国归案，1953年5月3日被枪决于大板南葛根仓东荒，年56岁。

(巴林右旗政协文史办)

三十五团及额勒登格叛变

根据柴·扎木苏文整理

三十五团的由来

1945年8月7日，几架苏联红军的飞机在伪阿鲁科尔沁旗（以下简称阿旗）公署（治所在昆都）上空盘旋，罕苏木一带传来隆隆炮声，伪旗公署的几十名日本人携家带眷，向姚家段山跑去，附近群众放火烧毁旗公署大瓦房，抢走物资。阿旗解放了。

苏蒙红军在罕苏木驻了七、八天之后，向天山、开鲁方向推进。于9月末、10月初开始撤离。

苏蒙红军从阿旗撤走时，蒙古人民共和国骑兵司令仁钦，把一部分日造步枪和子弹交给了道布①旗长，让他组织地方武装，保卫本旗安全。道布召集了一些日伪时期的官员，商定了组织地方武装的方案，北部以胡吉河、阿尔班苏木、沙巴尔台、昆都一带人组成，称一连，连长由阿力本嘎②担任；南部以德博勒庙、巴拉奇如德、查干诺尔一带人组成，称二连，苏清嘎③任连长。三连以乌兰苏木、哈尔哈达一带人组成，散布拉扎布④任连长。

招兵原则：凡日伪时期当过兵的，必须参加，富户出军马。

注：①道布：见本书“苏达那木道布”。

②阿力本嘎：伪满努图克达，见白寿峰“阿力本嘎的叛变”。

③苏清嘎：伪满努图克达，额勒登格亲侄。

④散布拉扎布：见“我是怎样起义投诚的”一文。

旗保安队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当时他们的分工是：道布负责全旗行政工作，军队由南协理伪满警务科长额勒登格指挥。当时确定，这支部队只保卫本旗的社会安全，不和外界接触来往。

1946年1月，和子章根据东蒙古自治运动领导人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恩根等同志指示，组建昭乌达盟警备总队。阿旗自卫队受昭乌达盟警备总队领导。1946年3月，昭乌达盟警备总队改编为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阿旗自卫队被编为三十五团。

团长：额勒登格；

副团长：嘎达苏①；

参谋长：嘎达苏（兼任）；

副官：宝音乌力吉②；

副官：柴扎木苏③；

第一连连长：堆钦扎布④；

第二连连长：苏清嘎；

第三连连长：先是何文贵⑤，后改为散布拉扎布；

第四连连长：阿力本嘎；

独立排排长：斯钦朝格图⑥。

全团共600多人，有长短枪600多支，全是骑兵，还装备有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掷弹筒4个。这些重武器是伪满国兵阿嘎登嘎等人，由唐山带来埋在奈曼旗的沙窝里的，额勒登格知道后派人取来，送给阿嘎登嘎一匹好马。所以额勒登格认为这些武器是他自己的财产，是他带到三十五团的。

①嘎达苏：伪满第九军管区48团机关枪连连长。

②宝音乌力吉：见“忆烈士宝音乌力吉”。

③柴扎木苏：伪满兴安学院学生。

④堆钦扎布：伪满时国兵。

⑤何文贵：汉族，乌兰哈达一带地主。

⑥斯钦朝格图：见“斯钦朝格图烈士”。

对三十五团的改编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通辽、开鲁，逼近昭乌达地区。冀热辽军区鉴于斗争形势，为了统一指挥蒙汉军队，于同年10月28日完成了对骑兵第四师的第一次整编，建立了蒙汉联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在师和团之间又设立两个支队（相当于旅）建制；师、支队、团配备政治委员，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安插到部队的关键部位。阿鲁科尔沁旗的三十五团与扎鲁特旗的三十七团被组为第二支队：

司令员：额勒登格

政治委员：义达嘎苏荣①

参谋长：业喜扎拉森②

第二支队司令部成立后，三十五团领导成员也相应地有所变动：

团长：嘎达苏

政治委员：道布钦巴拉珠尔③

参谋长：巴彦仓

政治处主任：宝音乌力吉

供给处主任：特木勒

蒙汉联军司令部成立后，于1946年10月份办了一期政治训练班，旗支会派一部分青年（主要是自治军里的青年）参加学习。我记得去的人有：宝音乌力吉、敖力布、泰治元、喜冷嘎、乌力吉陶克套、斯钦朝格图、道尔吉莫冷、柴扎木苏等人。这个训练班原计划学习两个月，因形势紧张提前一个月即11月下旬结业。结业后这批人大部分到三十五团搞政治工作，如宝音乌力吉任团

①义达嘎苏荣：见“义达嘎苏荣”一文。

②业喜扎拉森：见“业喜扎拉森烈士”。

③见“道布钦巴拉珠尔烈士”。

政治处主任，喜冷嘎任二连指导员，秦治元任三连指导员，柴扎木苏任三连副指导员。斯钦朝格图任四连副连长，乌力古陶格套任该连指导员。

额勒登格叛变的前前后后

1946年12月1日，三十五团叛变了，更确切地说额勒登格叛变了。额勒登格的叛变不是偶然的，是由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额的父亲当过管旗章京，爷爷当过协理，太爷是号称有万条花牛的大牧主。额本身也当过协理，伪满警务科长。到他叛变时家有几千头牛马，数百亩良田，还有家奴十余户。

蓄谋已久

1946年5月中旬，阿旗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阿鲁科尔沁旗支会”。6月初，八路军来到天山，成立汉民科，实行蒙汉分治。不久，阿旗政府由昆都庙移到天山，旗政府与汉民科的工作逐步协调，并于6月下旬掀起牧区的民主改革。这时，额勒登格以剿匪为名将三十五团团部迁到离开鲁100华里的德博勒庙他自己的家中，在天山街的团部只有政治部主任宝音乌力吉等30余人留守，其他连队分别驻扎在额家附近的几个区内。以后，虽经过9、10月的整编，三十五团仍掌握在额勒登格手里。

随着部队的整编和民主运动的深入，额勒登格加紧了与国民党特务的勾结。额勒登格的哥哥塔日巴喇嘛开着一处商行“德利源”，开始在双合兴，以后移到小街梁（德博勒庙南）。这个商行掌柜叫王振声，日本投降后加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他在“德利源”肩负三种任务，一是做买卖给塔日巴赚钱；二是以经商作掩护以“德利源”为据点，利用自己会讲蒙语的条件搜集八路军的情报；三是遵着上级的指示，向塔日巴喇嘛搞策反工作。除王振声之外，还有一个叫王安田的人，旧中国在开鲁税务机关工作。

他是以热河省国民党部特派员身份向塔日巴搞策反的（实际是向额勒登格）。据说1946年春天，他让王振声带路亲自到德博勒庙与塔日巴接洽，然后去林东搞活动。此外，科左中旗的苏和巴特尔，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道尔吉、洛布登，翁牛特旗王爷拉沁旺楚克、浩特劳等人叛变后，也都派人和塔日巴等联系，阿旗反动上层人士也分别敦促额勒登格投靠国民党。

真相毕露

1946年8、9日间，旗公安队的孙怀斌（伪满时期额勒登格部下）突然叛逃，投奔开鲁国民党。此后，出现了孙怀斌向额勒登格密交国民党任用额的委任状的传说。10月，该团四连的金巴、昂苏等人在姚家段阻击卓索图盟生产车，杀害了特木勒等13人。

姚家段事件后，支队政委义达嘎苏荣，给在德博勒庙的额勒登格和业喜扎拉森写信，信的大意是：挑起姚家段惨案的金巴、昂苏等10余人畏罪潜逃，准备投降国民党，将于11月7日经哈毕勒嘎庙进开鲁，要额勒登格、业喜扎拉森二人设法拦住这帮人，业参谋长命令阿力本嘎、斯钦朝格图、柴扎木苏去拦截。金巴、昂苏等人本是阿力本嘎的部下，所以拦截任务很容易地完成了。接着业参谋长布置让金巴、昂苏等人当天住柴达木营子（现在柴达木苏木所在的屯子），翌日去查干诺尔（因为这个地方离开鲁远一些）。额勒登格、业喜扎拉森11月9日同阿力本嘎前往查干诺尔解决金巴、昂苏等人的问题。途中额、阿下马解手，故意同业拉开距离，阿对额说：“你还坚持回天山？你的部下包括我在内都不想跟共产党走，你单人独马随着业喜扎拉森回天山凶多吉少。共产党掌权，道布当旗长，能放过你吗？再看盟的领导，萨嘎拉扎布、和子章那一个不是道布的知心朋友。”到查干诺尔后，在伪满区长敖斯尔家开会，讨论对金巴、昂苏的处理问题。公开场合，阿力本嘎坚持姚家段惨案的发生是由于误会，陈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理由。私下阿力本嘎、敖斯尔又密谋。据说阿力本嘎拍着桌

子手指额勒登格的鼻子说：“现在我们的连包围着这里，你如果再犹豫我要打死业喜扎拉森领着全连去开鲁，我看你怎么收拾局面！”额勒登格当场表示采取行动。

1946年10月，国民党93军22师占领赤峰，国民党热辽边区李守信部进驻开鲁并扬言窜犯昭乌达地区。林东的蒙汉联军司令部命令第二支队司令额勒登格带领三十五团移住爱根庙、德博勒庙一带，钳制国民党匪军北犯。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蒙汉联军司令部把过去的钳制策略改为坚壁清野，这一策略要求阿拉迪忙哈以南地区的所有工作人员转移到清河子以北地区，所有的牛马也转移到中部地带。重点是动员额勒登格进驻天山街。业喜扎拉森参谋长就是根据蒙汉联军司令部的这一安排，前来德博勒庙的。同他一起到德博勒庙的有他的爱人和三十五团供给处主任特木勒及其他几名随从人员，还有两台胶轮车。他们先到额勒登格家，第二天额、业一同去德博勒庙见塔日巴喇嘛。业参谋长向塔日巴谈了坚壁清野的意义和自己前来的目的。塔日巴听了以后表示称赞。然而他把业送到客厅后，弟兄二人商量时却不一样了。额勒登格先主张执行蒙汉联军司令部的计划，塔日巴则坚决反对。他说：“蒙汉联军司令部开始采取钳制策略，御敌于旗境之外，命令你到此地防守，这是天赐良机，如果没有这一命令，你岂不是笼中之鸟？八路军同国民党作战，搞了不少坚壁清野，现又跑到我们这里来搞。我们祖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祖宗坟墓在这里。过去奉军来了，我们没有走，山东棒子（指刘柱堂部）来了我们也没有走，难道到了我们这一辈，玷污祖宗的名望，跟着八路军跑吗？”塔日巴的一席话，说服了额勒登格，投靠国民党的意见一致了。但是反对坚壁清野不去天山这样的话，当着业参谋长的面都说不出口。因此他们暗中发动土豪劣绅来阻扰。业喜扎拉森到哪里开会动员，哪里就有人出来，陈述理由反对坚壁清野，反对让塔日巴、额勒登格搬家。

1946年11月30日，业喜扎拉森参谋长，在德博勒庙召开了最后一次动员大会。这一天，以土豪劣绅为骨干，反对坚壁清野，反对额勒登格、塔日巴移住天山的人特别多，简直起哄不让业参谋长讲话。在这样情况下，业参谋长停止开会，回到额勒登格家，那些所谓清愿的人也跟着进去。额家是三层大院，这天夜里，里外院大门都设了岗。不仅屋里挤满人，就是在院里也有人三五成群地围着火堆坐着。

入夜后业喜扎拉森对额勒登格说：“当地人不同意你去天山，不拥护坚壁清野，你就不要去，等月亮升高，我要返回天山，以后再联系吧。”额勒登格答道：“我不在这里，我也要去。”说罢，额勒登格对柴扎木苏说：“你也回去作准备，今夜一同回天山。”柴扎木苏回去一个多小时后便有人喊：“旅长要走了，快来吧。”柴扎木苏牵着马来到额的大门口，布仁巴雅尔小声对他说：“出事了，业喜扎拉森被抓起来了，小心点不要把命丢了。”柴扎木苏走进东厢房（额的卧室），炕上地上满屋子都是人。炕中放着一张炕桌，左边坐着额勒登格，挨着额勒登格坐的是他的老婆。右边是斯钦朝格图。阿力本嘎拿着手枪，要随时开枪的样子。靠西墙的便床上坐有敖斯尔的儿子二连三排长旺楚克，在地下站着的有塔日巴的大管家道尔吉宁布、二管家散布拉敖力布，还有洛布僧、扎布日勒、车德顺等入。见柴扎木苏后，额勒登格说道：“我听从大家的意见，逮捕业喜扎拉森投靠国民党了，你怎么办？”我看到当时处境，如果说出半个不字，就要没命了。第一步保命要紧，就说：“你走什么路，我也走什么路。”后来得知，额勒登格听到业喜扎拉森要当夜回天山，就派了一个叫林沁的人去德博勒庙向塔日巴作了报告，塔日巴听到这一情况立即派道尔吉宁布、散布拉敖力布到额勒登格家逮捕业喜扎拉森。他们动手时业参谋长在额勒登格正房东间。特木勒、王金宝（业的通讯员）和其他几名士兵在额勒登格的西厢房入睡了。

林沁先进去把墙上的枪收下，跟着进屋的岗嘎达尔、巴图巴雅尔、查干夫等人，把特木勒、王金宝等人一一捆上。

塔日巴、额勒登格，为什么到这时才公开叛变呢？其原因是：

1.他们财产很多，轻举妄动对自己不利，妄想等国民党占了绝对优势，不出反复，公开叛变才万无一失。国民党占领赤峰开鲁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

2.坚壁清野，让塔日巴、额勒登格进驻天山街本来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然而由于他们确实与国民党有联系，因此怀疑动员他们搬家是调虎离山，怀疑到天山会遭到“软禁”“被捕”“杀头”等厄运，于是他们想出由群众请愿的办法，来阻挠破坏业参谋长的工作，拖延时间，等待时机。11月30日业喜扎拉森说当晚要回天山，如果放走业参谋长，塔日巴、额勒登格岂不失掉向国民党献忠的见面礼？同时知道这次自己露出了不少马脚，因此撕下拥护共产党的假面具，绑架业喜扎拉森公开叛变了。

坏事做绝

逮捕业喜扎拉森的当晚，额勒登格接着做了三件事：一是派人往天山送骗取武器的信；二是派阿力本嘎带人去图古日格埋伏，截取武器；三是派林沁往西府（塔日巴家）送信。塔日巴接信立即派道尔吉宁布、刘忠、刘昆山等带信去开鲁见李守信。信的大意是：我们已逮捕前来德博勒庙搞坚壁清野的蒙汉联军第二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森，我三十五团全部反正，阿旗军队的百分之九十，武器百分之百都到我们手中，然而清河子以北八路军有一定势力，我们力量不足，望国军即时开进阿旗。说了一大堆奴颜婢膝的话。

1946年12月1日（农历十一月初八）额勒登格在家门口集中队伍说：“共产党叫我们离井背乡，大家不愿意，我听大家的话，投靠了国民党。可是国民党还没有进来。八路军听到消息，会来打我们。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小，迫击炮、机关枪还没有拿来，

所以我们暂时向西南方向转移。”说罢带着全家和现有的队伍，到德博勒庙接了塔日巴直奔翁牛特旗的沙景图庙。走到德博勒庙南的小街集时，派往开鲁的道尔吉宁布、刘忠二人回来了，他们报告说：“李守信司令很满意，他马上同开鲁县城防司令部联系，尽快地派部队来，来之前让我们自己维持秩序。”塔日巴、额勒登格听了倒吸了一口冷气，但仍装腔作势说：“没有什么，今天不来最近还是来的。”要部队快过台河。塔日巴派往开鲁的刘昆山在返回途中路过胡家岗时，被八路军打死了，所以只回来两个人。

额勒登格是投靠国民党的。中央军也好，李守信也好都在开鲁，理应奔东，但他却向西南进发，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他的谋划是：①先到三旗交界处（巴林、翁牛特、阿旗）网罗乌日他、浩特劳、拉沁旺楚克等人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向国民党讨价还价；②集中力量夺取由天山护送的迫击炮等武器；③直进开鲁怕中八路军的埋伏，借西进以转移视线；④保护自己的牲畜。塔日巴、额勒登格及附近大小财主的几千头牛马都集中在浩特忙哈以西一带；⑤更重要的是梦想中央军能及时开来和八路军先打，自己从中渔利。

额勒登格为骗取武装，是让柴扎木苏代写的假信。逮捕业参谋长那天晚上，柴说了“你走什么路，我也走什么路”的话以后，阿力本嘎就说：我们的计划可以说完全实现了，美中不足的一点是在天山的迫击炮和机关枪等武器还没有弄到手，你既然要靠拢我们，你就要想个办法。柴听出阿力本嘎这一招是一箭双雕，除夺取武装之外，还要逼他堵自己后路。柴也想将计就计，答应他们给道布钦巴拉珠尔政委写信。柴当时写了两封信，一封是骗取武器的；一封是告额勒登格叛变，想让道布钦巴拉珠尔政委知道我不是真心叛变。假信的内容是：“金巴、昂苏到查干诺尔后又叛出，现已进入险要沙窝，被我们包围，急速把天山的迫击炮、机

关枪等送来。”信上盖了额勒登格、业喜扎拉森的图章，这封信是按照柴的意见，派阿嘎登嘎送去的，他是机枪排排长。另一封信的内容是：额勒登格已叛变，业参谋长被捕，武器不能送，详情问送信人。阿嘎登嘎和柴关系很好，所以柴把此信也偷偷地给了他，并要他留在天山，不要再回来。他虽当时答应，后来怕额勒登格陷害他的家人，后一封信没有交。道布钦巴拉珠尔政委见信上有业参谋长的图章信以为真，为了把在天山的重武器及时送到假信所指的地点就让阿嘎登嘎去检查这些武器，由道政委亲自护送。阿嘎登嘎趁检查之机，把重机枪的撞针揣到衣兜里，所以在战斗中重机枪没有响。护送武器的队伍当天到巴拉奇如德庙。阿嘎登嘎为了给阿力本嘎、额勒登格回信，在巴拉奇如德庙没有站脚。12月2日，经翁牛特旗沙京图庙向西北走的额勒登格接到报告。额勒登格立即让阿嘎登嘎再返回完成两个任务，其一是给护送武器的道政委等人带路让他们进入阿力本嘎的伏击圈，其二是告诉阿力本嘎不要杀害护送武器的干部。阿嘎登嘎赶到图古日格北面的沙坨时战斗已经开始了。由于阿力本嘎人多又占了有利地势，道政委人少，又毫无准备。打起来不久，道政委、泰治元等被俘，宝音乌力吉受重伤，只有巴彦仓逃出。所带来的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1挺，掷弹筒4个，全被阿力本嘎夺取；护送人员的枪支：步枪20支，手枪2支，也被缴下。战斗结束，阿嘎登嘎给额勒登格（当时在嘎亥吐韩三家）送去报告。报告说：道政委死于流弹。实际是被俘后打死的，因额勒登格事先有话，不要杀害，所以谎报流弹打死。塔日巴、额勒登格，接到报告来到敖斯尔家，宝音乌力吉、泰治元等人都不见了。阿力本嘎说，宝音乌力吉伤重而死，泰治元夺马潜逃被土兵打死。

当额勒登格离开德博勒庙不久，蒙汉联军副司令和子章的队伍便开进德博勒庙。僧格林沁给塔日巴、额勒登格送来了和子章的信，信中写道：“你们快回来吧，据了解这次事件是由于当地

一些人的粗鲁而造成的，只要保证业参谋长的安全，对你们毫无关系，这一点我以自己的生命来担保，如果需要面谈，我只带几名随从去见。”塔日巴见信后，大发雷霆，回信上写到：你如果前来，我只能用枪口说话。对僧格林沁，说他给和子章效劳，唆使阿力本嘎把他杀害了。12月2日他们离沙景图庙到翁牛特旗王爷稍孟班（现在叫花都什）附近敖以苏家后，给翁牛特旗王爷拉沁旺楚克及浩特劳、秃喇嘛等人写信，告诉自己投靠国民党，要求他们共同行动，信由敖以苏派专人送去。12月3日返回阿旗嘎亥吐大地主韩三家，12月4日住查干诺尔敖斯尔家（伪满巴拉奇如德区长），那一天夜里敖汉旗敖来庙活佛（名字忘了）来见塔日巴说：共同努力，要无愧于在天之灵；巴林右旗自治军团长乌日他也来见塔日巴、额勒登格。额对他吹嘘说，我们有行动，有武器，有人马，不同于让和子章撵出旗境单人独马去抱国民党大腿的达理扎布。12月5日由查干诺尔动身到温都包尔住昆嘎日格苏勒家（阿旗丁协理之子），四处派探马了解八路军、国民党的动静，听到了和子章和开鲁县八路军要共同包围温都包尔的消息。12月6日又取道乌那嘎奔到柴达木去了。在乌那嘎饮马的时候，接巴林右旗乌日他的一封信，信上说：我回去后逮捕了蒙汉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孟和乌力吉等七人，全部处死。只要情况允许，我们不打算离开此地，万般无奈时才去开鲁。额勒登格看完信，人马继续往前走，刚进柴达木，和子章的追兵已出现在数里远的冲日格。额勒登格发现后，让我带领关布拉喜一排人占领西南高地，阿力本嘎带全连占领柴达木东边的沙窝进行牵制，苏清嘎的二连保卫塔日巴、额勒登格。阿嘎登嘎安置迫击炮，待和子章的队伍进入射程就要开炮。我带的一个排刚到高地，从冲日格那边策马飞奔过来七个人，关布拉喜迎上去打了一枪，打中了最前面的一个人。后来听说被打死的是和子章部的一位连长元旦仲乃。连长被打死后，和子章的部队没有再出击，额勒登格方面更没有开枪，双方对峙

到天黑，夜里额勒登格派人杀了业参谋长的通讯员王金宝，然后悄悄集中全部人马向东转移。12月7日天快黑时到了开鲁附近，以阿力本嘎为首的一半人马住在开鲁西约5里的一个较大屯子，以苏清嘎为首的另一部分人马住于离开鲁约8里的平安地。额勒登格、塔日巴偕巴布（塔日巴的翻译）及自己的家眷、业喜扎拉森的爱人进城了。这一天夜里八路军偷袭平安地，打死苏清嘎连的僧格、查斯喜和尔、阿民布和等三人。

第二天早晨，额勒登格由城里来到阿力本嘎的驻地，他说：“昨夜我们进城，见过国军七十二军军长陈铭仁，热辽边区司令李守信，两位长官命令我们今天枪毙业喜扎拉森，告戒不良分子。”然后叫关布拉喜把业参谋长押送刑场（阿力本嘎住地北一里外）。执行时阿力本嘎、苏清嘎、金巴、阿嘎登嘎等人参加，李守信派其参谋白鸿义前来监督。额勒登格布置完立即返回开鲁。以后乌占廷（国民党少将）由沈阳前来开鲁同额勒登格闲谈时说：“不该杀业喜扎拉森。”额勒登格回答说：“我也是这个想法，但那一天陈铭仁下令杀他，我们（指李守信）谁也不敢说话了。”

塔日巴、额勒登格叛变当初认为自己对国民党有功，一定会高升，但到开鲁以后，却只得到一个阿鲁科尔沁旗保安队的编制，额勒登格无法安置他的下属，对内埋怨其兄，对外骂王振生。但时至今日，也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国民党摆布了。

投入国民党怀抱以后的活动

额勒登格进开鲁是1946年12月7日，在开鲁被俘是1947年2月26日（农历二月初六），在这约90天中，他干了些什么呢？

1. 策划进犯天山

策划进犯天山是额勒登格到开鲁后的第一个行动。他妄想很快组织优势兵力，一举占领天山，重新取得失去的一切，他天天不是向中央军开鲁城防司令、团长王玉山提出要求，就是向热辽

边区司令李守信那里诉苦。但在开鲁的中央军只有一个团，是否能守住开鲁还缺乏信心，无力帮助额勒登格。至于李守信，虽然门口挂的“热辽边区司令部”的牌子，但官多兵少，实际兵力只有奈曼旗的洛布登、嘎斯拉部，扎鲁特旗的洪富升格、东如布部和新叛变过去的额勒登格部。不过李守信、王玉山为了给他鼓气，终于有一天答应出兵帮助。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王玉山的中央军和李守信的杂牌军合攻富通镇（双合兴东八华里），第二步由李守信的杂牌军组成先遣部队攻打天山。袭击富通镇的部署是：中央军出动一个营正面攻击，洛布登、嘎斯拉的骑兵沿老哈河南岸西进阻击八路军向南进入奈曼旗，额勒登格的骑兵沿台河北岸西进阻击八路军向北进入天山。战斗是在一天的拂晓开始的，中央军打下富通镇立即返回开鲁。额勒登格的骑兵在燕儿窝一带遇到向北转移的八路军，打了遭遇战。我跟随额勒登格到交战地点时战斗快结束了，我看到八路军过台河向南转移，有两名八路军牺牲。但战斗结束，在台河南的的黄家大院讨论战果时，有人说打死七、八个，阿力本嘎坚持说30多个。到双合兴后，攻打天山的先遣部队参谋长白鸿义把20多个改为100多个，上报热辽边区司令部。打富通镇的用意，一是“国军”给额勒登格赏脸，二是造声势以钳制奈曼旗的八路军北上支援天山。

第二步攻打天山，先遣部队有额勒登格名义下的阿力本嘎乌日他、浩特劳等三个骑兵团，和达理扎布名义下的东如布（扎鲁特旗）一个骑兵团共千余人。“前敌指挥部”共五人组成，总指挥达理扎布，付总指挥额勒登格，参谋长白鸿义。“国军”方面有两名参谋。“前敌指挥部”设在双合兴。

富通镇战斗结束后没有立即转攻天山，原因是总指挥达理扎布借口“没有子弹”，“东如布团尚未到来”按兵不动。额勒登格为此到双合兴数次。有一天热辽边区参谋长刘继广先到德博勒庙面见塔日巴、额勒登格等人，然后到双合兴召开“前敌指挥部”

成员会议，决定两路夹攻天山，额勒登格率领阿力本嘎、东如布两团由东正面进攻，乌日他、浩特劳两团在巴林右旗的马鬃山北集结，从西南方面进攻。攻打天山的计划，经过十几天的周折勉强变成行动。额勒登格由德博勒庙出发，在黄羊洼①整顿人马，奔袭天山。当时驻守天山街的有蒙汉联军冀察热辽警卫团，骑兵第三十二团，街外驻有天山支队。

额勒登格的部队到天山街东山，街里的八路军出击两次，都没有成功。之后，他们看到八路军，时有骑兵，时有步兵北上大山，好象弃城的样子。我们正在议论，忽然大炮巨鸣，炮弹连连落在额勒登格的阵地，有一颗炮弹正落在重机枪旁边，扬起的尘土几乎埋了机枪射手，插在山坡上的军旗也倒了。还没有等额勒登格说话，东如布团带头逃跑，阵容立刻大乱，纷纷后退。八路军又开始出击，额勒登格也只好随着逃跑，到黄羊洼勉强控制住原三十五团的人马（东如布团连影也不见了），当夜赶到巴拉奇如德庙，企图同乌日他、浩特劳等人联系，重整旗鼓再打天山。到那里一打听，八路军钳制很严，乌日他、浩特劳的兵力，根本没有集结起来，至此额勒登格攻打天山的计划破产，无奈返回开鲁去了。

这次进犯中，阿力本嘎、关布拉喜二人逞能，擅自带领十几个人闯入天山街东南村，关布拉喜被打死，阿力本嘎也险些丧命。

2. 乞求扩编

额勒登格公开叛变后，在翁牛特旗、巴林右旗附近转游六、七天，把乌日他、浩特劳等人拉入自己的指挥之下，可是到开鲁以后，额勒登格只捞个少校保安队长当，无法安排下属，乌日他、浩特劳攻打天山表现消极，原因也在这里。为了扩大编制，塔日巴、额勒登格一方面亲自同有关人员交涉，另一方面叫王安田去

①在天山街东30华里处。

讲情。最后经东北行辕国民党少将乌古廷同意成立天林支队司令部，其编制是：

支队长——塔日巴（少将）

副支队长——额勒登格（少将）

参谋长——王安田（少将）

参谋处主任——柴扎木苏（中校）

副官处主任——巴布（中校）

副官处副主任——王振声（少校）

军需处主任——特木勒（中校）

天林支队辖三个团两个直属连。

阿力本嘎为骑兵十三团团长（中校）

斯钦朝格图为骑兵十三团副团长（中校）

乌日他为骑兵十四团团长（中校）

浩特劳为骑兵十五团团长（中校）

秃喇嘛为骑兵十五团副团长（少校）

道鲁为卫队连连长（少校）

阿嘎登嘎为机枪连连长（少校）

天林支队的这个编制是李守信、乌古廷私下研究制定的，东北行辕长官部还不知道，为呈请东北行辕审批，塔日巴拿着这个编制表随乌古廷去了沈阳，他们离开没过几天开鲁就解放了。

3. 追捕反叛归队的斯钦朝格图

1947年1月21日（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斯钦朝格图反叛归队，他带领二十多名青年返回阿旗。听到这个消息，塔日巴、额勒登格等人，非常恼怒，命令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活动的阿力本嘎、苏清嘎等人千方百计追捕斯钦朝格图。塔日巴在命令上签了“至少——打死，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这样的话。阿力本嘎、苏清嘎等人表示，一定照办。不久，发生了凤凰山事件，斯钦朝格图等18人壮烈牺牲，只有3人幸存。

队伍溃散，额勒登格在开鲁被俘

1947年2月下旬以来，通辽危机的消息不断传来，开鲁三营兵力中的两个营往通辽调防，途中（道德营子）被八路军全歼。2月25日傍晚，八路军包围了开鲁。当时开鲁城内中央军只有一个营，杂牌部队都在城外，李守信、额勒登格已成瓮中之物，束手待毙。2月26日黎明前，八路军发动了总攻势，10点钟左右，额勒登格等一伙被挤到开鲁城东北角，走投无路，扔下马匹，跳墙潜逃，被城外八路军包围，钻进一间菜农的小屋。额勒登格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给家奴胡德勒格尔，把胡德勒格尔的破皮衣穿在身上企图溜走，但终于有人识破被活捉。额勒登格的队伍当时因在城外，见情况不妙，向通辽方面逃去。

塔 日 巴 喇 嘛

胡图荣阿 整理

塔日巴，人们叫他“塔日巴僧”。他是阿鲁科尔沁旗章京那达木得巴的大儿子，协理额勒登格的哥哥。

塔日巴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他七岁的时候，喇嘛叔叔送他去德博勒庙当小喇嘛，住在自己身边。塔日巴虽然当了喇嘛，但不喜欢经文，而对过日子和商品交易感兴趣，非常羡慕做生意的人。可是当时，喇嘛叔叔的清规戒律非常严厉，塔日巴没有人身自由，不能随心所欲地搞感兴趣的东西。在二十岁的那年（1911年），他背着喇嘛叔叔，从巴林右旗看墓人德日达格的老婆——他姑妈那儿弄了六十头牛，卖给了当时在德博勒庙上的北京买卖人宰和厚，手里有了钱，就逍遥教外，搞起自己的东西来。喇嘛叔叔知道了这件事，但束手无策。于是告诉了那达木得巴，让他第一管塔日巴。

一天，那达木得巴喝了点酒，大显威风，让塔日巴和额勒登格跪在脚前，拿掉指道：“你们丢掉了祖辈的脸，为什么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呢？难道你爹的钱财还不够你们俩花吗？”当时，额勒登格吓得浑身打战，叩头求饶；塔日巴却解开了衣襟，露出胸脯，说：“如有父亲杀掉儿子的缘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想必这是上天的安排。”说完，毫无惧怕之色。这样，那达木得巴也没有办法了，拍膝叹道：“让塔日巴当了喇嘛，这是我的错误啊！”非常后悔。经过这事，塔日巴的胆子更壮起来，权势和地位也随之提高，庙宇和家里的威望增高了。这，为他后来掌握庙

仓和家庭的权力，打下了基础。公元1929年，塔日巴的喇嘛叔叔和父亲那达木得巴相继去世。庙仓和家庭的财产，全归塔日巴所有了。

塔日巴的上几辈人，都曾当过阿鲁科尔沁旗王爷的章京和协理，是本旗南部有名的“巴彦”（汉意富人——译者）。但是同塔日巴相比，他们是只有几千头（只）牲畜的“巴彦”。1946年，塔日巴怙恩弟弟额勒登格，投降了国民党。当时把金银细软全部带走，根据1946年不完全统计，塔日巴的房屋290间，其中瓦房50间，奴隶48名，随丁农、牧民809名，土地两万多亩。他的牲畜放在百十来户人家，牛4,800头、小畜1,700只，马1000多匹，骆驼700峰，猪400口，商业本钱3.3万银元。从他家里挖掘出来的五十两的元宝有175锭，银元12,000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塔日巴富得为什么这样快呢？在于他重视经济利润和多种经营。

他没满足祖辈留下的几千头（只）牲畜，而是努力增加牲畜头数，同时注意提高个体质量。日本人来阿鲁科尔沁旗，搞牲畜品种改良时，塔日巴第一个向日本人买下良种公马、公牛、公羊甚至公猪，开始改良牲畜品种。解放时，他的马群中的改良马已有百十多匹。当时，人们看了说：“塔日巴喇嘛的马群，不是马而是象，没有峰的骆驼。”苏联红军进来，将塔日巴、额勒登格的牲畜赶走了不少。尤其是塔日巴的改良马，全被赶走了。

1920年，阿鲁科尔沁旗扎萨克王爷不能抵抗北方军阀的垦荒政策，将本旗南部的大片水草丰美的喇嘛达日罕草原卖掉。之后，1923年又将现在的西拉沐沦、台河之间的冲积地，即双和兴以西到义和萨拉宽八里、长七十里的土地，准备卖给开鲁县长官刘占英、宗为远。塔日巴对刘、宗大量行贿，以一万银元的价格，把这块土地弄到了手里。他对这块土地进行了详细考察，将浩日代以东的几块自然林进行了维护，搞了些人工栽培。他将这块肥沃的土地开垦下来，种了大片的农作物，使他单纯经营的牧业经

济,出现了新的转折。为了利用河水种水田,他从开鲁、翁牛特、林东找来了八十多户朝鲜族人,种了水稻。他将收获的粮食销售在当地,其余部分不在仓库存储,而是利用冬季闲时,自己领着驼队,把粮食拿到开鲁、通辽、郑家屯等地出售。

为了增加收入,塔日巴又种植了线麻、黑瓜、豆类等经济作物。他知道了自己的农牧副产品加工出售会更赚钱,就经营了榨油、豆腐坊、皮毛加工、织地毯等手工业项目。当时,阿鲁科尔沁旗二十一座庙宇中,塔日巴喇嘛的地毯占有绝对优势。他的地毯甚至打入了北平、奉天市场。

收入多了,塔日巴就开始维修和更新庙宇和房屋。为此,他又考虑到省钱和赚钱,利用德博勒庙西边刚刚额日格的黏土,建了一座砖瓦窑。所以,德博勒庙的却来都宫、喇嘛仓和他自己居住的房屋等,使用的都是自己烧制的砖和瓦。

他在经营榨油、漏粉、做豆腐等作坊的同时,将油渣、泔水等废下料利用起来,养了猪、鸡,再把猪肉、鸡蛋销售到市场上。他养的猪最多达到400口,肥猪平均出肉300—400斤。

随着收入和财产的增加,他开始参加商业竞争。他在开鲁县双和兴镇开了德利远、德利广两处商店,有了雄厚的资本。双和兴是翁牛特、奈曼、巴林、阿鲁科尔沁几个旗的交界地,经济贸易上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塔日巴早就看出了这个问题,为了独吞这方的利益,在双和兴的西边、德博勒庙前方,1936年筹建了小街集小镇。在这儿,也开了德利远、德利广、协利东三处商店。同时,他在开鲁三大商店公玉隆、公玉成、源聚公中入了股,分得利润。他又在广泰祥育肥牛场入了股,把自己的牛育肥出售。塔日巴把商业扩大到阿鲁科尔沁、翁牛特、开鲁、奈曼等旗县,又派遣那存满达夫、参布勒敖力布、蔡氏汉人等亲信,去锡林郭勒盟东西乌珠穆沁、浩其德、苏尼特等旗购买马匹,再以高价卖到内地和东北地区,从中渔利。他的事业顺利发展,

收入日益增多，开始需要在城乡、蒙汉地区进行交际来往的有文化人才。于是，他将侄儿苏清嘎和韶敖、宝音图等人送到了伪兴安总省省府王爷庙去学习半年，准备回来当老师。他们学习回来后，办了一座小学，让塔日巴亲信们的孩子入学，学费由塔日巴承担。

为了探听消息，宣扬自己的名声，塔日巴在住地开办了一座招待所，备有食堂、仆人，来客人时无代价地进行招待。不管来的是什么人，他都要抽空同他交谈，特别注意得人心。在他的招待所，公差和私事来往住下的，每天都有十多人。

同塔日巴第一次接触的人，总是留下他态度谦逊、办事公道、菩萨心肠的印象。那么，塔日巴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他有一个名叫敖木汉（汉意为老实人——译者）的仆人，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老实人。塔日巴为了杀一儆百，有一天将木轮车的车辋拿下来一节，把敖木汉的脖子夹在辐条里，车辋再安上，把敖木汉打得死去活来。最后笑着说：“我这人，不用说打人，就连打骂人的事情都不敢看见。但这奴隶却得意忘形，要踩着鼻子上头了。”这件事，德布勒庙一带的人们，至今还在传说着。

塔日巴虽然从小当了喇嘛，却没被宗教信仰迷住而把命运全托于佛祖，而是利用宗教来欺骗人民。他把全部精力放在金钱、赢利上，但对政治心中也有数。伪满时代，为了了解塔日巴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一个日本人同他住了几年。伪满兴安军长官巴达玛拉布坦、甘珠尔扎布等人同塔日巴见面，谈论政治。他说：“敝喇嘛知道什么呢？政治和朝廷之事，请同弟弟协理额勒登格谈吧。”这样推托出去，招待周详，用金钱搪塞。其实额勒登格丝毫不敢违背塔日巴的命令。塔日巴这样在政治上不露面，暗里进行指挥。

塔日巴最信任的人，是小街集总商店德利远的总掌柜王文声。

王是精通蒙汉语言，买卖有方的汉人。他为了依仗塔日巴、额勒登格的地位和财产，对他们忠心服务。日本投降后，王文声到处乱蹿，想爬上政治舞台。民国时开鲁税务局长、国民党占领开鲁后派到天山、林东的专员、国民党军统特务王安武私下预谋，利用塔日巴，将额勒登格所管的三十五团策反叛变。塔日巴于1946年冬末叛变投靠国民党，被任命为天林支队支队长。开鲁解放时，塔日巴无处可去，以养病为借口离开了国民党，化名为章其布，去北京雍和宫呆了一段时间，北京解放时逃往阿拉善旗，1949年参加了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建立的蒙古委员会。1950年，被列入起义投诚的名单里，成了五原县政协委员。

全国解放初期，塔日巴办了一个小商店。合作化时，塔日巴的牛超过二百头，骆驼三峰、马两匹，房屋九间。房屋租出去，年租金达600元。

1967年2月12日，“红卫兵”们把塔日巴揪到了阿鲁科尔沁旗。但组织上坚持党对起义者“既往不咎”的一贯政策，予以保护。不久，他得了重病，医治无效，1968年11月17日在天山镇去世，年七十八岁。

（宝力道、敖都译）

阿力本嘎的叛变

白寿峰

阿力本嘎的祖辈是巴拉奇如德活佛的奴仆。他弟兄七个，唯独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他从小练了一手好书法，而被挑选到王府做文书工作。

日伪时期他去开鲁读书。回来后在巴拉奇如德、昆都任区长职多年，后调到伪旗公署行政科任副股长。

家中财产，几间土房，十几头牛，一匹马，这些牲畜一半是其岳父其木德给经营的，每年和别人合伙种点漫撒籽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道布、额勒登格组建保安队，阿力本嘎应征担任第四连连长。金巴、昂苏制造姚家段事件后，想出一条毒计，把阿力本嘎的儿子带走，企图以此安全通过三十五团驻地，并伪造一封信，说：“阿连长来信叫我们把他儿子带到部队，由我们护送。”这样，把一个孩子当了人质。

路经吐古仍塔拉时，查布下庙机枪排前来阻击，叛匪派一个牧民送信，说：“我们护送阿力本嘎的儿子，出了意外你们负责。”阿嘎东嘎排长听了收兵而回。

金巴、昂苏他们来到阿拉迪沙漠，在牧主舍日家住。休息了两天，他们又想出了第二个毒计，让阿的儿子给他父亲写信，信由金巴、昂苏一句一句组织，借用阿儿子的手，费了半天才写完这封信，内容是：“父亲，我们来到阿拉迪沙漠舍日家，在金巴他们关照下一路平安。我们回连队还是在这儿等候？速回音指教。”他们把信交由一个牧民送去。

第二天上午，乌若布跟着送信人来到舍日家，说：“连部叫你们靠近连队，现在正和团部联系你们的归队问题，保证你们安全，不信可以把他儿子仍留给你们。”金巴他们放心了，跟着乌若布来到离登吉格庙不远的敖斯尔区长家（连部在登吉格庙）。

休息几天，金巴去德博勒庙拜见过塔日巴、额勒登格后，才让阿力本嘎儿子去登吉格庙见他的父亲。

阿力本嘎见了他的儿子，厉声逼问：“谁叫你来的？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儿子把金巴、昂苏怎样去他家、拿着信，说叫他速来，阿嘎东嘎怎样阻击，他们叫他写信等说出来。阿力本嘎听了气的直咬牙！乌若布劝说没有孩子的事！

第二天九点多钟，德博勒庙来了传令兵，通知：“南老爷驾到！”连队紧急集合，迎接额勒登格老爷。

额勒登格带着十几名随从来到，进了喇嘛的蒙古包，其他人在外面等候。听不见里面说些什么。一会儿，额勒登格嚷道：“目前，以草木当人，金巴这样的好汉，一人顶百人，他无罪有功！”额勒登格从里面气冲冲走出来，上马后对阿力本嘎说：“大难临头，想想阿旗，我们从小一齐共事，总还有点乡情吧，劝你三思！”他们走后乌若布进屋又谈了些什么。

过了两天，一个早晨从团部来通知：全连立即到德博勒庙集合，有紧急任务。一连到达时全团已在庙西集合。团长额勒登格骑一匹大黄马，他讲了话，最后说：“八路是魔鬼，专杀王公贵族、活佛富户等好人，消灭咱们的宗教、寺庙。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的救星章嘉活佛派来的国军已到开鲁，我早已联系好了，他们答应帮助我们，因此，我宣布：阿旗投靠他们。为保卫我们的神圣利益和八路血战到底！有良心的阿旗蒙古人跟我走，有不愿意走的可以分手，在战场上见面！”

他宣布：自己为司令，任命阿力本嘎为团长，桑日布为副团长，各连连长为：一连塔其贤，二连苏清嘎，三连散布拉扎布，

四连道鲁，机枪连阿嘎东嘎。

散会各自回原地。阿力本嘎带一连往北走，去哪儿没说。金巴他们十几个人很紧张，跟在后面互相耳语，傍晚来到舍日家，连部在东，各排依次向西驻扎。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西头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连部人员急忙赶到西头，金巴排一个人也不见了。连部朝枪声方向追去，半路遇见哈萨，他等候连部。他报告：“从查干庙去开鲁的八路军经过此地，金排长命令开的枪，八路打不过我们原道撤退了，我排正追去。”哈萨带路没有走多远，发现了好几个八路尸体，阿力本嘎见了目瞪口呆，不知道他想什么。

金巴他们回来了，金巴说：“首战得胜，请团长记功！”阿力本嘎醒悟过来，掏出手枪，乌若布把阿力本嘎拉到一边，说：“事到如今我们选择一个良策为好，乌兰达坝事件和你无关，但这次打死了这么多八路，人家能饶你吗？再说，打死一个金巴容易，我们怎么向额勒登格司令交待？况且金巴也不是一个人。”说的阿力本嘎搓手，骑虎难下。最后，他选择了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道路，决定返回德博勒庙。

到德博勒庙，塔日巴亲自迎接，满脸笑容，他说：“欢迎我们的民族英雄们胜利归来，大喜，大喜。我早料到，咱们的团长是先除恶魔，后上宝座，佛恩真灵啊！你走后就请众僧为你们昼夜念祛魔经，老弟啊，喇嘛哥我对你不错吧？”

塔日巴破格地杀牛杀羊，盛宴招待一连的全体官兵。塔日巴致词：“你们是我们蒙古族的英雄，我代表我弟弟、阿旗宗教、上层贵人们向你们感谢，你们打响了胜利的头一炮，给你们记下这个重要意义的特等功！特别是金巴老弟，佛爷永远保佑你，你们十几个人做得对，你们一连应当称为‘英雄连’，全团学习的榜样！”

塔日巴在酒宴中说：“阿团长，不，这不是我封的，昨天我

专派我的管家前去巴拉奇如德庙，朝拜活佛，请问目前事态时，活佛指令‘这支军队，只有阿力本嘎指挥才能取胜！’这是佛意啊，你看怎么样？”

阿力本嘎在这一生中头一次听到活佛点他的名，贵族这样宽待他。从小他见了这些人低头垂手，站立道旁，今天能和他们平起平坐，感到梦游中天。总算一辈子没白奋斗，他终于下了决心为塔日巴他们卖命，死心塌地的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

姚家段事件

1946年“四三”会议以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宣布解散，原来由“东蒙古自治政府”领导的“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接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5月初在林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白晓山是五月中旬随二十军分区来到林东的，组织上准备分配他到四师工作，到职前，暂去分会。白晓山到分会，感到最突出的问题财经开支困难，必须首先想办法解决。于是，他到林西以个人关系从地主张守礼处借了50斤大烟土，每斤作价50元，卖出后还烟价，剩余部分归分会。白晓山在征得分会领导乌力吉那仁、义达嘎苏荣、徐子干等同志的同意后，和盟政府财经科长王××一起去东北出卖。首批买回成套胶车6辆，于1946年8月份送回林东。为了处理其余烟土，白仍留在东北，往返于白城子、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做生意，一直到1946年旧历10月初返回林东。

在白晓山返回林东时，一共带回15胶车的物资。为了住宿方便，他们把车辆分作两个梯队。第一队，由卓盟纵队司令部的特木勒科长率领6辆车组成；第二队，由四师的于乐图率领9辆胶车组成。当第一梯队路过阿鲁科尔沁胡吉河一带时，被三十五团四连的金巴发现，便产生了截车抢劫的念头。

早在1946年春，三十五团突然开往通辽。据说：几个蒙旗合兵打土匪。去了一个月才回来，回到旗后全团集中在旗南部德博勒庙附近，说是南面有土匪。这时正好秋季，士兵都要求探家，安排

秋季家务。团部研究决定，轮流回家。胡吉河一带由金巴、昂苏负责，带领十几个人回去。他们到胡吉河时已经深夜，村里谁也不知道他们回来。

金巴回到家发现少努家来了几辆大马车，车上装着很多东西，便去少努家，装作拜访家主，了解来客人数和动身时间、途经那里。他见了这些人，都是文人，他很高兴。这个十几岁就当伪警备军的惯匪决定抢这几辆车。他到自己家没停，返回胡吉河通知回来探亲的人们，说：“我爸（猎人）说，乌兰达坝山来了一群野猪，咱们连夜赶到准能打住。”这些人信以为真，跟着他半夜到了乌兰达坝山。在距离林东镇60华里的姚家段村外小山沟里设下埋伏。当特木勒的6辆胶车从山下上来时，金巴首先向马车开枪，并命令大家射击，说：“他们是土匪！”车上的人先停了火，来人向他们说明身份：他们是从乌兰浩特调往林东工作的八路军。金巴提出：先放下武器，接受检查。车上的人答应了。金巴令手下的人把他们都用绳子捆起来，之后就抢车上的东西，抢完东西把人拥进山沟枪决了。车上连特木勒在内一共13人：2名战士、6名车夫、3名旅客。在旅客中有1名妇女。这伙歹徒，在杀害这个妇女时，有16人进行了轮奸。杀害后，又用柴草将这些遗体烧毁。

当第二梯队来到姚家段时，被6名群众领到现场，6辆胶车横躺竖卧，没有带走的弹药箱满地都是，死难者已经面目全非，从生产车上取下的麻绳还在闪着火光。

第二梯队的同志们把情况报告给卓盟纵队司令部。卓盟纵队将13名烈士遗体用两辆胶车运回，安葬在林东镇北山上。现在这里已经辟为烈士陵园。

据说，金巴做案后当场宣布：“大家发了财，今后一切听我的，谁也不能往外讲这件事，我自有办法。”等等。

乌兰达坝离胡吉河五、六十里，胡吉河的人们都听见了枪声，

村里人们很惊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昂苏的老婆日格吉玛出来说：他们在打野猪。村里人才放心，也才知道这些当兵的回家探亲来了。

村里人有的想看看野猪，有的想打听一下家里当兵的，但等了一天，他们没有回来。

后来听说，这帮匪徒连夜去了阿吉尔根山，又去阿尔班苏木，抢劫马匹，准备逃离阿旗投靠国民党。

他们逃跑前几天住在山上，有时夜里偷偷回家。村里人心慌慌。

（本文根据白晓山、白寿峰等人忆述整理）

斯钦朝格图烈士与凤凰山事件

苏雅力图

孙国章 整理

斯钦朝格图，1923年出生于阿鲁科尔沁旗白音他拉努图克（区）乌兰巴日嘎苏艾里（村）一个富裕牧民家庭。幼年时，就读于昆都国民优级学校，他聪明好学，性格刚毅。稍长，考入海拉尔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在伪旗公署做日语翻译工作；1943年冬他被征入了伪满国兵驻林西骑兵团服役；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到本旗参加革命工作。在东蒙自治军第四师第三十五团（骑兵团）任独立排排长、副连长。1946年末，三十五团叛变投靠国民党后，他与叛匪进行了一番斗争，在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率领一部分战士反叛归队。1947年2月，他在白音他拉努图克开展扩兵和瓦解叛匪工作中，于凤凰山（蒙语为嘎日迪哈达，现属扎鲁特旗管辖）战斗中，被阿力本嘎叛匪包围。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壮烈牺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东蒙自治政府在乌兰浩特（王爷庙）成立，并建立了东蒙人民自治军。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斯钦朝格图，抱着救国救民之心，立即报名参加了东蒙人民自治军。由于他酷爱军事，办事果断，组织能力强，入伍后不久被提任为三十五团独立排排长。

1946年承德四·三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之后，我党为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决定把东蒙自

治军和进驻热北地区的八路军二十分区合并，称为“冀察热辽二十军分区蒙汉联军第四师”（简称蒙汉联军），司令部设在林东。四师属下的三十五团共600多人，部队人员组成比较复杂。主要成员是伪满警察、唐山国兵和自备枪马的地（牧）主。大小头目多数是封建上层或伪满旧职人员。团长额勒登格是旧中国主管武装的旗协理、伪满警务科长。阿力本嘎是伪满努图克达（区长）。1946年冬，蒙汉联军司令部为提高整个部队的政治素质，改造这支队伍，在原自治军和地方上调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干部，在司令部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政治训练班。斯钦朝格图是参加这次政治训练班的学员之一。在训练班上，他认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决心为民族的解放贡献一切。由于形势紧迫，学习班提前结业，司令部派他回三十五团任四连副连长兼指导员。到四连任职后，他在部队部分官兵中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此时，国民党军已占领赤峰、通辽、开鲁等地，逼近阿鲁科尔沁旗南部地区。额勒登格率领三十五团，奉命到阿旗南部的德博勒庙（额勒登格家就在此地）一带驻防，钳制驻开鲁国民党部队北犯。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蒙汉联军司令部将钳制策略改变为坚壁清野，并命令额勒登格带领部队返回天山街。此时，塔日巴喇嘛（额勒登格的亲哥哥，大牧主）与国民党军统特务王振生和热河省国民党部特派员王安田勾结在一起，策动额勒登格投靠国民党。额勒登格部下，也连续制造反革命事件。阿力本嘎杀害了德博勒庙区支会副主任日木得都布哈；金巴、昂苏（阿力本嘎的部下）在姚家段袭击卓索图盟纵队运输队军需物资车辆，并杀害特木勒等13人，促使额勒登格的早日叛变。斯钦朝格图对阿力本嘎等人的胡作非为极为愤慨，为了挽救他们，他向阿力本嘎说明事情的严重性，让阿到团部把问题交代清楚，承认错误，阿

力本嘎不但不听其劝告，反而狂言说：“我要投靠国民党去了。”斯钦朝格图感觉到事态严重，随即向团部做了报告。团部派人几次去作阿力本嘎的工作，但最终没有改变他的立场，阿力本嘎因此对斯钦朝格图耿耿于怀，恨之入骨。

1946年12月1日，额勒登格不听前来动员他搞坚壁清野的蒙汉联军第二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森同志的劝告。反而绑架了业参谋长，拒绝蒙汉联军司令部让他返回天山的命令，胁迫全团，离开德博勒庙驻地，公开叛变了革命，投靠了国民党驻开鲁七十一军李守信部。

斯钦朝格图等人也因额勒登格的叛变被裹挟去了开鲁。但富有爱国之心和民族正义感的斯钦朝格图没有辜负民族对他的期望和信任，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做瓦解敌人的工作。斯钦朝格图的革命行动，使额勒登格怀恨在心，但又顾忌到斯钦朝格图在官兵中的威望，欲害不能，欲罢不忍。诡计多端的额勒登格，转而采取了更阴险的手段。任斯钦朝格图为天林支队（额投降后该部经东北行辕国民党少将乌古廷批准临时建立的）下辖的骑兵十三团副团长，将其率领的士兵全部拆散，分编到其它连队。名为提升，实际上削去了他的兵权。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斯钦朝格图只能采取秘密串联办法，等待时机反正归队。

1947年1月20日（农历腊月29日）晚间，斯钦朝格图趁叛匪过年放松警惕之机，与喜仁嘎率领26名进步青年，带长短枪30多支，一挺轻机枪和弹药，分兵两路从开鲁反正奔向天山。

斯钦朝格图率领十几名战士，返回天山的途中，路经乌兰巴日嘎苏自己家，这是1947年1月21日（农历腊月30日），因正值过年，便在家住了两天。这时，他听到村里人说，杀害我革命干部，制造“姚家段事件”的两名祸首金巴、昂苏带领几十人在罕庙努图克胡都格吐艾里，又杀害我革命工作人员色拉布旦等二人，还逮捕我工作人员好特劳，在去开鲁的途中要路过这里。斯

钦朝格图对战上们说：趁金巴、昂苏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反正这一良机，我们要智擒这两个匪徒，为民除害。斯钦朝格图布置好后，出门迎候金巴、昂苏等人。他们来到后，便将金巴迎到自己家里坐客。昂苏与大部分人，在村边等候金巴。斯钦朝格图和金巴等人进院后，请金到正房，跟随的那几个人到西厢房。斯钦朝格图一面与金巴喝茶，一面唠嗑以稳住他。然后趁上茶斟酒之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金巴大声喊到“不许动”。早有准备的战士们迅速从外屋跑进来，缴了金巴的枪，并把他捆绑起来。同时把金巴的随从也都全部缴械。斯钦朝格图对金巴说“你坏事干尽，罪恶滔天，我今天要亲自为民处决你。”说完，命令把金巴拉出去枪毙。这时村里的老乡们闻讯赶来说：“你们不能在这里杀他，额勒登格的人来了，我们就遭殃了！”为了乡亲们安全，斯钦朝格图决定不杀金巴。同时与昂苏交涉，用金巴换回了我工作人员好特劳。

当天夜里，斯钦朝格图率领部队，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去天山街，与喜仁嘎等十几名战上会合。第二天，斯钦朝格图等反正月队的28名同志受到了阿旗人民政府和天山支队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在林东又受到了乌兰夫同志的接见和表扬及蒙汉联军司令部首长们的称赞，同时蒙汉联军司令部把在阿鲁科尔沁旗重建一个团（三十三团）的任务，交给了斯钦朝格图，并任命其为三十三团副团长，兼一连连长。斯钦朝格图受到上级领导同志们的如此信任，他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上级交给他的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肩负着革命的重任，率领全体战士，从林东返回天山。

1947年2月12日，斯钦朝格图接受上级命令率领部队，配合驻天山的八路军部队骑兵五团、步兵二团开往扎嘎斯台一带追击阿力本嘎叛匪。我部队当天开进扎嘎斯台的吐占仁他拉庙宿营。来到此地，斯钦朝格图听到两个消息：一、在附近的吐占日格

(敖登艾里)营子，有叛匪通讯班十来人；二、散布拉扎布（阿力本嘎团三连连长，后带领全连217人起义投诚）的家属在此营子。斯钦朝格图听到此消息后决定：先活捉叛匪通讯班；然后把散布拉扎布的家属转移到天山保护起来，以争取散早日弃暗投明。第二天，斯钦朝格图带领六、七名战士，来到吐古日格，包围了叛匪通讯班。不到一个小时就把通讯班全部俘获，打死叛匪1人，活捉7人，缴获了8条枪和8匹全鞍马。战斗结束后，斯钦朝格图到散布拉扎布家，对其家属说明情况，并把他们接到旗政府院内，和自己的家属安置在一起。

1947年2月14日斯钦朝格图率领队伍，在哈日沙拉巴营子，夺回被叛匪阿力本嘎抢走的我某部三连战马20多匹。

194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早晨，阿力本嘎带领两倍于我的叛军，向我吐占仁他拉阵地包抄过来，由斯钦朝格图带领的人马，协同驻阿旗八路军部队同阿力本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在机枪掩护下，用全部兵力（骑兵）猛烈冲锋，把阿力本嘎叛匪打得落荒而逃。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敌人十人，活捉九人，缴获敌人七十多匹全鞍马，还有一些枪支弹药和牛车等战利品。

1947年2月16日，斯钦朝格图率领部队从吐古仁他拉凯旋，在天山街受到天山支队首长的表扬和奖励，为了加强武器装备，发给他们一批枪支弹药。同时，上级决定派斯钦朝格图带领部队，到白音他拉努图克一带，侦察敌情，发动群众和开展扩充兵员工作。2月17日斯钦朝格图率领部队开赴白音他拉。当他路经自己的家乌兰巴日嘎苏艾里时，得知爱人无影无踪不知去向，老奶奶也在劫难中死去，家里一切家产和牲畜都被叛匪抢走。面对奶奶的惨死，爱人的失踪，被匪徒洗劫一空的家，斯钦朝格图含悲饮恨，更坚定了他为革命为民族彻底解放而斗争的信心。当天夜里，他率领队伍赶到白音他拉努图克查干花艾里宿营。

1947年2月18日，斯钦朝格图带领部队到了电报局（现属扎旗白音他拉苏木管辖，在凤凰山西南方向十华里处）营子，侦察这一带敌情。老百姓说：“阿力本嘎和吐嘎拉占（阿的部下）常来此地抢粮食，抢草料，抢肉食，抢牲畜。”针对阿力本嘎叛匪骚扰的现实，斯钦朝格图于2月下旬分别在电报局营子、德勒腾艾里（现属扎旗白音他拉苏木管辖，在凤凰山正北八华里处）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斯钦朝格图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是蒙汉联军领导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斗的”，“额勒登格、阿力本嘎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投靠了国民党，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民族，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他们坑害百姓，胡作非为，是没有好下场的”，“我们虽然人少，但我们能取得最后胜利，因为正义在我们一边。我们可能会流血牺牲，但为民族的利益，死了也是光荣的。”他最后说：“我们要重建一个团，谁愿意参加，我们欢迎！”，“从此以后，我们要想一切办法不能给阿力本嘎叛匪一粒粮食、一棵草。”

1947年2月22日，斯钦朝格图带领五、六名战士到吉林庙一带，侦察敌情：了解到阿力本嘎团三百余人在他本陶力盖，白音他拉的河东河西沙窝窝活动后，当天返回电报局营子。并亲笔写信派人①把得到的敌情向旗政府和天山支队领导报告，要求派增援部队②来攻打阿力本嘎叛匪。当天夜里，部队从电报局营子转移来到凤凰山等待上级指示。可惜的是由于路途远、交通不便，我增援部队没及时赶到凤凰山。斯钦朝格图曾经还给在阿力本嘎团任连长的散布拉扎布写信，劝说其反正回到革命阵营中来，并要求他在我军攻打阿力本嘎叛匪时，里应外合，一举歼灭叛匪。斯钦朝格图认为他家与散布拉扎布家是世交，他俩又是关系很密切的同学。他

注：①西日布扎木苏、散日布二人。

②向扎鲁特旗的三十七团送去求援信，又派拉西、道尔吉尼玛等五人到双龙镇一带宣传群众。——据扎鲁特文史资料。

把这封信寄出去,不幸的是,这封密信在途中落到阿力本嘎手里,阿力本嘎将计就计,把散布拉扎布调开,命令他去开鲁领回子弹。

1947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四)凌晨,叛匪阿力本嘎用全团的兵力,向斯钦朝格图军驻地凤凰山发起猛烈攻击^①。斯钦朝格图率领英勇善战的二十几^②名战士,坚守凤凰山阵地,凭险抵抗,同阿力本嘎叛匪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敌众我寡,条件不利,在斯钦朝格图指挥下,战士们英勇杀敌,坚守阵地五个多小时,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这时,从敌人阵地露出一个举着双手的老乡,向我方阵地跑来交给斯钦朝格图一封信,是阿力本嘎写的。信上写着:“你们如果投降,我不杀害你们任何一个人。”斯钦朝格图看完信后,在信的背面只写了两句话:“势不两立,血战到底”。让那个老乡把信带回。然后对战士们说:“阿力本嘎来信让我们投降,这是妄想,我们一定要和他血战到底,决不投降,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叛匪阿力本嘎劝降未成,恼羞成怒,又疯狂地向凤凰山进行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敌人用全团的兵力向凤凰山阵地攻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斯钦朝格图坚定地命令战士突围,战士们迅速骑上马向东南突围,斯钦朝格图断后掩护。当冲到河边时,多数战士相继倒下去了,斯钦朝格图身负重伤,仍以惊人的毅力与匪徒搏斗,直至壮烈牺牲。战斗结束了,除一人突围成功^③,二人被捕外,斯钦朝格图等18名烈士的鲜血洒在了凤凰山上。

1947年10月,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在凤凰山为斯钦朝格图等18名殉难的烈士立纪念碑。

^①据扎鲁特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载,告密者为查本他拉营子的巴图敖其尔。

^②共21人。

^③名叫浩特劳。

1948年3月，昭乌达盟政府和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在凤凰山为斯钦朝格图等18名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阿旗政府副旗长陆棟同志主持了会议。当地各族人民群众和昭乌达盟各旗县代表及当地驻军等万余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上为斯钦朝格图等18名烈士树立了革命烈士英雄纪念碑。碑的正面上方横写着：“名垂千古”，下面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着：“凤凰山殉难烈士之碑”，碑的背面上方横写着：“殉烈万世”，下面刻着斯钦朝格图等18名烈士的名字和英雄事迹。追悼会上，齐唱了当地群众为悼念凤凰山18烈士而创作的《斯钦朝格图之歌》。枪毙了给叛匪阿力本嘎通风报信的民族败类巴图敖其尔。

1976年10月，扎鲁特旗人民政府在凤凰山西侧，又为斯钦朝格图等18烈士建立起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并把原碑迁移到新碑的前面。

斯钦朝格图等18烈士名垂千古！

（嘎日迪 阿拉坦格日勒 浩特劳忆述）

忆烈士宝音乌力吉

柴·扎木苏

宝音乌力吉（韩友琴、韩绍宗），原籍是土默特右旗人，生于1917年。当时家庭生活渐趋困难。宝音乌力吉3岁那年，他父亲格力格扎木苏带领全家移住阿鲁科尔沁旗巴彥塔拉村。

1934年，阿旗初次成立公办小学（当时叫国民学校），1935年底伪满洲国国立王爷庙兴安学院，向阿旗招生，来了1名学生的指标。当时阿旗公办小学最高年级的学生，还不到3年级，不符合招生要求，所以找到虽未进入正式学校但成绩已达小学6年以上成绩的宝音乌力吉，把他保送到兴安学校，成为兴安学院第二期生。在这里有以前升入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阿旗人宝音陶格陶，升入兴安学院的有宝音达来，后来通过考试升入兴安学院的有那存乌尔图、柴扎木苏、华来顺等人。

宝音乌力吉在兴安学院学习时期，勤奋好学，成绩最佳，尤其是汉字写得好，当时兴安学院的汉文门牌就是他写的。1939年宝音乌力吉毕业后回阿旗伪旗公署任行政股长、人事股长等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祖国光复。1946年4月，东蒙自治政府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第三十五团成立，额勒登格任团长，宝音乌力吉任该团的副官长。1946年秋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与八路军二十分区合并成立蒙汉联军，额勒登格改任第二支队长，宝音乌力吉改任蒙汉联军第四师三十五团政治部主任。同年年底额勒登格叛变，为了骗取在天山团部的重武器（迫击炮、机

枪、掷弹筒）写了一封假信，派人送到团部。当时在天山街里的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团政治部主任宝音乌力吉等领导同志被蒙骗，按着额勒登格的要求送武器。途中，在图古力格忙哈一带遭到额勒登格叛匪的袭击，在战斗中宝音乌力吉英勇牺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年才30岁。

我同宝音乌力吉同志都是阿旗人，都是兴安学院学生（他是我的上一年级学生）。解放后，同在旗政府和三十五团工作，在较长时间的相处中，他给我的影响比较深刻。宝音乌力吉同志，为人忠厚，学习勤奋，思想进步。参加革命后，他要求自己或勉励别人诚心诚意。他拥护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走。他的一生虽很短暂，但始终按着共产党指给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直到最后一刻。

我是怎样起义投诚的

散布拉扎布 口述

连柱、敖都 整理

我当过伪国兵，在日本驻林西伪军医院里服役。日本投降后，带着枪、马回到家乡阿鲁科尔沁旗哈拉哈达村，参加过村的自卫组织。旗临时政府成立后，将各村的自卫组织联合起来，集中了五、六百人，建立了旗的地方武装，命名为警备大队，由额勒登格总管。到了1946年的春季，改编为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三十五团，额勒登格为团长，我担任一连一排排长。

谁知，1946年冬至月初八，额勒登格利用他蒙汉联军第二支队长的职衔，带着三十五团大部，投靠了国民党，编入李守信的杂牌军。我当时对形势认识不清，跟随他走上了错路。但驻守在开鲁的李守信却对我们半信半疑，不准进城，给养无着，逼迫我们靠抢掠度日。到这时，大家都开始后悔，不该叛变出来投靠国民党。斯钦朝格图和乌力吉陶格套2人，尤为不满。斯钦朝格图和我们两家，祖辈相处很好，来往密切。我们两人又是伪满时的同学，相互之间无话不说。有一天斯钦朝格图对我说：“这地方不是咱们久留之地，想办法早点离开为好。”但那时我驻在下边连队（叛变后阿力本嘎升了团长，我从排长提为三连连长），斯钦朝格图在团部阿力本嘎身边，互相联系非常不便。一天突然听说，趁过年之机（腊月二十九日晚）斯钦朝格图带领20多人，从开鲁西营子逃走了。他们走后阿力本嘎对军队控制更严，

我只得把返回家乡的念头暂且搁起。到正月末全部人马在阿拉迪忙哈一带行动，阿力本嘎突然派我去开鲁领子弹。我当时很高兴，因为多搞点子弹，将来带着回家乡也光荣。但当我领子弹回来时，发生了凤凰山惨案，以斯钦朝格图为首的18名同志壮烈牺牲。事后听说，斯钦朝格图牺牲前曾给我写过信，托敖力吉白转交。信的内容是让我从内部接应他，他从外边攻，内外夹击，打垮阿力本嘎。但信落到了阿力本嘎手里。他拿到信后，对斯钦朝格图恨之入骨，这才把我派往开鲁，暗中监视八十二（我们连副连长）。据八十二说，我走后的第二天阿力本嘎便下令往北行军，说有紧急任务。第二天拂晓，到了凤凰山（斯钦朝格图的驻地）。八十二听说打的是斯钦朝格图，但趁进攻空隙派了两个人给斯送信，让他们撤走。斯钦朝格图不知信落到了阿力本嘎手里，还以为有内应，所以没撤。而我的三连在战斗之前就被拆散了。

凤凰山惨案后，阿力本嘎带领全部人马又奔了开鲁。我们曾打算留下来回家乡。可是又怕政府和人民不信任我们，就又跟着阿力本嘎走了。在道上听说开鲁已解放，额勒登格被俘，其兄塔日巴逃到通辽。我们又绕道奔通辽。快到通辽时，驻在那里的国民党中央军不让我们靠近。他们城防很严，城外都挖了壕沟，碉堡一个挨着一个；碉堡外拉上了电网，我们只好宿营在火车站附近。

国民党杂牌军李守信这时虽然惊恐万状，却还在装腔作势，封官许愿，笼络人心。他封阿力本嘎为上校团长，蔡侠春为上校副团长，任我少校连长，八十二任上尉副连长。其他人也分别封了官，无职无衔的所剩无几。

四月初，通辽完全被包围，无法出入。一天夜里，炮声震耳，火光冲天，我们都非常惊慌。但第二天却非常寂静，原来是中央军将弹药库炸掉逃跑了。李守信命令我们荷枪实弹开进通辽，以示其威。我们在街上遇到了阿旗的朝鲁、高虎等人，他们向我

们透露了准备逃离国民党的意思，我们表示也有此意，就是不得机会。不久听说他们带领40多人走了，我们深为自己未能走掉而遗憾。

我们继续秘密串连，扩大队伍，乌力吉陶格套、道尔吉莫冷、右旗的白庆林（团长）、翁牛特旗的一部分人也准备脱离国民党军队，我们商定一块走。我们联络大约400人，由于当时阿恩根司令员追剿非常紧，我们无法脱身，只好跟着国民党军队朝抚顺逃跑，后来奔了叶柏寿。到了叶柏寿还没有来得及吃饭，街上骤然枪响，我们便也打起枪来，第二天才发现，我们只是内部互相打了一宿，八路军只来了几个人，打了一阵枪早走了。我们进入叶柏寿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打开那里的弹药库，让我们随便取武器弹药。大家根据自己的马能驮多少，就带多少。从叶柏寿奔北票，到阜新和朝阳交界的一个叫道伦苏木的地方，遭到了八路军的追剿。到了这里，大家下决心脱离国民党。于是我们打开八十二副连长随身带的地图，了解了这一带的地形和交通，研究了一天多（这一天大概是1947年5月4日）。正好5月6日夜轮到我们团站岗。原来规定以班为单位站岗，后来由于战事紧，又以连排为单位站岗。八十二同志对我讲：“这是天赐良机，你带站第一班岗的五十几人到西边离大营子三、四里远的山包上等我，我以查岗，换岗的名义再带一部分人找你接头。”当八十二带领最后30多人出来时，阿力本嘎察觉，追赶着打了一阵枪。我怕发生意外，带领大部分人马离开了约定的山包，留下李全、吉如赫2人接应八十二。八十二到后，我们清点一下，共计400多人（包括巴林右旗白庆林带领的一部分），乌力吉陶格套当时在阿力本嘎身边未得脱身，阿力本嘎知道我们人多，也没敢穷追，只打了一阵野枪，便了事。我们从半夜马不停蹄地急驰，5月7日太阳升起时已走出50多里。逃脱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呼吸到了草原清新的空气。

脱离了阿力本嘎后，需要整顿一下队伍，重新制定一些纪律，这时大家吵嚷着推选我、八十二、白庆林三人担任团长，我们没有接受。我们商量着定了几条纪律和事项：（一）将我随身藏带的“内蒙古自治军军旗”取出换掉了国民党军旗；（二）命名我们这个队伍为“敖汉大队”；（三）部队编制不动，不重新委派干部；（四）途中不能分散，不许抢掠骚扰百姓；（五）脱掉国民党军服装，返回家乡。

当时为什么命名“敖汉大队”呢？由于我们在北票一带时，敖汉骑兵队经常尾随追剿我们，并且有一个穿喇嘛袍骑白马的人经常来到国民党部队内部鼓励大家脱离国民党。“敖汉大队”这个名字就会避免别人的嫌疑。

我们打着“敖汉大队”的旗号，有时找人带路，有时派人去与八路军联系，尽量走小路以避免发生冲突。于5月10日来到了沙景图庙（这时白庆林已带着自己的人马和翁旗一部分，归从了沙景图庙附近的孔飞司令）。

到5月10日晚上，我们踏上了阿旗边界，大家激动万分。当晚在德博勒庙温都包尔住下，派人与旗政府和德博勒庙努图克政府联系。由于我们脱离家乡半年多，不知八路军究竟怎样对待我们，于是便很快地离开德博勒庙去了扎格斯台图古仁塔拉。后来听说盟和旗的领导都在巴彦花乌兰苏木搞土改，我们便派八十二带领几个人前去联系（我当时带领部队离不开，加上一进阿旗弟兄们都要请假回家，我怕大家离队惹事）。

5月12日，八十二同志到了巴彦花努图克会见了当时盟里来的领导那斯图、那仁朝格图及旗有关领导。领导不但没有岐视我们，而且给予了热情地接待。领导上对我们返归家乡表示热烈地欢迎，告诉我们先将武器和马匹交了，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随便找事干。大家说：我们是回家乡赎罪，请求政府宽大的，没有任何奢望。于是5月14日在巴彦花努图克东占

并子交了枪支弹药和马匹。

我们当时上缴的武器是：轻机枪2挺，掷弹筒1个，步枪共219支，手枪10几支，子弹50000多发，手榴弹1000多枚。投诚人员共219人。

5月16日，贺希格陶格套带领我们来到天山，我们脱掉了国民党军装，政府发给了“从北票脱离国民党，返回家乡投诚”的证书。从此我们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共产党和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投诚以后，我们排长以上的人员集中到当时盟政府所在地林东，进行了思想教育。通过教育，我们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对跟随额勒登格、阿力本嘎叛变走上歧途，非常痛悔。从那时起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终身。

天 山 保 卫 战

鲍世民

天山保卫战发生在原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天山街（查布杆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抗日武装部队，大踏步向东北地区挺进。在战略上“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农村包围城市，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清匪反霸，使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革命政权，壮大武装力量，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根据这个伟大的战略方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程子华，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黄火青，以及黄克诚、胡锡奎、段苏权、赵毅敏、杨得志等老一辈革命领导同志，先后率领杨苏纵队挺进东北地区，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时，国民党反动派要反革命两手，一面谈判，一面向我解放区进攻，争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曾派其第三军孙连仲部抢占战略要地，企图攻占承德一线，切断我军挺进东北地区的交通要道。程子华、肖克、罗瑞卿等同志组织指挥了承德保卫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时昭盟地区已成为我军重要的战略地区，是我军挺进东北地区的走廊、交通要道、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故在国民党九十三军第二十二师攻占赤峰时，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战略转移到林西，

※鲍世民同志供稿，编者根据刘昌同志回忆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林东一带。此时昭盟地区各族人民得到翻身解放，积极支援解放战争，踊跃参军参战。

1946年秋，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向我解放军大举进攻，抢占大中城市和东北地区。1946年10月，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占领赤峰，国民党盟军李守信占领通辽、开鲁一线，并企图向昭盟地区逼近。国民党军向我根据地林西、林东派进特务马青山、任常德、姜贵昌，与我军争夺当地骑兵第四师，煽动四师武装叛乱。在这种形势下，保卫热北地区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保卫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指挥机关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时形势十分紧张，我党我军既同国民党斗争，又同热北地区反动分子斗争。

这一时期，地方上的反动势力活动很猖狂，奈曼旗的王爷曾派其弟额部分武装打我八路军，又派人到天山与塔日巴喇嘛之弟（当时骑兵四师三十五团团长）额勒登格联系武装叛乱，投靠国民党军李守信。接着由伪警务科长孙根全率领的阿旗公安队，派国民党特务孙海彬去郑家屯与李守信联络武装叛乱事宜。国民党热河省主席刘××，也派特务王安田到阿旗与塔日巴联系叛乱。翁牛特旗叛乱分子派人到三十五团活动。国民党军李守信占领开鲁后，也派特务宝音图策动额勒登格武装叛乱。同年10月，三十五团四连和一连少数人，在天山北胡吉尔河一带与途中宿营的卓盟纵队特木热为首的男女13名同志相遇。他们经过策划，在第二天凌晨到特木热等同志的必经之路姚家段山口进行潜伏阻击，特木热等13名同志全部残遭杀害，物资全部抢走。这是额勒登格叛变的开始。

1946年11月末，以额勒登格为首的骑兵第三十五团，除一连外，在天山南部地区德博勒庙集结，有叛变去开鲁投靠国民党的迹象，我蒙汉联军司令部曾派二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森，到额勒登格驻地动员他们北移，离天山近一些。思想反动，死心要叛变

的额勒登格杀害了业喜扎拉森，接着利用欺骗手段杀害了团政委道布钦巴拉珠尔、政治处主任宝音乌力吉等同志，同时逮捕了30余名拥护我党我军的进步青年，公开叛变。叛变者共五百余人，带走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步枪、手枪500余支，投靠了开鲁国民党李守信部队。与我党我军和各族人民为敌。除三十五团外，原骑兵四师相继叛变的还有：驻巴林右旗三十四的韩桑杰、乌日他等人裹挟的170多人；驻扎鲁特旗三十七团洪富升格、二虎等人裹挟的200余人，以及不属于四师的翁牛特旗匪队浩特劳、秃喇嘛等。这些人叛变后，由额勒登格网罗在一起，投降驻开鲁的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陈铭仁和“热辽边区司令”李守信。额勒登格等自恃对国民党有功，一定会高升。但到开鲁后，额勒登格也只捞个少校保安队长的头衔，所属部队只落个阿鲁科尔沁旗保安队的编制，无法安置他的部下。于是他极力鼓吹占领天山。遂于12月中旬争得李守信同意向天山进犯。

当时，额勒登格的名下有阿力本嘎、乌日他、浩特劳以及达理扎布的东如布四个骑兵团，总共一千余人，指挥部设在“双合兴”，总指挥达理扎布、副总指挥额勒登格、参谋长是李守信的参谋白鸿义。他们的部署是额勒登格率阿力本嘎、东如布两团从天山东南正面进攻；乌日他、浩特老两团在巴林右旗马鬃山集结，从西南方面进攻。

我军投入这次战斗的兵力为冀察热辽警卫团、四师三十二团和天山支队，总兵力近三千人，其中骑兵一千多人。指挥部设在查布杆庙附近，蒙汉联军参谋长阿民布和、蒙汉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刘昌同志带一连人驻在这里，天山支队守在庙东南；警卫团火力封锁前沿开阔地。12月15日凌晨，敌进抵天山南山，但不敢再向前进。为了把敌人引进我军火力控制区，刘昌同志命令三十二团和四师直属连，向黄羊洼一带敌后迂回。敌人见我军运动，约下午3时向山下冲来。我警卫团由于缺乏与骑兵部队的作战经验，

急不可耐地冲出阵地，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敌人仓惶逃走，所获不多。

当时，阿民布和、刘昌等同志估计敌人不会甘心，可能会向巴奇楼子庙方向撤去。于是，晚饭后决定乘胜追击。具体部署为：天亮前，把主要火力投放在巴奇楼子庙前开阔的沙窝子里埋伏，其余部队从庙后山进攻。可是，第二日天亮前，步兵没能及时赶到，我们的意图已被敌人发现。我军用炮火轰击大庙附近，敌人不战而逃。逃跑地点和我军设想路线一致，可是应在这里伏击的步兵还在二里之外。

由于敌人损失不大，我军判断他们仍不死心，会到白音他拉的大村滞留，于是又分两路包围这个村庄，次日凌晨发起进攻，大获全胜。从此，这股叛匪和国民党杂牌军逃回开鲁，一直到我军解放开鲁，再未敢有大股进犯之举。1947年2月26日我军一举攻克开鲁，国民党守城部队被我军全部歼灭。国民党骑兵司令李守信化装成商人逃命，额勒登格等被我军生俘。

三十六团的组建及其活动情况

(一)

克旗三十六团是1946年3月成立的,初建时先成立的小分队。

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克旗的进步青年包英昌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各地不仅要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还要建立武装。

1946年1月份,东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乌兰浩特)成立。1946年2月,东蒙古自治政府派出以萨嘎拉扎布为首的东蒙古自治政府工作团,到林东筹建昭乌达省,同年3月,昭乌达省政府成立,省政府成立后,根据东蒙古自治政府的命令,将昭乌达盟警备总队编为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师长是和子章,全师下辖巴林左旗两个团,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扎鲁特旗各一个团,共6个骑兵团,按其编制序列,克旗为三十六团。

包英昌同志参加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回到克旗,便联络了一部分进步青年,如义达嘎苏荣、查干楚伦、巴嘎雅色登等。于1946年3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克什克腾旗支会。支会主任是包英昌,副主任是查干楚伦。

克旗支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建武装,当时支会组织了三个宣传小组,深入基层进行宣传动员,第一组组长包英昌,去巴隆阿鲁;第二组组长巴嘎雅色登,去忠阿鲁;第三组组长温振铎,去西拉沐沦河以南的农区。宣传组边宣传动员,边扩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20多人报名参军,都是20左右岁的青年,其

中蒙古族青年占多数。根据报名人数，接着便就近就地组织小分队，共组织了6个小分队。其中，忠阿鲁两个（白音敖包、白音查干）；巴隆阿鲁两个（白音岸伦、克力更）；农区两个（河南的造福沟、苇莲沟）。这些新战士大多数是背自己的枪，骑自己的马，没有统一服装。

1946年4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热北专署同昭乌达省代表本着“四·三”会议精神，在林西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昭乌达省及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昭乌达省同热北专员公署合并，建立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四师，受热北军分区（二十军分区）指挥。

1946年6月，克旗小分队的战士已发展到200多人，枪120余支。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提高部队战斗力，三十六团团部决定把各小分队集中到经棚街进行组编，正式公布三十六团番号和团、连、排的建制，集中上来后，每人发一套夏装，即灰色仿八路军的服装、朱德帽、灰黄裹腿、胸章是方寸大小的白布，上印“内蒙古自卫军”六个字，集中了十几天，官兵相识，然后，又分别回到原来的驻地。

这次组编后，三十六团的建制是：

团长：宝长寿

副团长：包英昌 清巴图

参谋长：白福海

政治处主任：包英昌（兼）

供给处主任：巴雅尔

副主任：贡楚克

团下设两个连

第一连连长：包英昌（兼）

副连长：清巴图（兼）

贡思革

第二连连长：吉林台

副连长：高占才 代布清

1946年10月，昭盟地区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之要地，处于敌我争夺的严重局面。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策反阴谋，实现昭盟地区蒙汉部队的统一指挥，有利于对骑兵四师的整编和领导，根据冀热辽军区的命令，于同年10月组建了昭乌达盟蒙汉联军司令部。蒙汉联军司令部建立后，对骑兵四师进行了第一次整编，与此相应的，克旗三十六团于1946年12月也进行了一次改编，改编后的建制是：

团 长 包英昌

政 委：查干楚伦

参 谋 长：白 音

政治处主任：李斯胡

供给处主任：巴雅尔

副主任：贡楚克

第一连连长：宝音扎布

指导员：色 楞

第二连连长：都 西

副连长：斯布金巴

每个连下设三个排，各排排长是：

第一连：

第 一 排排长：官 太 龙胜嘎（后升连长）

副排长：色旺扎布

第 二 排排长：嘎 瓦

副排长：宝力朝鲁 刘价

第 三 排排长：白斯古楞

副排长 斯仁道尔吉（后升排长）

第二连三个排的排长未详。

三十六团建立后，由于战事紧张和人员流动性大，连排干部变化也比较频繁，据回忆，曾在三十六团任过连排干部的还有下列人员：

曾任过连级干部者：龙胜嘎 额尔登达来 格日僧扎布 吉雅图 吉林嘎 代布清巴力吉 乌力吉白音 王庆文 朱凌嘎

曾任过排级（或相当于排级）干部的有：

乌力吉道格图 赛胜嘎 巴图吉雅 万德山 嘎勒巴 塔尔乎 巴图 巴图孟克 额尔登尼（白少穆） 贡毕力格 图格木勒 拉拉哈扎布 清格勒 敖口玛扎布 斯仁道尔吉 白玉峰 乌尔他 德木齐格斯愣

克旗三十六团在艰苦的环境下组建起来，在维持社会治安，清除匪患、保卫土改成果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也得到了克旗广大农牧民和各界进步人士以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如，各连驻防地区的农牧民供给其粮食、马匹；1946年冬季，经棚街庆宁寺安庆喇嘛把一箱银大洋（约2000块）资助给三十六团。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蒙绥分局撤到锡林浩特，三十六团团长沙英昌、参谋长白福海带领排长白少穆及三名战士去锡林浩特会见乌兰夫同志。届时，向乌兰夫同志汇报了三十六团的组建及活动情况，请求蒙绥分局支援些武器弹药，这次蒙绥分局给了三十六团一百多支枪和部分子弹，还给了一些砖茶、布匹和粮食。

（二）

二十六团从成立那天起，这支草原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就投入到了紧张、激烈、艰苦的解放战争中。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昭盟地区也

成了敌我争夺的要地，各地形势不断变化，当地土匪活动猖獗，如克旗土匪头子白金辉、鲍玉林、赵三疯子、猴爬杆、高木匠等，他们疯狂地抢劫农村牧区百姓，进犯旗政府驻地经棚，偷袭各区公所，杀害革命干部，破坏土地改革，扰乱社会治安，无恶不做，群众愤恨已极，所以，三十六团的首要任务就是清剿匪徒，维持社会治安。这支人民子弟兵队伍，从她诞生之日起到1949年转战内地，四年中，战事不断，战功卓著。现在将能够记得起名的、比较大的几次战斗简述如下：

一、芝瑞麻绳铺梁战斗。1946年秋季，三十六团侦察到匪首白金辉带领匪徒住在他的家乡克旗芝瑞乡南店村，便与冀热辽军分区（驻地在林西县）联系，军分区决定集中力量围剿白匪。由二十二军分区司令员罗云率领步兵从芝瑞苇莲沟、热北二十军分区副司令员卜云龙率领骑兵从百岔川，由三十六团团长包英昌率领三十六团从广兴源向南店进发，三方合击。这天包英昌、鲍仲三率领的三十六团住在一姓张的地主家里，夜里，鲍仲三叫姓张的偷偷出村，给白金辉送了信。姓张的第二天早晨回村时，被我军岗哨查获，从姓张的身上搜出了白金辉写给鲍仲三的回信，经盘问，姓张的也承认了是鲍仲三叫他去给白金辉送信。

我军知道走漏了消息、决定提前行动，但前头部队赶到白金辉家，却扑了空，白金辉带领匪徒已上了前梁。前梁山高坡陡，这时天又下了一场大雾，不利于作战，我军不得已而停止了追击。回来后把叛徒鲍仲三（克旗旗政府内防队队长）枪毙了。

二、红山子乡黄土坑子战斗。1947年春季，土匪头子高木匠在广兴源抢掠财物，为害群众，团长包英昌率领67名战士赶去广兴源剿匪，匪首高木匠听到包团长来了，便向红山子乡方向逃窜，包团长率领战士在后面跟踪。高匪知道没有甩掉包团长他们，又从红山子蹿回来，佯装再回广兴源，包团长发现后，又回头

跟踪，可是高匪没去广兴源，而是又回兵小克头。包团长他们又向小克头追击，追到小克头村黄土坑子，敌我距离越来越近，三十六团和高匪才接了火。由于双方都已疲劳，战斗时间不算长，土匪不抵，过梁向西逃去，三十六团战士大部分是蒙古族，对此地不熟，因此，就没再继续追击。这次战斗，三十六团牺牲一名副排长（宝劳楚伦），打死土匪2名。

三、三义乡皮房子战斗。1947年春，三十六团团部调驻防在忠阿鲁（白音查干苏木）二连的部分战士到太力井子（现属于三义乡）剿匪。有一天，部队派几名战士去此地的皮房子、四里本营子催草。计划先去皮房子，后去四里本，却不知皮房子已住上了土匪。去催草的战士将要进营子时发现了土匪岗哨，放哨的土匪也发现了三十六团的战士，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生了战斗。战斗结束后听老乡说，这股土匪有30人左右，土匪头子是高木匠、王皮匠、王大爪子、赵大嘴、朋连星、林长生等。这次战斗虽敌多我寡，但由于战士打得勇猛顽强而取得了胜利，打死2名土匪，活捉了一名土匪。

四、好鲁库、元宝山一带剿匪。在三十六团及其他兄弟部队的严厉打击下，土匪白金辉、“猴爬杆”、鲍三疯子（名鲍玉林）等，在芝瑞、广兴源、红山子等地已无立足之地，便携其家眷逃到了好鲁库、元宝山一带。此处沙漠茫茫，灌木茂密，易于隐蔽。三十七团为了彻底消灭这几股土匪，于1947年3、4月间，与骑兵三团、县支队配合，开到好鲁库、元宝山一带。但由于地形复杂，土匪在暗处，我军在明处，因此，这次剿匪时间较长，奋战了近两个月，最后，白匪弃眷逃出了沙窝子，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内。接着，我们把居住沙窝子里的人家，包括土匪丢弃的家属，统统迁到其他地方，断决了土匪回窜之念。

五、土匪火烧大王庙学校。1947年5月间，匪首白金辉带着匪徒窜入西沙窝子，沿克力更向大王庙偷袭。三十六团得知这一情

报后，一面部署兵力设防，一面派人给驻在经棚街的黄大队送信，请求黄大队增援。黄大队接到报告，立即集合部队向达尔罕进军。部队开到沙里河，与三十六团会合，此时，白金辉已到了达尔罕，袭击大王庙，用火将大王庙学校烧着。我军急行军，赶至大王庙立即投入战斗。土匪见我军来势勇猛，仓惶逃窜。我军把火扑灭，保住了学校，未受大的损失。

六、亮子河战斗。1947年6月，三十六团奉命给昭、锡盟追剿布里亚特匪帮部队当先头部队。3日早晨团政委查干楚伦得到情报：土匪鲍三疯子、乌日他等在巴隆阿鲁努图克西边位于好来河河边的好来河营子开会。企图把这一地方的牧民迁至锡盟正兰旗境内。三十六团团部研究决定，坚决消灭土匪，粉碎土匪阴谋。于是，查干楚伦率领一个连，奔袭好来河，在甘珠敖包将土匪包围。战士们向土匪猛烈射击，排长贡毕力格在马上用掷弹筒向匪群直接炮击。好来河一战，打得迅速，也很痛快。俘虏了许凤等6名土匪，打死了仁钦好日劳等16名土匪，其余土匪冲出包围，向正兰旗逃去。

三十六团在好来河打了胜仗，沿着达里湖南岸往东走，准备返回驻地，在返回时，查政委命令乘马弱的战士先走。其余部队殿后。殿后部队走到亮子河（在大王庙西相距三十华里），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这时人累马乏，决定在此打尖。部队放出岗哨，开始生火做饭，正当部队吃饭时，岗哨回来报告，发现山梁上有土匪，查政委知道早晨被打败的土匪又反扑回来了。便组织部队准备迅速离开，可是已来不及了，回来的土匪正是乌日他及布里亚特匪帮，大约有200多敌人。从西、南、东三面包围了三十六团，土匪用四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向部队扫射，在此严重的情况下，查政委把部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英勇反击，一部分向外突围，战斗一直打到天黑，经过英勇奋战，趁夜幕，利用空隙，查政委和约一个排的战士突围出来。但是连指导员斯楞、旗

公安侦察员扎斯来及10名战士壮烈牺牲。其余战士被俘。

有的战士突围出来后，直奔三十六团驻地大王庙送信。到驻地一看，这里已无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向经棚街跑去，当跑到关地一带时，碰上从冀察热辽军区调来克旗剿匪的前卫部队——骑兵天山支队（此次调来克旗剿匪的部队有：二十军分区的骑兵独立团、骑兵阿旗天山支队、蒙汉联军第四师的三十二团、三十四团，还有经棚县支队骑兵连）。前卫部队知道三十六团被土匪包围的情况后，急行军赶到大王庙。不久，查政委率领突围出来的战士也回到了大王庙。前卫部队首长根据亮子河战斗的情况，认为，三十六团不能再参加这次剿匪追击战了，于是决定留下来进行休整。

昭、锡盟联合剿匪部队全部到达大王庙后，第二天立即向额仁钦道尔吉匪帮进袭。敌人占据托力庙南的沙丘制高点，用两挺重机枪连续扫射部队，同时，把给剿匪部队运粮的一百余匹驮马全部赶跑，三十二团的战士紧追不舍，只用两颗八二迫击炮弹就摧毁了敌人重机枪阵地，一个骑兵连冲上北山，去堵击敌人的退路，骑兵独立团及天山支队也冲向敌人，占据了沙丘。敌人见势不妙，丢下几具尸体，仓惶逃走。我三个骑兵团尾追敌人进入大王庙西部的大沙漠中。其他剿匪部队也开始行动，从此拉开了剿灭额仁钦道尔吉匪帮的战斗序幕。

（三）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为了有力地支援辽沈决战，全歼辽沈战役漏网逃窜之敌，内蒙军区命令，昭乌达盟蒙汉联军骑兵第四师与卓索图盟纵队合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师。三十六团也随之改编，取消了原团番号。1949年6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十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三师。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原三十六团的部分指战员随着大部队

的改编，转战各地，加入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行列。

(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参考資料：

1. 孟宪成《克旗三十六团始末》
2. 《巴林左旗党史资料》第二集
3. 巴嘎雅色登《额仁钦道尔吉匪帮复天记》

三十七团及洪富升格叛变

扎鲁特旗政协文史办

1946年2月，东蒙自治政府派出以萨嘎拉扎布为首的工作团来昭乌达盟，组建昭乌达省。3月中旬，将昭乌达盟警备总队改编为东蒙古骑兵第四师，扎鲁特旗的自卫队被编为三十七团。

三十七团的组建过程也和四师的其他几个团一样，产生于1945年苏蒙红军出兵东北以后。当时，扎鲁特旗出现两个人物：一个叫洪富升格，是伪满时期的警务科长，与原日伪时期军、警、宪、特及民族上层人物有广泛的联系，是地方上的实力派。与苏蒙军表示友好。苏军撤退后，有两个掉队士兵，其中一个被土匪杀死，他把另一个保护在家里达数月之久。1946年4、5月份八路军经过时，交给了八路军带走。另一个人物叫萨音巴雅尔，毕业于沈阳农大兽医科，在日伪军队中是中尉军官，在当地民众和进步青年中有一定影响。

苏蒙军队撤离后，东蒙地区根据自治运动领导人的指示建立临时政权和地方武装，维持社会治安。扎鲁特的守旧势力以洪富升格为首，进步青年以萨音巴雅尔为核心，分别组建了临时政权和武装。不过萨音巴雅尔的势力较小，而他本人又把主要精力用于与外蒙古和八路军的联络上（从1946年初至年底，先后派遣若干青年到林东、林西、左中、巴彦他拉等地学习；又派苏德宝扎布、德力格尔、扎木苏三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络），所以主要

武装力量掌握在洪富升格手里。1946年3月,昭乌达盟警备队改编为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洪富升格的人马与萨音巴雅尔的人马合并,组建为三十七团。洪富升格任团长。此后,洪富升格便以东蒙古自治军三十七团的名义,收容了地主和土匪武装,人数发展到三百多人。这些杂牌武装原来的头目,分别任一、二、三副官、连排长等重要职务。到1946年4月,三十七团的骨干队伍为:

团长:洪富升格

团副:喜吉旺苏漠

色布格道尔吉

古木彦(原土匪)

副官:扎木萨

锡里德格都

团本部副:白秀峰

以上为团部。团以下设四个连:

一连长:僧格嘎日布(洪团长之弟)

二连长:巴吐巴雅尔

三连长:莫 龙

四连长:宝音陶吐格(匪号二虎)

1946年“四·三”会议以后,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旗县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萨音巴雅尔任扎鲁特旗支会主任。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郑家屯,9、10月份先后占领通辽、开鲁、赤峰,并加紧对解放区的民族宗教上层、地方武装策反,加剧了三十七团内部的政治分化。同年5月18日,四连三排排长何文宝叛变,投降国民党。8月14日,三连副连长冬日布以去三区收缴一部分不听指挥的地主武装枪支名义,与这部分武装合起来叛变,抢走了三连(包括原萨音巴雅尔部下)的全部枪马。

东日布叛变后，洪富升格以打东日布为名带着队伍跟在后边，但一直到东日布走出旗界，一枪也没打。后来人们才省悟过来，这实际是护送。而东日布不过是他派往国民党军的联络员。经过东日布与开鲁的国民党李守信联系，洪富升格不久也带领部分人马叛变出走。此事发生在1946年10月。先后叛变的计有宝音陶吐格、占米彦、端如布、巴图巴雅尔等约五六百人。

洪富升格叛变时，萨音巴雅尔已将王爷、活佛等民族宗教上层控制在西王府（白音宝力高），因此洪富升格的叛变并未造成更大的动荡。

洪富升格叛变前，内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已下令免除洪富升格的团长职务，任命布仁巴雅尔同志为二十七团团长，任命萨音巴雅尔同志为该团政委。布仁巴雅尔到任后，与萨音巴雅尔首先在鲁北缴了洪富升格一连人的武装，之后又在德博勒庙，取得三十五团团团长嘎达苏的协助，收缴了一连人的武装。并带领一连人把团部移到梅林庙。洪富升格叛变时，他的弟弟僧格嘎日布正在梅林庙任团参谋长，洪走后他也带上3个人追随而去。

三十七团在以洪富升格为首的一伙人叛变以后，人数虽然少了，但是留下来的都是决心跟共产党走的坚定战士，战斗力却增强了。这些人经过整顿，又扩充了新兵。僧格嘎日布走时，正是布仁巴雅尔、萨音巴雅尔忙于扩兵时期。这次扩兵工作建立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之上，他们号召基本群众推举出身好处世正派的青年入伍，并以立场坚定的分子为骨干，重建了部队。重建后的部队号称一个团，实际150人左右。在团长政委以下，任命阿民萨和其为政治处主任，莫龙、色布格道尔吉、布和特木尔、巴雅尔忙烈等人为团部工作人员。下设一个连：

连长：毕力根达来

指导员：玛尔苏盖

副连长：宝音阿尔宾（额日思）

司务长：乌力吉图

连以下设三个排，每排约40人。

一排排长：桑杰扎布

副排长：那森乌尔图

二排排长：沙格德巴

副排长：布仁特古斯

三排排长：敖力布

副排长：巴拉吉尼玛

不久从林西教导队学习归来的五六名学员，也充实到连队。

部队经过整顿和重建，组织纪律增强了，他们学习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每到一个村庄，都听连排长安排食宿，不准打骂老百姓，不准调戏妇女，不准要老百姓东西。还给老百姓担水、扫院子，自己动手铡草喂马，从不和老百姓争吵，因此深受群众欢迎。

当时，部队生活很艰苦，衣着不统一，不整齐，而且很单薄。有的人没有帽子，就找块破羊皮，上马当帽子，下马当垫子。即使这样艰苦没一个人动摇，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令行禁止。

1946年11月，面临国民党势力逼近扎鲁特旗，固守梅林庙，把守扎旗南大门的战略已经没有意义。三十七团决定在扎鲁特旗内打游击，打击小股敌人，维持社会治安和宣传群众，团结争取群众。

1946年冬，三十七团鉴于严冬部队统一行动不便，决定将部队分成两部分，将其中的人强马壮，衣着较好的100多人组织成前线连队；另有30多马弱衣单的指战员，由色布格道尔吉、布和巴特尔、巴雅尔忙烈带队，撤到义旦扎拉嘎西王府、板子庙，作为后防部队。

10月上旬，一名喇嘛在梅林庙搞叛变活动予以枪毙，继而前线部队从梅林庙出发，计划配合阿鲁科尔沁旗的三十五团在扎鲁

特旗南部，开鲁以西、以北地域剿匪。一天拂晓，部队在阿木其嘎村受到二虎的袭击。在敌众我寡，敌人又占据有利地势情况下，团连干部决定组织若干阻击队，有计划地撤退。当撤到离村十多里的沙色时，政治处主任阿民萨和其同志下马阻击叛匪时不幸被俘。“二虎”亲自劝阿民萨和其投降，说，“你跟共产党有什么好处，连肚子都填不饱，投降吧，给你个团副或副官当。”阿民萨和其轻蔑地说，“我饿死也宁愿跟共产党死，绝不舔国民党的泔水！你们是国民党的走狗，死了就喂狗。我跟共产党，死了也光荣。要杀就杀，让我投降办不到！”1946年农历11月8日※上午，阿民萨和其同志壮烈牺牲，时年26岁。

在这次战斗中，除阿民萨和其牺牲外，还有业仁普勒同志负伤，桑杰扎布同志的战马被打死。

经过简短的战斗总结，部队开往阿鲁科尔沁旗南部地区打击残匪。在塔日巴喇嘛地堡、德博勒庙等地，用残匪的马匹、衣物武装了自己，然后去天山、罕庙一带配合八路军剿匪。当时的阿鲁科尔沁旗，三十五团额勒登格、公安队孙根全都叛变了，剩下的武装力量总共不到100人。旧历年末，三十七团回到扎鲁特旗巨里河、西王府（板子庙）一带。早在1946年10月，中共热河省委组织部就派秦纯一任扎鲁特旗书记，与先期到来的范文彩等同志在巨里河一带活动。三十七团到来后，受秦纯一领导，配合这里的武装搞剿匪。

1947年春节前，以舍布格为首的一股土匪，在西王府劫了旗贸易公司的车，抢了物资。当时三十七团住在保安屯，得到情报，半夜启程。当赶到西沙拉屯东小山包时，土匪发觉了，向西大山逃跑。在追击中，缴获土匪一辆马车，俘获土匪小头目舍布格。从此，土匪不敢明目张胆在这里骚扰。

1947年2月，三十七团接到三十三团副团长斯钦朝格图请求到凤凰山助战的信，三十七团（实际是一个连）日夜兼程赶到凤凰

山时，战斗已经结束，斯钦朝格图同志壮烈牺牲。

1947年2月后，邻近市镇陆续解放。扎鲁特旗政府、旗支会也于3月份从西王庙搬到鲁北，形势明显好转。三十七团于4、5月份进驻鲁北进行整训，正式改为旗大队。布仁巴雅尔同志任大队长，秦纯一同志任政委，赵敬山同志任副大队长，萨音巴雅尔同志任旗长。原连排干部毕力根达来连长、宝音阿尔宾副排长、敖力布排长等同志去内蒙古军政大学学习，其余干部战士全部合并到哲里木盟通辽警卫团炮兵排。随连去的干部有莫龙（任副连长）、巴拉吉尼玛（任副指导员）、桑杰扎布（任排长）等同志。

※注：巴拉吉尼玛同志写作10月10日，根据前后事件判断可能要早些，此文采取都瓦萨的说法。

忆义和他拉战斗

巴拉吉尼玛

1946年9、10月间，三十七团新建的连队驻守梅林庙，守卫扎鲁特旗南大门，以防国民党军的骚扰。不料同年冬季形势急剧变化，通辽、开鲁等邻近城市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军执行战略转移，开赴广大农村。我们连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上级的意图，配合阿旗三十五团剿灭开鲁县城外的国民党军。11月末，我连由布仁巴雅尔团长、萨音巴雅尔政委的率领下，从梅林庙出发南下，到义和他拉庙西北阿木其格村住下。第二天拂晓，却遭到国民党军宝音陶吐格（二虎）的袭击。我连在屯子里抵抗了一阵，由于敌人强占屯子东南的有利地形，我连一为晨光刺眼地形不利，二为避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受损，决定撤出屯子，我连三个排分成三路向屯子西北方向的沙坨子里转移，以备还击。进入沙坨子后，各排选好有利地形，定好“马桩子”徒步还击敌人。不料随阿民萨和其（政治处主任）的一部分人，遇到超我四、五倍敌军的包围，“马桩子”也被敌人隔开。在这十分不利的情况下，阿民萨和其同志亲自指挥十几名战士与敌人激战了半日。最后子弹打光，阿民萨和其同志不幸被俘。

敌首“二虎”早就想要得到阿民萨和其，这次阿被他俘住，真是大喜过望，便亲自为阿解绑，百般劝说阿民萨和其同志投靠国民党，并表示给其高官厚禄，但阿民萨和其同志当场痛斥了敌首“二虎”，还揭穿了“二虎”背叛民族利益、投降国民党的罪

恶活动。敌首“二虎”已觉劝说无效，羞怒之下打死了阿民萨和其同志。

阿民萨和其同志的英勇就义，在扎鲁特旗革命英雄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因此，义和他拉战斗，在扎鲁特旗的历史上也是一次较大的事件。

乌力吉那仁忆在内蒙古民族解放 运动的洪流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年代里，我做为一个为内蒙古民族寻求解放的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和领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积极投身于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我先后参加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确立东西蒙统一的“四·三”会议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五·一”大会，并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内蒙古解放战争中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亲历了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变革。下面就把我参加内蒙古革命运动的经历以及我所了解的一些历史作一概括的回顾。

寻求民族的出路

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参加内蒙古革命运动，有我自己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我的民族背景。这就是我参加革命的起因。为了使蒙古民族从被压迫状态下找到自己解放的道路，我和其他许多蒙古族青年一样，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有过一段为民族寻找出路的艰苦摸索。

我是哲盟库伦旗人。1919年12月生。我少年时祖父在旗里当差，懂一些政治。从我懂事时起，祖父就常给我讲民族问题，着重讲农牧矛盾，因为我们家族在一百年的光景大概搬了三次家。

※本文原为乌力吉那仁的一篇回忆文章，现将作者简历编入，以代人物介绍。

原来住的地方逐渐被开垦。六岁左右开始学蒙文，学了两三年。接着又到汉人村子读私塾二年，汉文也学会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侵占我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日本人对蒙古族采取怀柔政策，也注意抓些教育。我想继续学点知识，十六岁小学毕业，毕业后考取了齐齐哈尔蒙旗师范，上了四年学。1941年又考取了当时设在长春的伪满法政大学。到法政大学后，我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知识也丰富了一些。我学的是经济，开始学习还是比较用功的，也常看些日文和蒙文的有关蒙古民族方面的书籍和资料。那时我的民族观念较强，知道蒙古民族有自己的光荣历史，有自己民族的区域。日本人在东蒙成立了伪兴安省，在西部还有一个蒙疆政府。当时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蒙族青年，普遍都在考虑民族问题，感到日本人统治着内蒙古，蒙古民族过去是那么强大，现在为什么落后了呢？另外，学校里同学之间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我们一个年级仅有四个蒙古族同学，其他都是日本人、朝鲜人和汉族。老师都是日本人。日本人在学校里飞扬跋扈，我们几个蒙古人感到没有地位、处处觉得受气、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到蒙古民族没有出路，处于衰亡和被压迫时期。有时抱头痛哭。那时有个叫佐藤的日本人，写了一部《五十年以后的蒙古》，写道五十年后蒙古民族就灭亡了。蒙古学生们看了以后愤愤不平。到了大学二年级时，自己学的专业、正课就不怎么上了，尽找些课外读物看。自己的民族感情也愈来愈强烈。后来我下了决心退学，不想继续在此受气。当时退学的目的，一是因为知道西边有个蒙古自治政府，不管怎样，它有个“蒙古自治”的名字吧。那时东部也有很多人到那边去，我也准备到西蒙去。二是我有个想法，从地图上看，锡盟距离蒙古人民共和国很近，我们对外蒙有好的印象，它是一个独立国家，是苏联帮助成立的，并且它的经济、文化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所以我想如有机会到锡盟，一定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看看。正好我中学时的

一个蒙文老师吾如根仓，他已到锡盟西苏旗伪蒙军幼年学校当老师，我就写信联系。他回信说这里正需要蒙文教师。这样，1943年初，我就来到西苏旗，在伪蒙军幼年学校当了教师。

可是，我到了那儿一看，那里也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学校的权力由三个日本教官控制着，另外，德王府又有日本特务机关。从地图上看好象离外蒙很近，实际上有好几百公里。日本人有联防，想过去实在不易。这样我就在幼年学校当了文化教员，也无军衔。我承担蒙文、历史、地理三门课。学校有三个日本教官，其余都是伪蒙军军官任教官。学生全是蒙古族子弟。这个学校是个军事学校，是伪蒙军军官学校（在归绥）的预备班的性质。我在幼年学校尽量给孩子们灌输民族感情，曾鼓动学生们揍了一个日本人的走狗——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管理学生的区队长。自己常分析国内国际形势，从二次大战的发展形势看，德、日、意看样子要失败。尤其到了1944年，德意法西斯已投降，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可耻下场。当时，西苏旗还有个女子学校，德王下面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久而久之，我们互相认识了，常聚在一起谈论时事，关心和议论假如日本人完了，内蒙古会怎么样？等问题。1945年，形势对日寇更不利了。一天晚上，我们七个年青人聚集在德王府一个很僻静的小屋，先分析了目前形势，一致认为日本人就要垮台。日本人投降后，我们怎么办？大家一致同意，去找外蒙，应走外蒙的道路，争取内外蒙合并。对德王以后的政治倾向，大家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他会和外蒙联系，有的认为他会投靠国民党。然后讨论决定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成立一个政党。有的人说叫“内蒙古革命青年党”。我们在西苏旗军队和张家口的青年都要分别做当地的工作，开展活动。以后象这样的会议我们又开过几次。我的任务是在幼年学校学生中活动，给学生和一些军官做工作。

会后我想，自己是文化教员，无权，要是有个军衔，工作会

更方便些。但要有军衔当军官，起码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于是我要求受训。1945年7月中旬，我就来到归绥（现呼和浩特）伪蒙军军官学校受训，在那里受训一个月，8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了，伪蒙军整个都乱了，人心都散了。我想，日本完蛋了，内蒙向何处去？“八·一五”解放，日寇投降，在伪蒙军中的日本教官都撤了，就剩下一个伪蒙军司令部了。那些参加训练的人也走完了，只有我和另一个同来的人在学校里打听消息，不知去向，大家都希望赶快撤出归绥，还听说傅作义要来接管包头、归绥。8月20日前后，八路军攻过一次归绥城。当时我后悔不该离开幼年学校到此受训，如不来，早和苏蒙军接触上了。8月25日左右，国民党军队进城了，伪蒙军司令部和军校下令不许乱走。一天我在校本部遇到了一个叫沙格都尔苏荣的人，他是伪蒙军司令部的中校，过去在我老师的弟弟家相遇结识了。他说他已从国民党军队里弄到一个护照，可以出城。出城后他准备回他的家乡十二苏木去，并答应可以把我带出城去。这样，我们出了归绥城，往东走，一直到十二苏木沙格都尔苏荣家。我们听说西苏旗让苏蒙军解放以后，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政府。又听说幼年学校的学生举行了暴动，打死了日本教官。听到这些消息，我非常高兴，并急着要回西苏旗去。当时伪蒙军第七师、第九师都在商都，苏蒙军把他们缴了械。沙格都尔苏荣的父亲——第七师师长达木丁苏荣也在商都，他从商都回到十二苏木一趟，说幼年学校有一部分学生在商都，蒙古军准备用汽车把这些学生送回西苏旗去，正好路过十二苏木，于是我便搭上这辆汽车回到了西苏旗。

回来后的当天晚上，我就急于了解有关成立政府、青年党的事。我找到了布仁赛音，他给我介绍了这些情况。苏蒙军一进来，布仁赛音、德力格尔朝格图、胡尔钦比力格等人，在德王府，当着苏蒙军的面枪毙了三个日本人，诚挚欢迎苏蒙军的到来。之

后，同苏蒙军谈判，提出一些要求，说明他们几年前就成立了内蒙古革命青年党，搞反日活动，要求蒙古军承认这个党，还要求内外蒙合并。苏蒙军代表同意青年党公开活动。关于内外蒙合并，说现在做不到，你们自己应有个政府。这样，青年党就公开了，他们还搞了个青年党名册，吸收一些人入党，并提到青年党的名册上把我的名字也列进去了，还被选入执行委员会。我当时听说后，对此也挺满意。此外，他们还和苏蒙军商议，苏蒙军同意他们成立政府。青年党公开后，就派一些人坐着苏蒙军的汽车到乌盟、锡盟、察盟进行宣传，宣传要在西苏旗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要求这些盟派代表来，成立政府。他们从这些地方拉来一些人，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政府。政府主席是补英达赉，副主席达木丁苏荣，下设内政部、宣传部、经济部、军事部、外交部、交通部和一个秘书处。经济部部长是吉尔格楞，交通部部长是莫格登布，军事兼外交部长是乌力吉敖喜尔，布仁赛音是宣传部副部长，胡尔钦比力格是内政部副部长。青年党的负责人是德力格朝格图。布仁赛音就给我介绍了这些情况。原来蒙古来了个副总理，叫拉木扎布，他说，现在你们也不能提内外蒙合并，因为有一个国际问题，你们自己想有主权，干脆你们就成立一个独立国。这样，人民代表会议后，就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我在此间也见到了拉木扎布。同时，还起草了一个“独立宣言”，准备把宣言拿到乌兰巴托去，向全世界宣布。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派代表团去乌兰巴托，同外蒙谈判，并请求帮助。我回到西苏旗的第三天，临时政府就派乌力吉敖喜尔、布仁赛音、吉尔格楞、莫格登布等五人代表团到蒙古去了。当时，我还听到，伪蒙军大部分被国民党改编了，德王也跑到北平去了。在西苏旗幼年学校，以绍日格图为首的学生在苏蒙军宣战时暴动了，打死三个日本教官和一个伪蒙军教官，然后去找苏蒙军联系。不久，蒙古军与国内联系，决定

送幼年学校这些学生到蒙古去学习。9月15日以后的一天，学生们坐着两辆卡车，去了蒙古。当时我和蒙古军劳布仓商量去蒙古，他说，内蒙的革命还需要人的，你们不能都去，于是我就留下了。

五人代表团走后，我心里很着急，内蒙的事情究竟怎么办？内蒙的前途是什么样的？这一直是我考虑的问题，过了十几天，蒙古军方面告诉我们，说代表团很快就会回来；关于内蒙的事情，外蒙可能不插手了，你们政府的事以后就交给中国共产党。另外还说，八路军、共产党可能派代表来和你们联系。于是，我们就等待着八路军代表的到来。

蒙古民族长期以来遭受了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有多少仁人志士为民族的解放奋斗过。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我想，蒙古民族遇到了一个好时机。蒙古人民有三个共同的愿望：争取民族统一，争取民族解放和希望民族发展进步。这三个愿望是长期以来就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这种愿望更有保证了。所以，内蒙古西部出来个“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东部出来个“东蒙自治政府”，是有其社会历史根源的。最后，在党的领导下，蒙古民族寻求统一解放和发展进步的愿望，通过党领导的自治运动的发展，终于得以实现了。

从“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我们在西苏旗等待着消息，不几天，蒙古军告诉我们，八路军派的两个代表来了。临时政府的宣传部长汪宗洛作为代表与两名八路军代表谈判，我也参加了。他们提出让临时政府再派代表到张北去和八路军联系。这样，汪宗洛等人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

张北去了。剩下的人继续等待。

不久，蒙古军的代表又告诉我们，说张北代表要回来，并说有个绥蒙政府主席乌兰夫要来。几天后，张北代表回来了。接着，乌兰夫他们也来了。他们乘一辆汽车，约十几个人，说是从延安来的。那时我不是谈判代表。一天，我自己来到他们的住处，他们坐了一大炕，有乌兰夫、奎璧、克力更、黄静涛、陈炳宇、李新民等。他们给我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讲中国革命和内蒙古革命的关系。还介绍他们这些蒙古人是怎么为内蒙古民族解放奋斗的，怎么去延安的。我问内蒙的问题怎么办？是独立还是自治？蒙汉关系怎么办？他们逐一向我做了解答。他们回答了许多问题，当时我对党还缺乏深刻了解，所以有的东西我接受了，有的还有点疑问。这是我头一次和乌兰夫等同志接触谈话。乌兰夫同志对其他青年也做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使我们逐渐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正确的认识。起码一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蒙古一样，也都是共产党。在中国，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蒙古民族才能找到自己解放的道路。后来，乌兰夫他们提出一个方案来，说你们这个政府也是为蒙古民族的政府，我们这些从延安来的人也为蒙古民族奋斗二十多年啦，咱们合起来搞吧。一个问题是，临时政府中，尤其是政府头头补英达赉是蒙奸，八路军在张家口还通缉他呢。乌兰夫提出要重新选举政府主席。我们都表示不同意让补英达赉当主席了，然后我们合在一起，每人一张纸条，写完后当场检票，结果就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选举后，乌兰夫说政府成员、各部部长也要改组。我记得奎璧当了内政部长，克力更是宣传部长。这时已是十月中旬了，苏蒙也要撤军了，乌兰夫进一步提出，要把临时政府迁到张北去，让我们都去张北，然后乌兰夫同志就先回张家口去了。不久，我们政府人员都到了张北。后来去张北的人又逐渐到了张家口。

到了张家口，乌兰夫同志讲过一次话，批判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和青年革命党。他说这个政府的成立是不合法的，弄了一个伪蒙疆官僚补英达赉当主席。另外青年革命党的头头德力格朝克图，这个人过去参加过日本的“铁血团”反动组织（现在证实德未参加此组织）。所以这个政府、这个党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是行不通的。我们今后要为内蒙民族的彻底解放，发动群众，从头做起。但乌兰夫同志并没有说整个临时政府的性质是反动的。现在看来，关于这个临时政府和青年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是应该做出正确的历史的评价的。

在张家口，我常到乌兰夫同志家去。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再成立一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又作了一次报告，说准备成立一个“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他讲自治运动联合会既是一个群众组织，又是一个行政组织，它领导内蒙古人民搞自治运动。首先要发动蒙古民众。对于王公，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我们也要团结他。他还讲，内蒙古革命要想离开中国革命，单独地取得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形势好时，内蒙的革命形势才能好起来，内蒙才能得到解放。乌兰夫同志讲的道理我们听了都很赞成。这样，我们就在张家口搞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筹备工作。筹备时成立了一个联合会章程起草小组，克力更是组长，我也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联合会成立之前，许多人都聚集到张家口来了。有延安来的，西苏旗来的，还有原张家口伪蒙疆政府剩下的一些蒙古人，特别是学生很多，后来也有从归绥跑来的学生，原来临时政府去蒙古的代表返回也到了张家口，当时凡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都受欢迎。联合会成立时名曰内蒙古各盟旗代表会议，实际没有到各盟旗去招代表，就是聚集到张家口这些人，谁的原籍是哪个盟、旗，就做为哪个盟旗的代表。

1945年11月下旬，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乌兰夫同志做了报告，晋察冀中央局代表刘澜涛同志讲了话，成

仿吾同志也讲了话。联合会还有一本会刊，当时的会议情况都登在会刊上。当时的文件翻译和大会的蒙文翻译，均由我和另外两个人承担。大会选举了联合会执委会，我被选为联合会执委会执委、常委，一共十一个常委。十二月，成立了联合会的组织机构，乌兰夫任主席兼军事部长，刘春是秘书长，奎璧是组织部长，克力更是宣传部长，刘景平是秘书处。

联合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办教育，要成立一个军政学院，新来的都让入学。由齐永存同志负责筹备这个军政学院。

联合会成立前后，东蒙从乌兰浩特派来一个代表到张家口联系，代表叫包玉昆。他介绍了东边的情况和要求，总的要求东西蒙统一，联合起来，乌兰夫等同志研究了今后的工作，提出联合会活动要尽量在全内蒙范围内开展，决定组织一个东蒙工作团到东部去开展自治运动。工作团团长是刘春，副团长是克力更、包彦，成员有孔飞、乌兰、赛西阿勒图、清格勒图等，我也参加了。

同年12月下旬，东蒙工作团出发了，从张家口坐火车到怀来，然后徒步按八路军交通线走，抵承德。时承德已解放，冀热辽中央分局在承德，程子华同志，李运昌，段苏全等同志，也在那里。我们工作团是想从承德到赤峰，然后到乌兰浩特去。热河省委派两辆汽车送我们到赤峰，那时赤峰也解放了。走到围场时，听到前面有大股土匪，不能前进。代表团多数成员又返回承德。只有包玉昆，我和包音昌三人想继续走，坐马车到了赤峰。过了几天，刘春、包彦他们也到了赤峰，但他们的意见还是看看情况再走，同意我们先走，并给我写了一个介绍信，以便同哈丰阿他们联系。当时，我想抓紧了解一下东蒙的情况。我和包玉昆从赤峰到林东，当时林东和子章部队正和林西王逸伦等领导的八路军对峙，由于包玉昆同和子章熟悉，因此我们还有个任务是做和子章的工作，不让他再跟八路军搞磨擦了。包玉昆做了这个工作。

过了八、九天，我们到了乌兰浩特。

我跟哈丰阿等联系并认识了。但我只是先通个气，并不是谈判代表。在我到乌兰浩特二、三天后，东蒙自治政府召开成立大会，还把我请去当来宾。二十多天后，克力更、包彦到了，刘春没到。克力更他们就与东蒙自治政府商量，达成一个协议：东西蒙代表要在赤峰会谈。乌兰夫等从张家口、东蒙自治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代表从乌兰浩特到赤峰。克力更、包彦和我就同东蒙去的代表一起往赤峰赶。东蒙去的有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义达嘎苏荣、包玉昆、白云航。先坐火车从乌兰浩特到白城子，白城子有西满分局和八路军。当时陶铸同志正在那，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后他从白城子派专车送我们。这列专车是一个机车头，一节车厢，没煤只烧木柴，到郑家屯。不久前，八路军同国民党军队在法库打了一仗，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美制汽车六十多辆。在郑家屯又给我们派了两辆汽车，路过通辽、开鲁、林东、到赤峰。到赤峰后，会谈计划的地点又改为承德了。这样，3月20日左右我们到了承德，此时乌兰夫同志已到了。著名的“四·三”会议就在承德举行了。

我参加了“四·三”会议，但预备会期间我没有直接参加东西蒙正式谈判。实际主要是乌兰夫、刘春，与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他们谈的，每天在乌兰夫同志住的地方谈。预备会议成功后，举行了正式仪式，全体人员还合影留念。“四·三”会议通过了决议，内容有取消内人党，取消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哈丰阿当选为总分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军改番号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在东蒙各盟旗也大力开展自治运动，成立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各级组织机构等。在会议期间，哈丰阿同志和特木尔巴根同志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会议期间，他们可能有些争端，但争论场面我没见过。“四·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

“四·三”会后，我到昭乌达盟工作。5月，任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主任，同年7月兼任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政委。

参加“五·一”大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

1946年12月，正是内蒙古解放区开展自卫战争的时候。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我们从赤峰、张家口撤退的人，有很多来到了林东，从锡盟撤退的同志也来了不少。我们在昭盟刚剿匪归来几天，1947年1月，乌兰夫、王再天等同志就从锡盟贝子庙来到了林东。他们联合会总部是先从张家口撤到贝子庙，由贝子庙来到林东的。然后就准备到乌兰浩特去，召开内蒙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

乌兰夫同志在林东作过一次报告，着重谈形势，他作报告时我来当蒙文翻译（直到“五·一”大会我都给他当翻译）。他回顾了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并说面对国民党的进攻，我们要把自卫战争进行下去；另外，在这时他提出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再一个内容就讲根据形势的发展，要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他提出“成吉思汗的子孙团结起来”，我理解，日本投降后无论东蒙西蒙，要求自治的愿望都很强烈，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正是当时蒙古民族的迫切愿望。在这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发动蒙古民族各阶层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乌兰夫同志在林东呆了十多天就准备去乌兰浩特，并让我也同去，让昭盟和子章、萨嘎拉扎布两人也去乌兰浩特，这样，有利于昭盟的工作。1947年1月，我们分乘两辆汽车，从林东出发，到白城子，然后乘火车到乌兰浩特。沿途有四师和一师的部队保卫。到达乌兰浩特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还鸣放礼炮十三响，仪式十分隆重。

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同1947年国内局势的发展有直接关系。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一年多，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四·三”会议后东西蒙都统一在联合会的旗帜下了。内蒙古解放区各族军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东北和内蒙古东部自卫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所以内蒙古自治政府具备了成立的条件。乌兰夫同志把西边一部分封建上层也带到乌兰浩特去，目的是把上层人物也团结在自治政府的旗帜下，组成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到乌兰浩特后，乌兰夫、刘春等一些同志就去哈尔滨向东北局请示汇报工作。回来以后，就通知内蒙各盟派代表来，召开内蒙人民代表会议。1947年2、3、4月是召集代表的时间，也是自治政府成立的酝酿阶段。各盟代表有的骑马，有的骑骆驼，有的坐车，都向乌兰浩特集中。那时的乌兰浩特不过是万把人的一个小镇子，到处都住着代表，很热闹。我是作为昭盟代表先来的。代表来了以后，还组织了一段学习，印了一些文件，主要是从《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和自治运动联合会方针政策文件中摘录出来的。学习本身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政策。

在大会筹备过程中，就出现了思想分歧。有些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从昭盟来的人当中暴露的问题看，主要问题就是内蒙的领导权问题，内蒙到底成立什么党？是共产党的领导还是成立人民革命党？提这个观点的昭盟有萨嘎拉扎布。当时我做统战工作，他们的要求，我负责向上反映。萨嘎拉扎布和和子章两人住在一个小旅店，有许多人到他们那里去。我听到一些议论，有些人主张成立人民革命党。有一次萨嘎拉扎布写了篇文章，提出“内蒙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样的？”“内蒙有没有无产阶级？”“内蒙的土地所有制是什么性质的？”等问题。同时说明，内蒙不适应成立共产党。当时党的领导方面一是乌兰夫同志带来一些党员，另外就是原来的兴安省张策、胡昭衡他们组成的东蒙工委（对外

称“西满办事处”）。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代表资格的审查。这样，有些人以代表名义召来的，但经过审查没有让他们当正式代表。如昭盟的和子章和萨嘎拉扎布，叫他们做为列席代表。代表名额确定以后，有关选举的舆论就出来了。当时党内给我们传达过，说有些人搞拉选票的活动。但当时我们党已把青年掌握过来了。那时乌兰浩特周围以及大会的保卫工作还是靠这些青年，特别是掌握部队的革命同志，主要是一师。当时一师的主要负责人是王海山、胡昭衡、都固尔扎布他们。由于党在兴安省的工作，当时部队中都派了团政委、指导员等。那些革命青年确实听党的话，起了重要作用。会后，大家反映强烈，并把一个叫张尼玛的抓了起来。

“五·一”大会以后，我回到昭盟在军队工作。1947年7月，内蒙党委成立了，党领导内蒙各族人民把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引向了深入。内蒙军区也成立了，1948年，内蒙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

1948年6月，我到哈尔滨参加了内蒙古干部会议。因为当时东北局在哈尔滨，这次会议内蒙党委、内蒙自治政府、军区的领导都去了。会开了一个多月，会议要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总结“五·一”大会上两种思想认识的斗争情况。会上产生的主要文件就是高岗那个讲话。林彪在会上也讲了一次话。另外，这次会议决定，要在乌兰浩特办内蒙党校，昭盟的部队和卓盟纵队合并，部队番号为第十师。这个问题我曾个别向乌兰夫同志请示过。这样，部队的力量得到了加强。昭盟部队主要是三十二团，卓盟纵队实际上也是一个团。我向乌兰夫同志请示，等部队改编完了，要求入党校学习，乌兰夫同志同意了。1948年8月，我和义达嘎苏荣二人从哈尔滨返回林东。我在盟委传达了会议精神，讲了要整编部队的一些事情。9月份，孔飞同志从赤峰来，把卓盟纵队调到了林东，着手整编工作。新改编的第十师，由孔飞任司令

员，刘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我继续当政委。

部队改编后，我要求入学，想通过系统的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乌兰浩特来电，让我、义达嘎苏荣都去参加内蒙党校第一期学习。这是1948年10月，党校11月初开学，学习半年。1949年北平解放后，北京蒙藏学校的一些蒙族青年来到乌兰浩特，让他们到内蒙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这样，我在党校还没毕业，同年5月就抽我到军政干校去工作，同时抽去的还有孙殿忠、阿民、德力格尔玛，那木苏来等同志。军政干校专门训练连、排级干部，分一大队、二大队。我负责一大队工作，任政委，同时担任学校政治部副主任。我在学校工作了三个月，一大队毕业了。接着上级就命令我到内蒙军区骑四师去工作。

在 骑 四 师

1949年8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这时，内蒙骑兵总共编为五个师。除了原来一、二师外，原十师改编为骑三师，原十一支队改编为骑四师，原十六师改编为骑五师。一、二、三师驻防东部，四、五师驻防西部。8月，上级命令我和旺丹到骑四师，我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旺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当时这还是东北军区林彪签属的一道命令。我从军政干部学校带来40多人到骑四师。我们乘火车路过北京到了集宁。那时奎璧同志在集宁，他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当时集宁以西仍是傅作义、董其武部队，双方有协议，处于停战状态，有时也有磨擦。我们骑四师驻在四子王旗满都拉庙，四师师长兼政委是比力格巴特尔同志，他派人把我们接到师部。

1949年10月1日，我们从部队电台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我们在偏远地区，也没有收音机，报纸是一个多月从集宁、商都转来一大包。但部队的士气还是很好的。我们来之前，在内蒙军区开过一次军事干部会议，会议总

总结了内蒙古骑兵的改造经过和经验,要求部队继续贯彻“编训打”、“打训编”的方针,继续进行部队改造。我们就是带着这些任务来的,决定对骑四师进一步改造训练,以提高部队战斗素质。

1949年9月,绥远省委在丰镇举行了会议,通知我们参加,我和旺丹参加了省委的扩大会议。会上,苏谦益、高克林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同傅作义谈话的精神,要让绥远省国民党军队和平起义,傅作义答应了。他不久就到绥远地区,做其部下的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团结一致,争取进步”;“地方解放区化,军队解放军化”。就是让起义地区变成解放区,起义人员变为解放军。做起义地区政府、军队的工作,感化教育起义人员,让我们做这个工作,任务很艰巨。另一方面,我们的部队还要警惕他们捣乱。那时四师在乌盟地区搞防备,五师过河到伊盟。我们接受了任务,返回部队。在这一阶段,四师主要是继续做整训工作。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国民党官兵宣布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在四子王旗满都拉庙,还有一段插曲。一天,忽然从乌盟来了一个骑骆驼的人,说找师长比力格巴特尔。这个人原来是德王、李守信手下的。他们不是在西边也成立了个“自治政府”吗?当国民党大势已去时,他们就往西北逃跑,一直撤到额济纳旗那边。过去跟我们在哲、昭盟打过仗的一些叛匪,如塔拉巴、苏和巴特尔的武装,都跑到西边德王这里来了。当时巴林右旗有个叫韩桑杰的也叛变了。德王和李守信过境到了蒙古,剩下他们一些就留在国内了,蒙古也不让他们进去。这样,他们就困在了西北,东边来的人又都想家,于是又派人来找出路,打听投降事宜。我们请示了绥远省委和内蒙军区,回电同意让他们投降,但要交枪,然后予以免罪,遣返他们。这个人便回去了,一直到1950年3、4月份,他们当中有的在宁夏一带起义;有的则到这边投降。我和旺丹就带着两个连到了百灵庙。1950年4月,他们约一百多人来到了百灵庙,我们立即把他们缴了械,然后遣散了这批德王的残余

匪帮。

绥远“九·一九”起义以后，1950年1月，乌兰夫同志到绥远，傅作义也来了。当时绥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都进驻呼和浩特了。这时我们部队已进驻乌兰花了。乌兰夫同志就把我们四师和五师领导叫来，主要是向我们了解情况。乌兰夫同志大概是要和傅作义谈判，就是关于绥远省国民党政权 and 我们的人民政府怎么合并。我们在呼和浩特一个多月，结果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了，主席是傅作义，乌兰夫、高克林、杨植霖、苏谦益等都是副主席。给我们的任务就更明确了，以前进不去的地区，现在和起义方面人员商量好了，四师进驻整个乌盟地区搞防务，五师到伊盟。此外，绥远省还有康建民的一个骑兵师和两个步兵师。那时就提出，乌盟、伊盟成立自治盟。四师进驻乌兰花时，就酝酿成立乌盟政府。内蒙党校第一期毕业的干部派到西部不少。乌盟来了一批，以特布信为首，在乌兰花成立乌盟政府，韩是今也去了。正在这时，起义部队中有一部分叛乱，在呼和浩特打死了我们的干部，并打死了我们派进起义部队中的政工人员。乌兰花鄂友三、乔汉奎的土匪部队也有叛乱的，这样我们部队的任务就是剿灭这股叛匪。叛匪逃往大青山，所以剿叛匪的任务就交给四师了。1950年一年我们就剿匪到河套，沿着狼山一直到大阳庙。

1951年我们进驻昆都仑台。绥远省开始减租减息。乌盟政府迁到了固阳，我们派一、两连去保卫。另外就是镇压反革命，继续剿匪。到1951年8月，我们四师基本上肃清了当地的土匪。到这时，我调离了四师，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内蒙古团委工作。

调地方工作的简单情况是：在内蒙古团委期间，先后任宣传部长、书记。1956年，调往包头钢铁公司任副经理，1965年8月，调往内蒙古经委副主任；1975年5月，任内蒙古蒙语办主任、省区蒙语协作小组副组长；1979年元月，任内蒙计委副主任，到1983年离休。

阿 民 布 和

特木热忆父亲的一生

我父亲阿民布和，1904年生于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敖尔盖营子。祖父都古尔扎布，曾在巴林左翼旗公署当过扎希拉克齐（管旗章京）。

父亲排行老四，在他三岁那年祖母又生了一个女孩，因祖母月子里病故，家里无人照顾父亲兄妹二人，祖父就把他俩一起过继给他无子女的二叔达瓦嘎尔布。达瓦嘎尔布是个牧民，他家离敖尔盖营子二十来里远，就在巴林左旗札萨克贝子庙前的浩雅尔陶老盖营子居住。我父阿民布和十二岁时到乌丹念过一年汉文私塾，后因他叔父双目失明，生活困难而退学回家放牧。蒙文是自学的。十八岁那年他叔父达瓦嘎尔布病故，这样一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他肩上，扶犁种地（那时牧区种漫撒子地）；牵别人牛车去乌珠穆沁盐泡子运盐，上哈日干台山采伐木材等等。青少年时期的这些经历，使他了解了社会，磨炼了意志，为后来的事业奠定了生活基础。

父亲二十四岁那年，经他三哥清卓里克图（和子章）介绍到巴林左旗公署当了几年文书。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后在林西招兵，当时巴林左旗被召去了一百多人，其中就有我父亲。这些人编成一个连，因我父亲懂一些蒙、汉文，当时就让他当上了上尉连长，后来我父亲大部分时间在王爷庙（乌兰浩特）教导队、开鲁国高等处当教官。因为他没受过日本的教育，又不

懂日文，加上有民族情绪对日本人不满意，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十几年中只升了一级，当过一段有职无权的少校。他经过亲身体会和亲眼看到日寇的所作所为，逐渐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径，并渴望民族解放，向往苏联十月革命和外蒙人民革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苏联红军远东情报机构取得秘密联系。从此，连续好几年给苏军提供日伪军的情报。对反法西斯战争，对苏联红军1945年8月出兵东北打垮日本关东军作出了贡献。这一阶段父亲已受日本人的怀疑，因此控制他，既不重用也不轻易放他回乡。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打进东北，我父亲被俘关进沈阳北俘虏营，因过去跟苏联红军有联系，苏军就让他当了俘虏营中蒙族伪军人员的负责人。在这里他更进一步受到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的直接教育，更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策，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1946年1月从沈阳俘虏营出来，到乌兰浩特跟当时的东蒙自治政府的领导人哈丰阿等人取得联系，然后回到昭盟。

承德“四·三”会议后，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由于父亲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觉悟，在当地也享有一定的声望，因此被选为该分会的委员并兼任军事科长。在林东跟我大爷清卓里克图（和子章）一起筹建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进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八路军合作建立蒙汉联军，我父任四师联军的参谋长（我大爷和子章任师长）。

日本投降后，情况复杂，局势很不稳定。日伪时期的上层人物各找出路，思想不一致。日伪军警的枪支弹药失散在各地，土匪作乱，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证。经过兵荒马乱，生产受到破坏，加上国民党到处伸手抢胜利果实，派特务拉拢上层人物，搞各种破坏活动，闹得人心惶惶。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更复杂，共产党八路军的工作队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当地老百姓也不了解党的

政策，因此十分需要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稳定局势，维持局面，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我父阿民布和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欢迎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密切配合党在昭盟地区开展工作，为稳定局势和我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有一次国民党派两个特务来到林东，带来委任状，企图拉拢我大爷和子章，结果特务当场被抓起来，送到联军司令部。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

关于我父亲在日伪时期同苏联红军的关系问题，1946年，在林东向当时的热北地委二十军分区的领导人权星垣、刘昌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通过他们请示了热河省委，为了取得苏联红军的援助，1946年间我父亲曾到蒙古境内同苏联红军联系。如果国民党占领内蒙东部地区的话，就成立阿米道日拉组织，搜集国民党军队的情报，配合八路军打游击。苏联红军答应给予物资援助。他还到乌兰巴托见了吉雅太同志。就这样为革命奔走。1946年12月让我舅舅斯布吉德（戈更夫）再次去跟苏联红军联系，结果对方认为，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昭盟地区已成为中共八路军领导的根据地，以后没有必要再跟苏联红军保持联系，从此我父亲完全断绝了同苏军的关系。

1946年11月，我父亲迎接乌兰夫同志到林东，为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创造条件，这时阿旗塔日巴喇嘛串通国民党发动武装叛乱，我父带兵平叛，稳定了局势。

国民党的政治拉拢没有得逞，就发动军事进攻了。国民党李守信部占领开鲁后又大举进攻昭盟，形势十分危机，我父这时在前线指挥作战，有力地配合了阿旗天山保卫战，粉碎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国民党军事占领的企图没有得逞。昭盟地区成了巩固的根据地，保护了在这几开展革命工作的乌兰夫等领导同志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东北解放战场。

1947年4月乌兰夫同志带我大爷和子章一起前往乌兰浩特。此后我父阿民布和任四师师长。因带兵打仗没能去乌兰浩特参加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会上被选为内蒙政府参议。

在昭盟开展土改运动时，我父带兵剿匪，保卫了土改运动。1947年到锡盟指挥作战消灭了布利亚特仁钦道尔吉匪帮。这些背叛苏联十月革命和蒙古革命流窜到内蒙古为非作歹的匪徒，终于在中国革命胜利时被擒。接着又参加了解放宝昌战役。就这样，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一直过着戎马生活，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48年第四师和卓盟纵队合并成第十师，孔飞同志任师长，我父任副师长。

1948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到乌兰浩特内蒙政府农牧部任牧业处长，投入地方经济建设事业。父亲剿匪时看到仁钦道尔吉匪帮盘踞的锡盟、昭盟交界地区草场好，人烟稀少，正是发展牧业生产的好地方，就向乌兰夫同志提建议，内蒙政府当时派我父亲到锡盟巴音锡勒草原建设牧场。

1949年末，我父亲带着内蒙政府牧业处长职下来建场，当初只有一个大车，七个人，在塔布庙的废墟上自己动手盖起了最初的三间房子，安营扎寨。就这样白手起家，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建立了我区第一所国营牧场——锡盟种畜场（巴音锡勒牧场）。据当年的老职工干部讲，我父亲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大公无私，跟群众同甘共苦，对农牧业生产内行，事业心很强。建场后还是离不开自己着手建设的事业，1954由处长改任场长留下来。在党的领导下，跟各族职工干部一起奋斗十七个春秋，把场子发展到十五个分场，近二十万头牲畜，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父始终在第一条战线忘我地战斗和工作，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坚定的站在人民的一边，几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既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又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把个人安危和家庭置之度外，党指向那里就走到那里，从不后退。实践证明他是个忠诚的革命战士。他也要求当一名共产党员，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

现。

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父被调到锡盟政协任驻会委员。1968年春“挖肃”中，他被诬陷为“内人党”、“苏蒙修特务”，被“群专”抓去关了两年，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刑讯。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但我父亲始终没有承认“内人党”、“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胡咬过一个同事，是个硬骨头，因此受的折磨也多，关的时间也长。1970年又被拿到多伦“学习班”继续挨整。由于长期折磨而致残，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最后精神失常，1973年8月含冤死去。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在锡盟为我父平反昭雪，补开了追悼会。

（戈更夫同志曾来同类稿件因内容相近，故选用这一篇）

许少春忆阿民布和在开鲁二高

阿民布和于1941年到1942年任兴安西省立开鲁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少校衙军事教官。当时我正在该校读书，伪满时期日伪统治者为了推行他的奴化教育，从中学开始就增设了军事训练课使学生仿效军人的作风和制度。如，学生必须绝对服从老师的领导；下年级同学还必须服从上年级同学。等级观念相当严格。

阿民布和教官到学校以后，表现上给学生的印象是：坚毅、严肃，不易接近，十足军人作风。经过一段军训和相处以后，我们发现他在严肃中含有慈祥感。他从不责打和训斥学生，从来不和一些日人老师鬼混。我们看得出，他的内心是存在着对日伪统治者不满情绪的。有时甚至还有所流露和表现。

那时在开鲁，我们亲眼见到警察横行霸道，打骂群众，学生

对此甚为不满。开鲁二高的校舍在东门外，宿舍在东门里，每天都要经过几次东门。当时在东门警察设岗，盘查过路群众，并有时无故打骂群众。学生经东门都是站队通过，但有时学生在单独经过东门的时候，也多次受到这些警察的无故盘查。广大学生对他们的这种无理举动非常不满，曾几次发生小的冲突。但又不敢公开反抗。这种情况，阿民布和教官是清楚的，他曾在训话中表示过，用不着怕这些为虎作伥的警察狗子。他还暗暗向一些学生头头讲，你们可以直接打击这些狗东西，如果你们的力量不够，我可以发动驻军士兵来支援你们。正因为有了阿教官的暗中支持，在开鲁才发生了大快人心的“学生砸警察署”的事件。学生把警察署的门窗打坏，不但打了警察，还打了警察署长。事件发生后，群情激奋，广大群众完全支持学生的这一行动，也确实打击了警察狗子的嚣张气焰。事件发生不久，校方就采取了镇压手段，开除了两名带头的学生，把阿民布和教官也调走了。又调来一名日本人上尉当教官。

乌力吉那仁忆阿民布和与蒙骑四师

赤峰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将出版《和子章与蒙骑四师》一书。收到来信我很支持这件事。原来我不知道你们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长期地调查研究，把有争议的历史作出了认真的结论。对历史事实采取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科学的论证是符合共产党人的态度的。你们又命我写一篇回忆阿民布和的文章，我也愉快地接受。但由于时间过长很多事情遗忘了只能尽力而为！我想了一下书名是“和子章与蒙骑四师”，我这篇文章题目也叫一个“阿

民布和与蒙骑四师”吧。因为阿民布和对蒙骑四师的成长改造的贡献也是不小的。

我1946年“4·3”会议后到昭盟工作是有偶然性，也有小小的必然因素。我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填表时填了一个昭乌达盟喀尔喀左旗人。因此乌兰夫同志命我到昭盟工作，我也欣然接受了。但我人地不熟，我出生地虽在历史上隶属昭乌达盟，后来伪满时期已归哲里木盟了，观念上我认为都是蒙古地方，同样可以下革命工作。到昭盟后开展工作，除了有党的领导当地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合作也很重要，阿民布和就是其中之一。

1946年5月我到林东组织自治运动联合会盟分会时，就有人介绍他做常委，任命军事科长，盟一级党政军领导一致同意。后来我们的相处共事过程中关系搞得挺好。我很喜欢他有蒙古人的直爽坦诚风格，魁梧健壮体态，办事果断敢为，富有责任心。热爱民族，忠于革命事业。嘴上两撇八字胡须，面上常有自信的笑容。他是清卓里克图（和于章）的兄弟。伪满时期虽然当过伪少校军官，但受日本人怀疑，不受重用。当然这里也确有原因。据他说：“在乌兰浩特任职时，有一天出去打猎，在森林中遇到二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报人员，他们要求我提供日伪军事情报”，阿答应下了。为此阿从伪军官学校的某楼里偷了日伪军军力配备图，并将楼纵火烧了。将资料给了蒙方情报人员。从此成了苏蒙军的情报人员。他提供的情报，对苏蒙联军粉碎我国东北日军起了相当作用。苏蒙军打垮关东军后，他同伪满军一道被俘，后关押在沈阳北大营。苏军在各俘虏营中找阿民布和，在沈阳找到后，让他在俘虏营中任负责人，组织学习马列主义，而后释放。释放后，他途经王爷庙，回到巴林左旗林东，在自治运动联合会盟分会任军事科长，后在蒙骑四师任参谋长。蒙骑四师是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后以昭乌达盟的各旗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的，权力多被王公、官僚、地方军阀掌握，干部士兵成分也很复杂，号称蒙古民族，

保卫各旗治安，但缺乏坚定的政治方向，各旗之间矛盾也很大，清卓里克图（和子章）虽任师长也难统一指挥，只有巴林左旗是嫡系的，右旗还较靠近。其它各旗关系都很暧昧。1946年，在国共关系破裂，内战已经开始的时候，这个部队能否成为一个为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坚决站在中国革命斗争一边，听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的部队，是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试金石。使这个部队具有上述素质，必须做大量的整顿教育改造工作。这个工作当然就落在党领导下的自治运动联合会盟盟分会的肩上。所以盟分会的成员全力以赴承担部队政治工作任务的同时，阿民布和同志在其中发挥了一位重要角色的作用。后来担任了骑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骑四师与分区联合成立蒙汉联军司令部时，他担任了联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对统一指挥战斗发挥了作用。四师经过几年的整顿、改造、训练、作战最后与卓盟纵队合编为第十师时，他任副师长。他在任期间到扎鲁特旗对37团进行了一次整顿工作，指挥和参加了1946年末保卫天山战斗，参加剿灭塔日巴、额勒登格叛匪战斗，参加剿灭布利亚特仁钦道尔吉匪帮的战斗。以上都是蒙汉兄弟部队联合作战，阿民布和同志很好的履行了一个指挥员的责任。尤其是1947年初，和子章去参加王爷庙召开的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5.1”大会后（未回骑四师），阿民布和继任师长，负责四师的军事行政工作，对四师的整顿（清洗不适合部队的干部战士），教育（阶级教育）、支持上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他配合得都很好。总之，对第四师的建军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可惜的是，我们团结提高阿民布和的政治觉悟，充分调动他的积极作用不够。如他1946年开始要求入党，我们过分看重了他的出身成分问题，对于重在表现看的不够，一直到他离开部队未得到解决。

1949年十师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三师。阿民布和同志调离部队到内蒙古自治政府农牧部任处长。此时，我也离开了十

师在内蒙古军政干部学校任职。他到乌兰浩特后来看我，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对调离部队虽有意见，但还是认为革命工作在哪里做什么都一样，只是在解决组织问题上还有意见，感到离开昭盟了，对他了解的人没有了，更不容易解决了，因而有悲伤情绪。我很同情他，这是他要求进步，争取做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心愿。我只能安慰他在今后的岗位上争取。此后15年，我在包钢时期一次在京包线的火车上偶然见过一面。他告诉我在锡盟巴音希勒牧场当副场长，并谈到他创建牧场的艰苦奋斗的经过。他是牧民的儿子，自己也当过牧民，所以对办牧场有兴趣，对工作表现出了事业心和感情。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他有一种实干精神，在一起工作时如此，现在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在列车上一起吃了一顿饭告别了，没有想到这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文化大革命”后，他的儿女为平反昭雪，找我多次。听他们说，阿民布和同志为了创办牧场辛勤奔波多年，到头来成了罪人，横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刑讯武斗的结果，伤痕累累，终生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受尽了人间地狱之灾，冤假错案未得昭雪，伤病未能治好，就含冤离开人世。真可谓千古之恨！幸而“四人帮”垮台他的冤案得到昭雪，子孙后代卸掉了反革命后裔的沉重包袱。锡林郭勒盟政府以处级干部给予重新安葬。对此我认为可算落实政策，但不是彻底落实政策！阿民布和同志从46年到49年一直是师级干部，工作有成绩，不知什么时候，什么组织解除了他的师级待遇，降为处级？对这一点，阿民布和离开部队后我们二人两次会晤，他从未提及，愉快地以副场长待遇任劳任怨办了十几年牧场，最后结果含冤离开人世！我为阿民布和同志写这一篇纪念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呼吁应该彻底平反，恢复他师级待遇或相当于师级待遇！这完全是公正，符合党的英明政策。

刘 昌

刘昌，福建长汀人，1913年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警卫连指导员、营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后任红二十九军团政委、陇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内蒙古骑兵师政委。建国后，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7年毕业于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后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政委。1955年授少将军衔。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5年8月1日按正兵团级离休。从参加红军以来授功勋奖章四枚，身负重伤两次。

(自述)

蒙 和 舞 乐 极 烈 士

蒙和舞乐极，蒙古族，汉名汪洪斌，生于1916年，原籍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干噶根庙南。父亲是庙上的奴隶。蒙和舞乐极幼小时在亲属的帮助下读书。小学毕业后，又考入了奉天

(沈阳)蒙族师范学校学习。他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是学校出名的高材生。在这里,他受哈丰阿、哈斯巴特尔两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读一些唯物主义书籍。掌握了一些民族进步和解放的道理。

毕业后,受哈丰阿老师委派,来到巴林右旗。

蒙和舞乐极于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来到大板教书。当时,大板公爷府东有一所简陋的学校,只有二、三十名汉族学生,没有蒙族学生。蒙和舞乐极决心吸收蒙古族青少年入学,加设蒙文班,象二位老师那样用文化教育来教示民众,拯救民族。

蒙和舞乐极人地两生,扩大学校谈何容易,但他克服了千辛万苦,终于办起来了。蒙文班办起来后,穷人家的孩子来念书的却寥寥无几,他又亲自下乡动员。不知走了多少个“浩特”,进了多少个蒙古包、崩崩,苦口婆心地劝着贫苦牧民把子女送到大板上学。为了解决穷苦学生的生活困难,蒙和舞乐极除了自己省吃俭用拿出一些钱和东西接济穷人子弟外,又动员富有的开明人家捐款捐牲畜,支持办学,扶助贫苦牧民子女上学。

一天傍晚,查干诺尔一位名叫达林台的牧民,眼含热泪把16岁的大儿子送来了。一进蒙和舞乐极的家门,就叫儿子给这位多次徒步到他家动员的老师磕头。从此这个缺吃少穿的孩子就吃住在蒙和老师家里上学读书。达林台老牧民逢人就讲:“蒙老师,伊和赛哪(真好)!”

蒙和舞乐极为办教育日夜奔波,身体越来越消瘦,爱人郭淑德劝他注意身体,可他总是不以为然。他说:“人活着,一是要学习,二是要为穷人多办点好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白天授一天课,晚上一学到深夜,批改完作业备完课后,还要偷看《唯物辩证法》一类的进步书籍。为了把进步思想灌输给学生,他学习哈丰阿、哈斯巴特尔老师的作法,把它融化到课堂讲课中去。自己还亲自编写教材。当时他编了一本《民众教育课

本》，宣传唯物主义，撇弃唯心主义。他还让学生孟和毕力格给插图，画了从猿猴到人的演变过程，生动有趣，学生很爱读，书中还列举爱斯基摩部落，说明科学的唯物史观，批驳上帝决定人类命运的唯心学说。为了把人们从宗教迷信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蒙和舞乐极还把附近几个庙宇的喇嘛组织起来学习，不让他们吸收新教徒。锯响就有末，教育就会有效果。后来，一些青年喇嘛经过蒙和舞乐极的启示，接受了新思想，毅然脱掉袈裟，离开庙宇，参加了革命；象这样的例子不少。

在这期间，蒙和舞乐极还不断地扩大教育面，有意识的接触群众，结识了不少穷朋友，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向这些人传播进步思想，他还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编了不少民歌进行宣传。现在保存下来的《告同胞诗》《牧马人之歌》和《劝告青年歌》等几首，在当时都很有进步意义（这些诗歌均已公开发表）。

最早写的《告同胞诗》，汉语译文大意是：

世道已经大变，

大家赶快清醒过来！

为了把全人类从苦难中解放出来，

必须同心同德，“知”“行”合一，

未知而行者盲，知而不行者惰！

当然，蒙和舞乐极当时还没弄清如何能把“全人类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当他看到了自己的学生中，有的当了警察和宪兵，为非作歹，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于是他在1939年春又饱含激情创作了《劝告青年歌》，歌词是：

振臂跃起的蒙古族青年们：

放眼看看，苦难群众的支援，

奋斗吧！喜迎世界的新曙光，

为人类宏伟事业做出贡献。

.....

生与死自有定律，实现真理是我们的任务。

胸怀宽广的蒙古民族——

欲与宇宙共同前进！

要把堆积如山的私利一脚踏碎，

寻找纯挚的真理当做亲朋；

救起那苦难的民众，

共享幸福的甜蜜！

这首诗最初发表在《丙寅》杂志上，1942年以后有人配了曲子，流传于巴林左、右两旗，对青年影响较深，至今还有很多人能够唱得出来。

从1937年到1944年的八年间，蒙和舞乐极一心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他还自学了日语、汉语，并运用蒙、汉、日语来宣传教育群众。当时，伪旗公署经常找他翻译些材料，他趁机接触一些伪职员，向他们宣传进步的思想。后来他被调到旗公署任文教股长，于是更加热衷于教育工作，扩大民族学校。全旗五个区都办起了学校，还办了女子学校和汉文班，同时创办了一个“兴学会”，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人民捐款捐物支持教育，用这些经费来扶持贫苦牧民子弟上学。日本投降前二年，大板学校已发展到五百多名学生，成为当时兴安西省的第一所比较正规的蒙族完小。这里倾注了蒙和舞乐极不少心血，也教育出不少人才，如现在内蒙古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巴·布仁贝赫、仁钦嘎瓦、霍尔查等。都曾是蒙和舞乐极的学生。

1944年秋，多才多艺的蒙和舞乐极，被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看中了，把他调到王爷庙省政府担任秘书，他开始接触上层官员，并且与哈卡阿老师（他已调到省政府工作）重逢，也借机阅读了大量内部材料和书籍，看到了一支透心亮腑的革命力量正在

兴起。当时乌兰浩特有个十六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兴蒙党”，所宣传的内容正是蒙和舞乐极多年向往的：赶走日本强盗，推倒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不久，“兴蒙党”的乌勒吉那仁等人告诫蒙和舞乐极，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才能拯救民族。他感到很开脑筋。

日本鬼子临撤退之前，血腥镇压乌兰浩特革命人民，深深地触动了蒙和舞乐极这位年青知识分子，使他认识到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意义。

“八·一五”以后，苏联红军协助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乌兰浩特到处是一片被日寇破坏的废墟，坍塌的残墙断壁里还冒着缕缕青烟，旧政府散架了！王爷府的一所进步学校也被炸毁。蒙和舞乐极组织一些学生和民工日夜复修，修好后，除了自己给学生讲课外，还特意请了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有名望的人，给讲一些民族要统一，要加强团结等道理，起到了一定收拢民心的作用。尤其对充满激情的青年学生教育更深，象干柴烈火，自动组织起来，宣传革命道理，清除暗藏的坏人，建设光复后的新秩序。

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1946年1月份，在乌兰浩特南的噶根庙召开了东部区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了东蒙古人民政府，并决定派一部分人到昭乌达盟组建昭乌达省政府。

3月份，包括蒙和舞乐极在内的东蒙古自治政府工作团到达林东。蒙和舞乐极到林东不久回到大板，把家属和老人安置在大板附近的麻斯他拉艾勒，又同其他干部一起到林东，为筹建昭乌达省政府日夜奔波。不久，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乌兰夫同志亲自在承德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蒙统一会议以后不久，即1946年6月的一个夜晚，蒙和舞乐极就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昭乌达盟解放后的最早中共党员之一。

时隔不久，蒙和舞乐极被派到蒙汉联军第四师担任了师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他到部队后就着手部队的整编和扩军工作，吸收了二百多名贫农牧民子弟、青年学生参军。同时，采取阶级教育的方法，激发战士阶级觉悟，对改造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向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赤峰、开鲁等地相继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阿旗、右旗的叛乱迹象已显，四师师部获悉：驻扎在右旗益和诺尔迫毛都的三十四团二连官兵思想波动。这个连是在土匪头子乌日他的控制之下，副连长双喜又是国民党兵痞。乌日他、双喜都是反复无常极端残忍的家伙，以前就曾与右旗的匪首韩桑杰、阿旗的他日巴反动喇嘛等有过勾结，现在虽然队伍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但思想并没有完全转变，土匪的恶性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掉。为了阻止这个连发生叛乱，师部决定对这个连进行整编。

1946年11月15日，蒙和舞乐极带领一个班共11人，从师部所在地林东出发，并给驻守在大板的三十四团团长确吉敖斯尔捎去信，叫他带兵前去策应。

三天后，共走了四百余里路程，到距二连驻地还有二十多里地远的西迫毛都艾勒住下。为了慎重起见，派一个名叫毛小的士兵（原乌日他部下）回去探听虚实。没想到这人是叛徒，去了半天多，乘马而归，装腔作势地说：“蒙主任，别听夜猫子叫唤，二连一点事也没有，乌日他连长正设宴准备欢迎你们去哩。”

傍晚，蒙和舞乐极和战士们来到二连连部，副连长双喜和许多士兵出来迎接，院内各出口、门前都有人荷枪站立。蒙和舞乐极警惕地询问：“你们为啥这些人站岗？”双喜嘿嘿地一笑，不露声色地说：“蒙主任，你还不知道，现在有些地方都叛变了，不加强警戒不行呵！”蒙和舞乐极又问起乌日他连长和指导员赛乌尤图在哪儿，为什么不见？双喜撒谎说：他们去追击一小股从翁旗逃窜过来的残匪还没回来，并格外殷勤地让蒙主任上屋歇息。

喝茶，还大声命令通讯员快去给指导员和连长送信，就说师部政治部蒙主任已到……。这家伙蛛丝马迹未露，其实他们头三天就已暗中叛变，把坚持正义、誓死不叛的指导员赛乌尤图抓起来，然后封锁消息，伺机“拉竿子”（匪语，即拉部队走）投奔国民党。蒙和舞乐极等到达后双喜立刻派人，给正在沙布嘎艾里大牧主哈木吐家与阿旗派来的土匪旺吉勒密谋叛变要事的乌日他连长捎去信，询问对蒙主任怎么处置？阴险狡猾的乌日他没有回来，却下令把蒙和舞乐极等人先逮捕，押往赤峰，给中央军“送礼”。就这样，趁蒙和舞乐极和战士们吃饭的时候，土匪以“盛饭”为口令下毒手。经过一场搏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蒙和舞乐极等落入“虎口”。

土匪妄想从蒙主任口里弄点什么，好做为投靠中央军的“见面礼”。起初，只是来点软的，他们把蒙和舞乐极想象成一个好对付的文弱书生。可是什么法都使了，这才认清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身媚骨的怯者，而是一个视死如归、硬骨铮铮的钢铁战士，蒙和舞乐极根本不把土匪的皮鞭、棍棒放在眼里，他几次在酷刑下死去活来，仍然向身边的土匪宣传革命道理：“中国东方已大白，为什么要投靠国民党？投靠国民党只有死路一条！”并且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敌人达不到目的，更加暴跳如雷，惨绝人寰，他们为了逃避我军的追击，把遍体鳞伤的蒙和舞乐极等人，用绳子绑上手，扒掉他们的鞋袜，赶着他们赤脚在冰天雪地的沙窝里转，稍微走慢一点，就遭一顿毒打，要不，就拴在马尾后拖一阵……。更残忍的是，每天只给一顿稀粥喝，战士却吉僧格有时饿极了，就偷偷地抹眼泪，蒙和舞乐极除把自己的粥往他碗里拨以外，还笑着给他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激励他坚持斗争下去。

土匪押送着他们越走越远，离开了热土“巴林”，蒙和舞乐极这才觉察到土匪是要把他们往国民党那里送，“不能死在国民

党的屠刀下！”于是，他就暗中琢磨突围的办法……。

一天夜里，来到翁牛特旗龙化图庙北边的查干营子，天很冷，下着清雪，土匪把他们关在一个房子里，只留两名土匪把门，其余匪徒都跑到营子里找酒喝，蒙和舞乐极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突围机会，于是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告诉排长“喇嘛”。不一会儿，一个土匪抱着酒坛子给站岗的宝音达来，六十二两个土匪送来了，这两个家伙象馋猫见了腥货似的，不要命地喝起来。

“哎，我要小便。”蒙和舞乐极敲着门大声叫喊着。

“什么，谁要尿尿？”名叫六十二的那个土匪把空酒坛子摔出很远，踉跄地站起来，边开门边说：“尿尿可以，可得一个一个出去尿……”。

蒙和舞乐极被解开绳子，临出去时，他给排长喇嘛递了个眼色，示意一下就出去了。

屋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冷不防，蒙和舞乐极一下把持枪的六十二推倒，并高声地冲屋里喊了一声：“同志们，快跑……”。

“哎呀，不好了，蒙主任他们跑了！”

顿时，嘶哑的喊声，狗的吠声，急剧的枪声四处响起，整个艾里乱成一片。

蒙和舞乐极拽着瘦小体弱的却吉僧格跑，因天黑，不幸跌进一个沟里，等爬出来时，土匪已包围过来，六十二照着人影打了一枪，蒙和舞乐极左腿中弹，但他还咬着牙拖着伤腿仍往外突围，可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

“哎，你他妈还跑吗？”一个土匪把身负重伤的蒙和舞乐极拖回屋里。

“跑！”蒙和舞乐极挣扎着坐起来，牙齿咬得格格响，怒斥匪徒：“你们杀了我一个人，杀不了万千革命群众，革命一定会成功！你们必将自食其果！”他捺着枪伤的大腿要站起来，汗珠

顺着脸颊流下来。

“再让你嘴硬！”恼羞成怒的土匪宝音达来瞪着眼珠，抡起枪托照着蒙和舞乐极的头砸去，蒙和舞乐极应声倒下了。

当晚，即阴历11月23日夜，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他，头骨坍凹，嘴角顽强地下弯，牙关紧闪，同牢战友们没听到他的呻吟声，但他那坚毅、愤慨、视死如归的精神，却长久地印在巴林草原蒙汉各族人民的脑海中。

（此文曾刊登在原昭盟文联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碧血丹心》一书中，现经作者重新修正，编入文史资料内）。

（郭振有）

确 吉 敖 斯 尔

确吉敖斯尔，蒙古族，1914年12月12日出生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彥他拉苏木老道板嘎查一个贫苦牧民家，兄妹七人，父名宝音达来（又名张七十二），给牧主放“苏鲁克”为生。

1923年10岁时，被古力占台庙的元登喇嘛要去当小喇嘛。1926年逃跑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阿尔善宝力格干零活。1928年春，因父亲有病，赶着自己挣下的一头牛四只羊回到家乡老道板，从此有了自己的牲畜。可是到家不到一个月被庙上发现，被送到大板王府当奴隶，这时，确吉敖斯尔产生了求知念头。经沙嘎德尔台吉介绍到大板学堂。此事后来（1930年）被三爷喇嘛及其兄业喜敖日布公爷知道了，以奴隶不能进校门为由，强令撵出

校门。为了生活又跟萨嘎沙来画匠学徒（1930年—1933年）。同时，抽空到扎米扬高力布、喜仁嘎老师家学习文化。这时，结识了萨嘎拉扎布，并在古力古庙买了房子以绘画为生。

1935年春，蒙和舞乐极老师到古力古台庙找确吉敖斯尔，商量如何提高民族教育兴办学校的事。确吉敖斯尔当时把自己的好朋友沙嘎达尔台吉的儿子拉布杰介绍给他，共同商量确定，由确吉敖斯尔负责筹办古力古台庙学校，拉布杰负责筹办黄花庙学校。开始时阻力很大，但经蒙老师等共同奔走联络，终于在第二年正式成立了古力古台学校。古力古台庙达喇嘛告到总管达喇嘛和旗长敦文泰处，确吉敖斯尔处境困难，流浪一年。后来被蒙和舞乐极推荐留日学习。

1938年4月至1940年5月在日本京都市华顶山智恩院蒙古青年教育所学习。这时发生了诺门罕战争，校方动员在校蒙古族学生回来参战。针对校方的意图，全体蒙古族同学秘密地开了会议，决定集体请愿反对参战。确吉敖斯尔完成了学业于1940年6月回到大板。1942年萨嘎拉扎布任右旗旗长，经他批准正式成立了巴林右旗兴学会，这是一个组织群众集资办学的群众组织，蒙和舞乐极为第一任干事长，确吉敖斯尔当干事，蒙和舞乐极调离后确吉敖斯尔继任干事长。兴学会资助了十五所学校和一所蒙医研究训练班。

这时，确吉敖斯尔因为个人关系常与蒙和舞乐极、乌日图等人到萨嘎拉扎布家听听收音机和阅读一些革命书籍。1945年5月，萨嘎拉扎布因办理扎噶尔王爷葬礼，以伪兴安总省民政厅长身份来右旗，向确吉敖斯尔等青年讲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应付时局等问题。

1945年8月8日和9日，苏蒙相继对日宣战，驻巴林右旗的日本侵略者组织退却，进步青年巴布道尔吉、却吉僧格等二三十人在安嘎图村和阿贵庙打死日本侵略者5人、俘虏多人，并于8月13

日晚返回大板时，把缴获的战利品和俘虏交给了苏军。确吉敖斯尔始终参与了这些行动。苏军把确吉敖斯尔等交敬文泰，敬说：你们辛苦了，先吃饭，然后交谈。结果敬文泰把这些人送入在大板的苏军俘虏所。连同被这些人抓获的日本人一齐送进沈阳俘虏营。确吉敖斯尔等人到沈阳，苏军搞清他们身份以后编成一支“蒙古部队”，任阿民布和为部队长，确吉敖斯尔任队副，巴布道尔吉、却吉僧格分别担任排长。还允许他们到汉族俘虏营听党派到俘虏营的瞿同志讲的政治报告。

1945年12月底他们获释放。1946年元月把阿民布和和确吉敖斯尔二人送到王爷庙，他们二人在沈阳加入了苏军秘密情报组织（苏军撤军时解散）。他们到王爷庙时，东蒙人民代表大会在葛根庙召开，东蒙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他们见了蒙和舞乐极、萨嘎拉扎布、哈丰阿等人。蒙、萨、哈等人说：“东蒙自治政府在中共是西满分局支持和苏军城防司令部准许下成立的。”他们叫确吉敖斯尔参加筹备东蒙自治政府赴昭盟工作团的工作。

关于这一段经历，据确吉敖斯尔回忆：

工作团由萨嘎拉扎布、蒙和舞乐极、确吉敖斯尔、阿民布和、斯布吉德、察隆阿、贡嘎丹儒布七人组成，萨嘎拉扎布任团长。规定三项任务：1.将和子章部队改编为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伍和子章为师长；2.组建昭乌达盟政府任萨嘎拉扎布为主席；3.主动与林西的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解决摩擦和实现合作共同开展工作。

1946年3月在林东成立了昭乌达盟政府任确吉敖斯尔为宣传科长。为解决摩擦问题，3月下旬由萨嘎拉扎布等组成昭盟代表团赴林西谈判。确吉敖斯尔为代表团成员之一。4月10日达成了《林西协议》。

1946年5至8月，确吉敖斯尔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常委、宣传科长。同年8月和徐子干同志一起到大板、查干沐

论发动群众开展民族自治和民主改革运动的试点工作。

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师二支队政委兼三十四团团长。

1948年3月至1951年11月在昭盟政府任民政处长。同年在阿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至53年2月在北京中央政治干部学校行政班学习。

1953年至1984年4月，历任内蒙古自治区民政部（民政厅）优抚处长、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主任、民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等职。

1984年4月离休。

（根据本人提供的忆述材料整理）

义达嘎苏荣

义达嘎苏荣，蒙古族，1918年生于克什克腾旗贵族家庭，为克什克腾旗“老旗长”阿拉腾敖其尔长孙。父亲名叫宝音德力格尔，又名朋斯克拉西。

义达嘎苏荣少年时代就学于克什克腾旗旗立第一完全小学校。这是一所老内党党员白永伦、鲍永昌、白福海、官布扎布、德力格尔、陈荣久、鲍永瑞等人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时，在阿拉腾敖其尔、敖勒根扎布等人庇护下办起的新式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一批蒙古族青年受到苏蒙革命思想熏陶。

1932年，义达嘎苏荣小学毕业后，与其他12名同学被送进设

在沈阳的兴安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当时，这所学校的反满抗日气氛高涨，到1934年时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叫张世林的历史老师，准备刺杀关东军将领上肥原。日本人有所警觉，派人到张世林家搜查。搜没搜出线索，可是，搜查的人刚出门，张世林叫女人把藏在床下的手榴弹转移到房后掩埋时爆炸，女人被炸伤。张世林化妆逃脱。事情暴露，宪兵队查封了这所学校。学生并入哈尔滨兴安师范学校。义达嘎苏荣到哈尔滨进入高级班。

哈尔滨兴安师范与沈阳的兴安第一师范不同，学校不注重教书，灌输法西斯思想，主要学习日语，义达嘎苏荣等一批血气方刚的学生看不惯，带头向伪满蒙政部写信告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个“留日生”，名叫阿成嘎。他通过义达嘎苏荣在沈阳读书时一个姓曾的老师来做义达嘎苏荣的劝解工作。义达嘎苏荣不服，学校又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办法，选派义达嘎苏荣等几名（4人或6人）同学升入吉林高师学习（实际是进了大学）。义达嘎苏荣想入语文系，可是校方却把他送进体育班。义达嘎苏荣不感兴趣，念了三年便不辞而别，回到克什克腾旗老家。时间是1938年。

1937年，义达嘎苏荣与其前妻——“宾图三杰”之一的何明祺的女儿结婚。1939年春节过后，受父亲之命携眷到开鲁，与担任伪兴安西省民政厅长的爷爷阿拉腾敖其尔一起居住。这时，布和贺什格在开鲁办起了蒙文学会，聘请义达嘎苏荣为训练班的教员。没教半年，阿拉腾敖其尔主张叫孙子进兴安西省文教科任职员，义达嘎苏荣不同意，适逢南满医大招生，他便征得厚生会支持进南满医大学习。开始旁听一年，约1941年进入本科。由于爷爷不支持，主要资金来源为厚生会每月60元的补助。南满医大学制四年，可是义达嘎苏荣只念三年，感到日本人垮台的时限已经到来，便躲在家里坐观时局。这是1944年。没想到日本人又苟延一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蒙军进入克什克腾旗。10月，陆棣、陈耳东等我党同志先后到来。这时，义达嘎苏荣再也呆不住了，适逢义理通阿派人找他，商量维持地方秩序的问题，便从此投入我党领导的革命工作。不久，克什克腾旗按属人主义成立了旗政府。义理通阿任旗长，义达嘎苏荣担任秘书长。

正在这时，热北部队与林东的自治军闹误会，王逸伦同志请义理通阿出面调解。义达嘎苏荣随义理通阿去林西。当时，因为与林东方面联系不上，他们改乘苏军汽车去赤峰寻求解决办法。到乌丹，义达嘎苏荣取道去林东。到林东时，正在召开各旗县代表会议（联防会）。和子章没有出席，他当时正率部驻林西东门外。参加会议的左旗代表有乌梁海巴音福、彭即吾、白雅尔；克什克腾旗有巴嘎雅色登、色布金嘎（察干楚伦？）。克什克腾旗的这两个人是作为出席东蒙代表会的代表中途参加林东会议的。义达嘎苏荣不是代表，但临时受两位代表认可，也被增补为克旗代表，出席了林东会议，并一同出席乌兰浩特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大会。

在林东会议上，义达嘎苏荣等克旗代表感到有的人的发言势头不对，于是想用多提问题的办法使会议不了了之，所以提了不少问题。两天后，便启程去乌兰浩特。

到乌兰浩特，义达嘎苏荣仍惦记“林东”、“林西”误会的事，并为此找到哈丰阿。哈丰阿告诉他，“和子章，你不要管了，我管。你去参加筹备会的工作。”

1946年乌兰浩特闹疫，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大会不得不改在格根庙召开。在代表会上，义达嘎苏荣以青年代表身分被选为小会代表（蒙语直译如此，相当于人大常委会驻会常委）。

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后，派出包玉昆、克力更、包彦去西蒙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联系东西蒙统一问题。经研究，在张家口召开统一会议，东蒙派出有表决权的五人代表团：哈丰阿、特

※乌力吉那仁回忆最初决定在赤峰召开，而后改在承德。

木尔巴根、博彦满都、包玉昆、义达嘎苏荣。代表团出发后，张家口失守，会议地点改到承德。从乌兰浩特到郑家屯坐火车。据说，当时的火车烧豆饼和木柴，从车上跳下来洒泡尿还能追得上。在郑家屯改乘汽车，经通辽、开鲁、林东、林西、赤峰，约三月中下旬到达承德。代表们一到就开会，一直开了许多天，所谓“四三”会议，是指四月三日完成了会议主要议程。会后，东蒙自治政府撤销，义达嘎苏荣便留在昭乌达盟，任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组织科长。同年10月改任秘书科长。蒙汉联军成立前后，任第四师一支队（义达嘎苏荣本人认为是第二支队）政委，当时的支队长是额勒登格，副支队长兼参谋长是业喜扎拉森。

1947年3月17日，义达嘎苏荣同志经当时的盟委书记权星恒和肖佐汉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光复后，我盟较早发展的蒙古族中共党员之一。

1947年“五一”大会之后，昭乌达盟第一任盟长萨嘎拉扎布调离，义达嘎苏荣继任盟长职务。

1948年秋，义达嘎苏荣调内蒙党校学习半年；1949年初，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当干事；同年秋，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秘书；1951年6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部副部长。后来该卫生部改为卫生厅，经国务院任命为卫生厅副厅长。

1958年3月8日，经义达嘎苏荣报请中央卫生部批准，筹建内蒙医学院。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在义达嘎苏荣同志主持下，内蒙医学院从建筑主楼、教工楼、学生宿舍楼，到延请教职员工，当年9月1日正式开学。这在正规大学创办史上，时间是相当快的。

1960年，义达嘎苏荣同志受到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分（后来纠正），下放到濒临倒闭的呼和浩特制药厂当厂长。在20个月的时间里，他注意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研究出一批新产品，使该厂产值翻了三番。1962年调回卫生厅。从1963年到1966年

参加了三批“四清”。在“文革”中被打倒，“群专”五年，1972年10月恢复组织生活，工作上待分配。1978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顾问；1979年12月调内蒙古医学院任副院长，1985年离休。现在义达嘎苏荣同志正潜心于医学著述，年72岁。

(孟克 整理)

斯布吉德道尔吉

斯布吉德道尔吉，现名戈更夫，1925年4月5日出生于巴林左翼旗查干哈达爱里博拉嘎家，姓博尔济吉特氏。

1933年至1938年在林东念书。

1939年至1943年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兴安学院（中学）读书。

1944年至1945年8月在长春建国大学读书。

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在王爷庙 东 蒙 古 青 年 同 盟 本 部 工 作。

1946年3月至10月在林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工作，任青年科长。

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10月至1948年10月，在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四师三十二团任政治委员。

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在乌兰浩特中共内蒙党校学习。同年5月至12月，在兴安盟突泉县内蒙古军区第三师七团任政治委员，师党委委员兼团党委书记。

1950年1月调北京中央外交部工作，同年7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任二等秘书至1955年9月回国。回国后在外交学院学习，1959年6月毕业。

1959年8月至1963年8月在外交部第二亚洲司任处长。1963年9月至1973年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任专员。1974年9月至1977年底在干部司工作。

1978年4月至1983年1月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政务参赞、党委委员。

1984年10月至今，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戈麦夫自述)

徐 子 干

山东省沂水县前晏家铺村人，男、汉族、学生出身，生于1917年1月。

1927年至1930年在初小读书。

1931年至1932年在高小读书。

1933年至1936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后半年，与应届毕业生参加山东省济宁市梁漱溟办的“山东八校师范生乡村服务训练处”，受乡建理论训练。

1937年3月至同年9月任山东莒县夏庄区乡农学校教员。

1938年1月曾一度参加过李宗仁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刘震东部（约十天左右），因刘抗日牺牲，部队失散而回家。

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任中队

长。

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任八路军游击二支队（即滨海支队）参谋，同年11月调延安后方学习。

1939年11月至1940年5月，入延安抗大三分校一大队五队学习。

1940年5月至1941年3月，在抗大三分校参谋训练队学习。

1941年3月至同年11月，调中共中央情报部西北公学学习。

1941年12月至1944年3月，任西北公学组织干事，校部秘书。

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任中央情报部干部处干事。

1945年10月至同年12月，因抗战胜利，到原热河省平泉县任县支队政治处主任。

1946年1月至同年3月，任平泉县公安局长。不久，调原热河省公安局任一科科长（设设处）。不久，又调到东西蒙在承德召开的“四三”会议上搞招待工作，主要负责东蒙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四三”会议结束后，根据代表团的要求，组织决定到昭盟地区（林东）搞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

1946年5月至1948年3月，任自治运动联合会昭盟分会秘书长兼蒙汉联军骑四师政治部组织科长。

1948年3月至1949年5月，任昭盟公安处处长。

1949年6月至1951年10月，任中共昭乌达盟盟委副书记兼公安处长、盟公安大队政委。

1951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内蒙古公安部办公室主任。

1952年12月至1954年3月，任内蒙古公安部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党组小组副组长（即党组副书记）。

1954年4月至1955年6月，任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兼政治部主任。

1955年7月至1959年12月，任内蒙古司法厅副厅长、党组书记。

1957年1月至1958年5月，任内蒙古监察厅副厅长、党组副书

记。

1958年6月至1966年，任内蒙古党委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委。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2年10月至1975年3月，任内蒙古人保部副主任。人保部改为内蒙古公安厅后任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1975年3月至1978年3月，任内蒙古党委政法小组副组长。

1978年3月至1983年8月，任内蒙古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

1983年8月离休。

(本人提供)

业喜扎拉森烈士

1945年10月，我受哈卡阿、阿思根、特木尔巴根等东蒙古自治运动领导人的委派，同恩和森（巴林左旗）、胡和德力格尔（巴林右旗）、道尼道尔吉（阿鲁科尔沁旗）等人来昭盟工作，任务是传达东蒙古自治运动领导人的意图、乌兰浩特的现状、呼哲两盟的动态，建政、建军、建立“内人党”和青年同盟的组建工作，宣传内外蒙古合并或争取独立，宣传与八路军友好和反对国民党等。路过伪科尔沁左翼中旗旗公署所在地巴彦他拉街（当时有科左中旗华尔街之称）时在伪总务科长青龙家见到业喜扎拉森同志，其后他在东蒙古自治军骑兵四师工作期间，在三十五团团部和团长额力登格家，我和他多次接触。

业喜扎拉森同志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下简称科左中旗）塔巴

哈人，1922年出生于都日本格热村，他的父亲叫敖力玛扎布，亲兄叫乌日图那苏图，亲弟叫仁贵。他小时候在科左中旗第三小学读书，1936年毕业后，升入伪满白城子铁路学校学习，与当时在蒙古青年中较有威望的民族上层人物哈丰阿、阿思根相识，受到了他们的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产生了热爱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爱国思想。1939年哈丰阿把他派往西蒙，在乌力吉敖其尔（是1925年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当时是握有军权的革命者，文化大革命前当过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厅长）手下搞翻译工作。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基本结束。在亚洲战场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摇摇欲坠，局势将要发生重大转折。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乌力吉敖其尔在1944年春末派业喜扎拉森到东蒙同阿思根将军联系，东西蒙古的伪蒙古军队约定日期采取行动，配合八路军打垮日本军队。不幸他到家就得病，卧床半年，病好时苏联红军已进入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所以，在日本投降前东西蒙的蒙古军队共同行动的计划没有实现。1946年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后，他到乌兰浩特被阿思根司令员任命为东蒙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参谋长，来林东工作。

业喜扎拉森同志主要在师司令部工作，到阿旗工作的时间短，但对阿旗的革命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一）1946年国民党军队窜犯通辽、开鲁时，在那里驻屯的第二师有些部队整团整连地投降国民党了，其中以白音仓为首的不愿意投降国民党的十六人，投奔阿旗来，到阿旗后最初住在三十五团二连连长苏清嘎家里，苏清嘎向额力登格报告了这件事，但额力登格收编与否犹豫不决，当时白音仓等人的处境很困难，正在这个时候，内蒙古自治军骑兵四师参谋长业喜扎拉森同志赶上来阿旗，他听到这件事立即说服额力登格收编了白音仓等十六人。（二）国民党军队打进哲盟后，1946年夏季，阿旗的伪警察孙怀斌，受当时阿旗

公安科长孙根全的旨意，潜入国民党后，同孙根全有联系的反动分子蠢蠢欲动，尤其三十五团何文贵为连长的第三连出现要叛变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业喜扎拉森同志又赶来（1946年秋初），同额力登格、嘎达苏等团的负责人商议，把何文贵的全连集中到天山街马家烧锅院里，缴了械。（三）阿旗与开鲁县只隔台河一水。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偏见，开鲁县的汉族群众和八路军同阿旗的蒙族群众及自治军之间多次发生小的磨擦。甚至有一次为地主宝音图的问题（阿旗人被开鲁民兵抓去了）几乎酿成小的武装冲突。业喜扎拉森同志主动多次去开鲁县，同开鲁县的张县长、姚政委接洽。妥善地解决了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纠纷。（四）1946年秋末国民党军队进犯到赤峰、开鲁等地，时局极为紧张，业喜扎拉森同志奉命以蒙汉联军第二支队参谋长的身份，为落实坚壁清野的工作，前来阿旗德博勒庙额力登格家，遭到了塔尔巴、额力登格等人的抵制，业喜扎拉森同志做了六、七天说服教育工作，没有收到效果。最后他决定把额力登格留在德博勒庙，自己准备星夜返回天山街，然而背信弃义的额力登格公开叛变，当夜（1946年12月8日）把他抓起来，带到开鲁枪杀，那年他才二十六岁。业喜扎拉森同志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不长的，但在这个不长的时间里做出了很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

（柴·扎木苏）

道布钦巴拉珠尔烈士

道布钦巴拉珠尔同志，解放初期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阿

鲁科尔沁旗支会主任，还兼任着蒙汉联军第三十五团（驻阿旗）政委。他来阿旗工作仅五个多月，便被二十五团的叛匪杀害了。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猖狂地向解放区进攻。承德、赤峰先后被占领，紧接着又占领了通辽、开鲁，逼近到阿旗边界。在这种形势下，以额勒登格为首的一伙匪徒，扣押了去他们那里进行工作的蒙汉联军第二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森同志，胁迫三十五团大部，于1946年末公开叛变。

当时，三十五团团部设在天山街，但额勒登格实际已将三十五团全部人马带到距开鲁西一百华里处的德博勒店自己家附近。在天山的三十五团团部，只有团政治处主任宝音乌力吉等三十余人留守。

额勒登格叛变后，立即派人给道布钦巴拉珠尔政委送去一封信。信中称：昂苏、金巴一伙断道拦截卓盟支队生产车后，已逃至沙窝子里。他们已将昂苏、金巴等人包围，但缺乏轻重武器，打不出来，要道政委接信后，带人携带所有轻重武器，从巴拉奇如德那边过来，快速与三十五团会合。信上分别盖有额勒登格与支队参谋长业喜扎拉森的印章。

这封信是额勒登格的副官扎木苏按着额勒登格的意图写的。额勒登格决定叛变后，感到重武器不足，尚有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和四个掷弹筒留在天山，他们要把这部分武器骗走。

1946年12月1日，道布钦巴拉珠尔接到额勒登格的信。他对这封信深信不疑。他不知道额勒登格已经叛变，并将业喜扎拉森参谋长扣押。前几天他还给额勒登格写过信，告诉他们昂苏、金巴拦截军车之事，要他们阻止昂苏、金巴投奔开鲁。

此时昂苏、金巴果真在东柴达木，不过没有被包围，而是被连长阿力本嘎接回了连里，信中称“被包围”，不过是诱兵之计。

当天，道布钦巴拉珠尔和政治处主任宝音乌力吉商定后，对

当时旗支会工作人员希日布扎木苏说：“明天出发去打开鲁，原打算让莫日根白音跟我去，他有事去不了，是不是你跟我去？”希日布扎木苏表示同意去。道布钦巴拉珠尔又对三十五团留守人员命令说，额勒登格支队长来信，要打开鲁。今天晚上把重机枪、轻机枪检查检查，明天全部带着。

第二天早晨，队伍集合，道政委讲话之后，三十多人，两辆马车，马车上拉着重轻武器，随同额勒登格派来的两个送信人出发了。

下午五、六点钟，到了巴拉奇如德。天黑，队伍住在巴拉奇如德庙。

次日清晨，队伍出发，准备到查干诺尔吃早饭。这时，送信人之一哈日夫（也叫艾日力吐）来找道政委，要和另一送信人阿嘎登嘎先去准备饭。道政委同意了。

队伍走到查干诺尔的图占日格附近时，一个骑驴的牧民撵上了队伍。他拦住希日布扎木苏问：“你们到哪儿去？”听说队伍要去三十五团找额勒登格，他赶紧拦阻说：“你们不能去，阿力本嘎已经叛变了，送信的人就是阿力本嘎打发去的，听说还要抓你们，特别是要抓道布钦。”希日布扎木苏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道政委。队伍停下，道政委来到这个牧民跟前，这个牧民又把原话叙述了一遍。并说，希日布扎木苏我们认识，才赶来报信。道政委沉思了片刻说：“不，不一定，我们三十五团的兵不是那样的兵。”道政委找到宝音乌力吉和机枪连连长白音仓商议了一阵，队伍又继续往前走。

太阳刚要露头的时候，只见沙坨子顶上东南角、西南角都有人出来。大家不由停住了脚步，议论起来。道政委说，去两个人到前面看看情况。派出的两名战士刚出去不远，从南面沙坨子上又窜出了许多人。道政委意识到情况有变，赶紧把那两个战士喊了回来，并指挥队伍迅速往回撤。这时枪响了。叛匪边追边打枪，

我方队伍也边还击边后撤。还没撤出沙窝子，叛匪已四面八方围了过来。我方虽然人少，处于不利形势，可是武器装备较强：叛匪虽然人多，占据地理位置好，但武器多是马枪。双方激战，僵持了三、四个小时。

宝音乌力吉中弹负了伤，道布钦巴拉珠尔冒着弹雨向他喊：“你受了伤，不要动，我们坚持到天黑一起突围！”

越打，包围圈越小。太阳压山，晃得眼睛看不清目标。守在道政委身边的希日布扎木苏对道布钦巴拉珠尔说：“道政委，情况紧急，等天黑突围怕来不及了，你快冲出去吧！”道布钦巴拉珠尔坚定的回答：“不行，我冲出去，留下这些人怎么办？”正在这时，只听西边有人喊：“别打了，自己人。”说着，有几个人步下向这边跑来，边跑边举着双手喊：“别打了，别打了。”跑在前面的还喊着：“别打了，我是关布拉喜。”听到喊声，机枪射手和其他战士以为真是误会，就停止了射击。枪声刚停止，骑马的叛匪就来到跟前把队伍包围起来，夺走了战士的枪支。

几个叛匪扭住了道布钦巴拉珠尔的胳膊，扒掉了他的棉衣，把他推到离战士们二十多米的地方。道政委一边挣扎，一边喊道：“我们都是自己人，你们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事情不可以谈谈么？”那几个叛匪恶狠狠地说：“干什么？你是我们阿旗的祸害，今天送你上西天！”抢劫卓盟支队军车的叛匪金巴走了过来，举起枪，叫道布钦巴拉珠尔跪下，道政委大声说：“要跪只能跪生我养我的父母，生我养我的家乡。”他还要大声喊什么，“呸呸”两声枪响，道布钦巴拉珠尔同志倒下了。

道布钦巴拉珠尔同志牺牲了，团政治处主任宝音乌力吉也在押送途中被叛匪杀害，其余人员马匹枪支弹药全部被劫走，只有机枪连长白音仓只身逃出。这是额勒登格一伙匪徒公开叛变后干出的一桩罪恶勾当。

（嘎尔迪、希日布扎木苏口述 李树民整理）

阿民赛和其烈士

一

阿民赛和其同志1920年5月1日出生于扎鲁特旗伊和他拉苏木（后划归开鲁县）沙日花嘎查三代家奴阿由尔扎布的贫寒家里。家里弟兄四个，他是排行老大。

阿民赛和其从8岁起即当了书童，他服侍着贵族的小主人，在开鲁县胡家岗念了私塾。整天为小主人弄笔磨砚，帮他写写划划。由于他本人聪明好学和4年的私塾旁听，他的汉文书写能力竟超过了他的小主人。同时由于他的性格倔强，从不向任何压力屈服，所以他的小主人也惧他三分，常常请他代写作文，以杜严师的作业。久而久之，阿民赛和其的汉文书写能力提高的很快，在私塾里一个服侍小主人的书童，竟成了深得老师喜爱的优等生了。

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之后拼凑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他们为了培养一批为日伪服务的亡国奴，各地建立了学校。在扎鲁特旗鲁北也建立了一所国民优级学校，从旗内招了生。但是这些学生不是自愿，都是强迫来的。每个村子都有任务，哥俩必须去一个，有钱人家可以出钱，让穷人家的孩子来顶替。所以新来的学生想家，哭爹哭妈。阿民赛和其也在这帮孩子之中，虽然当年他才12岁，但是他与众不同，不但不哭不闹，反而给同来的孩子说，不要想家，不要哭，念书有什么不好，给他们告诉四年旁听私塾的亲身体会。给他们添点温暖，鼓励他们的勇气。孩子们听了他的话，都用佩服地眼光看待他。

阿民赛和其从小倔强，具有不畏强暴的刚强性格。在六年级

放寒假回家后，有一天一个日本人领着几个人来到村子里。当时把伪警察分驻所的伪警察可忙坏了。为了招待日本人，把阿民赛和其家里的唯一的一只羊抓去了。阿民赛和其听了就气的拿牛鞭子从警察后面追上去，往伪警察朝克吐的脖子上打了一鞭。这下可惹起了天大的祸，4个伪警察连踢带打的把他抓去绑在马桩子上就打，打的遍体鳞伤，满头是血，但他仍然大骂伪警察是强盗。父母和乡亲们跪着求情也不住手。可巧惊动了日本人，出来问什么事？阿民赛和其仅用六年级的日文程度争辩：“富人家有成群的羊他不去抓，却要抓我家的唯一的一只病羊，这是什么道理？”日本人一听是病羊，“苦啦！大大的不好！”又问：“你是什么家的小孩？”阿回答：“我是旗立小学六年级学生。”日本人咕嘟了几句，连人带羊都放走了。

二

阿民赛和其从小聪明好学，平时努力功课，学习成绩优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国民优级学校。1938年春天，考入了兴安学校，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小小的鲁北，来到王爷庙（即乌兰浩特）念书。眼界开阔了，接触面也广了，知道的事情也多了。他在学习上还是很用功，学习成绩优秀，由于求知欲望强烈，经过五年苦读，基本上成为精通蒙、汉文和懂日文的高材生了。当时日本人，对阿民赛和其这样能精通三种语言文字的学生特别欣赏，扬言要把他送日本留学。甚至1941年，把阿民赛和其等一批学习优秀的学生送往日本各地旅游，企图培养一批为他们忠实效劳的亡国奴。可是恰恰相反，这些高材生暗地里早已同爱国的蒙汉青年和进步人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们已经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经常偷着俄国十月革命等有关宣传材料和《蒙古》杂志（当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机关刊物），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军的故事。他们在知心朋友之间也议论国家大事和民族的前途。他

们放寒暑假回家时候，也带来这些材料，也给人们宣传革命的思想 and 民族的前途。

阿民赛和其家里有很多书籍和一些刊物。有一次在鲁北国民优级学校念书的其弟弟义兴嘎（现名乌江）好奇的翻了哥哥的书籍，有日文、汉文、蒙文等各种书籍，正在翻阅时阿民赛和其从外面进来，很紧张地抢过书籍，并生气地：“你翻腾什么？”把他训斥哭了。最后拿一本书对弟弟温和地说：“这本书叫‘马尔考思’，是外国的书籍，你对任何人都不准讲我有这么个书，你要答应，哥哥给你一本特好看的笔记本和铅笔……。”就这样哥俩定了个“不说”的盟约。阿民赛和其还有一个总锁着不打开的小箱子，义兴嘎觉得很神秘。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来了之后有一次阿民赛和其打开了这神秘的箱子，从里边拿出报纸上剪下来的两个长胡子老头的照片，装在照相架子里，正正规规挂在墙上。义兴嘎好奇地问：“这两长胡子的是什么老头？”阿民赛和其笑着对他说：“是外国人，一个叫马尔考思，另一个叫恩格斯。”

三

1942年，阿民赛和其从兴安学院毕业回到扎鲁特旗，在国民优级学校任教，担任汉文班六年级的班主任，任教蒙汉高年级的日文课程。阿民赛和其给学生讲课的同时，冒着“思想犯”的危险，经常给学生讲爱国主义思想。

1942年秋天，他剪掉了六年级汉文课本中的挑拨蒙汉团结内容的课文。为此事，受到日本校长马原善太郎的严厉训斥。1943年秋天，他给高年级学生讲历史课时增加了一段“文明古国，英雄的民族”的内容。讲述了七百年前和两千年前的几段历史故事，很受学生欢迎。但是有人把此事又报告了日本老师。原来剪掉课文之后日本人已经安插了耳目。第二天晚上，日本老师兼监事野口三郎到阿民赛和其家里大吵了一顿，责问：“为什么随随便

便剪掉和增加课文内容？所谓文明古国和英雄民族是什么意思？讲这些什么目的？……”。阿民赛和其就以成吉思汗征服欧亚，统一中国建立了强盛的元朝为例同他争辩，把野口三郎说的哑口无言，使他气愤地走了。从此以后，日本人对阿民赛和其产生了严重的嫌疑，但是又找不到可靠的“反满抗日”的证据，所以只好暂时了之。可是没过5天，伪旗政府就下令免了阿民赛和其的班主任教师职务，调到旗文教股当科员，降职监视使用。

当年年末的一天，阿民赛和其上街见了几个哭哭啼啼的牧民，问什么事，原来是乌嘎拉吉屯的牧民，他们拉来木头疙瘩卖几个钱，买点过年的盐米。可是一个日本人把几车木头疙瘩全部卸下来一文不给，求了半天也无济于事，阿民赛和其听了之后气愤地说：“这简直是强盗，我给你们去说理。”阿民赛和其找到那日本人，用日语对他说：“几个牧民要过年，买盐米的钱都没有，你们应该可怜可怜，给他们的钱吧。”日本人冷笑之后站过来问：“他们是你的亲属吗？”阿答：“不是，我认识都不认识，但他们是穷苦牧民，我很同情他们，可怜他们。”那日本人很傲慢地说：“那你走吧，这里没有你的事。”阿说：“你不给他们的钱，我不走。”日本人生气地骂：“混蛋！”阿民赛和其气愤地说：“你们日本人欺压老百姓！”那日本人气愤地拽出战刀，“你反抗日本人，杀头！”就这样日本人把阿民赛和其推到门外，推到坑边，让他跪下来，说要杀头。但也没有执行。整整让他跪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又来一个日本人，才放他回家。

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东北人民见到太阳，得到了解放。虽然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妄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派势力针锋相对的对立起来

了。扎鲁特旗鲁北这个小小地方也不例外，1945年虽然国民党还没有到，共产党组织也没有来，但是，人们都在严肃地考虑着酝酿着跟谁走？跟共产党还是跟国民党的重大问题。具有爱国热血的阿民赛和其，严肃认真地考虑着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来，日本撤退之后在鲁北洪富升阁为首建立了一个“维持会”，组织了他的一派势力。阿民赛和其觉得洪富升阁本身是个伪满警务科科长，他的人马主要是伪警察、上层贵族为核心，所以很难靠得住。所以必须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在一起组织一派势力。他们在一块议论，一致认为，我们民族靠国民党是没有出路，只有依靠共产党才有希望和前途。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他们还认为，在两派势力对立的动乱年代，没有武器没有人马是不行的。这一批人，萨音巴雅尔为首，阿民赛和其是骨干分子。他们1945年10月份起招兵买马，召集了百、八十人，建立了扎鲁特旗自卫团，驻扎在王家堡（现在的工农村）、刘家堡（现在的道德屯）。为了懂得革命道理，阿民赛和其等人到科左中旗巴彦塔拉，在八路军办的教导队学习了一个来月，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1946年4月份，内蒙古自治军阿思根将军命令，把各类部队统一编制，把扎鲁特旗的部队编为内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三十七团，被编入三十七团的有：洪富升阁的人马、萨音巴雅尔的部队，还有宝音陶克套（二虎）、吉木彦（这两股是土匪）的人马。所以三十七团的成份非常复杂，有情愿跟共产党翻身得解放的，有甘愿投奔国民党反动派的，还有祸害老百姓的土匪等三、四种势力混杂在一起。三十七团，当时洪富升阁为团长。为了稳定部队的思想，阿民赛和其等骨干分子，通过各种关系在三十七团官兵中阐述民族前途的说服教育工作。

1946年后半年开始，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了承德、通辽、开鲁等地，八

路军战略撤退。当时形势紧张。在三十七团内的反动分子和伪装起来的假革命派已经坐不住了。1946年5月18日，四连三排排长何文宝为首的18人，叛变投降国民党。1946年8月14日，三连副连长东如布为首的37人叛变投降了开鲁国民党。叛变走时，半夜来把三连（多数为萨音巴雅尔部队原人马）的武器弹药和马匹全部收去。1946年8月，萨音巴雅尔为首在梅林庙重建三十七团。就两个连队，把二虎、吉木彦土匪人马没有编入。团长是布仁巴雅尔，政委是萨音巴雅尔，参谋长是僧格嘎日布（洪富升阁的弟弟）。

由八路军二十军分区和内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和子章部队合编，建立蒙汉联军司令部。司令部、政治部设在林东。为了培养干部，提高骨干人员的政治素质，在林东举办了训练班。三十七团派阿民赛和其等几名同志去学习3个月，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方向明确了，立场坚定了。他一来就任他为二连指导员。他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对部下热情关怀，同甘共苦，能够体现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精神，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他听到二虎（宝音陶克套）等土匪袭击八路军在伊和他拉庙养伤的伤病员和护送连队，残杀十几名同志的紧急消息之后立即把情况写信报告蒙汉联军司令部。得到指示后阿民赛和其去找二虎，写了一封信给二虎说：“请把此信亲自送到梅林庙三十七团部。”二虎把信送到三十七团部，团部立即缴械了二虎的武装。原来阿民赛和其写的信就是缴械二虎的信，因为二虎不识字就来送信被缴械武器。智取二虎之后，决定要枪毙。但是伊和他拉几个村的一部分人出面担保了二虎的生命，免了他一死。但是二虎，对此件事，对阿民赛和其已经恨之入骨了。

1946年10月起，形势更紧张了，开鲁国民党军队经常出来袭击八路军和自卫军。1946年10月，伪满警务科科长，原三十七团团长洪富升阁和其弟弟三十七团参谋长僧格嘎日布率领15人，叛

变到开鲁投降国民党。

一切反动派和伪装起来的假革命派，——离开了革命的队伍，投降国民党。留下来的革命战士们的立场更加坚定了。经过几次叛变，虽然三十七团的人员少了，但是队伍比较纯洁了。萨音巴雅尔政委、布仁巴雅尔团长为首的三十七团，重新整顿了队伍。这时候，阿民赛和其同志在政治上比较成熟了，已经牢固地树立了一心为革命，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为革命的事业，不顾个人得失。本来他有老婆有孩子，给儿子起了“乌兰苏和”（即红色斧头的意思）的名字。因为形势紧，任务重，顾不上照顾他们，一出来就几个月不回去，有时候晚上来，半夜就出走。他老婆普吉玛问他：“你们到底忙着什么事？”阿民赛和其给爱人告诉：“我细说你也不懂，以后没有贵族了，也没有奴隶了，我们奴隶们、穷人们很快要过好日子啦，有自由了，要翻身得解放了，你等着吧，快了。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恩人，是我们的救星，这必须要记住……”他边说边抚摩儿子的头发，亲一亲儿子的小脸蛋，再安慰几句爱人之后离开亲人，走向革命队伍。

1946年11月初，蒙汉联军司令部任命阿民赛和其为三十七团政治处主任。1946年11月7日，三十七团从梅林庙出发，当晚驻扎阿木尔其嘎屯。第二天早上，二虎等几帮土匪突然袭击了三十七团。三十七团指战员边打边撤出阿木尔其嘎屯，阿民赛和其同志主动接受了掩护部队的撤退的任务，占领至高点，阻击敌人的前进。后来被敌人包围，敌众我寡，11名同志被俘。二虎等几帮土匪，知道阿民赛和其是团级干部，又懂得三种语言文字，所以动员他投降：“你跟共产党有什么好处，连肚子都吃不饱。给我们投降吧，给你个团副或副官当。”阿民赛和其同志蔑视敌人：“我饿死，宁愿跟着共产党饿死，绝不舔国民党的泔水！你们是国民党的走狗，死了就喂狗！我跟共产党死了也光荣！让我投降那

是妄想，办不到！要杀就杀！绝不会投降！”1946年农历11月8日，阿民赛和其同志英勇就义，年仅26岁。

1946年11月中旬，蒙汉联军政治部以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的名誉在林东镇大街上贴出《战斗英雄阿民赛和其同志英勇就义》的布告，追认战斗英雄。后来才知道，阿民赛和其同志在八路军教导队学习期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三十七团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阿民赛和其同志的一心为革命，英勇奋战的精神。在清明时候，三十七团政委萨音巴雅尔同志亲自去阿民赛和其同志英勇就义的地方，和家乡的广大老百姓一起给烈士立了个高两丈、一方尺宽的木碑，上面用蒙汉字写“人民英雄阿民赛和其”，纪念了烈士。开了追悼会，号召大家学习阿民赛和其同志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烈士牺牲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鼓舞着千万个人。他的弟弟义兴嘎，继承哥哥的遗志，跟着共产党去与敌人浴血奋战。广大百姓，为了纪念烈士，编了一支民歌，“啊！阿民赛和其英雄，你的英雄业绩我们歌颂，你的遗志我们继承，我们踏着你的足迹前进！前进。”这支歌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广阔的草原上普及，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唱这首歌。人们纪念他，歌颂他，并学习他的英勇精神。这支歌鼓舞着革命人民的勇气，唤起革命人民的斗志，号召大家继承烈士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都瓦萨 整理）

仁 钦 宁 布

仁钦宁布（又名佟荣久），蒙古族，生于1898年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现辽宁省建平县曹府沟村）一个农民家庭。成年后弃农从戎，日伪时期曾在伪警备军第九军管区骑兵六团任团长，不久退役闲居林东。八一五光复以后，参加和子章组织的地方自卫队。1946年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整编巴林左翼旗自卫队为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时任参谋长，是年因故被监护受审查，在监护期间出逃巴彦淖尔盟等地，1957年返回左旗后又被拘审，在拘审期间患重病保外就医，1963年病故。

（旺 钦）

金 宝 光

金宝光，蒙古族，蒙古名图门仓，1900年生于辽宁省建平县王子坟营子一个农民家庭。兄弟人多加上家庭贫寒没有念过书，成年后家庭越来越贫无法维持生活，为生存投到崔兴武部下当兵。时值巴林左翼旗放垦，崔兴武在左旗碧流台川挂了地，建起了窝铺（现在称司令地），金宝光脱离了军籍来到巴林左翼旗给崔兴武管理地铺。

他本人很爱社会交际，不管什么人也交朋友。这时，也逐渐有了点家私，生活富裕起来。日本人占领林东以后，由于他交际面广和官方有了关系，在日伪时期先后担任过伪旗公署庶务股长和大烟组合负责人。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参事官堀田太郎撤离前把林东街里的头面人物找去，面授“备战”事宜，金宝光也是其中之一。和子章在13日组织巴林左翼旗人民自治委员会和自卫队，任金宝光为自卫队队长。

1946年1月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把和子章的自卫队改编为东蒙古人民政府自治军骑兵第四师，金宝光为第四师供给部部长。

(旺 钦)

博 拉 哈

博拉哈，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人，1909年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家庭，青少年时代应为喇嘛，但从未住庙，长期在家弄枪猎兽。在二、三十年代兵荒马乱之际，以保家护畜为己任。

1930年左右，曾被本旗王爷授与闲散梅林的荣誉头衔，在日伪时期虽已废除，但人们习惯称他“博拉哈梅林”。

1936年，和子章去蒙疆在德王军队里当副团长时，博拉哈也曾同去当了几个月的副官，但自己实在不愿意当兵从戎，就退伍回家。回家后曾有不长时间当过巴林左翼旗警察署查干哈达分驻所所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伪满垮台，时局动乱之际，他出面组织了查干哈达的自卫队，自任队长。他虽是田夫野老，但他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并能骑善射，略懂行兵布阵之道，因此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愿跟他共同来保护家乡的安宁不受外来侵扰。不久他的人马归和子章编入左旗保安总队。之后，成立昭盟第四师，旗保安总队分为两个团，博拉哈任33团团长。1946年底他解甲归田，脱离部队。

1947年冬的土地运动当中做为富裕牧户并为追查什么枪支而他被批斗清算，以后的屡次运动中都被做为斗争对象，在“文革”中还被追查“内人党”问题。由于年老体衰和经不起多年的折磨，他在1968年猝然去世。

据悉，近年和子章问题得到解决落实政策后，内蒙古军区有关方面已表示承认并肯定昭盟第四师33团的建制和博拉哈的33团团长。

（戈更夫回忆 旺钦调查补充）

桑 杰

桑杰，蒙古族，赤峰市巴林左旗人，祖上满族，生于1900年。其父叫嘎海喇嘛，他10岁时到贝子庙当喇嘛，20岁当“聂拉巴”喇嘛，21岁任林东荒务局稽查到33岁。伪满时当过巴林左旗警备队队长一年。曾在日本人在林西办的干部学校学习。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迅速突破在华日军主力——关东军防线，红军先遣部队在1945年8月中旬进入左旗境。

在林东的日本人纷纷逃窜，当时左旗地方实力人物和子章（清卓力格图）为维持地方治安组织地方自卫队。桑杰参加了和子章的自卫队，编入自卫队第一大队任副大队长。

1946年初，东蒙自治政府成立，任命和子章为东蒙自治军第四师师长，把和子章的巴林左翼旗自卫队整编为两个团（三十二、三十三团），桑杰任三十三团副团长，后任运输队大队长。桑杰从1945年8月加入自卫队至1947年初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亲自参加了老道板、五十家子两次磨擦。1947年6月由于“历史问题”逮捕入狱，送兴安岭林区劳动改造。1952年释放，回到家乡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翁沁扎拉嘎（王安池爱里）当牧民。1973年病故于王安池。

（旺 钦）

恩 和 图 布 新

生于巴林左旗敖尔盖（敖尔盖现归巴林右旗），是和子章的侄子。1930年他曾去北京入蒙藏学校读书。据戈更夫回忆，恩和图布新在北京求学期间，曾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大约在1933年左右，恩和图布新回到原籍巴林左旗，在林东蒙民小学任教，以后当了伪警察。1945年日伪垮台前，他曾在巴林左旗白塔子当过警察署署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在白塔子区搜集伪军警散落的枪支组织当地牧民成立自卫队（保安队），后编入和子章的巴林左旗保安总队。

1946年1月,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和子章被任命为东蒙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师长后,巴林左旗保安总队编为三十二、三十三团,任三十三团团团长,不久两个团合编为一个团,仍保留三十二团的番号,恩和图布新就任三十二团团团长。

1947年初整编三十二团时,昭盟盟委(对外称民运部)、二十军分区(热北军分区)和第四师领导决定输送恩和图布新以及连排干部十余名到热河军区土城子(克旗)军事学校学习。

1947年冬颁布“土地法大纲”热河地区进行土改,此时军队也进行了“三查”工作。当时由于出身、历史、成份等问题把恩和图布新定为清理对象,先关押后送到兴安岭林区劳动改造,至六十年代后期释放回家,随其子迁到克旗牧区当牧民。几年前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复查时,给他落实了党的政策,承认恩和图布新为革命军人。

(旺 钦)

敖 子 洋

敖子洋原籍喀喇沁右旗中官营子人,建平高中毕业后来林东土木富洲双井沟落户,当私塾先生。1935年参加伪满兴安西省警备军,在第三团当中士,1938年任司务长,1941年在乌兰浩特少尉候补生学习班学习,毕业后任少尉排长,被派往伪兴安师司令部副官处。1943年提升中尉军械员,1944年回到巴林左翼旗土木富洲乡为农。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林东时,和子章成立自治会,被任命为土木富洲治安分会会长。1946年“四三”会议后,和子

章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任命敖子洋为内蒙古骑兵四师三十二团副团长兼团供给处主任。1946年曾随部队参加过阿旗黄羊洼战斗。1947年3月，参加过在林西木石匣一带的剿匪战斗，1947年被捕审查。1949年获释，被送回林东当农民。1986年由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给予落实政策，恢复了原来的职衔，按离休干部待遇。

(王玉龙)

仲 乃

仲乃，蒙古族，姓王，1905年生于巴林右旗巴彥尔登。父名苏嘎都尔，是扎噶王手下的梅林。

仲乃七岁时开始便跟一个叫乌苏荣贵的老师读书，18岁为扎噶尔王当卫士。他身材魁梧，面色紫红，长于骑术，枪法甚精。康德五年，曾任兴安警备军驻大板四团一连上尉连长，该年与扎噶尔二女鲍紫英结婚。婚后，退伍随扎噶尔王到长春（伪新京）与扎王亲家和子章及其大女婿恩和森住在一起。从此仲乃赋闲，一直到1945年。这年夏回到巴林右旗。苏蒙军赶走日寇，仲乃组织自治军。开始分三个小队，仲乃任大队长。士兵在蒙古长袍上佩戴红袖标，人称仲乃军。小队长有达理扎布、特古斯吉日嘎、道尔吉等。仲乃身边有秘书达瓦、翻译阿其图、参谋萨日呼、警卫员敖德斯尔。指挥部设在东呼和格日的仲乃宅内。昭乌达盟各旗县1946年1月代表会后，各旗县按一团规模组织军队，仲乃又在查干诺尔的拉珠道尔吉举行集会，将原来的三个小队扩充为四个连，仍称仲乃军。1946年4月，东蒙古自治军骑兵第四师建立，

仲乃的部队被编为第三十四团，团长仲乃。所部驻守巴林右旗边沿地带查干沐沦、嘎拉达苏台、呼图乐河、巴林桥、查干诺尔、拉西席力庙、排毛都、胡日哈、乌兰陶劳盖、巴彥西格日等地。

“四·三”会后，东蒙自治军改称内蒙古自卫军，仲乃仍任自卫军第四师三十四团团长的。

1946年秋，仲乃根据四师命令，指挥两连人马在克什克腾旗白岔一带，与股匪白金辉作战，大获全胜。秋末，三十四团与三十六团组成第四师第二支队，仲乃任支队长，额尔恒巴图任政委，郎布仁钦任参谋长，沙日夫为副参谋长。

1946年10月15日夜，仲乃团长不幸遇难身亡。

(伊 丽)

额 尔 恒 巴 图

额尔恒巴图，1920年12月28日生于巴林右旗巴彥呼述后胡日牙钦村，父名德力海。额尔恒巴图8岁至15岁在家从事简单劳动。15岁至19岁在大板读书。1939年至1940年末，在扎兰爱里师道学校特修科学习；1941年1月到1942年9月在大板小学教书。该年被迫加入满洲第一国兵林西警备团三连。三个月后，到吉林北大营宪兵训练处学习一年半。毕业后，从1944年4月至1945年8月，在林西宪兵分团担任后方工作人员、秘书等。

1945年秋，林西伪满官员逃往赤峰时，额尔恒巴图以去巴林桥找车为由，连夜逃回家中。1946年3月加入巴林右旗自治运动联合会。

1946年“4·3”会议后，额尔恒巴图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举办的干训班学习一个月，之后，担任巴林右旗旗支会主任和自卫军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

1947年8月到1948年9月，入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并参加宁城、赤峰等地土改运动，为期八个月。此后，在赤峰等地重点中学当教导主任，曾多次被评为模范。但他在历史上参加宪兵和担任苏蒙情报人员（当时的中共党组织认可）的经历却成为他一生的累赘，每次政治运动，无一幸免。

于1982年在大板因病逝世，终年63岁。

（特·武力更）

鲍金昌

鲍金昌，卓索图盟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冯家站东北犴犴屯人，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弟兄三人，其居中，出身贫寒。

民国六年（1917年）鲍金昌于苏鲁克旗蒙文学校毕业后，入京奉铁路护路警卫军军校就读。二十多岁时，为了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队伍作对，曾在苏鲁克旗、彰武县一带“拉竿子”，号“添红”。1931年初，哲里木盟达尔罕旗的兵务梅林嘎达反对放垦，造反达尔罕王爷和东北军阀张作霖，鲍金昌大力支持嘎达梅林造反，并参加起义队伍。后嘎达梅林和鲍金昌在西拉沐沦河一带被李守信和他的部下黑河（额木格图）重重包围。黑河在西拉沐沦河里枪杀了嘎达梅林，而鲍金昌率部下十三人冲出重围，后

继续反对东北军阀张作霖和李守信等。活动范围在卓索图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地。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蒙知识青年发起组织“内蒙古自治军”（后来受到日军的控制和破坏），鲍金昌担任自治军第三军副军长（日文《最新满洲国人名鉴》昭和九年八月版112页）。

伪兴安省建立后，任鲍金昌为伪满兴安南省警备军驻郑（郑家屯）办公处处长。两年后，升任伪兴安南省伊胡塔警察署长、警正，荐任八位。伪满康德二年（1934年），任巴林右翼旗第一任警务科长。半年之后，获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伪“蒙疆政府”，号召蒙民“有志之士”参加伪蒙军的消息，他辞职回彰武县招兵千余人带到伪蒙疆政府。到了德王处，他才发现当年镇压嘎达梅林和鲍金昌起义的李守信正在蒙疆政府军任总司令，而亲手枪杀嘎达梅林并强占了嘎达梅林妻子牡丹的额木格图也在这里当师长！而德王又将鲍金昌放到额木格图手下当团长，鲍金昌没干，只选了无权无职的“嘱托”。空衔干了五年。这期间他蹲了两次日本宪兵队监狱。一次是1939年敖门罕事件后，外蒙古将德力格尔和旺吉勒二人派到内蒙古做地下工作。二人到了厚和（今呼和浩特）与鲍金昌取得了联系，被日本特务德力格朝格图发现并告了密。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如用刀刮背、用火烫等，但鲍金昌没有供出任何人的名字和事情。日伪毫无办法，一年后放他出狱。另一次是怀疑他与苏联共产党有联系，他以一些金条买通关节获释。

1945年春，鲍金昌的长子鲍荣久从通辽到厚和（今呼和浩特）接鲍金昌回家乡。不久，日伪垮台，解放了。

光复后，鲍金昌从彰武县带原部下12名炮手来昭乌达省驻地林东投奔蒙骑四师师长和子章。和子章遂将鲍金昌派往驻大板的三十四团给该团长仲乃当助手。不久，鲍金昌被委任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三十四团副团长。在大板，他住在东大庙东三喇嘛（根

普勒)住宅的西厢房。鲍金昌善用手枪,枪法极高。他用的枪是马牌噜子,随身携带,一时不离。

1946年6月国民党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南已侵占了赤峰,东已侵占了开鲁,形势严峻。8月,鲍金昌以叛变嫌疑在大板被捕审查。在送往林东途中的保日黑勒地方被监送人员处死。同鲍金昌一起处死的还有喇嘛扎布。鲍金昌死时46岁,遗有二子、四女。

(纳·宝音贺希格整理)

张 华 廷

张华廷是个资历较长的老同志,原籍不详。1937年至1945年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七旅工作,1945年11月率二四干部团的一些同志来到林西。干部团到林西后,分散到经棚、林西和当时新收编的“骑兵团”,着手组织经棚支队、林西支队和改造骑兵团。张华廷任林西支队政委。在任林西支队政委期间,张华廷同志曾率部打击热水汤一带中央军组织的红枪会,打击张桐轩、白金辉匪帮,配合“天大支队”在林东、天山、开鲁一线剿匪,在大王庙、多伦一线打击仁钦道尔吉匪部。1947年调任蒙汉联军骑四师三十四团政委。1949年调任内蒙古军区骑兵第四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来又调第五师工作。1954年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1965年转业到内蒙古党委工交政治部主任。1972年调太原市,历任重型机械厂党委书记和市委领导职务。

(本文根据色登扎布同志提供的情况和手头仅有的资料整理)

却 吉 宁 布

却吉宁布是巴林左旗阿贵庙第四世呼毕勒干（转世活佛），出生于本旗东协理萨钦扎布家，六岁时由阿鲁科尔沁旗巴其楼子庙葛根认定为阿贵庙转世呼毕勒干的灵童，次年聘请庙中坐床，十二岁赴阿鲁科尔沁旗罕庙拜查干呼图克图活佛为师学经文，二十二岁返回本庙，主持本庙事宜。

却吉宁布1940年任伪满洲国喇嘛教团巴林左翼旗分会会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却吉宁布为了保卫家乡和自己的财产及寺庙的安全，组织起地方自卫队。此时林东的和子章出任林东自治会会长并组织地方自卫队（后来改称保安队），却吉宁布的正自卫队被编入巴林左翼旗保安总队。

1946年1月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和子章任东蒙自治军第四师师长，把巴林左翼旗保安总队改编为第四师，却吉宁布的队伍被编为三十二团第三连，他被任命为三十二团副团长（曾代理团长）。随部队转战昭乌达盟北部草原，参加过“保卫天山”战役、围剿仁钦道尔吉匪徒以及阻击白金辉匪部等较大战役。由于当时他率领的三十二团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积极，在追剿塔日巴叛军的战役中，三连连长元旦仲乃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光荣牺牲，当1947年5月该团路过林西时，当时的《群众日报》记者曾专访却吉宁布，并在该报发表了关于喇嘛团长（却吉宁布）的长篇报导。

1947年末，由于时局和“左”的思想影响，却吉宁布被“洗刷”回家。合作化前后在原籍巴林左旗沙日哈达爱里当放牧员，

1967年遭受“文革”中的政治迫害，于1969年病故于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腰力阿鲁爱里。1987年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给予落实政策并颁发了“病故军官证明书”，遗属得到生活补助。

(旺 钦 整理)

包 英 昌

包英昌，男，蒙古族。1919年生于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苏木，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克旗支会主任、三十六团政治部主任、团长。1949年后，历任内蒙古骑兵第三师副参谋长、内蒙古公安总队副参谋长、昭盟军分区副参谋长。1952年12月任昭乌达盟副盟长，后调任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副厅长。1988年4月逝世。

(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办)

察 干 楚 仑

察干楚仑，男，蒙古族。生于1924年6月，克什克腾旗新井人，1946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察干楚伦同志，1937年至1940年12月在乌兰浩特兴安学院读书，1941年至1944年就读于新京医科大学，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15日在伪满通辽飞行队当军医；1946年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克旗支会副主任，三十六团政委；1948年至1949年4月任克旗旗长；1949年5月至1954年3月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民政厅科长、卫生厅副处长；1954年4月后，历任呼伦贝尔盟卫生处处长、呼伦贝尔盟公署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84年5月任呼伦贝尔盟政协副主席。

（克什克腾旗政协文史办）

布仁巴雅尔

布仁巴雅尔，原籍喀喇沁人，日伪时期在伪军中当过连长。日本投降后曾去锡盟，不久来林东投奔和子章。热北党政军迁驻林东后，表现积极，当时三十七团团长江富升格对政局态度暧昧，蒙汉联军将洪富升格调到林东，派他代洪担任三十七团团长。后来洪富升格叛变，布仁巴雅尔同志与政委赛音巴雅尔重新整理和扩充三十七团，在稳定扎鲁特局势和剿匪斗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历任哲里木盟库伦旗旗长，内蒙古军区第四师某兵团长，内蒙气象学校校长等职，死于“文革”中的“批斗”。

（据有的同志忆述整理）

赛音巴雅尔

赛音巴雅尔，扎鲁特旗籍，伪满沈阳农大毕业，在日伪军队里当过中尉军官。日本投降后，团结扎鲁特旗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探求民族自治道路。1946年秋任内蒙古自治军第四师三十七团政委；1947年5月转业任扎鲁特旗第一任旗长。现在吉林省工作。

(根据仅存资料整理)

农乃扎布

农乃扎布，蒙古族，1917年生于东土默特旗（阜新）农民家庭，1940年至1945年在王爷庙伪警察学校当战术教官。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蒙古对日宣战。8月13日王爷庙苏蒙军城防司令部用蒙汉两种语言广播通知，一切伪军政、公务人员必须在8月15日上午8时到火车站附近的好太儒（日本旅馆）集合开会，研究如何维持社会秩序和其它事宜，会议是苏蒙军城防司令部和原省公署领导人共同召开的。农乃扎布于8月15日早8时到好太儒报到，当时哈丰阿、阿思根也在，另外报到人有军警约300人，军警学校的学生二百多人。在会上城防司令部的一名

蒙古族军官讲了话，主要是安定人心和进军东北的重大意义。当时经哈卡阿、阿思根等人研究，商量组织一个总省临时政府，为维持治安首先成立了一个内防厅，下设四个科两内防中队，四个小队。人选是：内防厅长阿思根，内防科长张尼玛、民政科长包明德、刑事科长嘎儒布僧格、农乃扎布任保安科长。两个内防中队维持王爷庙街里的治安，四个小队分驻在四个分所。

1945年9月初，博彦满都、哈卡阿等10几人去蒙古，找乔巴山元帅，商讨内蒙解放以后怎么办。博、哈等人向乔巴山提出内外蒙合并，当时乔巴山说不行，外蒙革命二十多年了，而你们内蒙古在日伪统治下刚刚解放，步调不一致。不行要他们回中国找毛泽东，并说你们筹备自治也可以，要和八路军联系，他们能帮助你们。因此，博、哈等人9月下旬从外蒙回来就准备成立自治政府，筹建工作这样开始的，首先确定自治范围，除原兴安总省管辖的37旗外，还想把原不在兴安总省管辖的郭前旗、郭后旗、杜尔虎特旗、伊克明安旗、苏鲁克旗、土默特右旗（朝阳）、土默特左旗（阜新）、翁牛特左右2旗、喀喇沁左中右3旗包括进去共49旗。既然召开代表会议，必然要各旗代表参加，确定谁是哪个旗的问本旗选代表。会议定在1945年11月3日在王爷庙召开。会议代表报到日期定在3日之前。10月3日回各旗选代表的从王爷庙出发。土默特左旗在王爷庙的人有4人（察隆阿、蒙和舞乐极、贡嘎丹儒布、农乃扎布），有人因怕担风险（有土匪）不愿回原籍，最后他们3人和农乃商量让他回去，当时他也不愿回去，商量结果他也同意回阜新。

农乃扎布于1945年10月3日从王爷庙出发，临走时带上证明信件（蒙、汉、俄文），当时铁路没恢复就跟苏军军车到沈阳，从沈阳坐火车只走了60华里铁路被国民党破坏，他们几个人下车后步行60里到新民县找苏蒙军城防司令部。苏军问清情况以后把他和其他六个人用军车送到阜新。正遇上从关内到东北的八路军部

队，部队刘政委听了他们来的目的和要求以后，说：八路军同意支持少数民族自治，和国民党根本不同，毛泽东主席支持少数民族搞区域自治的。并于第二天在一个大院内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八路军进军东北的意义，同时征求蒙古青年愿意不愿意去王爷庙参加东蒙自治大会，谁愿意去直接找从王爷庙来的人（农乃扎布）。当天晚上农乃扎布住处去了20多名蒙古青年，他把王爷庙的情况介绍后，只有四个人愿意去。这就是阜新五位代表。回王爷庙没有交通怎么办，当时德力格尔忠乃同志向王宝山同志说你家开三个烧锅，弄几匹马吧，经王宝山做工作，王家提供了五匹全鞍马。11月13日从平安地出发，当天到库伦旗，遇上库伦旗代表18人（他们都有枪马），一路路过12个旗，到王爷庙时人数已达420人（其中300来人有武器）。到王爷庙，听说会议移到葛根庙。到葛根庙，大会刚刚开始，大会领导很满意。他见了哈丰阿和蒙和舞乐极后，回王爷庙没有参加大会。

这次代表会参加的还有沈阳来了几名老八路军参加会议并指导了工作，东北局和西满分局发来贺电。这次代表会议共开了13天，选举产生了东蒙自治政府人选：

主席：博彦满都

副主席：哈丰阿

下设六部、六盟，呼伦贝尔盟（海拉尔）、纳文木伦盟（扎兰屯）、兴安盟（王爷庙）、哲里木盟（通辽）、昭乌达盟（林东）、卓索图盟（赤峰）。

东蒙自治政府成立以后，面临的问题是组建基础政权，所以东蒙自治政府决定派遣工作团组建基层政权。这时东蒙自治政府公布萨嘎拉扎布任昭乌达盟主席（也有人说省他回忆没有正式文件公布）。为了解决交通工具，当过伪警校教官的留日生博和从大烟库的窗口进去背出一麻袋烟土，把烟变卖一部分拴了四辆胶车。他本人也来林东，所以工作团借了个方便。1946年正月26

日从王爷庙出发，整整走了半个月到达林东。

工作团共七人，萨嘎拉扎布、察隆阿、蒙和舞乐极、道布钦巴拉珠尔、博赫、农乃扎布、贡嘎丹儒布（道布钦巴拉珠尔因开会没有一同来）。他们这些人连家属分坐四辆车。

第一辆：萨嘎拉扎布及其爱人，通信员（20多岁叫那顺）共3个人；

第二辆：察隆嘎及其爱人子女，农乃扎布及其爱人和子女，以及农乃扎布的通信员（吴彬19岁）共9人；

第三辆：博赫及其爱人和子女、通信员玉山（22岁），民警队副队长丹参道尔吉，共7人；

第四辆：蒙和舞乐极及其爱人和子女，贡嘎丹儒布及爱人和子女，共8人。另外护送他们的民警队（也叫内防队）22名乘马全副武装，队长叫海儒布。路经，二牛索口、杜尔吉、代钦他拉、突泉、鲁北、昆都、乌兰苏木到林东。到昆都时由林东的那苏图前去迎接，3月8日早从乌兰苏木出发下午到林东，当时和子章300多名自卫队和百十名职工群众在古城北边（现在的百货公司南）举行了欢迎仪式。

林东当时是个不足6,000人的小城市，没有招待所，把工作团成员分散安排在大车店，来到的当天晚上在三庆园举行宴会。宴会后在西协理家的日式炕上开的会。参加人员有王爷庙来的他们七、八人，和子章方面也七、八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萨嘎拉扎布讲了来的目的和任务，蒙和舞乐极把来的人作了一一介绍，双方寒暄之后，萨嘎拉扎布当场宣布林东自卫队编为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任和子章为师长，和又说感谢之类的话和自己的决心。第二天休息，第三天晚也在旧地开会，在会上宣布昭乌达“盟”人选，萨嘎拉扎布为昭乌达“盟”主席、察隆阿为秘书长、那苏图为秘书长、贡嘎丹儒布为秘书科长、博赫为内防处长、农乃扎布为公防科长、蒙和舞乐极为教育处长。以后开了几次会议，

主要研究旗县政权如何建立的人选问题。

以后历任蒙汉联军骑四师保卫科长、盟农牧处长等职，现已离休。

(根据本人回忆整理)

胡 图 仍 嘎

胡图仍嘎，1890年秋生于巴林右旗白音罕山查尔斯泰一个牧民家庭。自幼跟阿日本嘎老师学得蒙、汉、满三种文字。后来，给业喜诺尔布公当杂役，间或给同龄人教字，为老年人抄书，“八一五”前夕，为伪协和会会员。

1945年秋，和子章在巴林左旗组织自卫队，胡图仍嘎也在家乡组织了人数不多的自卫武装，1946年1月仲乃扩军，胡图仍嘎将所有枪支以及个人所有的马、牛、羊全部交出，并联络苏日呼日查、拉西道尔吉等参加自治军（当时已称警备军）。东蒙自治军第四师成立后，胡图仍嘎任三十四团第三小队副队长。1947年1月任三十四团副团长。团长为确吉敖斯尔。据确吉敖斯尔证实：胡图仍嘎任三小队副队长时，拒绝他的上级韩桑杰叛变为匪的利诱。相反，率部与叛匪进行了殊死搏斗，夺回了叛匪劫掠的财物、牛羊。1947年3月，三十四团政治处在白音布统被五百余国民党匪徒围困，胡图仍嘎率部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24小时激战，击退了敌军，使政治处脱险，保卫了家乡。

1947年秋，胡图仍嘎的家乡搞土改，他请假回家主动向工作队交待他的历史情况和家产时被处决。当时任三十四团副团长的吴振邦急忙前去营救，已经来不及了。时年49岁。

(那·色登)

额勒登格

额勒登格（蒙古族），阿鲁科尔沁旗人，博尔济吉特氏，阿鲁科尔沁右翼台吉，出生世代官僚家庭，父名那达木德巴（管旗章京），幼年读私塾。

● 民国末年任阿鲁科尔沁旗协理，日伪时期任伪阿鲁科尔沁旗警务科长，1942年转任伪阿旗总务科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与伪阿旗旗长曹德那木道布一起，组织地方自卫队。

1946年初，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昭盟各旗地方武装编为东蒙古自治军第四师时任三十五团团长。同年任第四师第一支队支队长。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相继侵占通辽、开鲁时额勒登格随其喇嘛兄塔日巴，策动三十五团大部叛变投靠开鲁国民党李守信部。

1947年春，开鲁解放时，被我军俘虏押回昭盟，在冀察热辽二十军分区军法处关押。

1947年冬，在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被镇压。

洪富升格

洪富升格（汉名学礼，字希圣）是黑龙江省泰来县东平人。

1930年，在放垦中，其父当了揽头，从中渔利成了暴发户。日伪时期任扎鲁特左旗警务科长。在加林台事件后，日本参事官将其数忠一事报省转国务院。不久，以伪满洲国的名义授洪一枚祝国勋章。

1943年任扎鲁特旗协和会监事职务。

1945年8月扎旗解放，洪组织维持会自任会长。

1946年，第四师三十七团成立时任三十七团团长的，不久投靠开鲁国民党。1947年春，开鲁解放时被我军抓获。

萨嘎拉扎布

萨嘎拉扎布，蒙古族，汉名郑凤祥，1907年生于牧民家庭。幼时失去母亲，父名郑福增，民国年间当过公主陵丁，续娶了一房，萨曾受继母虐待。民国七、八年间，日本人博益三在大板开设了一个蒙古产业公司，常在王府坐客，以收购右旗的辽代珍贵文物为名，广交朋友，与萨的父亲相识，也常到郑家坐客。博益三发现萨受继母虐待，并看中了萨有培养前途，遂将其带回日本国学日语。回国后，1920年又通过博益三保送，到原大连满铁公司成立的育成学院事务管理科学习。1922年7月毕业，回到大板在“蒙古产业公司”当仆役。此后，1925年4月至1929年又被保送到原育成学院学习蒙、汉、日、英文；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在郑家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当雇员；1934年调任伪满兴安西分省公署事务科任科长，荐任8等；1935年任兴安西分省公署总务科长，荐任6等8级；1936年任兴安西分省公署理事官，荐任5等7级；1937年任兴安西省公署秘书官兼劝业科长；同年，扎

噶尔省长调任新京（现在的长春）兴安局任特任总裁，萨随同调到兴安局任秘书官；1939年“诺门汗事件”发生后，他受扎噶尔总裁的委托，以伪满军事代表身份参加伊尔库茨克的谈判；1940年至1943年11月调到伪巴林右翼旗公署任旗长，荐任一等勋5位，其间主张发展民族文化教育，组建“兴学会”，成立喇嘛学校等，同年11月调到王爷庙（现在的乌兰浩特）伪兴安总公署任官房参事官，翌年任兴安总省公署民生厅长。

1945年解放时，他在王爷庙（现在的乌兰浩特）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任执行委员职，与西满分局主动联系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1946年2月，萨嘎拉扎布以东蒙古自治政府工作团团团长身份，带领蒙和舞尔极、察隆阿等人携带部分武器来到昭乌达盟（林东），组建昭乌达盟省政府，萨出任昭乌达省主席。其间，按照东蒙古自治政府的指示，他主动与驻林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热北专署接触，以防止对峙和磨擦。3月下旬，萨嘎拉扎布带领那苏图、确吉敖斯尔等人到林西会见热北地区党政军领导。承德“四·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热北地区党政军机关迁到林东，6月，在林东成立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萨嘎拉扎布出任行政委员会主席。

1947年调王爷庙工作。同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翻译处处长、中央驻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内蒙古组副组长等职，曾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萨嘎拉扎布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蒙汉日文翻译工作。在工作中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坚决维护各民族间的团结。他在负责蒙古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期间，不辞劳苦，搞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调查。在他主持整理阿拉善等旗的调查材料的基础上，曾产生出相当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他还和其他同志合作，完成了

日文《清代蒙古社会制》一书的翻译任务。

“文化大革命”中，萨嘎拉扎布被诬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员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4年1月病故于呼和浩特市。1978年5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在呼和浩特市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

（阿其吐）

那 苏 图

那苏图，原喀喇沁右旗黑水八大营子人，汉名白士俊，1911年生。从七八岁开始在私塾读书，后来家境不支，十五岁失学。当时，汤玉麟部队驻黑水一个营，那苏图失学后，到这个营当“小鬼”。

1926年奉军与国民军开战，那苏图随军转战山西、山东等地。奉军失败投降蒋介石，那苏图所在的东北路军骑兵第十旅某团驻新丘（即今建平县新丘），那在团部当文书。“九一八”事变，那苏图随部队撤到包头，之后，开小差回原籍，经其表叔乌勒吉敖喜尔介绍，到伪兴安西省地方科哈丰阿手下当雇员。1935年，地方科兴办财经干部学校（训练班），秘密发展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那苏图被发展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不久，升任署官（相当于今天的科员），后因“电台案”入狱。

所谓电台案大致是这样的。1937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了加强东西部联系，从第三国际弄到一部电台，乌勒吉敖喜尔辗转委托吴相文捎给那苏图存放，不久，吴相文叛变，1941年5月20日，兴安西省日本特务机关的两名特务，押着知情人玛尼拉（苏联东方大学毕业）来找电台。事实上，这部电台由于买不到蓄电

池，一直没能使用。吴相文叛变后，那苏图受命捣毁并埋到房后。特务机关取走电台，那苏图因此被捕。在狱中，那苏图一口咬定因与吴相文是同学，藏的什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电台才毁坏埋掉，其余一概不知。日本人因查无其它线索，于1941年9月20日释放那苏图，并继续监视一年。出狱后，那苏图把情况报告内人党东蒙地区负责人之一哈丰阿和西蒙地区负责人之一乌勒吉敖喜尔。哈丰阿等于1942年9月设法把他安排到巴林左翼旗，初任庶务股长，1944年代阿巴瑞米达担任总务科长。

1945年5月，日伪统治陷于风雨飘摇，身任伪兴安总省参事官的哈丰阿，趁来林东检查工作之便，告诉那苏图，“日本人超过10月必败。日本败退后，由于遗留的民族矛盾很深，如处理不好，很可能发生民族间的残杀、流血事件。所以要提高警惕，要组织武装进行自卫。要争取和子章。他这个人，在民族革命问题上可能有点做为，到民主革命时期很可能动摇。……国民党靠不住，要同共产党合作。”

日本垮台当时，那苏图与和子章等共同组织了林东“自治会”，任秘书长；1945年11月“东蒙古青年同盟巴林左翼旗本部”成立，那苏图任名誉书记长；1946年3月在林东组建昭乌达省时，他任昭乌达省秘书长；同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昭乌达盟分会成立，他任副主任；同年6月，热河省政府领导组建昭乌达盟临时行政委员会，他仍被任命为秘书长；临时行政委员会改盟政府后，他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农牧处长。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成“老虎”，关押五个月，无罪释放，调内蒙古自治区农牧部任农产处长；之后，去中央农业干部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任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干部离休制度形成后，离休于内蒙古农业科学院，现年79岁。

（孟克 整理）

敬 文 泰

敬文泰，原名赵化民字维范，幼名发财。蒙古族，1879生于大板。父名赵特格舍（汉名赵福山），民国年间在巴林右翼旗当过梅林。

赵化民青少年时在大板读私塾三年，教他的老师叫李忠和。后来放过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与当地牧主赊了一部份马赶到黑龙江、海拉尔一带贩卖获利。次年，他在齐齐哈尔开办龙江饭店。其间，与东北军张作霖及其部下发生来往。

1903年回到巴林右翼旗，是值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北京的日本驻京军方，派出以爆炸东清铁路嫩江大桥为目标的两名“别动队员”，一名姓冲，另一名叫横川，他们由北京坐骡驮轿出发，经过古北口、热河，越茅荆坝一直到喀喇沁王府。来找他们同伙伊藤、吉原两个人，密谈二日。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给他们换上喇嘛服装，并派辛占柱护送到巴林右翼旗，巴林王扎噶尔指派敬文泰继续送往哈尔滨。途中被东清铁路队发觉，将冲、横川二人逮捕，当场枪决。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派出特务多名，他们一路由巴林右翼旗王爷扎噶尔派敬文泰当向导，并配备了乘用马匹，路经乌珠穆沁草原，前往海拉尔，日本人都化装成喇嘛，在海拉尔市近郊潜伏，企图炸毁海拉尔铁桥，瘫痪俄军运输线。但因俄军戒备森严，未能达到目的，仅炸毁一段钢轨。敬文泰取路张家口回到北京。向扎噶尔汇报，得到扎噶尔王的信任，留在巴林王驻北京办事处。

北伐战争后，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1928年冬，敬文泰被派作昭乌达盟代表前去祝贺。

1930年（民国十九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蒙古会议”，起初提名巴林右翼旗杨敬文泰（梅林）为昭乌达盟蒙族代表，此人在出席前夕病故，旗方临时委派赵化民顶杨的名额参加这次会议，赵遂改名“敬文泰”赴会。

清顺治年间，固伦淑慧公主下嫁给巴林第一代王爷色布腾时，顺治帝曾将其在隆化县城附近的一片狩猎地划给淑慧公主，名曰胭粉地。原名波罗河屯。因为是公主胭粉地，改名皇姑屯，并建有康熙行宫（在隆化县城址）。一直到第十三代王扎噶尔时，从该县每年税收课银以五成交巴林王府，课银由隆化县代征，但是，不是收不齐，就是某项亏空。扎噶尔王爷遂想把此胭粉地卖掉，并指派敬文泰办理此事。卖地一事，被当时热河军阀汤玉麟知道，将敬文泰吸收到热河省经济委员会任嘱托职务，企图垄断卖地款。卖地后，敬将此款秘密送到北京扎王处，被同事人王铁山密告于汤玉麟，汤借故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将敬全家监禁到承德监狱院内。一直到1930年经东北军阀张作霖（敬因与张有交情）去信，始解除监禁，暂住到热河承德南营子头条胡同。

1933年3月3日东路日军侵占承德，地方权贵闻风而逃，老百姓到处躲藏。敬文泰不但没躲避，还在自己的大门口挂了一个木牌子，上书“蒙古人敬文泰寓”。日本人看到这个牌子很是惊奇，质问他为啥要挂这样的牌子。敬说自己是有功于日之人，并将两次当向导破坏沙俄铁路的功绩详细作了介绍，当时受到日本人赞扬和保护。以后回到本旗。

翌年（伪康德元年），任兴安西分省开鲁警察局局长，荐任四等一级。1936年（伪康德三年）任兴安西分省公署总务厅长，荐任四等七级（满洲国官吏录上署名敬棍太）。至1939年（伪康德六年）4月改任巴林右翼旗旗长荐任三等五级，1940年（伪康德七年）

升为荐任二等。1941年（伪康德八年），荐任二等加勋五位，同年10月1日“依据文官令第九十八条一款”宣布为退官。

1942年（伪康德九年），敬文泰被邀为巴林右翼旗协和会旗本部委员兼大板上协和分会长、兴农合作社理事（义务）等职。其间，在大板南希登包冷经营一部分稻田地。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0日上午，日本参事官（多田正美）在旗公署门前广场召集在大板街内的全体伪职员，公布“战时体制紧急动员令”，将全旗伪职员和部分警察、自卫团员合编为北边镇护国境警察守备队，并把武器库打开分发枪支、弹药。日本参事官提出将伪旗公署院落、兴农合作社全部“焦土化”，敬文泰提出反对，只放火烧毁了旗公署、兴农合作社一部分房屋和物资仓库。然后，参事官多田正美带领日伪人员向本旗阿贵庙方向逃窜。同日，敬文泰同范文廷、郑廷华、杨畅茂等人，在大板街经堂庙前，组织各界人士百余人集会讨论如何准备迎接苏军。大家推举敬文泰为迎接苏军代表。敬带领大板街蒙汉各界三百余人，出迎苏军，苏军军官到来时，举手致意，表示热烈欢迎，并将苏军军官请到自己住宅，将前大厅让给苏军作为苏军驻大板城防司令部。

随后，敬文泰按照苏军指令，一面派白德英（哈斯宝）、范文廷二人到昂嘎吐把苏联红军招降的通知，转告跟随日本参事官逃往阿贵庙的阿拉坦瓦其尔旗长等伪职人员；一面在经堂庙召开群众会议，宣布苏联红军安民告示和苏联红军进驻大板的情况。当苏军装甲部队途经大板南下，敬文泰又带领一百多人在大板街西头欢迎。当时，苏军官指示，地方上要有人管。8月20日，敬文泰自发成立了巴林右翼旗国民党党部，他本人任委员长，下设委员多人，即发白袖章，在大门上挂巴林右翼旗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在院里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旗。一个星期后，听到临近旗县都没成立国民党党部，苏军驻防司令部也对成

立国民党部，不满意，敬立即降旗摘牌，在旧公爷府门前召集百余开会，根据群众意见，改建为巴林右翼旗地方维持会，敬本人为会长。

8月下旬在东大庙召开伪村长、地主、牧主、伪职员参加的“代表大会”，组建巴林右翼旗政府，会上敬文泰当选为旗长，下设总务、经济、民政、保安各科和民警总队。基层组织了区公所和民警分队。

1945年9月下旬，由林西方面一部分部队路经大板开往林东。在老道板与巴林左翼旗和子章地方武装发生冲突。当时八路军牺牲二人，遂即撤回大板（住在敬文泰院内），和子章武装以博勒哈大队长为首尾追至大板北面各山包，准备包围敬文泰大院，敬立即派吐布朝格吐、特占斯巴特尔、仲奈、那孙孟和、赛音朝格吐等人，出面调停，安全地由民警总队长仲奈护送回林西。

1946年1月1日，热北方面乘坐苏军汽车，来到林西县周家大院，同和子章进行正式谈判。敬文泰做为和方代表出席会谈。会谈时热北方面人员有张焕然、苏雷等，和方有和子章、敬文泰、那苏图、老布僧普尔来、义礼通阿等；苏军驻林西城防司令马丁洛夫参加了会谈。敬文泰态度积极，努力促成谈判。会议达成如下协议：①和所率武装人员，必须在阴历正月初五以前撤出林西县境；②林西方面的八路军亦暂不进驻巴林左右两旗；③热北地委在昭盟建政等问题听候上级决定。

1946年4月东蒙古自治政府在昭乌达地区成立昭乌达省时，解除了敬文泰自任的旗长职务，任察隆阿为第一任旗长。苏军驻大板城防司令部撤退后，苏军少校尼克来处理善后事宜。通过敬文泰培训了尼克搭拉其、苏格德尔扎布二人为苏牒报人员（主要传送国民党的消息），并发给每人电台一部。尼克来少校临走时，拿出一张苏币让他俩每人抓住一头扯开，各自将一半苏币号码保存。尼对敬说“一旦需要与苏联联系时，凭此半张苏币对号人苏

联和外蒙古国境。”1947年秋，敬文泰赶胶车一辆，运着砖茶火烟，以行商为名，同其弟吐布朝格吐（汉名赵连骧），将其子特木尔巴特尔（铁蛋），自优格珠尔庙，越中蒙边境，以半张苏币号码为联络，交给尼克来少校。

1947年巴林右旗进行土地改革，敬文泰在林东被拘捕入狱，经几个月审查，后因病释放回家，1962年病故，终年83岁。

（阿其吐）

苏达那木道布

我父亲苏达那木道布是阿鲁科尔沁旗王爷的协理，日伪时期任过旗公署总务科长、旗长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东蒙自治政府成立，我父亲又在阿旗当旗长。也就是解放后的第一任旗长。他1974年3月30日病故于呼和浩特。

关键时刻站到革命这边

抗战胜利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你站到哪一边的激烈斗争，对一个贵族出身又当过伪旗长的我父亲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的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对我父亲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

1945年秋，东蒙自治政府成立，派柴扎木苏、道尼道尔吉、乌力吉陶格套等三位同志来阿旗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哈丰阿、博彦满都还写信给我父亲，委任他为阿旗旗长，按着根据东蒙自治政府的部署，我父亲组建了阿旗政府。哈丰阿、博彦满都信中

说：八路军是可靠的朋友，应该发动全旗的广大青年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我父亲按照信的内容和要求，召集了一些伪职员、警察及从外地回来的伪国兵和青年学生，参加旗政府工作。这时的主要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宣传革命道理。

1945年冬季，传说八路军已到林西，巴林左旗的和子章为了不让八路军入蒙旗境内，派人向我父亲提出左阿两旗合兵或互援。我父亲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没合也没给支援，他说：“动枪动炮不是一般的事，尤其是八路军和中央军不一样，绝不能出兵打他们。”对此事的处理，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转变。

1946年“四·二”承德会议，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结束了“东”“西”分离的局面。此后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阿鲁科尔沁旗支会，道布钦巴拉珠尔任支会主任，并改组了旗政府，昭乌达盟公署正式任命我父亲继续担任旗长，恭额春、陆棣为副旗长。同时，共产党派来的惠北海等同志到了天山街，把旗政府由昆都迁往天山，为开展革命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1946年冬，塔日巴、额勒登格发动了反革命叛乱，投靠了国民党，这对我旗上层人物和某些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我父亲毫不动摇，对工作还是那么热情，对革命前途坚定不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在这个时期，也就是1945年秋到1948年，我父亲被调离阿旗前的这段时间，斗争错综复杂，事端层起，只简述几例。

一个是1946年冬，乌兰夫同志路过林东、阿旗去乌兰浩特，虽然很保密，在社会上还是吸引了很多方面的注意。我父亲极为重视，派关布来喜等同志分两路带兵去乌兰坝和拉什寺庙，他自己带一部分兵到罕苏木迎接乌兰夫同志。阿力本嘎伙虽然包围了罕苏木，但我们有一定的兵力和八路军的配合，打退了他们，

完成了乌兰夫同志安全路过阿旗的保卫任务。

1947年春，我旗土地改革运动普遍开始，我父亲提出自愿把自家财产交给群众的要求，这事得到了盟长吴广文的批准，派来鲸嘎同志参加我父亲交付财产的群众大会。交付财产按照党的政策：我们有房子住，四季不缺衣穿，留够家用器具。当时盟的领导说我父亲是开明绅士。

调离阿旗后继续为革命努力工作

1948年冬，根据工作需要，把我父亲调到东蒙古自治政府（乌兰浩特）参议室工作。以后他由政界转做文化工作，工作性质有了变化，父亲仍然努力工作。父亲懂蒙、汉、藏、满四种文字，后来，他在文化战线做了一点贡献，这与他的文化知识分不开的。

1955年至1957年，经国家有关方面同意，我父亲应邀到援蒙总工程师处当了翻译员，前后两次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为增进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这期间他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曾有过我父亲三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传说，是去过三次，除上述两次之外，1945年冬初他去过一次。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对日作战，路过我旗时抢走了很多我旗的历史资料和带走一部分青年，为了解决此事他去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没到国都，就被蒙方答复并送回来，事情也没得到解决。但他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买来《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等革命书籍，通过学习，他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当时送给我一本《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一书，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里收藏着。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我父亲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中蒙医研究所做藏药处方翻译工作，蒙医大夫们跟他配合的很好，一起住，一起下乡，深入到牧区调查研究。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带来了灾难，象我

父亲这样的“历史人物”更是逃避不了的。父亲被撵出工作岗位，回原单位参事室待命批斗。由于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的原谅，他的身体虽然没有受到那么严重的折磨，但在这场混乱中，安稳度日是不可能的，我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写交待材料给他人出证言材料等。偶尔我见到他，他说：现在从外地来要证言的越来越多，有的不知道历史，乱说乱问，不按他的意思说，有些人就动手动脚。不管怎么样，我是坚持真实的，不然就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时，我也是被当作“钻进党内的异己分子”被审查。我把被批斗的情况讲给父亲，他鼓励我说：“你走的路没错，今天把你开除，以后最起码还是管你生活的。”

1974年春，我父亲得了癌症，住进了医院，他知道自己病不能治好，他说：死了以后把我的尸体献给医疗事业。并写了尸体交给内蒙古医学院的遗书。我们遵照父亲的遗嘱把遗书交给了医学院，医学院没有接受。我父亲在遗书中说：“要是这个愿望不能实现的话，把我的骨灰撒在黄河里。”按父亲的要求，我们把父亲的骨灰撒在黄河里。

1974年3月30日，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组织上给他作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评价。这能够反映我父亲一生的某些方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父亲的一生也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党的政策为他平反昭雪，对株连的子女也落实了政策，没有工作的最小的女儿也给安排了工作。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如他九泉之下听到这些，该有多么高兴啊！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

（色布勒玛文 敖都译）

内蒙古各族人民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

乌兰夫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今乌兰浩特成立。当时，内蒙古东部地区是东北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也是东北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为东北的解放乃至“辽沈决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建立政权 安定后方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建立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建成为东北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是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工作和斗争的。

记得“七大”前，中央决定我去蒙绥地区工作，任我为蒙绥政府主席。参加“七大”后，我就从延安出发，途经山西偏关，适值日军投降，遂和吕正操等同志一道随军北上，到了商都。其时因绥远省城被国民党抢占，我又从暂驻商都的蒙绥政府赶赴张家口，见到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同志。他留我先在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告知我德王已经逃跑，伪蒙疆政府留下一批人，让我去管理安排。这样，我便着手清理伪蒙疆政府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八五”以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苏蒙联军出兵后，日军投降，其东西傀儡政权伪蒙疆政府和伪满兴安总

省也随之倒台。我们正在挺进途中，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因此伪军警宪特仍在为非作歹，土匪十分猖獗，社会极不安定，各种势力都在竞相活动。国民党则妄图攫夺抗战胜利果实，抢占了内蒙古一些地区，并笼络少数王公贵族，向一些地区派遣特务，秘密建立国民党党部。与此相呼应，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也从南京北上，大造“内蒙古自治”的舆论，力图把内蒙古重新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对于国民党，内蒙古广大人民，甚至包括一些民族上层在内，早已是深恶痛绝；他们由于对过去遭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统治的罪行记忆犹新，因而不抱任何希望。但少数曾在伪蒙疆政府和伪满兴安总省任过要职的一些官僚政客和王公贵族，此时却打着民族的旗号，搞所谓“内蒙古独立”和“内外蒙合并”的活动，企图窃取内蒙古的领导权，继续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而广大的内蒙古人民，则对于抗战的胜利，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渴望早日获得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摆脱被奴役的贫困落后状况，只是怎样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实现这个美好愿望，还缺乏明确方向。因此，当时内蒙古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同样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抉择，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内蒙古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自然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1945年9月9日，在苏尼特右旗出现了一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出现后，聂荣臻同志传达中央指示，让我去进行处理。十月间，我轻装简从，只和奎璧等少数同志到了苏尼特右旗。当时不仅看到这个为时月余的“临时政府”每天还打铃上班，升降国旗，而且获知已经派出了外交使团，去谋求外援。其中政府头目，是伪蒙疆政府的法院院长补英达赖，成员包括一些王公贵族等上层人物和一批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我去后，积极同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并向他们指出，我们主

张国内各民族共同斗争，共求解放；主张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不是什么“独立”。特别是说明，内蒙古长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革命斗争历史，已经把蒙古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要使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不独各方面不能认可，就说蒙古族人民，也是不能允许的。所谓“内蒙古独立”，对内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全国革命的胜利都是不利的。在说明这些道理时，我特别注重做青年工作。广大青年是愿意革命的。我们开座谈会，一讲就是半天。我向他们说明，补英达赖是蒙奸，张家口还在通缉他，你们选他做主席，行吗？他们在讨论中，开始时虽然对此问题也有人不服，但是团结在我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青年，因为认识到补英达赖是蒙奸，便都愿意进行改选。这样，我就将一步路，分成了两步走，先行改选，再创造取消他的条件。后在改选中，他们选我为这个政府的主席，政府成员里还增加了几位中共党员。我随即商得他们同意，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往张北搬家，并就此停止了以这个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事后我返回张家口，立即向晋察冀中央局和党中央报告了处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所了解到的内蒙古各地的情况，同时向中央请示，我们准备成立一个领导自治运动的组织，以便开展工作。

1945年10月23日，中央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的电报指出：“在目前我们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电报指明：“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同时指示我们：要加强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民族上层应积极争取他们参加自治运动，使我们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小限度。对蒙古伪军亦应与其他伪军不同处理，除最反动者

应武力解决外，一般的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其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渐改造。电报还指出：要教育我们到那里工作的干部尊重蒙古人的风俗习惯。要我们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举办有利于蒙民的各种文化、经济建设事业及社会公益事业。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统一领导内蒙古的自治运动，我们正式提出了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和具体方案，并先取得晋察冀中央局的同意，由晋察冀中央局于1945年11月9日电报请示中央，提出成立一个群众团体，“名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带有政府的咨询机关性质。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办学校，联络各盟旗，团结王公、喇嘛、知识分子，准备将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各盟旗政府下，成立蒙古人民的自卫武装。”第二天，中央即回电称：“同意你们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针。”我们经过筹备，即于1945年11月25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盟旗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成立了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我担任了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和工委书记。其间，联合会吸收内蒙古各地区各阶层人士参加，甚至连原在伪蒙疆政府工作的和那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要愿同我们合作的，也被吸收进来为委员。那时我问那些上层人士，那个“临时政府”怎么办？他们说，大家都参加自治运动联合会了，那个政府也就算了。这样就取消了那个政府。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一个半群众团体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它在各盟旗建立分会和支会，派遣干部，健全机构，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收编整编解放区内各盟旗的保安部队。它自成立后产生了巨大号召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人民和各界青年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原来已被傅作义部队控制的一支蒙古军队，就是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歧

视，前来投靠自治运动联合会，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我们成立军政学院，就是以最先起义的部队为基础，为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和进一步开展自治运动培养了干部。因此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1月底，东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王爷庙派来一位代表包玉昆，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东蒙情况。我们听了这些情况后，为迅速开展东蒙的工作，遂于十二月派出了一个东蒙工作团，沿怀来、承德、赤峰一线向东蒙进发。行前，我还特地写信给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交东蒙工作团副团长克力更同志带去，内容是，请富春同志能够相机派出部分干部，协助我们开展东蒙工作。但东蒙工作团路经围场时，遇到大股土匪阻隔，没能及时通过。次后，当克力更同志到达郑家屯后，将我的信交与富春同志。富春同志对他们说：你们来得太好了！东北的解放对于全国的解放至关重要，而内蒙古的统一对于东北的解放也很重要。现在你们来得正好，赶快去王爷庙吧。他们在富春同志派车送去后，便与东蒙自治政府的负责人进行了频繁接触，其间达成的协议是：尽早互派代表，举行谈判。

1946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冀热辽军区的部队要进入昭乌达盟，遭到东蒙自治军第四师的阻挡。他们声称这个地区归东蒙自治政府管辖，不得进驻，于是双方发生磨擦。中央给我和东北局打电报，让我去处理这一争端，并研究解决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问题。后经东北局提议商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自治政府各派七名代表，于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问题的会议（即“四三”会议）。这次会议，突出地围绕着内蒙古的领导权和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在争论中，经过我们耐心的工作和反复的协商，终于统一了思想，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确认：内蒙古地区必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会议同意，由东蒙自动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按照中央先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做群众工作的指示，决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领导东部四盟的工作。东蒙自治军改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一致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接受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军区的领导和指挥。

“四三”会议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民族结束了长期被分割的局面。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为把内蒙古地区建成为巩固的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曾作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广泛深入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积极领导群众，分别在农村进行了除奸反霸和减租减息、在牧区进行了削弱封建特权和民主建政的斗争。同时以实行自由放牧，奖励生产，打击旅蒙商的不等价交易和发展国营贸易事业等措施，逐步解决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困难。而在张家口、赤峰、王爷庙等地，则通过开办军政干部院校，先后培养了三千多名少数民族干部，他们在解放内蒙古和东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时，内蒙古各盟旗的王公、扎萨克、总管，以及伪满和伪满疆的一些蒙古族高级官吏，都是内蒙古的民族上层；他们在民族内部都有一定影响。在开展自治运动中，只要他们拥护人民解放战争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都采取既往不咎和包下来的政策，把他们吸收到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各级机构中，安排一定的职务，给予适当的照顾。这样做既可安定上层，又利于发动群众，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形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甚至对少数倾向革命，要求加入我党的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物，我们也根据他们的表现，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壮大了我们自己的力量。

与农村的除奸反霸和牧区的民主建政相配合，我们还组织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进行了剿匪和抗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日军投降后，内蒙古地区的伪军警宪特残余势力还很猖狂，他们同一些反动王公、土豪劣绅相勾结，组织起名目繁多的各种匪帮约两万多人。他们盘踞在内蒙古地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残杀共产党干部，祸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如果不把这帮匪徒清剿干净，不但民主改革难以进行，群众难以发动，后方亦不能稳定。为此，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在各地党和政府的协助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作战方针，经过在兴安盟、纳文慕仁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的剿匪作战，除闻风远遁的残匪外，共计毙伤匪徒三千四百多人，收降两千七百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马匹。紧接着，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于1946年6月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之时，内蒙古解放区亦遭到严重威胁。国民党七十一军的三个师和九十三军的一个师，与蒙奸李守信等部相勾结，侵占了内蒙古地区的开鲁、通辽、库伦、赤峰等地。对此，内蒙古人民自卫军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奋起自卫反击，配合兄弟部队与国民党匪军展开了殊死斗争。战斗中，部队指战员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很快收复了被国民党抢占的地区，英勇地保卫了内蒙古解放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减少了东北前线部队的后顾之忧，并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1946年冬，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成立后的一年中，由于以我党为核心，统一领导了内蒙古东西部的自治运动，废除了历代统治阶级所推行的重重压迫与剥削制度，受到了区内外广大蒙古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并在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坚定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跟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与决心，因而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的呼声，从西到东，自下而上，十分强烈。

也就在这年底，中央指示东北局、西北局和晋察冀中央局，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同时让我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去，亲自组织筹划。当时锡察盟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从贝子庙出发后，穿行于土匪出没地带，沿途安排妥西部各盟旗的党政干部、王公贵族代表、筹备工作人员随后启程事项，边走边检查工作，经林西、林东、到达了王爷庙。到后即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博彦满都及东、西蒙总分会负责人等，又一起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东北局会议，研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问题。我们与博彦满都等负责人协商同意，确定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和施政纲领。为能确保这些商定的事项得以顺利实现，会后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并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工作。

1947年4月3日，正逢“四三”会议一周年时，我们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东西部各盟旗，各阶层的三百九十二名代表，包括工人、革命军人、农民、牧民、妇女、青年，以及一些上层人物和宗教人士，共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大事。我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总结和分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经验和自治运动联合会一年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任务。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少数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公开提出“内蒙古没有阶级，不能进行民主改革”的谬论。我们根据内蒙古的经济形态和实际存在于城镇、农村、牧区的阶级状况，给予坚决批驳，从而坚持了党的领导原则，确定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至于人选，本来在哈尔滨就已是协商定了的，但这时又有少数人提出要“自由选举”。并且请客拉票，妄想推翻东北局的决定，由他们来掌握政府。其实通过讨论，我们取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因此我对他们说：既然你们要自由选举，那就让代表们自由取舍吧。后经选举证明，果不出我们所料，挑起事端的人恰恰得票很少，还得通过我们做说服工作，才为他们保留下一定的位置。

就这样，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艰苦紧张的工作，内蒙古自治政

府终于在1947年5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我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但毫不奇怪的是，即使在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斗争还在继续着，少数有影响的上层人物，继人民代表会议之后，又提出要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时我说：先把你们的党纲拿来，看看是不是合乎我们自治政府的方针。他们没有拿出党纲，于是不了了之。后来东北局经过慎重考虑，并请示中央同意，于同年7月9日电告我们成立了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后于1949年改为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保证了党对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工作的领导。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我们祖国大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它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提供了范例。它的成立，对国内外震动很大，影响深远。它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我们在自治政府成立后，就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并于5月19日接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鼓励我们说：“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古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内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随后，我又打电报向东北局汇报，并当彭真同志途经白城子时，专程前往向他汇报了政府成立的情况。彭真同志认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不仅是蒙古族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东北地区以至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他对自治政府的成立，表示了热忱的祝贺，并指出：在内蒙古这么大一块地区，能够建成为一个安定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本身就是对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巨大支援。

进行改革 支援前线

1947年，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后，在内蒙古农业区进行

了土地改革和广泛的民主运动。这是我党为赢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掀起的一场社会变革。我们根据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和内蒙古地区的具体情况，本着既坚持彻底消灭封建压迫，废除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解放生产力，又坚持慎重处理好围绕土地问题可能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农牧矛盾的原则，制定了内蒙古农业区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这样从1947年11月开始，到1948年4月结束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内蒙古广大农业区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民群众翻身作了主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整个农业区一当打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翻身农民就自动地组织了农会、民兵、妇女、青年等群众组织，掌印当家，参加政权，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建立了各族农民之间新的阶级友爱关系，实现了内蒙古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彻底的人民民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在农业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我们对牧业区也进行了民主改革。我们根据牧业区阶级结构和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制定了“依靠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改造和从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封建特权，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生产”的总方针，实行了“牧场民族公有，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扶助贫苦牧民，牧工牧主两利”（简称“三不两利”）的政策。这项方针政策的实行，既废除了牧业区的封建特权，又鼓励了牧主、富牧发展生产，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安定，避免了牲畜的损失和死亡，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的大幅度发展。并由此一举，使得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无论在乘马、鞍具、皮衣、皮帽、毡靴、食品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供应。因此，这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它使内蒙古草原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至于城镇，我们主要是发动群众，开展了对于暗藏的日伪国特的检举运动，清理了社会渣滓，建立了政权和工会，保护了工

商业的发展，安定了社会秩序，同时建立和恢复了一些工厂，为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用，支援前线，做出了贡献。如军械厂、皮革厂和被服厂，他们将制造的武器和军需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装备了内蒙古骑兵部队，补给了东北野战军。

这个时期，由于农村、牧区、城镇民主改革的普遍兴起，部分蒙奸恶霸和反动地主预感到他们的末日来临，他们为了维护其封建剥削制度，破坏民主改革，与伪满军警残余势力和国民党相勾结，组织起地主武装，杀害我土改工作干部和积极分子，捣毁我区乡政权，使一些地区的民主改革难以进行。为了保障各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顺利进行，我们又一次组织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展开了剿匪斗争。在战斗中，广大指战员不避艰险，英勇顽强，同时配合政治攻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毙伤匪徒六百余人，捕俘匪徒二百余人，收降百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匪患，保卫了民主改革运动的胜利成果。

总之，经过广泛的民主改革运动，内蒙古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贫苦农牧民翻身作了主人，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他们造福的党，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就是他们的子弟兵。他们在各条生产战线上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城乡群众的生活也得到初步改善。这时，改革后的工人农牧民为使部队有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以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当时内蒙古地区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号召下，各盟旗都成立了支援前线委员会，广大农牧民在“打老蒋、送好粮”的口号下，节衣缩食，精心挑选，把最好的粮食、最好的牛马羊送往前线。仅兴安盟、纳文慕仁盟和呼伦贝尔盟，三个月就缴送了一亿一千多万斤公粮；哲里木盟缴送了二万二千多斤牛羊肉，八万四千多斤羊草。内蒙古自治政府给前线运送了折合人民币四十一万多元的牛羊肉、干菜和其他军需品。当时，内蒙古解放区经济还比较困难，广大群众能够拿出这么

多物资支援前线，实在说，是相当不容易了。不仅如此，成千上万的农牧民青壮年，为了保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保卫自治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人争先恐后，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和骑上自己的马、带上自己的枪，前去参军的动人景象。仅昭乌达盟就动员了四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的兵力，并组织了二十八万民工支前。支前民工们抬担架，搞运输，破坏铁路，担负战场勤务，及时把作战物资送到前线，把伤病员运往后方，充分保障了我军作战的需要。同时，各地群众在生活还不富裕、劳力紧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前方战上和民工能够安心参战，对烈军属、支前民工家属，凡是缺乏劳动力的，普遍实行了包耕制，生活给予关照，做了大量的优抚工作。内蒙古各族人民就是这样从多方面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对“辽沈决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

组织武装 并肩作战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提出：少数民族地区要“建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晋察冀中央局也多次指出，要我们组织蒙民自卫武装。可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在内蒙古直接由党领导的部队，只有一部分游击队和少数盟、旗的地方武装，而各盟、旗王公贵族的保安队却很多。因此在日军投降后，我们通过多数盟旗保安队和伪军的起义反正，收编改造了大量旧军队，同时动员大批翻身农牧民和青年学生参军，根据内蒙古地区特点和自然条件，组建起一支新式蒙古族骑兵部队，这是我们在开展自治运动之初，首先抓出的一项成果。到“四三”会议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所辖部队为五个骑兵师和一个纵队，其中蒙古族指战员占部队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为

剿匪肃特，保卫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运动的开展，为解放内蒙古和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这个时期，为了加速教育、改造和提高这支蒙古族武装，东北局、西满分局、晋绥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都先后派来许多优秀干部，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委员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他们以我党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开展政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而使这支蒙古族骑兵部队，一开始就在肃清境内伪蒙疆和伪满残余匪患的实战中，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革命的社会秩序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这支部队的精神力量。广大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决心不惜牺牲一切保卫内蒙古解放区。这支部队，遵守《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中提出的，在党的领导下，人民自卫军必须忠于民族，忠于人民，拥护政府，遵守政府法令，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整纪律，保卫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建军方针。他们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胜利的战斗中，尽管气候恶劣，供应不足，行军艰苦，作战频繁，但官兵无怨言，部队很巩固，数年间涌现出了许多为人称颂的英雄和模范。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动了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在这三次攻势作战中，内蒙古骑兵部队配合主力并肩战斗，活动于农安、怀德、康平、彰武、黑山一线，击退了增援四平之国民党骑兵，打击了抢粮的敌人，清剿了散匪。部队还四次挺进敌后破袭北宁路，致使敌区的交通命脉长期中断，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在这三次攻势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共与国民党正规军及其他地方军作战六百三十余次，毙俘敌一万九千余人，缴获各种口径炮、轻重机枪、长短枪八千五百六十余件。战斗中，部队发扬了蒙古族骑兵骁勇、灵活、迅疾和擅长出奇制胜、穷追猛打的传统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为孤

立长春、沈阳之敌，扭转东北战局，贡献了力量。战斗结束后，受到了东北军区的嘉奖。我代表内蒙古党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给部队发了慰问信。

1948年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成立了内蒙古军区，中央任命我担任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战斗间隙，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经过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内蒙古和解放全中国的信心，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也得到了充分发扬。特别是由于广大农牧区经过民主改革，大批翻身农牧民踊跃参军，增加了部队的新鲜血液，农牧民成分占到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因而纯洁了队伍，严明了纪律，胜利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思想工作 and 杀敌立功运动，指战员们情绪饱满，士气旺盛，个个争当功臣和杀敌英雄。并在此基础上，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热潮，运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传统练兵方法，从骑兵特点出发，进行骑兵战术技术训练，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所有这一切，都使内蒙古部队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48年辽沈决战前夕，内蒙古骑兵部队按照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挺进到铁岭、沈阳、新民、彰武地区，完成掩护主力和开辟新区的任务。在广阔的正面地段，对沈阳、新民地域之敌进行了封锁，对骚扰之敌给予了沉重打击，为野战军部队进行整训创造了条件。八月中旬，内蒙古骑兵部队又奉命开赴长春前线作战。临出发前，我到部队驻地作了动员，要求他们配合东北野战军，坚决消灭美蒋反动派，为人民再立新功，并在战斗中锻炼壮大自己。部队驰赴到大黑林子镇地区，任务是：如长春突围之敌途经黑林子镇时，采取顶、拉、侧击的战术，迟滞敌人的

行动，堵截敌人退路，严防敌人逃跑，并要争取时间，配合主力部队将其歼灭。8月29日，部队在辽河北岸阿其堡堵截铁岭逃敌，广大指战员乘马冲杀，俘敌一六九师运输团二营营长以下一百零五名，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五挺，六〇炮三门，冲锋枪、步枪四十八支，子弹五千五百余发。

辽沈战役开始后，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决战的电文中，都提及内蒙古骑兵一、二师，并将这两个师部署在适合骑兵作战的地段，充分发挥了这两支蒙古族骑兵部队的作用。在辽沈战役的整个过程中，从攻打锦州，会战辽西，到夺取沈阳的五十二个日日夜夜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始终配合东北野战军战斗在最前线，胜利地完成了战役侦察、占领前进阵地、侧翼威胁、阻击突围与远距离追歼敌人等任务，常常是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战斗。战斗中，广大指战员高举锋利的军刀冲锋陷阵，使敌人闻风丧胆。内蒙古部队在坚守阵地的浴血奋战中，英勇顽强，人在阵地在，他们在和敌人多次展开肉搏战的拚杀中，有许多蒙古族优秀儿女，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骑兵一师二连连长布和吉雅，就是带领全连坚守阵地而壮烈牺牲的。他们经过誓死抗争，为黑山、大虎山的阻击战赢得了时间。10月25日，骑兵一师二团在大虎山以南勐家窝堡一线占领阵地，保障了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阵地右翼的安全。当时，敌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在四门山炮和三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他们的阵地猛烈轰击，全团指战员顽强迎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在这次战斗中，三连连长拉木扎布、指导员敦敦满都拉带领战士，从敌人侧翼发起乘马冲锋，冲进敌人的重机枪阵地，当战马被打死后，他们就徒步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为解放东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特等功臣甘珠尔，用重机枪击落了敌人（RST式229号）侦察飞机一架。战斗结束后，我们授予他“英雄勋章”一枚。锦州解放后，内蒙古骑兵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参加追歼企图

从营口乘船南逃的敌五十二军的战斗，敌军除军部、二十五师及三个团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在他们追歼南逃之敌的途中，沈阳宣告解放。至此，伟大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彻底解放。

“辽沈决战”胜利后，国民党蒙骑一旅逃向内蒙古，准备西去接受绥远国民党指挥，妄图作最后挣扎。东北野战军授命内蒙古骑兵一师追歼这股逃匪。骑兵一师的指战员虽然在辽沈战场上连续奋战了五十二个日日夜夜，人困马乏，尚未休整，且又时值隆冬，部队棉衣未到，指战员还是头戴单帽，脚穿单鞋，但他们为了不失时机追歼敌人，接到命令后，就日夜兼程，穷追不舍，直至十多天后，追到昭乌达盟的林西，余匪向西远遁才作罢。至此，内蒙古东部解放区彻底肃清了多年未绝的匪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广阔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派太平景象。

这个时期，担任留守任务的内蒙古各骑兵部队，在歼灭各地区散匪的战斗中，也是相当艰苦的。为了保卫内蒙古解放区、巩固后方交通和支前供应线，他们从盛夏到严冬，常常是在沙漠、草原、荒山地带完成追歼任务。特别是部队在没有穿上棉衣的情况下，有时一个连只能分到一个蒙古包住宿，多数战士经常是在冰天雪地里露营。而剿匪作战又往往是远途奔袭，日夜兼程，转战千里，行军比打仗的时间多出许多倍，这就更加辛苦了！广大指战员经常是用一把炒米、一把雪充饥，断粮是常有的事。有些人常常因疲惫不堪，在马上打盹睡觉。但在剿匪战斗间隙，他们却又象生龙活虎一般，为沿途广大农村、牧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协助当地政府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各族人民立下了新功。他们不愧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优秀的子弟兵。

内蒙古骑兵部队在东北解放战争，尤其是在“辽沈战役”中，以其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写下了一章与兄弟部队并肩作

战、发挥骑兵特长、屡建战功的历史。这一章历史，无可置疑地说明，经过这场人民战争的考验，内蒙古部队已经锻炼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智勇兼备的人民铁骑。这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光荣，是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辽沈战役”距今已三十六年了，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能在伟大的“辽沈决战”中贡献力量，是非常光荣和值得自豪的。而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的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秀儿女，更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头！他们的勋业，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他们的榜样，正激励我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

东西蒙承德会议主要决议

——云泽报中央、中央局、东北局、西满、晋绥分局——

此次邀请东蒙博彦满都等来承德会谈，自3月30日至4月2日，关于现阶段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向、路线、政策问题，基本上已获得同意，并于四月三日举行会议，正式通过。

决议主要内容：

甲、内蒙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只有中共领导帮助，才能得到解放。在目前形势下，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东西各盟旗均组织其支会分会，实现其纲领，应建立各盟旗民选政府，分别接受各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及帮助。

乙、他们提出东蒙自治政府成立时，曾申明内蒙自治运动有统一机构后即可撤废。现东西蒙已统一于联合会，该政府即可撤废。决定东西蒙代表回去即召开代表会议，实行解散，会后在东蒙设联合会总分会领导工作。东蒙人民革命党已宣布解散。

丙、蒙汉杂居区实行蒙汉分治，盟管旗、专署管县，蒙人优势区或深入蒙人区之汉人区，汉人实行民主自治，受民主盟政府领导，盟旗政府按具体情形应有汉人委员。“九·一八”以前未设县之地不再设县，设治局废除，不改设县，深入蒙地之汉县，八路军得在该地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维持治安以防特务活动。

丁、扩大原联合会机构为八部一处，增选执委至61人，候补8人，常委24人，云泽为主席、博彦满都为副主席，但在东蒙政府未宣布解散前，不能公布。

戊、各解放区国大代表应注意蒙古代表的问题，并争取选出民族代表，补国民党指定之蒙古代表中已死或投敌罪大者之名额。

己、各解放区政府帮助解决救济蒙人，培养干部，军队训练、给养及机关经费服装等问题，西满多派干部参加王爷庙蒙古工作。

庚、以赤峰为内蒙古临时中心地，联合会迁此。

此次东蒙从外蒙及其实际体验中已知内蒙民族运动是中国革命一部分，中共真能予以帮助，故自愿接受我党领导。他们原计划（划）最低限度成立内蒙临时政府来代替东蒙政府，此次虽未实现，但对会议结果仍满意。现其主要负责人××××××××要求入党，我们准备接受。

目前已具备在广大内蒙区域发展工作的良好条件，请考虑设立统一的党委或工作机关的问题。

此次会谈，原则上虽获得一致，但在具体执行时，他们不可避免有分歧和出入之处，希予以注意。

云泽

1946年4月5日

关于昭乌达盟行政军事 及蒙汉关系诸问题的决定

A. 关于热河北部昭乌达盟行政军事及蒙汉关系问题，与博彦满都等决定，解决办法如下：

（一）开鲁、林西、经棚三县，林东汉民行政委员会及克什克腾、巴林左、巴林右、阿鲁科尔沁、扎鲁特五旗，归昭乌达盟民主政府领导；开鲁暂归西满军区；昭盟受热河省政府领导。

（二）林东汉民区设汉民行政委员会，直接归盟领导。

（三）大板、天山、鲁北设汉民自治区，并在旗政府内设汉民自治科。

（四）盟政府委员蒙汉各半，盟长为蒙人，副盟长为汉人。

（五）一切汉人工作由八路军去做，负责人选由八路军指出。

（六）民主盟政府的选举，应尽快进行，于最近期内办妥。

（七）八路军之分区司令部等机关驻林东。

B. 规定各地内蒙古军队分别地域属八路军各军区领导指挥。

C. 此次热河省政府已给东蒙银洋三万元，救济王爷庙机关工作人员及贫困蒙民。

云 泽

4月10日

解放初期的林西

王逸伦

1945年冬，冀热辽中央分局派我到乌丹工作，当时乌丹属于热中。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张焕然、卜汝英、赵志良。我任司令员，张焕然任政委，赵志良是乌丹县长。

当时，全国的局势还比较安定，国共两党还未公开分裂，正在重庆谈判。热河省要召开国大，要我参加，并让我带上几个地方上的名人，我共带了五、六个人。有赤峰的张振元，有乌丹的几个，有两个女的，一个姓刘，一个姓王，还有一个叫包振国。我们一起乘木炭车到达承德，我被选为国大代表。

1945年10月，冀热辽中央分局决定成立热北地委，由我任热北地委书记，兼热北军分区司令员。先派副司令员卜云龙带两个步兵连开往林西。

在承德开完会，我也到了林西。我指示卜云龙要整理部队，派上支队长和政委。

林西县支队是1946年初建立的。

1946年“四·三”会议后，我到了林西。这时我们的部队与和子章发生了一次冲突。我们有个参谋长名叫石军，不听话，我指示他不要与和子章冲突，要和他谈判，结果他带了一个连从林西到大板去，让和子章打了一下。

5月，和子章打死了冬不冷的孙宪，抢走了冬不冷财粮助理张晓光的枪。

1945年冬，我与和子章谈过一次，但没有结果。

1946年冬天，苏军撤退回国。

1946年5月以后，中央分局决定成立热辽区党委，胡锡奎任书记，我为秘书长。

全国内战爆发承德失守，我随热辽区党委到赤峰。热辽区党委与热河省是平级单位。热辽区党委组建热辽军分区后，我任军分区政委，张苏任司令员。

赤峰失守后，我们又撤到林西。随冀热辽分局到林西的有鲁艺、热河省干校。这是我第二次到林西。国民党占领赤峰后，曾派出骑兵进攻乌丹南九十里的桥头镇。为保卫乌丹和林西，胡锡奎指示炸掉乌丹南桥，我认为没有用，没炸。当时张苏是司令员，我是政委，何挺是副司令员。在国民党向桥头镇进兵时，我们捉住了与国民党联系的一个土匪密探，他们（土匪）企图与国民党两面夹击我军。我们诈称是国民党的军队，问明了情况后处决了他，然后由张苏带队飞奔大木头沟，我随后赶到，又与一股土匪遭遇，被我击溃。

乌兰夫路过林西到乌兰浩特去，要干部，他指名要我去。我于1946年冬离开了林西。

（选自林西史料《解放战争时期的林西》）

热北建军问题

按：1947年2月中旬，热北地委（昭乌达盟委）在林东召开了扩大的干部会议。会前，在党内对于1945年以来热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回顾和调查。“热北建军问题”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尽可能客观地总结当时历史情况，现将马新同志在当时的调查整理稿附录于此。供考考。时间为1947年2月7日到9日。全部调查材料现存河北省档案馆。

一、建军的环境、条件、估价

1. 根据及特点。处于热北地区，有五个县（即林东、林西、经棚、大板、天山）。面积，东西长1200多里，南北700里（经棚、林西二县仅400余里）。气候：八路军来后变了，原来林西每年冻死20多人，前年八路军来后只冻死六人，去年一个也没冻死。今年冷到零下40度（室外），非皮衣不能过冬。春秋二季刮风沙。大者可以伤人，白天屋里燃灯。

地广人稀，原号称70万人口（连鲁北在内，约二二万人），蒙人占20万，回民2万。实际可能有42万。汉人12万※，系河北、山东、山西及朝阳、热中、热南移居者，生活艰苦朴素。

封建剥削重（尤其是蒙人），土地很集中。蒙人有三大地主，其地亩牲畜无法确实统计。此三家，即（1）杨树（松）格根，在根丕庙有其200余喇嘛，（2）塔喇巴喇嘛，（3）和子章。为热北三大封建巨头，东西财主还是第二等。

※可能为20万的笔误——编者。

热北为蒙古之家，又是蒙汉杂居之地，是建立我们民族武装的根据。因之，我们必须建立民族军队。

2.建军的过程。45年8月，红军解放热河，日人撤退，情况紊乱，大户为主到处招兵，查收财产，土匪四起。10月，王逸伦、张焕然到此开辟工作，利用旧熟人关系，一面委任让其自去招本（兵），一面加委已有的地主、土匪武装进行改造。并后共委任十八个支队，二千多人。都是地主武装和土匪、伪警察、特务，如姚占山、石荣、张振山部，都是土匪改编来的，有二百多人，枪马齐全。张振发、王瑞贤、盛世恩（王逸伦亲戚）等，则是地主武装改编过来的。十八个支队，只十四个支队有人，其他九个是空头衔。计：二支队，416人；四支队18人；五支队，412人；六支队，106人；七支队，3人；八支队，80人；九支队，210人；十支队，260人；十三支队，250人；十五支队，28人；十七支队，90人；十八支队，180人，共计2,013人。一支队、二支队、十一支队、十四支队只委有队长，无一兵一卒。

十月底，分区参谋长石兴军带110隆化伪讨伐队（投降我们的）来此。十一月初卜云龙带教一旅一个连来此，随后周耀山带一干部团121人来此（其中有赵正刚、张发廷等同志），以及谢志群又带来20多人。

十一月七号成立了分区司政供给各部门，当时未很好掌握、领导。刚到林西就派加委土匪张振山带100多人，以八路军名义去接收林东。蒙古人当时表示欢迎，和子章等出来接进城，进行慰劳，送好吃的，请客。席间还问及朱、毛健康及八路军中工作状况，张一无所答。且军队进城后，匪相毕露，乱抢乱吃。张本人抽大烟，又显大汉族主义态度，与林东汉人邢桐银结合，在街上贴打倒和子章标语。因此，和部包围下其余部枪马，说他是假八路，令速全部离开林东，于是，全部回到林西。

※应为师军。

当时，王逸伦对此态度很硬，要和子章全部交还枪马。和很戒备，对八路军印象不好。正在此时（枪马未还），参谋长石（师）军又带十三支队、六支队、讨伐队，从乌丹经大板到林东。刚到大板，和子章即派代表交涉，要他缓进。石（师）不听，硬坐汽车要走。代表告他前面有卡子也不管，就一直向林东前进。果然到林东几十公里地，和卡子上的人开了枪，两下接触，打死了石（师）军所代讨伐队二人，于是撤回大板。刚到大板，士兵即抢百姓东西达一百三十多家，因而大板蒙军又包围他们，把他们赶走，至此才撤回林西。林西此时成了孤城，两面受乱，东面和子章两次兵临城下，说林西是假八路，写信限旧年一定退走，“你们如果不退走，就要发生流血惨剧”。我们的工作连冬不冷村※也去不了。西面经棚此时又被张崇宣※※占领（张是当时国民党委为）。……红军※※※驻林西（架大炮、机枪于城墙上），方庆和等未敢入城。而城内此时亦紊乱异常，十八个支队，在满街设立支队部，抢杀百姓无所不为。当时摆在面前有很多严重问题：（1）部队财政困难，收集物资都被私人吞了，公家得的很少，因此战士无棉衣穿，无鞋穿，甚至有的班只有一双鞋，公用（谁出谁穿），部队中一些坏蛋则趁机发财，到处抓一把，百姓敢怒面不敢言。（2）军队无组织无纪律，一天到晚乱打枪。老干部干涉，新兵（即改编的匪警等）骑在马上说：“你没法，我抢，你管我干什么？”说着又打几枪才扬鞭加马而去。为争风，还打死我们一老干部。抓物资更是不择手段，吊打百姓……计全林西城被他们搜查的有200多家，打死的有七人。当时百姓说，“没有老八路，那些假八路我们早把他们消灭掉了！”（3）土匪四起。土匪多的原因：A、汤玉麟时代有十一万多人，走时一

※林西城东不远的一个村子。——编者

※※为张桐轩之误。

※※※即苏军。

个也未带走，结果大部当匪了。B、日本人在时也仍有土匪，如姚占山部当时抢富不抢贫，日本人始终未消灭了他。C、我们来后势力单薄。D、地主为抓一把，到处组织武装，因此当时土匪四起。（4）干部普遍不安心，因无坚持根据地思想，且地区不大，无工作分配，吃住在百姓家又苦，有些想升官又无官可升，因之多不愿接受工作，要回承德口里。赵志刚就说，段苏权骗了他们，原来热北不过如此！（5）民族问题又兵临城下（见上面）。据此，说明情况非常混乱，且部队番号、警务乱七八糟，很多人都不敢出门。

十二月，分区开会进行合并：

（1）把13、4、15支队编为骑一团，有642人，610匹马，下编四个连，任盛世恩（地主）为团长，张树新为副团长、石凤辉为政委，阎义林为参谋长（后三人为我们的干部）。

（2）把6、16支队及姚占山全部编为独立骑兵大队，有200多人，委姚为大队长，我们只派一教导员去。

（3）把10支队、讨伐队及15支队一部分，合编为步支队，任王仁选（林西警察）为支队长，有390人，下分四个连，我们派崔同喜为副支队长，李天再为参谋长及少数副连排长。

（4）3支队基本未变，委张振华为支队长，我们派吴振邦为副支队长，何一勤为教导员。

（5）以下云龙所带一个连（除抽调一部分干部外），补120多新兵后，编一个警卫营，有160多人，编二个连。这是全热北的基干部队。

与此同时，办一军政干部学校，学员除本地知识分子四十余人外，都是各支队里抽出来的大烟鬼、伪警察、特务、土匪。时间定一月。生活极散漫，时间表上还定有三小时抽大烟时间。以后因天冷也就解散了。学生回去后，跑的跑，有的当匪，只有四十几个知识分子留下工作了。

部队合并后，稍有头绪，但本质未变。领导权仍握在地主手中，派去的少数干部起不了作用，由住房子可以看出，谁看中了那幢房子就去住，毫不听分配，我们的干部只是背着包袱在他们马后走。成分仍是原样，以一团为例：土匪104人，老头169人（其中35—40岁的115人，40—50多以上的54人），抽大烟的107人，当过特务的14人、警察58人。

综上所述，可见这一时期（从10月至1月，也是最乱的时期）的缺点主要是：

（1）未掌握民族政策，（2）未掌握重心，放出了很多干部，未起什么作用，（3）乱搞物资，弄得民乱匪扰。我们之所以能维持住者，全赖红军的帮助与部分干部的坚持。

3. 建军的曲折到转变。一月里喻楚杰来，传达省委和军区关于群众运动及建军意见。喻力主建军。当时地委有三种意见，王逸伦主张散了算了。他曾叫徐国忠去土城子改编张振华，告徐能编就编，不能编就回来，这可看出他的思想。卜云龙是主要争取，慢慢改编。喻楚杰和谢志群则力主坚决彻底改编，要好枪好马掌握在好人手中。这三种意见争执不下，地委、司令部三次开会未果。最后喻楚杰严厉提出责任问题，始通过喻、谢整编意见。

二月开始整编，此时六十八团也开来此地，遂决定宣告整编骑一团，两次大洗刷，把二连全下枪马（该连最坏），最后只余180多人。接着又派刘昌去经棚、卜云龙去土城子分别整编。该次把姚占山部全下枪马，最后只余8人未下。

整编方式：（1）下枪马，（2）许假回家，（3）身体不好者，以不能下操为词，令其回家当良民。洗刷的标准：（1）土匪、特务、警察不要，（2）抽大烟的不要，（3）老弱病残废的不要。共计洗刷1,600多人，现在仅余旧兵200来人。枪马均大部拿到我手……经过这次整编、洗刷，情况大为转变：

（1）部队掌握开始转入我手（略）

(2)从洗刷中改变了部队成分 (略)

(3)财经制度和军风纪开始变好 (略)

4. 现获初步成就如下 (略)

5. 获初步成就的原因 (略)

兴安总省布告

第一号

为布告事赤军以解放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决心进军满洲日军闻声逃窜而败退了我兴安地带重见天日恢复了自由世界吾等蒙汉鲜各人民已得到了复苏之良机不胜庆幸者也本省长承受赤军之命令将旧兴安总省公署加以重新之改组设立了新的兴安总省公署凡在我省境内居住之各民族一律平等绝无种族之歧视民族之偏见一致团结与赤军协力共同维持我兴安地带之安宁秩序望我省内蒙汉鲜人民等各安生业不要恐惧其已逃往他处者急速归来安业工商各界务速恢复营业共同协力复兴我兴安地带之繁荣从前在各机关服务之官公吏会社员等望速各归旧职其服务机关尚未复旧者到西科前旗治安维持会联络总之吾等兴安地带之复兴事业必须以吾等自己之力更新建设不得再有偷盗放火等情事如有违犯行为一经查出绝不宽贷仰我蒙汉鲜等人民一体遵照为要切切此布

兴安总省长 博彦满都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

兴安总省训令第肆号

秘总第壹号

令各旗县长

关于制定地方行政建设要纲正派员指导关系书类随令附发仰遵照办理由

为令遵事查本总省公署已于八月十七日正式开厅执务诸般行政均按红军之指导展开新的建设中自不待言管内各旗县之秩序恢复民生安定等重要工作实为焦眉之急务本省有鉴及此兹制定地方行政建设要纲并行组织建设班日内即行分赴各地实际指导合亟检同该要纲并关系书类多份随令附发仰即遵照据实办理具报一个急速派遣要员来省连络以利旗务而安地方为要

此令

附件

- 一、地方行政建设要纲 壹份
- 二、地方行政建设班编成表 壹份
- 三、布告 肆份
- 四、宣传□□ 壹□份

西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兴安总省长 博彦满都

东蒙古人民政府树立宣言（译文）

自从人类公敌德日帝国主义者先后被打倒之后欧亚二洲内所有各弱小被压迫民族相继得到解放树立政权享受自由平等之生活举世呈现和平气氛诚吾人不胜庆幸者也内蒙古乃东方弱小民族之一历受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压迫与侵略民众渴望解放已非一日溯自满清入主中国为利用蒙古民族之武力并企图削弱蒙古采取怀柔愚弄政策相与缔结同盟关系阳示和好阴则大施其弱化蒙古民族之谋略三百年来以致吾蒙古民族几达无可救药地步嗣中国辛亥革命成功创立五族共和国家高倡一扫从前专制实行民主政治五族一律平等决无尊卑贵贱之分以相号召蒙古乃欣然参加以为吾蒙古民族复苏之良机至焉詎料共和成立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徒有共和民主之名而毫无其实至于少数民族之利益更未遑顾及蒙古民族之所期待者仍皆归为泡影迨至孙中山先生倡行三民主义推翻北京政府提倡民族一律平等有自治自决之权其伟大革命精神实令吾人可钦可敬者也吾蒙古民族以为自此可得真正自由平等焉孰意国民政府成立后政令不达边陲地方政权仍未脱军阀专横依旧施其压迫政策视蒙地如征服地视蒙民如奴隶开放蒙古土地以塞蒙民生计戍兵屯垦强制移民以夺蒙民牧场等等以致蒙古大众日陷贫困蒙古社会日趋黑暗因此蒙古有志之士为求民族之解放争取民族之自由数十年来曾多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惜皆遭受军阀摧残而行失败致吾蒙古民众辗转于军阀暴政威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似此蹂躏民众违反革命之黑暗政治实令吾人痛恨而悲愤者也其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入中国吾内蒙古地方首当其衡遭受其惨无人道之

压迫与榨取十四年间民众牧农财物被夺一空饥寒交迫已达极点幸去年八月九日伟大之苏联红军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为解放内蒙古及东北民众毅然出师归灭日寇吾人所渴望之解放于兹实现曷胜庆幸吾人对于苏联红军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参加消灭侵略者之联合国侧之感激实非以文字所能表现者也吾人复更念及指导此次战争胜利诸公不仅打倒人类公敌故直接拯救被压迫各弱小者于水深火热之中且为树立世界人类永久和平显彻底解放实行建立世界和平集团保障机构成文如大西洋宪章旧金山会议之协定及克里米亚领导之成立而联合国间对其规定尤皆忠实信守奉行为铲除将来纷争根源为确立永久和平基础使被侵略压迫之弱小者或从前无完整主权之民族及国家先后得到解放予以自治或独立者已不下十有余国似此义举诚全世界人类所同庆者也其与吾蒙古民族关系直接者如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且于同日伟大之蒋主席郑重发表声明曰“国民革命之目的对内求各民族之平等自由”“对持有自治精神与独立能力之民族必扶持其成长达成自主独立之目的示以中国为自由平等之邦”此不独吾同族之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独立国家之地位同时对于吾内蒙古赋与以树立自由政权之权利矣吾人对于蒋主席之伟大革命精神衷心感戴于此吾等根据蒋主席之发表及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大西洋宪章所称“尊重各民族在生存上所选择的趋向和形态恢复曾经被压迫过的各民族的自治例决的权利”更信赖国父孙总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内之承认中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之指示根据人民总意乃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于东蒙古葛根庙举开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公推博彦满都先生为主席于主席领导之下协心戮力发足开始吾等自治建设属自治区域以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呼伦贝尔布特哈二部及伊克明安齐齐哈尔苏鲁克三旗为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领域对于境内所有各民族无论其

现在与将来一视同仁政治上经济上及其他一切上当一律予以平等
待遇兹当吾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树立之际谨将吾等自治决意宣布
中外深望中央政府及其他各方对于吾等自治政府不惜援助指导俾
得健全发达则甚幸焉

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译文）

一、与一切赞许少数民族自治自决援助东蒙人民自治政府之各党、各民族各阶层紧密的团结起来建设自由的和平的民主的新东蒙、同时进一步为宗主国之繁荣发展而奋斗

二、打破封建余势、铲除不合理之特殊权益消灭侵害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健全发展之一切反动势力

三、反对利己的狭义民族主义、实行广义平等的新民族主义

四、尊重自治区域内之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之政治权、经济权、并积极赞助其发扬民族固有之文化

五、邻接各省县内居住之蒙民归属问题依其民意趋向与关系方面协力解决之

六、根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使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上各种事业

七、对于工人技术人员及各种专门家、不分其国籍种族之别、一律优遇聘用之

八、在尊重自治政府法律范围内允许任何外国人于自治区域内经营事业、及宗教文化活动、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

九、成立东蒙古银行、发行货币整理金融安定经济

十、发展各种公营企业、保护奖励私人工商业、欢迎内外财界投资、以繁荣经济、充裕自治区域内之人民生活

十一、发挥凡有物力、人力、智力、开发矿生、及地下富源、并保护天然森林、以合理的方法采伐木材、利用未垦地带、种

植森林、奖励个人及团体之造林事业

十二、建立一贯的、综合的轻工业计划、使自治区域内之消费生产、达到自给自足之目的

十三、设立产业立地计划，按经济地理之布状况、使牧、农、工、矿、各产业部门、均衡综合的发展

十四、强化牧畜业、建设近代牧场、彻底实行防疫工作、并提倡数量的增殖质量的改良

十五、废除国兵法、实行志愿兵制度、建立必须为人民服务、并为保障东蒙古人民之自治权、而斗争的军队、养成良好之军队纪律、以求达成军民一体的建军理想

十六、废除危害人民的警察制度、于必要时设立合理的人民自己的民警

十七、铲除奴化教育实行自由平等的真、美、善、勇、并重的合理教育，在最短时间，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极力增设各级学校、培养学生自治自勉的精神、提高教职员之质量与待遇

十八、积极输入国际文化之精粹、振兴科学发扬艺术文明、普遍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十九、救济失业者、及灾民、难民、并提高勤劳大众之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

二十、积极建设健全幸福的农村、牧村、组织农牧村自己的各种组合、俾免中间榨取者之剥削

廿一、废除“配给”“出荷”“献纳”各种统制制度、实行生产消费分配之自由经济制度

廿二、实行普遍的免费医疗制度、并于各地方设立医院、于人口集中地带、设置治疗所、并组织巡回治疗班、举全力扑灭风上病或传染病

廿三、严禁鸦片及麻醉药品之流毒、树立妥善彻底之断绝政

廿四、设置无线电台、及通信网、经营邮政事业恢复固有之驿站邮传制度

廿五、开发空路、极力提倡航空业并奖励民营航空培养航空人材

（这是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1946年1月通过的）

林东林西摩擦期间的有关信件（17件）

一、和子章1945年12月27日

给热北王逸伦等人的信

王逸伦、卜云龙
张盘新、张焕然 诸负责者鉴：

启者，自从东亚的法西斯日本全面降伏后，我们内蒙古的人民根据看这一次世界各弱小民族解放战发布被解放的宣言，同时在全内蒙领域内展开了新政治运动，一面强化内部的政体各级组织，一面公选了外交人民委员，分赴莫斯科、乌兰巴特尔、延安、重庆等各关系责任政府，请愿我内蒙人民的新政问题。目前我们的各地代表已经归来，各政府不但一致赞成和允许外，尚予以莫大援助。近日来业将在东北内蒙领域的一部铁路并各种矿工业以及军政全面接收完了。现在本委员奉令整饬昭乌达盟的地方政体组织和治安肃正各工作，是以督率人民革命军数万骑到看此地。

我们的人民革命军，始终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取一致行动的，同时也是最友爱的同志，我们不但丝毫不伤害他，一旦进出我们的领域内，我们还以贵客之礼相待，这是敝党的一贯方针，尤其以客观的立场言之，内蒙的革命对中国的革命有莫大的补益，此举稍具政治头脑者，皆亦为然耳。

自从红军肃清了内蒙的日寇以来突然现发了真伪难辨的，自

称共产党员的人，到处招集土匪和法西斯日本的残寇，滋扰被解放区域的人民陷于水深火热者层见迭出，以情此节谅在洞鉴勿庸赘述。

其次在巴林左翼旗地方，最初有奉王逸伦司令员命令着陈荣久支队长，称为中国第八路军建军，与该旗责任者商讨结果，支援一切誓以合作，嗣经几度周旋，该旗始终未负此言。继陈队长之后又有奉王司令员命令建军者，张纯三支队长到看该旗，在乡间即招集土匪大肆抢劫，伤害数起，该旗人民为自卫起见，群起反抗，结果将该张纯三所率之部属，已经解除武装。嗣经问讯后，始知与陈荣久支队长同出一辙。该旗为保持八路军的荣誉，将所解除之武器如数归还。自张支队长南行后，不但不能理解该旗人民之正当处置，痛恨之余，率驻乌丹一带的盛参谋长师旅长等大批伪八路军侵入巴林右旗大板上，该旗人民所遭之浩劫，不堪言状。继而该伪军进攻巴林左翼旗，又遭到了人民的反抗，追逐至大板上，彼时本应将残留在大板上之五六十名武装解除，只以大局具地及真正八路军之颜面攸关，再次放过。及至最近以冷静的观察结果，发觉在林西县内的各种施策，不但与新民主主义背驰，大有国民党之卑鄙的谋略之嫌，不啻破坏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爱民本旨。本委员既奉内蒙人民解放委员会之命，建设昭盟一带，因责任及管辖的领域攸关，不得不先行通告，故所诸位责任者，务于本月三十日以前率领真正的共产党和八路军退出林西经棚等地。余将由当地编成之武装土匪应交我方处置，并巴林右翼旗内损失之枪弹马匹牛羊及钱款衣类（如赔偿契约），林西县内损失之枪弹马匹人员以及捐入之宗款项全数交出，以作本党治下受害各旗县、地方行政、教育、治安等正当用途。对上项之损害，诸位责任者若无适当交待，难免破开情面，致使发生重大交涉，希将以上各节做具体的答复为盼。

倘诸位先生谅解内蒙的立场，为期退让时，不仅免去流血惨

剧造福一方之人民。在内蒙革命、解放事业上贡献良多，较任何援助均佳。今后更能增进双方的密切关系，尤其在中国内地革命前进上与内蒙解放事业两有裨益。以上供诸进一步的参考。

此文

敬礼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七日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党部
昭乌达盟政治委员清卓里克图印

二、王逸伦准备发给和子章的信稿

按：此信为王逸伦同志的一篇信稿，据信中所谈问题看，时间当为1946年2月2日到5日之间。至于寄出与否，不得而知。

这是我关于给和子章信的意见，您们详细考虑修改从速寄去，逸
子章先生：

一月二十六日曾寄去一信，并托代转王爷庙一函，谅早收到？本拟再作一次真诚的合作表示，以求得先生谅解，具体解决热北问题，以免人民涂炭而安蒙汉民心，不意仍未得先生一字复，而我平庄经棚木石匠境被蒙军袭击，林西四、五两区仍被占领，一、二、三区边境时遭蒙军扰害，王逸伦是假共产党，热河省府不合法，先生已受中央任命来打八路军后路之谣言，不断传来，一若不借用一切手段非驱逐我等出林西不可者，此等危害蒙汉人民利益，破坏蒙汉团结行动，实非号称革命家如先生者所应有的态度。

我们为着辩明是非，解除双方误会，达到蒙汉两民族之真诚合作，不得不将几个月来双方争执的具体事实，提供先生考虑，用

我们作和平解决材料，以求得热北问题的早日解决。

一、林东、大板事件不错，张春三部队，是我们新组织的一个部队，在林东纪律不够好，也是事实，但他们无丝毫反对先生的言行，他们以三、四个人敢去先生占据的有四、五百武装力量的林东街，已可证明他们虽幼稚，已多少知道一点蒙汉人民团结合作的道理，对先生是一种真诚合作的表现，而先生竟对之施行了下去枪马的污辱，先生必以为，这是因他们纪律不好，若然，先生站在蒙汉合作的革命立场，应将他们破坏纪律的事实具体的转告我们，我们必以法惩办，但绝不能以此作为反对我们的口实。

大板冲突，因是师参谋长不了解先生的具体情况 的粗忽行动，但他去林东的本意，是以先生作朋友而未作武装准备，并且乘汽车行路绝没有违犯纪律的行动，而先生竟途中截击，打死我们两个战士，此又系先生以友作敌的行动。

我军在大板固有破坏纪律者 站在革命立场，先生与敬文泰旗长应极真实的写信给我们，绝不应似敬文泰先生的损失单，将无作有，尽量扩大事实，使稍有识者一看便断定其不实，文件俱在，这是可以证明的。

二、林东大板事件，事实虽然如此，但我们为着和蒙民真诚合作，帮助蒙民解放，仍本着责己的精神，一再给先生去信，说明误会真象，以期达到先生的谅解，先生可将过去一切信件找出详看，是否有虚伪不实危害双方团结辞句？而先生的每次来信，都带着一些轻藐、诬蔑、甚至谩骂的辞句，不特骂到林西的我们，并且涉及热河省府，这一切也都有文献的证明，是不容否认或狡辩的。

三、我们为着争取先生的谅解，在林东大板事件后，除通信人员外，未向林东派过一个人，未向林东放过一枪，未拿过林东一草一木，未骂过先生一句，而先生则相反，作出下列许多事来：

1. 先生亲率部队摧溃我林西两个毫无抵抗的区政权，在遵

捕我干部后，剥去衣服又用枪打伤，此种行为即日寇对待俘虏也不过如此。

2.组织四、五两区土匪武装，先生派去的队长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宣称先生已受中央任命，专打八路军后路，中央不日用飞机送武器来，要知今日全国民主和平团结局面已确定，任何人都不能制造内战，若真有藉受中央命令进行内战者，不特是全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国民党的叛徒。

3.下去我们派去林东送信蒙古革命党员白晓山（按：据白晓山自述，他不是蒙古革命党员，当时是热北军分区第六支队长）的枪。

4.不时派人到林西一二三区边境抢劫，打死百姓，且一度进逼林西城。

5.二月五日派队袭击我驻经棚木石匣境内部队，缴去我供给人员枪马各一，剥去衣服，声言消灭八路军。

6.桑杰札布队长两次到乌丹给旗长去信，要清除八路军，并在乌丹自己承认错误后，又当面说王逸伦坐汽车去赤峰开会，抢去蒙民的牛马羊的幼稚笑话来。

7.很早以前，先生曾说出王逸伦是假共产党员的话，但在和苏县长会面时，先生已承认是误会了，不意此次先生的代表到赤峰又代先生说王逸伦是假共产党员，王逸伦是中共热河省委派到热北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负责同志，这在他几次去承德、赤峰开会，热北许多干部军队的派遣、红军军官几次向先生的证明中，早已证实，即三岁顽童亦不能再有疑问，而竟一再出于明达如先生之口，用意何在？真使人百思莫解？

8.自林东大板事件后，先生或亲身或派人没收了许多参加我军战士的家产，奸淫了许多妇女，逮捕了许多汉人，使许多汉人出走，过着祖国光复了而自己失掉家庭的流浪生活。

我们为着帮助蒙民解放是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但是蒙军

这些压迫残害汉人的行为，是否应该呢？请先生也考虑一下，先生必说，这是国特，那更奇怪了，参加八路军的是国特吗？

9. 阴历元旦，先生命令悬挂蒙古国旗，这我们没什么意见，但不挂者罚款两万元，这又是旷古奇闻！

四、我们认为，为着双方的谅解和团结，应该克己而薄责人，本此精神，我们对于在林东大板破坏纪律的军队，曾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处罚，将去腊因追逐侵扰抢劫林西百姓的蒙军而在大板境破坏群众纪律的军队，干部撤职，军队解散，解除武装，而先生对贵军的种种不法行为，进行了些什么教育呢？恐怕是受上赏吧！

五、以上是几个月来双方交涉的经过，谁诚恳忠实，谁猜疑狡诈，事实俱在，昭然若揭，任何人也诡辩隐蔽不过的。

六、不过我们站在帮助蒙民解放立场，应从大处着眼，不能计及细小，故愿仍本以往精神，真诚和一切蒙古革命人士合作，为着早日使蒙汉人民安享和平幸福，根据老松布来同志退出林西四、五两区的诺言和在赤峰的决定，特提出以下意见：

1. 林西四、五两区老松布来同志本确定自去腊二十八日后七日即退出，若逾期再发生冲突，应由林东负责，我们即去建设区村政权，先生所有军队应完全撤出，否则发生任何冲突完全由先生负责。

2. 林东大板各地参加我军的蒙汉同胞家属财产应妥为保护，严禁贵部下对这些人的非法行为，以使战士安心工作。

3. 我们拟于××日派一个部队去开鲁，路经林东，希通知各部队，勿发生误会，若再造成如大板之同样事件则完全由先生负责，这是根据在赤峰双方工作人员自由来往的决定。

4. 我们极愿于最近期间能与先生晤面，商谈热北一切问题，若同意希即赐晤面地点时间。勿此盼复即致。

敬礼！

（以下无署名和日期）

三、1946年正月16桑杰给热北地委的信

亲爱的八路军诸位朋友

这封信请诸位朋友转呈贵军的驻于查干木伦河西岸的指挥官，在阴历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与林西县长苏雷先生会谈之结果，在至本正月初五日之间，谁也不准任意越界。若有违反者，打死勿论，但其界为查干木伦河。虽然现在协定的期间已过，但彼此也很守本分的在严守着。使敝非常的钦佩贵军的信用。但有一事敝不明白！吾方队伍由河东岸经过时，常有枪弹飞来，这样事业已有过多次，吾方至再的忍耐，但贵方真不客气，再次的这样无礼。想这种行为，对于贵军的主旨实有莫大的关系，象这种行为，实不为怎样正大光明的事。将很贵重的弹药无为的消用，并且失去贵军的人格，贵方有何利可获呢？且吾方并不是惧怕贵方的威力。为了确守我方的军纪，所以虽有枪和弹并未向贵方射击过。但贵方真不知进退。这是否确贵军所干敝不能断言。也须其它人所为不定，但因弹系由西方射来，是贵军所为也不一定。所以希望见草后急速详细回复是荷。若以后再有这种行为时，吾方要不客气，那时贵方不要怨吾方无礼。敝人的意见如上述，请贵方见草后急速回复是希。回信处即请向树林子一带转交桑杰大队长即可，别不多述 祝

诸位健康

巴林左旗警备队
大队长桑杰（章）
一九四六年正月十六日

注：此信为公历2月17日

四、和子章1946年2月19日给热北地委的信

诸位同志、同胞惠鉴：

今有新林镇来警报，内云贵军骑兵二〇〇余名在小于屯地方居住等因，伏思，我们双方的根本精神是一个，因何互相残争呢？希望诸公即速派人报告王政委同志，严守前约，等候老布僧布来同志以及兴安不久来员，那时我们双方一定（有）互相携手互相谅解之一日。

特此革命敬礼！

不要一误在（再）误

敝人 和子章 二月十九

苏县长同志不另

八路军暂时停止工作，等候我们与你双方结（解）决吧。当初红军长官有言，在你们蒙旗由此不要前进。

五、喻楚杰1946年2月21日给和子章的信

和子章旗长：

老孙布来、胡克两同志带上之函，谅邀收览，未蒙赐示，深以为念。

关于林西四、五两区重归林西政府管辖推行政令问题，已商达有案，当承老孙布来面许，“阴历正月初五以前，林东部队即由四、五区撤出，如逾期不撤，发生误会，责任概由林东来负，”刻逾期已十余日，想贵方部队已遵约撤出，为了使林西四、五两区工作开展，群众早一天发动起来，四、五两区政府于本月二十四日即进入该区开始办公，根据施政纲领，逐步推行工作。

刻我主力三十旅已奉令进入热北，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内蒙的自治运动，剿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共建繁荣的热北。

我们的问题已积累数月，对各项工作影响是很大的，在这个问题上热北的蒙汉人民对你我是不满意的，我们应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怎样达到热北人民对你我的希望呢？我们认为有急待会商之必要，如你能于最近期间来林西一行，我们是竭诚欢迎，否则你如无暇西来，我们即行东去面会，如何确定，请速赐复。

此 致

解放之礼

谅邀收览

喻草喻下

二月二十一日

六、王逸伦、喻楚杰、卜云龙、张焕然

于1946年2月21日给敬文泰的信

赵旗长钧鉴、素仰阁下

素仰热心公益维护地方，颇得民族赞扬，尤于祖国解放，热北政权建立以来，事为蒙汉团结奔走辛劳，曷胜钦佩！

自去冬和子章先生率部进入林西县境，四五两区政权被摧，至今未复，群情愤慨，人心不安，一般民众曾数度要求，我方派员前赴该两区维持秩序，但我方为顾全蒙汉团结大局，坚持和平解决，一再忍让并未前往。所幸我与老松布来先生会谈结果，决定一月五日前和部撤出，如约执行。我方定于本月廿四日派员进入该两区进行工作，维持秩序、以安地方、而解民困，该两区与大板接壤，恐再生误会，特为奉告。

再者，蒙汉关系虽经会谈数次，双方都有谅解，但隔阂并未消除，实属不幸，热河省府军区对此均极关切，特派卅旅驻防热北，负有调解蒙汉关系，扶助内蒙运动，剿灭土匪之任务。故即函

约，贵方迅速派员驾临林西会商，使蒙汉团结问题早日获得解决，如贵方不能莅此，即请函告，以便我方派员前往贵处会面。

专此函达

顺颂

公安

王喻卜张

廿一日

注：此信当为2月21日，赵旗长即敬文泰。

七、和子章1946年2月25日给王逸伦的信

热河保安队驻林西王政委钧鉴：

敬启者，敝人保守疆界，奔往自治途径，严守秩序，恐有事故发生，率部下查阅边境，并无其他之意，因已派员赴赤峰解决一切之故耳。不意敝于二十三号已就回归之途同志等于二十四号黎明突入本旗边境兴隆村、永生号、五十家子等处射击杀戳，将守护五十家子公安队员二十余名俘虏、禁押，未知存亡。敝奉令自治，按照无党、无派、无种族之偏见，遵守革命宗旨，并无获罪贵军。又有日前苏联红军证定条件以及边界，不知何故并无通知越境侵占，敝不明其故，犹予之际，适本旗派往赤峰之员已回，持与胡政委联络签定之条约，今列于下：

- (1) 双方停止一切冲突；
- (2) 八路军方面对热北开展工作停止，保守现时状态；
- (3) 双方公务来往时互相保护；
- (4) 百姓及商人自由来往不得限制；
- (5) 若有大多数土匪双方联络删除。

由此条约观之，无侵占冲突之必要。今特奉函申明，敝意更祈各守疆界，将俘虏本旗公安队员并其武器、马匹请释放返还本旗属地，互相联络保护并重友好，似符所定条约，而近情理。

特此奉函 并希明复

和子章鞠躬

二月二十五号

注：此信当为2月21日

八、和子章1946年2月27日给三十旅的信

张 旅 长

张 副 旅 长 同志伟鉴：

谢政治委员

今奉大札，一切敬知内情，同时通知各村周知。今据本月中旬在赤峰会议胡政委同志之议定条约，敝旗绝对服从，且尽力欢迎。若反抗本条约时本旗负完全责任。

1.前日扣留之敝旗公务员王玉民、连世伍、王鼎臣等几名，请同志们释放回来，若后日贵处有事时，此等几名，敝旗负责完全从去。

2.新林镇、兴隆村等处之警备队队长任承藻、律松亭，陈旭东及小队长以下一百来名，请同志们鉴源（谅），不要留难，将该队员（放）回来实为（所）盼。（如蒙金诺该公务员几名释放时交与姚春阳可也）

特此革命敬礼

和子章谨上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九、热北军分区二月末给和子章的信

和子章先生：

前来信收到，所说你自己不到林西商讨了，我们认为这是很遗憾的事。这对求得林东大板人民的彻底解放是很不幸的表现，也没有得到你的真言真意竟要如何？不得不使我们发生疑惑。是

因为什么问题牵制着你难为，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都不许照这样做的，如果做了，也会在人民面前揭破的。

上次那斯图先生在新林镇代你提几个问题，当因那先生说你会到林西一趟，所以当时双方将所提问题未作正式解决，等你一齐会商后作最后解决，可是到现在又未见到你来，这些问题是否还须解决？如果继续拖延你想革命工作是否容许下去？决不能的！

三十旅和分区的部队要开林、大两地，因等待时间太久，一方均已准备就绪，深望你即来林西一趟，万一你真不来，部队向林东大板开发，如果发生误会一切罪恶全由你担当，我们概不负责。因为我们的手续已尽办到，你不接受置之不理，请很好考虑特此说明。

你接信后限十八号前定到林西会商，如果你实在不能远行，在五十家子会谈，亦可请速定时间。我们即派专人赶到会谈，再不能等待。火速之音，专此

你来时当有派队接你

绝对保护你的安全一切条件当可互相谅解取得一致

致此

军礼

热北分区 司令员
副政委
三十旅 政委

注：此信发出时间当为2月28日。

十、三十旅 首长于1946年2月28日

给和子章的信

和子章先生，

来信收到。

本旅奉命到热北第五军分区各县（林东、大板、林西、乌丹、经棚）驻防，其宗旨一再向你说明。

1. 维持各县之治安，即时休整部队。

2. 帮助建设蒙汉政府，扶植蒙汉民族之独立，及其经济文化之发展。

3. 剿灭各地散匪，使蒙汉民族安居乐业。

你提出的五条约，本旅未接到上峰指示，不敢轻易相信，因此目前本旅之行动，仍以原任务执行，即进军林东大板等地驻防。

请你负绝对责任通知林东、大板各地之蒙汉民族，当本旅向上述两地开发时，不准有任何武装抵抗之行为，否则本旅不问其属于何民族一律以优势之武器歼灭之。

王玉民、王鼎臣等，本军向抱中国共产党之宽大政策，全已释放，请勿念。

惟新林镇之公安队，全系该地维持治安之武装，现已归第五分区指挥了，你没有任何理由要这支武装归你，请不必想念。

此 致

春 好

三十旅 张

谢

张 二十八日午下

注：此信为2月28日。

十一、和子章于1946年2月29(?)日

向三十旅的回信

张旅长

谢政委 各位同志钧鉴：

张副旅长

来信收到。前约定在新林镇会议一节，旨因大板赵旗长同志未到，伏思此项问题并不是单独巴左旗一旗之事，所以等待大板旗长到，（着候）一同欢迎贵军谈判一切事宜。专此予前特派孟股长前往亲自接洽各位同志报告。

祝御健康并颂

春安

和子章鞠躬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十二、1946年3月1日和子章给王逸伦的信

王逸伦同志：

廿一日的信廿八日午后始接读，关于林西四、五两区，本应遵约撤出，碍以该两区民众一再要求，“在林西县接收前，暂给保护”，故而迟至廿日始下令撤出。恰于此时逢张旅长部北上，因敝部属“现地各小队长”由误会以至发生新林镇的冲突，此深以为憾事。

来函所约会谈一事，殊表赞同，地址规定在太本庙。如同意时，请即驾临，否则由贵方另行规定会商地址及日期亦可。但祈早速通告为盼，晤面匪遥，无他可陈。

敬致

革命礼

和子章

三月一日

十三、三十旅谢锺忠为进军林东、大板给 喻楚杰、谢滋群的信

喻谢首长并付和来信一封

和子章昨日又派老松不來及其孟股长等四人前來談判，主要是說明現在已去請趙旗長來，只要他到後，共同前來談判，如要待趙旗長來到，在時間上還要遲延二天，即陽曆的三月四日（今日是三月二日）。過了四號以後，五號我們即可以行動，並且三日和子章與趙旗長可能來，最遲是四號一定要來，照我估計，現在去大兵臨境，他沒有辦法不叫我們去，他自己沒有力量來阻止我們的，同時我們一再向他們說明，上級的命令、電報經常促我旅早日到達指定地方執行任務。這次林東大板是一定可以進去的。

因此現在對於林東、大板的問題要地委很好的討論，就是將來如何領導問題，到那邊去的幹部準備等等。兵力的調集也很重要，六八團除烏丹現在的二個連及一個營部之外，應全部集中。要土城子部隊兼程趕赴，以便五日或六日向林東開進，烏丹的二個連待我回去將這團解決後，即經大板到林東去。

旅部是否到林東？待我回去請示縱司。

土城子和經棚不能留六八團的隊伍。因為這幾個人沒有什麼新的問題，就只談這件事，所以他們未到新林鎮來，回去了，他們趕緊回去促和子章趙旗長來。

我明下午回新林鎮。

禮

弟

謝鍾忠

2 日

注：此信是68團謝鍾忠給喻楚杰、謝滋群的。

十四、谢镗忠为进军林东、大板给喻楚杰、 谢滋群的第二封信

喻、谢同志：

现在和子章、赵旗长派了他们的代表来谈判，但我们打听了一下，他们仍然是不能解决问题，故此我们再次提出要他们写信回去，请和子章亲自来谈，否则，不能解决问题，现他们已写信去了，请和到新林镇来谈判，大约明不到后天可以到。

现在这二个代表暂在五十家子等和子章，待和到后共同前来谈判。

为了解决林东大板问题，必须事先有很好研究，须要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如果是部队不到林东、大板去，就等于我们自己不要林东、大板；在蒙汉民族的纠纷上就等于加深了一层，就等于无原则的迁就了蒙奸，这是我个人的认识，因此我不同意部队不到林东、大板去。

目前的问题是这样，林东、大板热北分区是否要？如果要的话，不去部队是万万不行的，要想用谈判的方式，要争取和子章赵旗长归热北领导是不可能的，要懂得和究竟是什么人，因此态度一定要强硬，必须进兵，利用他现在打着革命的这个招牌，进兵林、大，是不会发生武装冲突（小的可能）。

如果林东、大板这二个县热北领导同志思想上是准备不要，那么我旅部队即干脆撤退，找地方休整。……

蒙汉民族之间的仇恨不是热北领导机关造成的，是数千年以来就存在这个仇恨的，这次与和谈判弄成僵局，以致某些方面的武装冲突，仅仅是历史民族仇恨的又一次反映。……

和来的谈判我不参加，今天我与六八团讲话，明日我返新林

镇，后天返林西，我在林西等候你们谈判的捷音。

专致

敬礼

谢德忠 三日

十五、敬文泰于1946年3月10日
给张盘新的信

盘新同志钧鉴：

日昨赴林之际，遵蒙逾格优待，衷怀感谢，莫可言宣，归来后，当即如约进行会谈之准备，一方并向左旗和旗长连（联）络，本拟如约前往，商酌贵我双方之地方事宜，可是在昨日接到和旗长的连络说，兴安方面派来建设昭盟的人员，业于昨九日到着林东，所以贵我双方之会谈似无于最近举开之必要，用特函达，希见字后，就解不能如约覆行之苦衷，稍候数日，则必能与兴安来员晤面，对地方事宜，作彻底解决之谈也，同时更希尊重胡锡奎、包玉昆各位于赤峰协谈条项。用以维持目前之状态，则所切盼不署者也。

余不及详、此祝

革命健（战）斗

1946年3月10日

敬

敬文泰

十六、李望淮、喻楚杰、张盘新于

1946年3月12日给敬文泰的信

赵旗长台鉴：

捧读来函敬悉，□切林东大板问题已迟延很久未得解决，甚为遗憾，蒙汉人民均渴望着早日解决以便各安生业而利民族团结。来信谈兴安派来人员业于九日到达林东，闻之不胜欣喜，望阁下速与兴安来员接洽并约定时间偕同该员等同来林西会商以期问题彻底解决。

(1) 我对大板问题的解决提出以下的几点意见：

1. 不改变蒙旗政府的组织，
2. 我们派工作委员会到大板帮助旗公署进行工作，
3. 为了减轻蒙民负担不在大板长期驻屯重兵。

以上几点意见，请阁下考虑速来回音，如于本月十八日前既不来信又无来人，卅旅即执行上级命令兵驱大板望勿发生误会，并希多方帮助。

致

敬礼

李望淮

喻楚杰

张盘新

12/3

十七、关于新林镇谈判，谢滋群、喻楚杰

给李望淮的信

李书记：

今天何派老孙不来，乌尼突宝二人来新林镇谈判（本来他们说去林西的）。谈判时，开始他们还找我们的弱点，谈起以后喻提出较强硬的问题及三〇旅谢提出较强硬的问题，弄得老孙不来，最

后无发表意见，即急着要返林东去给何子章商讨，故此未去林西谈判。

我们现感××我们是占了主动，而使无法应付我们，但也有可能对我们采取“反击我们”，望注意大板方向之警戒，经过情形一切材料送去，请阅研究。

最后他们答应我们三天回信（三月二日前）并说了何子章、赵旗长亲来谈清，不知他是否会来，待后再知道。

又决定何子章的队伍离五十家子廿里以外驻防，我们暂不越境，待何子章来谈后再处理。

大约情形如此。致以

敬礼

谢 喻
二十七日

五十家子事件后双方谈判记录

阳历二月廿七日何子章派老孙不来，乌尼突宝来新林镇谈判记录如下：

老：五十家子的公安队是何命我在该地调查四五区的蒙奸、国特的，所以住在此地，但被八路军突击了。

谢：我们按照你在民运部廿七日谈的何的部队阴历初五后即撤走我们还迟到二十三日才行动的，但得老百姓的报告新林镇、五十家子住有土匪，所以我们以军事的行动去消灭土匪的，打的不是何子章的队伍，是土匪之队伍。

老：五十家子地界，原是巴林左旗管的，但我们有责去治，因为这是以前蒙人开的荒地。

苏：地界不能这样算，五十家子等地虽有蒙人，但还是林西县境。说起荒地整个林西以前是没有的到现在不过卅余年而现算是算不清的。

谢：我们部队出发前二十一号送了两封信给赵、何通知，不要发生误会，此信是否收到了？我们部队到新林镇后又给何赵两信是否收到？

老：这些信均收到了我看了。

苏：何这次叫你们来谈是些什么具体问题？请详谈提出来。

老：执行五条你们是有何意见？

谢：这五条签字我们还没有得到上级命令，仅看到你们写来的信说的，但今天我们未收到前还是执行上级原来对我的指示，为了互相团结，我们执行尚尽可商讨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为上级没指示我们不能详谈此题，还是执行原来指示，因为林、大两地是我第五分区的地域，我们有责任并要很快去帮助蒙汉人民赶快组织起来为蒙汉人民谋利益的，是为蒙汉双方谋利益的，并不是站在那一方去解决问题，建立蒙汉政府为目的，为五分区蒙汉人民求得彻底解放为目的。

苏：你们是否带来五条签字的证明？

老：证明文件没带还在何子章那里，你们最好派人去与何谈好吗？

谢：我们今天是不去，要何来此谈更好。

三〇旅谢：我奉上级命来热北大板、林东等五县驻防剿匪维持治安，扶植蒙汉团结，建立政府，部队是整休，我们没得上级命令前我们是执行原来之命令，这事请你们通知何子章，赵旗长准备粮草，我们部队去了不许任何抵抗，如抵抗那是你们负责，部队很快开此，现在到了一部份，很快也要向林大两地开去。

喻：我提出几点意见：

- 1、现在林东、大板划为热河第五分区管辖防地，对谈判是抱合作团结的原则，但何子章不相信我们，不见我们，是何道理？

- 2、老孙不来，何子章答应在二月廿七日谈判中说何子章部队于阴历初五退出四五区，如不退出发生冲突由何子章负责，我们于廿三日才到新林镇、五十家子，为什么没有退出？

- 3、何子章部队提前开入四五区有什么道理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并且放林西县长韩寿天这是为什么？

- 4、今天我们没有必要与何谈判，我们写了很多信派了苏县长去还不信，我们请你回去告诉他，如要谈请何本人来谈，如他本人不来，请王爷庙派代表来谈，我们相信老孙不来，但只起传达作用。

- 5、昨天何的来信说本军越境，这是四五区地方，这问题

提出是不适当的？

6、何来信说，要我释放俘虏，你们早说初五后即退出了为什么我们打土匪中还有你们的俘虏，这是什么道理。

7、老孙不来在民运部廿七日谈把张岳福送给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没送来，即是革命党做的事为什么不执行。

8、本军奉命驻林东、大板，任务是帮助蒙汉政府独立自主维持治安、剿匪请转告何子章我们去时绝不要发生冲突，如是我们是当土匪打击彻底干净消灭之。

9、我们赞成蒙人独立自主建立武装，蒙人归蒙人指挥，汉人军队归口驻军指挥。

10、请二位先生回去绝对不要发生误会，如完全是何子章负责，只有团结精神来谈，最好请何本人来谈，或王爷庙来谈你们二人我们是相信的，但不能与何作主，只可传达作用。

苏：红军解放后热北人民痛苦我们去何子章那里谈判而何处用枪威赫我们，并打伤区长，下枪脱衣服等事为什么不信。

老：五十家子永生号只剩两个中队，我们告诉他这两个中队如八路军来了要欢迎，绝对不打的。

苏：我们手续已办到部队临走时已写信告何赵要他们不发生误会，但军事行动秘密这是对付土匪，不是打你们的部队的，为什么廿四号下午又来袭击我们，将我们指导员打死，打伤战士二名。

谢：部队开入大板、林东我同意，因为大板、林东是革命区域，我们可以自由驻防休整。我认为何子章先生是革命党的话，不但不应阻止而应该欢迎。

老：最近八路军到五十家子，而白塔子的人民跑了，因盛参谋长过去之事例，而害怕，当然贵军要去，我们是不阻止的，可是人民都跑了，我们工作是受到损失的。

苏：林东、大板老百姓要走了那责任是何子章要负 的，举例经棚、乌丹蒙民为什么与八路军合作？

老：部队进入林大两地，我们先回去与何商讨再回信。

谢：二位回去与何商讨我同意去，而部队在五十家子，可以暂时不向前开进，待限时间回信（三月二日前），待决定部队开进办法，并请何赵二人来此谈判。

喻：你们部队退出五十家子廿里以外，如果本军在五十家子受到任何部队袭击那我们即坚决干脆消灭这股土匪，如果你们三月二日前不来谈，我们部队还是继续以前计划执行。

老：何子章不知回林东了，如没有回我们即随他来，如不在白塔村了，时间可能长一点

谢：如果何不在白塔村你们应派人来说明才对。

老：我们今天即回林东去，不去林西了，因为我们才从廿号到林东驻不多久即以五条签字到林西谈清的，所以现在要回林东去见何商讨。